裕仁天皇传



程永明/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他坚持一夫一妻制；

他亲历日本从发动“二战”到战败投降；

他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最高责任；

他促进了战后日本的发展，他的功过至今颇具争议。

他，就是裕仁天皇。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80688-692-2



定价：32.80元

裕仁天皇传

程永明／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裕仁天皇传／程永明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0688-692-2

Ⅰ.①裕… Ⅱ.①程… Ⅲ.①裕仁（1901～1989）—传记 Ⅳ.①K833.1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0609号

责任编辑：徐　晶
特约监制：罗　毅
特约策划：罗　毅
特约编辑：高红玉
装帧设计：李　石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23366354
传　　真：（022）23075303
网　　址：www.tssap.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295千字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80元

目　录

第一章　皇孙裕仁降生　重臣精心培养

皇孙裕仁降生

1901年，日本皇室迎来了一个大喜的日子。在这一年的4月29日，位于东京青山的皇宫内院，被紧张而喜悦的气氛笼罩着，年仅18岁的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的王妃——16岁的节子即将分娩了，皇宫上下无不焦急地等待着。助产婆岩崎、护士田中等人都神情严肃，紧张而忙碌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生怕在接生过程中出现丝毫的纰漏。

据说这一天的天空一直阴沉沉的，可是快到傍晚的时候天空突然放晴，西方出现了壮观的火烧云。晚上10时10分，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打破了皇宫的寂静，满面喜色的女官跑出来报告："王妃生了一位太子!"皇宫内顿时一片欢腾。日本又诞生了一位天皇继承人，皇统的延续终于有了保证，王妃节子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节子是嘉仁皇太子多名王妃之一，出身于显赫的藤原家族[①]。自从1758年桃园天皇诞生以来，所有的天皇都是王妃生的，而并非皇后所生。为了顺应西方的礼仪标准，从明治天皇开始就颁布了新的皇室法典，规定以后只有皇后所生之子才能成为皇太子，但同时对这一规定又附加了一条说明，那就是只有名副其实的皇太子的生育者才能成为皇后。因此，已与嘉仁皇太子订婚的节子，是否能与嘉仁结婚并成为真正的皇太子妃，将取

---

① 在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几个家族以其女儿先后侍候过八十多位天皇而闻名，藤原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决于腹中的婴儿。因此，这一男婴的诞生，也预示着节子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

这位命中注定要与世纪同行的新生儿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裕仁天皇。日本在20世纪经历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将与这一名字紧密相连。他也将成为日本兴衰沉浮的整整一个时代的象征。

得知皇孙降临的喜讯后，明治天皇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下令将香槟酒遍赐给寝宫的侍从。婴儿出生后的第七天，恰好是5月5日日本的端午节。按照日本的习俗，要为婴儿举行庆贺仪式和命名仪式。明治天皇为皇孙命名裕仁，尊号迪宫。名和号都取自汉籍《尚书》，“裕仁”之“裕”字语出“裕乃以民宁”（社会富裕，人民才得安宁）之句，而取“仁”字则是千年以来皇室形成的习惯，凡天皇家男子的名字大都加有此字。号中的“迪”源于“允迪厥德”（真诚地履行其德）一句。

按照当时皇室的惯例，裕仁出生70天后，应该离开双亲，被送到外祖父九条侯爵家抚养。但明治天皇在与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商议后认为，应该把裕仁寄养在一个家庭环境好、夫妻健在，特别是武功显赫的家庭。据说明治天皇“钦定”武功显赫的军人之家作为皇孙裕仁的寄养处，主要是希望将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军事统帅。但也有另一说法，认为明治天皇想让皇孙离开患有精神病的嘉仁身旁，希望他能够健康、愉快地成长。

但原因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日本皇室历来有许多陋习，对天皇周围嫔妃的称呼和地位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对这些妃子们来说，宫廷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在日本天皇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不乏女性称帝的先例。但1890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对皇位的继承作了明确规定，即只能由“皇子皇孙”继承皇位，实际上杜绝了皇族女性后裔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规定为众多皇妃们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博得天皇的宠爱并为其生育男婴，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在皇宫中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母以子贵”。因此，出于嫉妒心理，妃子们常常会彼此憎恨、相互羞辱，甚至做成纸人或草人，将对方的名字写在上面，放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或者把它们偷偷地钉在皇宫内的大树上，以此来诅咒婴儿。嘉仁皇太子的生母柳原爱子刚怀孕的时候，据说就有人在走廊上泼了油，想让她滑倒流产，在宫城内的红叶山上，也出现了诅咒她的纸人和草人。甚至还有人在她的住处放了一个水盆，里面泡着一个鼓鼓囊囊装满豆子的袋子，诅咒她腹中的婴儿难产，就像袋子里的豆子一样，再鼓也

不能从袋子里出来。

因此，为了将来作为皇位继承人的裕仁不致成为这种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牺牲品，明治天皇决定将出生不久的裕仁寄养在民间。明治天皇和宫内大臣最初选中的是大山岩元帅家，但大山岩或许是感到抚养皇太子的责任过于重大而婉言谢绝。无奈之下，明治天皇又选中了川村纯义伯爵家。65 岁的川村纯义是旧萨摩藩武士出身，曾参加过幕末的尊王倒幕运动，明治维新之初任海军中将，曾三次出任海军大臣，其后又担当枢密院顾问官。而川村的女儿花子嫁给了嘉仁皇太子生母柳原爱子的侄子义光伯爵，所以川村家同裕仁也有姻亲关系。更重要的是，川村是一位笃信儒教和武士道、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元老。据说这一点才真正是川村被明治天皇选中的理由。

考虑到大山岩元帅婉言拒绝的前例，为了能让川村接受这一任务而不便推辞，嘉仁皇太子专门召见了川村，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川村说："我想让您抚养最近新出生的皇孙，天皇和皇后也认为您是最适宜担此重任的，您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孙子来看待吧。"话已至此，难以推辞的川村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任务。

7 月 7 日，裕仁在侍医、护士、奶妈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川村的府邸，明治天皇夫妇、嘉仁皇太子夫妇也一同乘坐火车前往。当见到早已在火车站恭候多时的川村时，平时不苟言笑的明治天皇此时也满面笑容地对身边的女官说："今天朕心中非常高兴，川村前来车站迎接皇孙，看他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也感到很愉快。"显然，明治天皇为给皇孙找了一个满意的家庭而心存欢喜。

寄养川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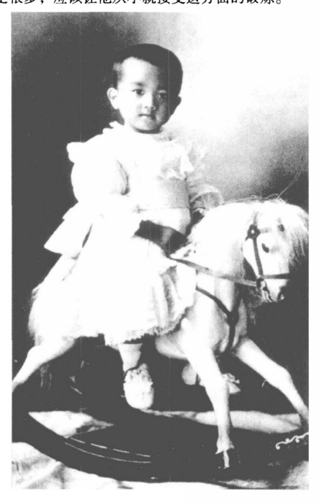
裕仁在川村家度过了 4 年时光，在这 4 年中，川村一家对裕仁的抚养可谓尽心竭力。为此，川村本人甚至连唯一的爱好——打猎都放弃了。

川村在自己的宅邸专门为裕仁新建了住所，并派了三个奶妈、两个护士昼夜轮流侍候。川村夫妇也经常睡在裕仁的邻室"侍寝"，帮助照料裕仁。为了使裕仁能够健康成长，川村一家常常带着裕仁随季节的变化而转移住处。夏天住在日光、箱根，冬天则住在沼津、叶山。可以说是各个方

面都考虑到了。

非常注重皇孙穿着的川村，请日本驻法国大使为裕仁在法国定做服装。这些服装都是仿照法国贵族孩子的服装式样制作的，有镶嵌花边的西服，也有用凸纹红条纹布缝制的水手装。但似乎裕仁并不喜欢这种红条纹的水手装，所以川村又特意为他定做了黑条纹以及白底紫条纹的水手装。

裕仁的玩具大都是从外国订购的。日本的驻外大使非常留心，一旦发现好玩具便买来送给裕仁。为了从小就培养裕仁的尚武精神，他们送给裕仁的多是一些大炮、军舰、西式帆船等玩具模型。此外，对裕仁关怀备至的明治天皇还特意送给他一匹大木马。明治天皇认为，自己的皇孙将来骑马的机会一定很多，应该让他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锻炼。



裕仁骑着明治天皇赠送的木马（时年3岁）

虽然在生活上对裕仁百般照顾，但在教育上川村对裕仁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认为重点是要培养裕仁健康的体魄和克己的精神。川村曾说过："花匠把花木扭弯，使其不能按自然形态成长，这就是诸侯教育的明显弊端。承担教育重任的人，应该启发孩子从小就养成大胆勇为、尊重他人、不畏艰难的性格。决不能让他蛮横任性、刚愎自恃。"① 因此川村并不是事事都迁就裕仁。有时裕仁淘气撒娇，川村便会吓唬他："你要再淘气，就别住在这里了。"有时，川村夫人精心做好的饭菜，裕仁却把筷子丢在一边，说不好吃。川村便假装生气地说："如果你再这样任性，我就不给你饭吃！"从小就生活在川村家的裕仁，心里早就将川村夫妇当作自己的父母，所以这种方式很是奏效。每当川村警告或吓唬裕仁时，裕仁都会变得很听话，连说："是我不好，我吃，我吃。"

1902年10月，裕仁的弟弟淳宫雍仁亲王（后来的秩父宫②）出生后也被寄养到了川村家。这样，川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川村为了不辜负明治天皇以及嘉仁皇太子的信任，竭尽全力抚养两位亲王。1904年8月，69岁的川村因患肾衰竭，怀着"抚养之责未竟"的内疚之情逝去。川村的儿子铁太郎以财力不足为由，谢绝继续抚养皇孙。无奈之下，裕仁和弟弟被送回到父母居住的赤坂离宫。

虽然回到了赤坂离宫，但裕仁依然未能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进了一个小院。明治天皇委派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领导人木户孝允的养孙、宫中顾问官木户孝正负责抚养皇孙。这也使得裕仁和木户家的关系非常亲密，木户孝正之子木户幸一后来成为裕仁的心腹宠臣，曾担任宫内大臣和内大臣之职，深得裕仁的信任。

幼年时代的裕仁

1906年春天，6岁的裕仁开始和其他同龄的亲王子弟一同到专门设立的皇家幼儿园上学。当时，久迩宫邦彦亲王的女儿——后来成为裕仁妻子

---

① ［日］河原敏明：《日本天皇——裕仁》，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② 除了皇太子之外，其他皇子在成年或成婚后，会经宫内省批准建立一个宫家。宫家不同于作为幼年称号的宫号。以裕仁的二弟为例，名雍仁，年幼时号淳宫，成年后建立的宫家为秩父宫。

的良子也在这个班里。据说，每当吃午饭的时候，裕仁和弟弟坐在饭桌的一边，而良子则和妹妹坐在饭桌的另一边。裕仁常常笑嘻嘻地看着良子，弟弟吃完饭便会起身离开，而裕仁仍和良子相视而笑。当时担任幼儿园主任的幽香小姐见此情景，曾说道："他们两人将来说不定有缘吧。"没想到这句无意中的话后来竟成了事实，良子果真嫁给了裕仁。

在这所皇家幼儿园内，上课的老师都来自贵族学校，虽然他们面对的都是出身显赫的皇子皇孙，却敢于严格管教，并热心传授知识。其中有一位叫植谷的教师，酷爱生命科学和海洋植物学，常常带孩子们到动物园、植物园、神社、公园等地方去开展一些有趣的课外活动，这对裕仁后来走上研究海洋生物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

对这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来说，玩耍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捉迷藏、夺旗帜等游戏，有时也到院子里摔跤、捉虫子。日俄战争后，他们又增加了"日本海大海战"的游戏。裕仁常将自己的铅皮玩具军舰拿出来与伙伴们玩耍，把军舰分为两列，然后互相冲撞。到了暑假，裕仁他们还到叶山行宫避暑，分成两伙玩打仗的游戏。

在与伙伴们的嬉闹中，裕仁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相反，与同龄的儿童相比，裕仁显得虚弱、瘦小。他走起路来有些拖脚，这也许是从他祖父明治天皇身上继承的缺陷。由于脊柱侧凸，他不能挺直腰板，眼睛也近视。这些缺陷使得裕仁在游戏中常常显得笨拙，动作不灵活，再加上他所处的未来天皇的地位，使得他与同学们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

与裕仁相比，弟弟雍仁则个头大，力气壮，性格外向，爱当孩子头，其他孩子也愿意和他一起玩耍。裕仁和雍仁朝夕相处，难免会有斗气打架的时候，每次都是雍仁将裕仁摔倒或是把裕仁弄哭。有一次，雍仁甚至趁哥哥不注意，拿起大炮玩具冷不防砸在裕仁的头上。这次可闯了祸，雍仁不但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还被罚在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像前请罪，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干了。成人后的雍仁曾回忆说："说起来我是老二，却总爱吵架。我知道自己经常爱和哥哥吵架，弄得他没法对付。"然而唯独在相扑上雍仁不如裕仁，虽说裕仁个头比较小，但在相扑时从来不服输。裕仁对相扑的酷爱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由于裕仁所处的特殊地位，众人都对他这位未来的天皇群星拱月般地精心呵护。当裕仁从稍高的地方往下跳时，侍从们会赶紧伸手将他从半空

接住；裕仁摔倒后在自己爬起来之前，侍从也会赶紧把他抱起来。也难怪弟弟雍仁经常讨厌地说："哥哥摔倒了，自己爬都爬不起来。"在这种呵护下，裕仁也养成了一种旁人所不及的优越感。在和同伴玩打仗的游戏时，裕仁必定当"司令官"，而总喜欢当孩子头的雍仁则只有做"先锋官"的份儿了。由于裕仁与雍仁性格不同，即使在成年后仍在许多方面观点不同，以至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秩父宫雍仁公然支持叛乱的皇道派一方，使裕仁非常被动，这是后话。

裕仁虽然生性孱弱内向，但有时也有过人之处。据说，有一次，裕仁正在与伙伴们玩"骑马游戏"，首相桂太郎恰好前来为他祝贺生日。这位在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首相，当时身着陆军大将服，胸佩闪闪发光的勋章，显得威风凛凛。但裕仁对他却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央求桂太郎道："老爷子，来得正好，您当马让我骑骑好吗？"对皇孙的请求，年过半百的桂太郎无法拒绝，只好四肢着地驮着裕仁在地上转了一圈。另外，据说有一次裕仁和两个弟弟[①]去给皇后请安后便留在那里玩耍。不久，元老重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七人走了进来。他们一个个身着盛装，佩戴勋章，等待天皇的召见，室内气氛严肃庄重。裕仁的两个弟弟赶紧退到了一旁，只有裕仁还站在那里，盯着他们不动。伊藤见状，就俯身问道："你是皇孙陛下吧？"裕仁立即答道："是的。"接着又反问道："您是谁呀？""臣是伊藤，今天承蒙令祖父厚赐，特来拜谢。""那这位又是谁呀？"裕仁把脸又转向其他人问道。于是，伊藤便把与他同来的几位元老的名字一一告诉了裕仁。接着，裕仁又指着伊藤佩戴的勋章问道："你戴了这么多的勋章，今天获得的是什么勋章呢？"伊藤忙回答道："是这个。"裕仁又指着其余的勋章追问："你佩戴的这些又是什么勋章呢？""这些都是外国颁发的勋章。"伊藤于是一一向裕仁解释了这些勋章的来历。看到年仅6岁的裕仁谈吐如此从容，在场的各位元老既感到惊奇，又十分高兴。

裕仁与乃木希典

1908年4月，已到学龄的裕仁进入了专门为皇族和华族子弟设立的贵

① 裕仁的三弟光宫宣仁亲王（后来的高松宫），于1905年1月3日出生。

族学校——位于东京四谷的学习院初等科学习。学习院不属文部省管辖而是由宫内省管理，是专为皇室培养栋梁之才的学校，拥有许多特权。例如，在明治和大正年间，学习院的高中生可以免试直接进入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

学习院初等科编为两组，东组约30人，西组13人，裕仁被编入西组。明治天皇为加强对裕仁的教育，特意任命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伯爵为学习院院长。乃木对天皇忠心耿耿，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效尽犬马之劳。在日俄战争中，他亲临战线指挥旅顺攻坚战，双方死伤10余万人，战场上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战斗中殒命。由于旅顺要塞久攻不下，据说曾有人提议撤换乃木，但被明治天皇阻止，乃木为此对明治天皇感激涕零。

在明治天皇看来，乃木不仅具有传统武士的“优秀”品质，而且还精通儒学，擅长书法，具有高深的个人素养，是负责未来天皇教育的不二人选。而乃木也深感明治天皇的信赖和恩宠，把培养裕仁看作自己生活的全部，也是自己最后的应尽之责。

学习院表面上气势华丽壮观，但在教育上却似乎有些软弱无力，缺乏质朴刚健。乃木的忧虑也正在于此，他认为对未来的天皇来说，接受这种教育是不太适当的。于是新上任的乃木院长一心要改变校风，为教师们制定了教育皇孙的几个方针，包括健康第一，对不良行为要及时予以纠正，对学习成绩不能庇护，养成勤奋的习惯，生活朴素，注重军事方面的教育等。乃木还为前来就学的其他贵族子弟也制定了12条戒律，以使他们将来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他期望的那种优秀的武士。

乃木除了负责学习院的全面工作外，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裕仁身上。大到任课教员的选择、意志品质的塑造，小到穿衣走路、言谈举止，事无巨细，无不过问。

学习院与裕仁居住的赤坂离宫相邻，只隔一条马路。开始时，裕仁常常穿过赤坂离宫的鲛桥抄近道去学习院上学。乃木知道此事后便告诉他：“应该与其他人一样上学才好。”此后，裕仁便改从离宫正门出去上学。

每天早晨，当裕仁来上学时，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乃木总是要到学校门口恭迎裕仁。此时的他一改过去那狰狞的战神面目，白须垂飘，笑容可掬，用标准的军礼向裕仁还礼。为了把裕仁培养成为一名一丝不苟的军人，据说有一次裕仁要回皇宫，乃木送他到门口，裕仁举手敬礼，但乃木

并未马上还礼，而是待裕仁纠正姿势并再次敬礼时才予还礼。

乃木总是让裕仁穿着普通的衣服。他曾吹嘘说，他和裕仁从来不知道穿贴身丝绸内衣的感觉。那时，裕仁跟随乃木学习相扑，裤子和袜子经常磨破，乃木便让裕仁补好后再穿。此后，裕仁改变了破了就换新衣服的习惯，常穿补过的衣服去上学。他还常对身边的女官说："院长说了，衣服破了当然不能穿，但补好再穿，也就不算丢人了。以后如果衣服破了，就补好了再穿。"

此外，乃木每个月还要在院长室与裕仁谈几次话，有时跟裕仁讲自己在打仗时的经历与奇闻，有时给他讲一些作为未来天皇应有的品德等。

最令乃木担忧的是裕仁那瘦弱的身体和笨拙的举止，他认为这会妨碍裕仁将来正常履行天皇的职责。为此，他经常教裕仁相扑和游泳。冬天，他们到外地避寒时，乃木不让裕仁围着火炉烤火，而是让他去跑步，甚至让裕仁像自己年轻时一样，赤着身子站在冰柱下，直到他能控制住发抖的身体安静地站在那里为止。他还常常向裕仁灌输这样的观念："凭借锻炼和意志，就没有改变不了的东西。"

为了督促裕仁的学业，乃木还经常亲临教室，检查教学。这使得性格内向的裕仁特别害羞和难为情，担心在回答时出错令院长失望。有一次正在上音乐课时，乃木走进了教室。裕仁向来对音乐和手工不感兴趣，任课的小松耕辅老师竟然指名让他唱《楠木正成》[①] 之歌。当时裕仁唱得虽然不是很好，却很用心。乃木不禁连连点头，感动得流下热泪。

在学习院期间，年幼的裕仁已将乃木"敬为神灵，尊为严父"，不允许身边的人称乃木为"大将"，而必须称"院长阁下"，以表示对恩师的尊敬。对于乃木的教诲，裕仁更是言听计从，并尽力做到使乃木满意。经过数年的锻炼，裕仁已出色地掌握了游泳技巧，并成为高于一般水平的高尔夫球爱好者以及同龄少年很难战胜的相扑手，自信心也大大增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乃木的教诲和影响。

裕仁小学时期的成绩并不算优秀，只能说是中等偏上。音乐和手工的成绩最差，国语、作文的成绩也不太好。教他历史课的大森金五郎教授曾

① 楠木正成（1294—1336年）是后醍醐天皇时的一名武将。他推翻了镰仓（北条氏）幕府后，天皇才得以重返京都，改年号为建武，故称建武中兴。后来日本历代统治者都将楠木奉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甚至誉为"军神"。

向记者坦率地透露：殿下的成绩开始时不如他的弟弟（淳宫雍仁亲王），后经努力，成绩才算有了提高。但这种率直的谈话犯了忌讳，因此这位教授很快便被免职了。不过，裕仁勤奋好学，做事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却也是事实。

其他成绩虽一般，但裕仁对生物却有着浓厚的兴趣。1913 年 6 月，裕仁上六年级时，曾经毫不畏缩地抓住了一条菜花蛇。后来这条蛇被装在玻璃容器里，以他的名义送给了学习院，如今还陈列在生物标本室里。每逢暑假，同学们总爱拿着捕虫网在附近的山野里捕捉蝴蝶、昆虫。在盐原的行宫度假时，裕仁还曾在附近的田野抓到了一只附近一带很少见的、被称作“大紫”的大型蝴蝶。平时在制作标本时，其他孩子们只是将昆虫按图案摆得看起来漂亮一些就行了，而裕仁却要将标本认真地进行分类排列。这种小学时养成的爱好，无意中使他后来成了有名的生物学家。

明治天皇去世

明治天皇从 1906 年就患上了糖尿病。1911 年秋天，明治天皇前往福冈县视察日军大演习时，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病情加剧。1912 年春季后，又并发尿毒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三浦谨之助和青山胤通两位医学博士作为御医，日夜精心地为天皇进行治疗。1912 年 7 月 20 日，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省发布公报：“自 19 日下午以后，圣上精神略呈恍惚状态。”对一向把天皇奉若神灵的日本国民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从这一天起，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便纷纷聚集在皇宫的广场上为天皇恢复健康而祈祷。同时在日本各地，更多的人拥向当地的神社祈求天神保佑天皇。

接到明治天皇病重的消息后，正在外地度暑假的裕仁和雍仁连忙赶回皇宫探视。此时的明治已进入弥留阶段，认不出面前的两位皇孙。当裕仁探视出来，大家问起他祖父的情况时，他只说了一句“今天晋见爷爷的时间很短”，说完便失声痛哭起来。

裕仁把乃木尊为“严父”，但对明治天皇的形象，更多的是“畏惧”和“尊敬”。在裕仁的脑子里，似乎并不存在诸如“亲热”和“撒娇”之类的感情。明治虽然平时对自己的皇孙非常关心，但那种感情却是深藏不露的。祖孙见面也仅仅只是在参拜仪式上，相互间说话的机会很少。因

此，裕仁即将失去祖父的痛苦，与其说是出于亲情，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对祖父的尊敬。

1912 年 7 月 30 日零时 43 分，在日本天皇史上享有盛名的明治天皇去世，享年 60 岁。让我们回顾一下明治天皇及其时代：明治前期（1868—1894 年），正是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明治天皇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式的立宪君主制、推动日本建立近代工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明治后期（1895—1912 年），也就是日本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明治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以及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负有重要责任。

明治天皇去世后，嘉仁继位，在皇宫偏殿举行了登基典礼，并接受了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八坂琼钩玉。按照传统，根据中国《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新年号为“大正”，嘉仁成为日本第 123 代天皇——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即位后，指定皇太子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裕仁生于父母结婚之前，身体又有不少缺陷，但大正天皇和大部分朝臣都希望指定裕仁。出乎意料的是，被裕仁奉为崇拜偶像的乃木却纠集了少数人，主张推选裕仁的弟弟秩父宫。乃木并没有什么使人信服的理由来为他的立场辩解，而只是凭着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难以名状的意识。但他的意见最终被否决了。9 月 9 日，裕仁被正式封为皇太子，并任陆海军少尉。

在为明治天皇举行国葬前的 9 月 11 日，乃木希典突然晋谒太子。在祝贺裕仁成为皇太子后，乃木向裕仁赠送了《中兴鉴言》和《中朝事实》两部书，都是根据神国思想鼓吹天皇具有绝对权力的著作。接着乃木叮嘱裕仁道：“重要的地方我已画了红线。现在阅读可能太难，但这是有用的书，我请求您要更加努力学习。您现在是皇太子了，又是陆海军中最年轻的军官和全国未来的总司令，恳求您要恪守军人的本分……为自己和日本，好自为之。”

从 9 月 13 日开始，日本政府为明治天皇举行了为期 6 周的隆重国葬。13 日晚 8 时，载着明治遗体的灵车驶出皇宫朝青山练兵场（现在的神宫外苑）进发。半小时后，灵车从东宫皇城前经过，身着旧式朝服、臂戴挽章的裕仁含泪在门前相送，这对年仅 12 岁的他来说，无疑是有生以来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

当送葬的队伍从皇宫出发后，乃木步行回到自己位于麻布的别墅，遵

照武士道的精神和古代的先例，乃木与夫人一起沐浴洁身，穿着崭新的白色和服，在挂着明治天皇签字的照片前跪下。乃木夫人静子按照规定的礼节，将一把匕首刺进自己的颈部流血而死。乃木希典则把短剑刺入自己的胸膛，划了一个十字，剖腹殉死。乃木之死，无疑给少年裕仁以极大的震动。据说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呆若木鸡，表情平静得可怕，良久才说道："日本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也许这时的他才明白"院长阁下"的那次造访和赠书竟是最后的诀别。关于乃木之死，对外界公布的消息是乃木夫妇双双自杀是要追随明治天皇，但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乃木的地位还没有重要到足以把自己看成是明治不可缺少的家臣。了解内情的人的看法是：乃木曾提出反对立裕仁为太子的意见，受自尊心驱使而选择了自杀，他不能眼看着被自己的学生抛弃。究竟自杀出自何因，或者是多种原因都有，那就只有乃木自己知晓了。

就读皇家学问所

在明治天皇去世两年后的 1914 年，裕仁晋升为陆海军中尉。也就在这一年，他从学习院初等科结业并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入了位于东京高轮皇宫内的"皇家学问所"。

皇家学问所的总裁由在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担任，副总裁是宫内大臣波多野敬直，干事由海军大佐小笠原长生担任，其他所有教师都是当时日本的知名学者，还选任了一批东京大学毕业的一流学者前来授课。

在皇家学问所期间，裕仁每天早晨 6 点起床，先向伊势神宫[①]的方向遥拜祖先，然后就是跑步、进餐、学习。

东乡元帅希望将皇太子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而特设了军事课和马术课。此外，东乡还选用了一批陆海军军官和官僚来负责裕仁的军事课程。裕仁对军事课很感兴趣，尤其倾向于战术和后勤方面，他同军事课教师终身保持联系。1915 年 10 月，日本第一舰队在伊势湾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时，东乡元帅还特意让太子乘"香取号"战舰随同见习，以便他能看

① 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供奉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

到舰队的大炮击沉目标的情景。

在皇家学问所，东乡元帅精心选定狂热的国粹主义者杉浦重刚担任被称为“帝王学”的伦理学教师。杉浦系官僚出身，曾担任过文部省参事官兼专门学务局次长。杉浦利用古今中外饶有趣味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为裕仁教授帝王之道。杉浦在教学中所贯穿的一个主线是：竭力宣扬以儒教为本的皇室中心主义、政治主义、与外国竞争主义、日本优越的世界第一主义以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在 7 年的时间里，杉浦为裕仁授课 200 余次，在当时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像这样明目张胆地对皇太子进行保守教育的，恐怕只有杉浦了。

为了使裕仁的谈吐更能显示其作为天皇的尊严，皇家学问所对裕仁在演说时的发声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其结果是，裕仁在演说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先高后低、抑扬顿挫的声调。这种声调不仅与日本普通国民的说话声调迥异，与其他皇室成员也完全不同。此后裕仁在各种场合的致辞都是使用文语体，郑重地用这种奇特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的，以至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时，第一次聆听“御音”的日本普通国民不仅感到吃惊与可笑，甚至连天皇所宣读的内容都未能听懂。这就是“帝王学”的成果，三笠宫[①]称之为“造神学”。

在皇家学问所，裕仁除了系统地接受如何做好一个帝王的教育外，比较喜欢的科目还有历史以及自幼便怀有浓厚兴趣的生物学。裕仁曾对学友说过，自己若不是皇太子就打算专攻历史学或生物学。他曾认真地阅读了日本历史学者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世界大战史》以及宫内省编纂的 200 余册的《明治天皇纪》等历史读物。

在服部广太郎的指导下，裕仁对生物学的爱好，在这一时期也继续发展。服部指导裕仁注意周围世界中奇妙多变的自然界，这大大激发了裕仁对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每逢暑假，他都要到叶山、沼津、那须等地的行宫去采集标本，并在显微镜下进行长时间的观察。服部常常为裕仁安排钓鱼和潜水活动，这培养了裕仁对日本海湾昆虫和贝壳的终身爱好。裕仁还酷爱生物学中的分类学研究，这种认真的精神也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东条首相和木户内大臣都是既无信念又无方针的谨小慎微的官僚，但其长处都是严格、认真，所以深为裕仁信赖，是天皇最喜欢的臣下。

---

① 裕仁的四弟澄宫崇仁亲王（后来的三笠宫），出生于 1915 年 12 月 2 日。

经过7年的学习，裕仁1921年从皇家学问所毕业。综观裕仁从童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人们便会发现，尽管这一时期裕仁受到自然科学的熏陶，对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政治上，历经川村、乃木、东乡等人多年特殊而严格的军事教育，又使裕仁具有了独特的军人气质。他外表威严庄重，从早到晚身着陆军军服，在公共场合经常是纹丝不动地站立。如1928年12月25日，已是天皇的裕仁在二重桥前检阅关东地区数万名武装的学生和青年队伍时，天下着小雨，参加大会的人冷得直哆嗦，不得不竖起大衣领子，使劲地搓着手取暖。在会场正面的观礼台上，搭着缀有皇家纹徽的帐篷。可是即将开会时，跑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帐篷拆了。正当人们以为因雨要中止检阅而发出阵阵欢呼声的同时，传令官跑来报告："大家淋雨，陛下不安，特决定拆去帐篷，圣驾光临检阅，仍按预定时间从两点开始。"青年们深为感动，也不知是谁带头脱下了外套放在地上，全体青年毫不犹豫地都跟着脱下了外套。按预定时间到达会场的裕仁，看到青年们的那种姿态，也立即脱下披在身上的陆军斗篷。分列式开始后，裕仁冒雨而立一动不动，长达1小时20分钟，令在场的人都大为感动。

天皇身着陆军军服，足以说明当时日本重视陆军胜过海军的特点。天皇和皇族只有在视察海军学校和舰队以及乘军舰时才穿海军服，这说明天皇并不是总揽统治大权的文官，而是一名陆军武官，是"陆军天皇"。

第二章　结连理好事多磨　任摄政祸福倚伏

裕仁的婚事

大正天皇即位后，已逐渐长大成人的裕仁皇太子的婚事便成了上至皇室、下至国民关注的焦点。以往，皇后几乎都出自皇亲国戚或者贵族家庭。1917 年，为太子裕仁选妃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负责此事的侍从官们搜遍了全国，将符合条件的少女编制成一份候选人名单，上呈给皇室会议成员和裕仁的母亲节子皇后。热心的国民也争相购买《皇室画报》，试图从中找到符合自己心目中标准的皇太子妃。

开明的节子皇后虽对裕仁的终身大事非常关心，却并不愿意一手包办，而是坚持要裕仁亲自挑选。1917 年夏天，皇后在皇宫嫔妃阁内接见了候选女子。十几名妙龄女子按照顺序一个个单独进入房间，跪坐在节子皇后面前，小心翼翼地回答皇后的问话。与此同时，在与该房间相连的滑门后面，皇太子裕仁正透过窥孔，仔细地端详着这些候选的少女。

几番周折，并经宫内省的秘密考查，最后皇后和太子都选中了久迩良子，也就是裕仁在皇家幼儿园时的同班同学。久迩良子是久迩宫邦彦亲王的长女，1903 年 3 月 6 日生于东京的久迩宫中，是赫赫有名的伏见家族的后代。伏见家族原是皇族的一个支系，因其祖上有功于皇室，而被皇室依其居住的地名（今京都市伏见区）封为伏见宫，其后代也因此得势，历代天皇的女儿不少下嫁于这个家族。良子的曾祖父伏见宫邦加亲王成为第 119 代天皇光格天皇的养子后，其家族势力更加扩大。良子的祖父曾担任第 121 代天皇孝明天皇的枢密顾问，并被明治天皇封为久迩宫。良子的父

亲是皇族中少有的海军专家，官拜海军大将。良子的母亲也出身豪门，是在勤王倒幕的斗争中立下战功的萨摩藩主岛津忠义公爵的第七个女儿。从血统和门第来看，良子被选为皇妃是无可挑剔的。皇后和太子的这一选择随后也得到了大正天皇的赞同。

1917年年底，宫内大臣波多野亲自将皇后欲选良子为太子妃的意思转告给了久迩宫亲王。久迩一家自然高兴万分，一口应承下来，并在1918年的元月正式内定了婚约。宫内省在久迩宫内为良子紧急修建了两层小楼，并设立了专门的学问所。这个学问所的主任由后闲菊野女史担任，为裕仁传授“帝王学”的杉浦重刚主讲最重要的修身课，同时还有10余名知名学者负责讲授其他课程。其目的就在于要把良子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符合皇室要求的皇太子妃。在此期间，皇室的御医还对良子的身体做了全面的检查，以使未来皇统的延续能够确保。

从内定婚约到两人正式举行婚礼，在这6年左右的时间里，裕仁和良子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仅有的几次见面，有的是为了拍摄订婚照片以供报纸发表，有的是在一些社交场合，偶尔他们也会被允许单独在宫内的花园散步。尽管这样的单独相处很短暂，但仍使他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婚事将会在日本政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由于皇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各派政治力量都把皇太子妃人选与自己未来政治上的荣辱联系在一起，进而招致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古代围绕天皇的婚姻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屡见不鲜，裕仁与良子的婚事也不例外。

对裕仁与良子的结合最先发难的是长州藩元老、因建立日本常备军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有功而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良子的祖父朝彦亲王在幕末的倒幕运动中曾镇压过长州藩的倒幕派，是长州藩出身的山县的宿敌。良子的母亲又出身于萨摩藩的岛津家族，也使山县担心萨摩藩阀会由此扩大势力，故而决定阻止这桩婚姻。

当然，精明的节子皇后和裕仁选择这门亲事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长期以来，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长州藩阀势力依仗其显赫战功，飞扬跋扈，钳制内阁，甚至不把皇室放在眼里。当时皇宫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皇的话是金子，可是无冕天皇的话可以炼金。”而这“无冕天皇”指的就是山县有朋。节子皇后和裕仁希望通过政治联姻，借助萨摩藩和伏见家族的势力削弱长州藩阀。

1920年夏天，山县依据日本前红十字医院院长提供的材料，在东京的一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从遗传学的角度追溯了萨摩藩岛津家族历代色盲的遗传史。由于良子的母亲出身于萨摩藩岛津家族，如果裕仁同良子结婚，神圣的皇室血统便带进了这种不良的遗传因子，将来的天皇便有可能出现色盲。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良子的外祖母（岛津忠义公爵的侧室）便是色盲。到了良子这一代，虽说良子的眼睛色能力正常，但她两个兄弟的辨色能力却都很弱。由于良子担负着养育未来天皇的重任，因此这一问题非同小可。

紧接着山县又策动西园寺公望和松方正义两位元老，以维护皇室血统的“圣洁”为名，要求宫内大臣波多野取消原来的决定，同时又以调查不力为由免去了波多野宫内大臣的职务，而代之以山县的党羽——陆军中将中村雄次郎。山县这种阴险而蛮横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原敬首相和久迩宫的不满。

新任宫内大臣中村秉承山县命令，挑选了5名医学专家对良子的视力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终作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良子的眼睛完全正常，但其后代出现色弱、色盲的概率在50%。对这一结论仍感不满的山县等人继续步步紧逼，决定请伏见宫博恭亲王为说客，劝说久迩宫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对此，良子的父亲久迩宫邦彦亲王断然予以拒绝，并声言：“提出要娶我家姑娘的可是皇室方面，既然要解除婚约，那就该由皇室来履行。我顺便奉告一句，如果硬要这样做，我首先杀死良子，然后我和我的全家都将因受辱而剖腹！”

为了与山县等人抗争，深受裕仁喜爱的老师、右翼理论家杉浦重刚干脆将此事交由右翼团体“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来处理。杉浦同头山满交往过密，在杉浦的授意下，头山满的党羽五百木良三写了《呈山县公书》，并向报社和知名人士广为散发，以便将这一事件告知于国民。北一辉也散发了反对山县的文章，五百木和岩田富美夫等右翼分子还制订了一个暗杀山县的计划。

平时憎恨山县的前首相大隈重信和山本权兵卫此刻也坚定地支持邦彦亲王，将山县蔑视大正天皇和皇族的行为作为攻击山县的材料。与此同时，皇后和太子也明确表示无意改变婚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只有皇室作出最后裁决才能平息这场纷争。在原敬首相的授意下，1921年2月10日宫内省发表文告：“关于良子殿下内定

为东宫王妃一事，尽管世上有种种传闻，但以上决定并无任何变更。”至此，这场争执了一年多、被称为“色盲风波”或“宫中某重大事件”的闹剧才告收场。四面楚歌的山县引咎辞职，并在一年后去世，他的亲信中村雄次郎也被免去了宫内大臣的职务。自此，以山县为代表的长州藩势力逐渐失势，萨摩藩军阀逐步控制了军部大权。但长州藩与萨摩藩派系之间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在以后的日本历史发展中，它们之间的斗争又逐渐演化为皇道派与统制派、北进派与南进派之间的斗争。

1922 年 6 月 20 日，宫内省宣布：“圣上已经恩准了皇太子的婚约，随后的纳彩仪式预定在 7 月上旬进行。”所谓的“纳彩仪式”就是由皇室向女方家馈赠彩礼的仪式，是皇族成员举行婚礼前必需的一道程序。由于皇族中的最长者东伏见宫依仁亲王于 6 月 26 日去世，纳彩仪式延迟到 9 月 28 日才进行。这一天，风和日丽，金秋送爽。侍从长德川达效携带礼品驱车来到久迩宫家，将纳彩通知书递交给久迩宫邦彦亲王，并将纳彩礼品一一呈上，包括 2 坛清酒、2 条新鲜鲷鱼、5 匹西服布料以及御佩宝剑和勋一等宝冠章。纳彩仪式表明裕仁与良子已正式结成婚约。

初次访欧

1921 年裕仁从皇家学问所毕业后，当时的首相原敬就曾提出应趁结束学业之际，让裕仁出访欧洲。他认为新时代的君主应该周游世界扩大知识面，同时拜访各国元首，加深同欧洲各国宫廷的友好关系。此外，原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尽早让裕仁接触立宪君主制下的国家和社会。对原敬的提议，当时对裕仁与良子的婚姻持反对意见的山县也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是希望利用皇太子出国旅行而使激化到计划暗杀山县的事态缓和下来。裕仁本身也一直打算以一次欧洲之行结束自己的学业，并且已经同英法政府拟定了各种安排。但裕仁出国旅行的消息一经传出后，便受到了种种阻力。

由于当时社会上谣传山县有朋想把裕仁送走，以使他对良子的热情冷下来，进而破坏婚约，因而久迩宫邦彦亲王首先发起了反对皇太子出国旅行的运动，皇后也为之所动，借口“病魔缠身的天皇万一有个好歹那就麻烦了”，表示反对。裕仁的老师杉浦重刚认为日本的皇太子没有必要向外

国学习。反对原敬内阁的在野党以及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分子更是借机制造了种种流言飞语：

"父皇陛下龙体欠安，却置之不顾，居然出国漫游，岂非不尽孝道?"

"'神国日本'的皇太子漫游'夷狄'之邦，这是为何?"

"如果年轻的皇太子沾染了民主主义的危险思想，岂不危及日本的将来?"

"山县会在裕仁离开时杀死良子!"

"朝鲜的刺客将在特拉法加广场把裕仁砍倒!"

"西方人会嘲笑裕仁在喝汤时啧啧做声的日本习惯。"

火药味越来越浓烈，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分子还在纪元节[①]那天纠集了2500人到新建的明治神宫前，以祈祷"天皇病体康复，东宫中止旅欧"的形式举行示威游行。1920年2月27日，支持原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儿子、皇太子的侍从官西园寺八郎在家中被一帮暴徒打得遍体鳞伤，原敬首相收到的恐吓信和建议书也积案成堆。但原敬首相和元老山县有朋并没有动摇和屈服，而是煞费苦心，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不断派出说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说服了皇后和头山满等人。

1921年3月3日11时半，皇太子裕仁以及由15名亲信侍从官和陆海军军官组成的随从人员，乘坐"香取号"军舰，在"鹿岛号"战列舰的护航下，从横滨出发，开始了漫长的海上旅行。当南下行驶到三浦半岛的顶端时，航道改向西北航行，从相模湾的深处向叶山开去。这是根据皇太子裕仁的要求，从海上向在叶山行宫疗养的父亲道别。"香取舰"以最慢的速度通过叶山海面，裕仁身着海军少佐礼服，站在后甲板上，向天皇和皇后居住的叶山方向以及富士山的方向鞠躬遥拜。

此次作为顾问陪同裕仁出访的是几位忠于皇室的老臣，他们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担当起辅佐裕仁的重要任务。如珍田舍已后来担任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奈良武次后来担任裕仁天皇的武官长，负责天皇与陆军之间的一切联系。孝明天皇的养子闲院宫载仁亲王是日本陆军大将，作为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的老资格成员一直跟随裕仁，亲身参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山本信次郎因在皇家学问所教授过裕仁法语，此次也一同随行。随同裕仁一同出访的还有两名宫廷御用文人，他们的任

---

① 纪元节：在每年的2月11日，纪念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

务是将皇太子出访的盛况记录成书，以便流传于世。山本信次郎在旅途中一边教裕仁法语，一边讲授西餐的用法和礼仪上的一般知识。尽管山本费尽了气力，但由于裕仁学东西比较笨拙，进步很慢。

裕仁的舰队前往英国，一路以当时英国遍及世界的领地为停靠港。在香港，裕仁出席了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几次盛大宴会。在新加坡，他以私人身份参观了当地著名的植物园。在科伦坡，他欣赏了当地的土风舞和40头训练有素的大象所作的表演。在马耳他，他观看了由意大利歌剧团演出的威尔第的剧作《奥塞罗》。

历经75天的航程后，裕仁一行终于到达了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在英日两国结成同盟、图谋携手称霸亚太地区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以隆重的仪式欢迎裕仁的到来。爱德华皇太子前往军港迎接裕仁皇太子，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前往伦敦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欢迎裕仁，并与裕仁同乘华丽的宫廷马车前往白金汉宫。

在英国，裕仁以英国国王私人客人的身份，在白金汉宫住了3天。他看到英国皇太子爱德华可以脱掉军装，在街上游逛，随便去剧院看戏，在公共场合观看体育比赛，在夜总会喝着香槟酒和美女跳舞等场景，是那样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真是羡慕极了。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授予裕仁陆军大将军衔，送给他一套大将军服，还向他传授帝王之道，并向裕仁介绍了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裕仁在皇家学问所学习时掌握的丰富的“一战”史知识此时派上了用场，也许是有共同谈论的话题，裕仁同乔治五世国王相处甚欢，似乎是一对忘年交友。后来，裕仁在回忆起乔治五世国王时说：“乔治五世陛下像慈父一样，在各方面盛情相待，使我终生难忘。”

接着，裕仁又以英国政府贵宾的身份在切斯特菲尔德大厦住了下来，3天作为王宫的贵宾，5天作为政府的贵宾，前后享受了8天的优厚贵宾待遇，可以说是开了先例。在这8天中，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裕仁出席了各种欢迎仪式，参观了各地名胜，还会见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离开切斯特菲尔德大厦后，裕仁动身前往苏格兰，在身世显赫的贵族阿苏尔公爵的布莱尔城堡逗留了一周。在这里，没有了那些繁缛的礼节，裕仁的身心得到了放松。阿苏尔公爵陪同他打猎、钓鱼，乘车游览风光如画的苏格兰高地，并招来自己领地的农民为裕仁举行了盛大的狂欢宴会。所有参加宴会的成员不分主仆地跳起欢快的舞蹈。这种开放、随便的风



身着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赠送的名誉陆军大将军服的裕仁

气，以及不分尊卑贵贱的亲密关系，令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皇室长大的裕仁非常吃惊。

也许是受到英国王室这种自由风气的影响，后来裕仁在回国后举行的庆祝出访归来的晚会上，也想创造出一种自由和谐的气氛来。他在赤坂离宫招来了与他年龄相仿的亲朋好友和一些艺伎，在书房外面摆放着阿苏尔

公爵送给他的苏格兰陈年威士忌，打开留声机播放出欢快的舞曲。他要求所有来宾不必拘泥礼节，随意跳舞喝酒。客人们忠实地执行了皇太子的命令，结果一些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忘乎所以，口吐狂言，与裕仁称兄道弟，在皇宫中自由出入。对裕仁举办这样一个“伤风败俗”、不成体统的晚会，在场宫廷官员很震惊，随后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第二天，西园寺便从乡间别墅风尘仆仆地赶到赤坂离宫，礼貌而语气坚定地对裕仁进行了规谏，从此裕仁也就放弃了体验这种自由气氛的想法。

5 月 31 日，裕仁结束了在英国的访问动身前往巴黎。法国以在位君主的规格款待这位皇太子，法国总统米勒兰还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欢迎裕仁。裕仁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参观了举世闻名的卢浮宫艺术博物馆，凭吊了坐落在巴黎荣军院中的拿破仑陵墓并捐赠了 400 美元。此外还在“凡尔登英雄”贝当元帅的陪同下，参观了法国的圣西尔军校以及凡尔登、索姆河等“一战”时的战场遗迹，并观看了坦克和飞机表演。

离开法国的前一天，裕仁微服出游，前往闹市区为皇室和未婚妻良子选购礼品。他为良子选购了一串价值昂贵的天然珍珠项链，为自己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作为纪念品。后来，他把这座雕像连同达尔文的头像一起摆放在了书房里。

结束在法国的访问后，裕仁又访问了比利时和荷兰。7 月 7 日，裕仁乘坐火车返回法国南部的土伦，在那里乘“香取号”战列舰归国。在归国途中，他又于 7 月 10 日至 18 日顺访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罗马，参观了圆形竞技场和西斯廷教堂，拜访了伯努瓦十五世教皇。

1921 年 9 月 3 日，裕仁在出访欧洲半年后返回日本。当他步下舷梯踏上日本国土时，受到了日本民众隆重的欢迎。当天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和提灯游行，整个日本热闹非凡。

这次出访是 20 岁的裕仁初出国门，在历时半年之久的旅行中，他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 5 国，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款待。这次旅行按预期目的，不仅促进了同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声望，在国际上展示了日本未来天皇的形象，同时也使年轻的皇太子在各种应酬中得到了实际锻炼，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日本政府及元老重臣们对这次出访的结果是十分满意的，欧洲舆论也普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日本未来的天皇谦虚、镇静，具有机智的素质。

就任摄政

在日本人的眼里，与“光荣的明治”相比，大正天皇可以说是“不幸的大正”。这是因为他在位15年，论“功绩”远不能同明治天皇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终生为脑病所困。

大正天皇出生时因难产几近夭折，后来又患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据一些接近他的人回忆，大正天皇继位时就出现了精神病症状，在沼津和叶山时经常从行宫跑出来在大街上游走。有时在院子里骑着自行车乱转，只要保卫人员稍不注意，他就会一下子溜出去。但当时病情还没有发展到妨碍他履行天皇职责的程度，至少在他当天皇的前期，日本还是继续沿着明治时代的侵略扩张道路迅速发展。

大正天皇在位后期，精神异常的症状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变得喜怒无常、举止怪异，而且行走困难、记忆力衰退。元老或首相前来晋谒时，他总爱把桌上的香烟乱抓一把分发给大家。到了晚上，特别喜欢军歌的大正天皇经常跑到院子里，用筷子当指挥棒，指挥士兵唱歌。当他无所事事时，武官长还让皇宫的卫兵在他的面前表演诸如两人三足、兔跳、蒙眼竞走、倒立竞赛、跳木马、爬越障碍之类的游戏，以此来愉悦天皇。

在一次检阅陆海军演习时，大正天皇居然跑下检阅台，先是用马鞭抽打士兵，然后又命令士兵打开行囊，翻乱里面的东西，而且还非要亲自收拾好行囊不可。1915年，大正天皇在议会开幕典礼上，把讲演稿卷成一个圆筒罩在眼睛上当单筒望远镜，对着议员和前来观礼的外国使节乱看一气。这种大出洋相的举动，让在场的元老重臣十分尴尬和反感，认为这有损天皇的形象。他们把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了裕仁皇太子身上。

1919年12月，依照惯例，天皇要出席议会的开幕式。但由于当时的大正天皇连朗读文件都很困难，最终还是取消了出席计划。到了1921年，大正天皇的病情继续加重，既不能接见外国使节，也不能主持各种国事盛典了。皇室典范规定：“天皇因长期病症不能亲政时，经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商议设置摄政。”摄政就是以天皇的名义行使最高权力。已经成年的皇太子或皇太孙一旦奉命摄政，在其任期内便具有了天皇的权力。由于裕

仁时年已满 20 岁，按规定已算成年[①]，而且学业也已结束，元老们便把裕仁摄政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当裕仁从欧洲出访回国后，对裕仁出游非常满意的元老重臣们更加坚定了尽快将裕仁推上摄政宝座的决心。首先行动起来的是首相原敬，他积极奔走于皇室和枢密顾问之间，磋商裕仁摄政的有关事宜。看到大正天皇已病入膏肓，节子皇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同意让丈夫交权。遗憾的是，积极策划裕仁摄政的核心人物原敬并没有能够看到裕仁就任摄政，就于 1921 年 11 月 4 日在东京火车站的检票口附近被扳道工中冈艮一刺杀身亡了。

11 月 25 日，皇族会议和枢密院会议决定让裕仁代替病中的大正天皇就任摄政。他是日本近代以来唯一的一位摄政王。实际上裕仁从这时起，就已经接管了一个拥有 5600 万人口、发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享有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开始了他长达 50 多年的统治，其时间之久超过了明治天皇执政的 45 年。

这时的大正天皇尽管病魔缠身，还时常神志不清，但对让出皇权仍是心有不甘。当时担任侍从武官的海军大佐四灶孝辅曾生动地记叙了这样一个插曲。正亲町侍从长去拜见天皇，希望天皇能将御用的印章盒（装有刻有“可”、“闻”、“览”的御玺的小箱子）转交摄政，但天皇并不情愿交出。后来侍从武官长又去找天皇，可天皇却说刚才侍从长已拿走了，弄得侍从武官长也不知如何是好。

裕仁出任摄政后，日本国民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摄政宫”，他们期望裕仁上台后能给他们带来好的生活。但是裕仁担任摄政前后的国内外环境处于一种多变、动荡的状态。从国际形势来看，1919 年，在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了要求收回山东权益的“五四”反日爱国运动。1921 年，美国为抵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发起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另外，由于出兵西伯利亚遭到惨败，日本在国际上也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从国内状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景气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1918 年便爆发了经济危机，饥寒交迫的民众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1920 年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已广泛传播，同时人民群众要求实现普选权的民主运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而在统治阶级内部，

---

① 《皇室典范》规定：天皇和皇太子以满 18 岁为成年，而一般人则以满 20 岁为成年。

明治维新时期的元勋相继谢世。作为元老，只剩下了西园寺公望和松方正义二人。

面对如此凄凉暗淡的形势，裕仁摄政任命西园寺为最高顾问，负责推荐任命下一届内阁的人选。从此以后，直到1940年11月病逝，西园寺担负起了辅佐裕仁的重任，切实体会到了如履薄冰的滋味。

行刺裕仁的“虎门事件”

裕仁担任摄政后遇到的第一桩棘手政务就是处理关东大地震事宜。1923年9月1日，是立春以后的第210天，就像西方人认为13日、星期五不吉利一样，日本人把这第210天也视为不祥之日。上午11时58分，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突然发生了7.9级的强烈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变成了一片火海，大部分街市化为灰烬，整个东京被烟雾所笼罩。东京市48.3万户中的30万户房屋被震坍或烧毁，东京265万人口中的170万人遭灾，死亡、失踪者多达14万人，相当于美国后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致死人数的总和。

地震时，裕仁正在赤坂离宫举行国宴。由于这所离宫是按抗震要求设计的建筑，因而经受住了地震的冲击。裕仁和来宾跑到院子的空地上，眼看着东京被摇晃得东倒西歪的惨景。大正天皇和皇后当时正住在日光，所以安然无恙，皇宫建筑也是按抗震要求设计的，只遭到了一些轻微的损坏。

震后的东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在公园、广场、马路上风餐露宿、啼饥号寒。9月3日，裕仁摄政向灾民恩赐了1000万日元的赈灾款。但亲临受灾地区视察，却是两周后（9月15日）的事情了。那时，四处已响起了重建家园的钉锤声，原来的灾难情景已经淡薄了。而且在3个多小时的骑马巡视中，裕仁不仅没有给灾民以慰藉和鼓励，反而撵走了沿途的人，等于在无人的旷野中兜了一圈。原定于11月为裕仁与良子举行婚礼，由于地震的发生，皇室不得不在9月19日发表了推迟婚礼的公告。

按照日本传统的迷信观点，地震是由躺在日本下面的一条巨大无比的鲇鱼引起的。每当天照大神对她在位的皇子皇孙不满时，这条鲇鱼便会躁

动引起地震。在古代，大地震后天皇常以退位来谢罪。但这次地震发生后，日本统治阶级没有让因病让权的大正天皇退位，而是找到了新的替罪羊，那就是旅居日本的外国侨民。

为了把群众的愤怒情绪从天皇身上引开，日本决定拿当时在东京、横滨地区从事土木建筑的朝鲜人开刀。这样既可以发泄对朝鲜“三一运动”的仇视情绪，又可以防止“不逞之徒”与灾民联合起来发生“骚动”。据事后调查，有6415名朝鲜人在这场人为灾祸中丧生，大约100余名中国人被残忍地集体屠杀，10余名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惨遭杀害。

裕仁摄政试图用暴力手段来稳定动荡的社会秩序，结果却适得其反，他本人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行刺的对象。“虎门事件”险些让他命丧黄泉。

关东大地震后不到4个月，1923年12月27日，裕仁要去出席帝国议会开幕式，当上午10时45分裕仁乘坐的汽车经过虎门公园时，一名青年从下跪的人群中突然跃起，用肩膀撞开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向裕仁的座驾开了枪。子弹穿破玻璃，碎片从裕仁的右耳掠过，稍许渗出些血来，司机加快车速后才躲过射来的第二枪。行刺者一边高呼“革命万岁”，一边追赶汽车，随后被群众抓获交由宪兵处理。

行刺者是一位23岁的青年，名叫难波大助。他的父亲难波作之进是山口县的大地主、众议院议员、皇室中心主义者。难波大助自幼便反对父亲家长式的统治，热衷于普选运动，政府的严厉镇压和原敬首相的横暴，使他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大地震后政府的高压政策使他充满了敌意，当他得知自己崇拜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被杀害的消息后，决心暗杀皇太子为其报仇。

12月23日，难波从故乡山口县到达京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裕仁将于27日出席议会开幕式的报道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刺杀行动。他连夜动身于27日8时20分到达东京火车站，随身还携带了一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拐杖。这并不是一支普通的拐杖，而是一支经过改装的拐杖枪，是他大名鼎鼎的同乡伊藤博文出访归来送给他父亲的礼物。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厕所里，难波在拐杖枪内装上了子弹，然后来到裕仁前往议会必经的虎门公园附近。于是便上演了上面所描述的一幕，被称作“难波事件”或“虎门事件”。

遭遇刺杀事件后的裕仁，仍按预定计划出席了议会开幕式。司法当局认为，无论如何按照难波的行径终归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为了向外国

和日本国民显示“日本并不存在真正反抗皇室的人”，大审院院长横田秀雄等人对难波进行了各种劝诱其变节的活动。但在遭到难波的坚定拒绝后，当局还是以他的名义发表了悔过的声明，并宣布犯人是在病态的情况下行事的。当局的目的在于极力隐瞒犯人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事实。

在此后长达一年的酷刑审讯中，难波拒绝承认有罪，并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而感到自豪。第二年的11月15日，难波被判处死刑。行刺未果的难波大助被处死刑后，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返回故里终日闭门思过的父亲，甚至不愿去为自己的儿子收尸，只好由监狱出面将其草草安葬于监狱附近的公共墓地。而经过这次刺杀事件后，裕仁更被严密的戒备所封锁，变成了“被囚禁的人”。在以后的出行中，裕仁所乘坐的汽车两侧增设了骑跨斗摩托车的警卫。

裕仁与良子的婚礼

“虎门事件”后，宫内省主张再次推迟婚礼，但这次遭到了良子父母及良子本人的反对，原因是婚礼因为各种原因已被多次推迟，拖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皇室经过研究，为了冲洗日本列岛上空弥漫数月之久的悲凉气氛，一扫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决定在1924年1月26日为摄政裕仁和良子举行婚礼。然而就在婚礼的前一天，一名朝鲜义烈团的成员在皇宫二重桥附近扔了一颗炸弹，好在并无人员伤亡，但仍引起了日本当局极大的不安。

婚礼当天的早晨，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的久迩良子早早起床，在侍女的帮助下梳妆打扮。随后，她向父母告别，感谢父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上午9时许，裕仁和良子分别从各自的住所出发，前往举行婚礼的皇宫，沿途两旁盖满了简易防震的木板房。为防止意外，日本当局对来自朝鲜的船只都进行了检查，对朝鲜船员和旅客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并提前拘留了一大批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以及流浪者。同时，在前往皇宫的沿途除派出大批警察外，陆军大学的立花小一郎、国粹会总裁大木伯爵等人还组成大日本国粹青年团，与东京、横滨一带的千余名赌徒和黑龙会的十几个团体共同担负警戒任务。由于震后流行性感冒传播，警视厅甚至不许沿途

有稍患感冒的市民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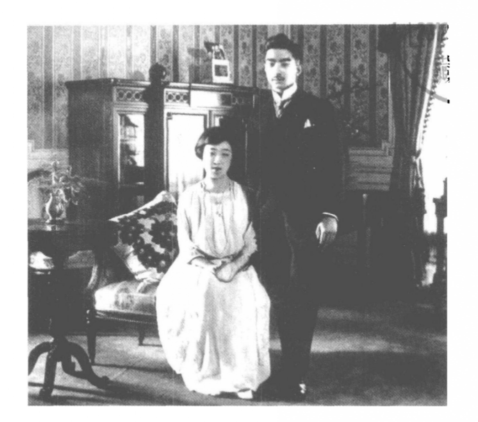
裕仁和良子的盛大婚礼在皇宫内的贤所举行，共700多名皇族王公、文武高官应邀参加了婚礼。原定的庆祝酒宴因震灾原因推迟到5月份举行，因此婚礼显得有些冷清。按照皇室的传统，大正天皇夫妇也没有参加裕仁结婚时的宫廷礼仪活动。

到达皇宫的裕仁和良子，换上了自平安时代便流传下来的礼服。裕仁身着黄丹色的御袍与白绫和服裤，头戴垂着菊御纹红缨的皇冠，手持玉笏。良子则身着华丽的十二单衣，外罩宽大飘逸的绸绢长裤，头发依照平安时代的式样高高地拢起，手持折扇，两人都佩戴着皇室的菊花纹章。

整个婚礼按照皇室典范的规定和古老的传统进行。司仪由九条掌典长担任，在日本乐器奏出的舒缓庄严的乐曲声中，裕仁和良子在司仪引导下缓步进入供奉着日本列祖神灵以及神器的贤所正殿。在贤所神像前，裕仁皇太子和良子分立左右，行四巡叩拜大礼，再由司仪将玉笏传给内掌典，供奉于八咫神镜之前。接着，裕仁用专用的皇室祭祀语向列祖神灵诵读了成婚告文，随后走出贤所正殿。早已迎候在贤所外的九条掌典长连忙向他们献上被视为神酒的米酒，两人轮流喝了三杯“合卺酒”。这时，站在神殿外来参加婚礼的来宾们纷纷跪拜祝贺，停泊在东京湾港口的军舰鸣礼炮101响。随后，裕仁和良子又到皇灵殿、神殿进行拜祭后，完成了全部大婚礼仪。这一天全国放假以示庆祝。

午饭过后，新婚夫妇在严密的护卫下乘车返回赤坂离宫。沿途挤满了欢庆的市民，他们手挥太阳旗，高呼着“皇太子新婚大吉”、“天皇万岁”等口号。

当晚，按照传统礼仪，在赤坂离宫举行了皇太子结婚的最后一项仪式——“三个夜饼之仪”。这是从平安时代就延续下来的传统仪式，原在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夜举行，后改为从结婚当夜起连续举行3天。晚上9时，侍从们在新房的桌子上摆放了4个银盘，每个盘子里均盛着与皇妃年龄相等的21个精致白饼。在白饼上供奉着日本传说中的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二神，寓意吃下这些饼的新婚夫妇会健康长寿。在布置得恍若仙境的新房内，在温馨柔和的烛光下，忙碌了一天的裕仁夫妇终于安静地坐在一起，品尝美味的白饼，相互举杯祝酒，度过了新婚第一夜。次日上午，裕仁夫妇离开赤坂离宫前往大正天皇夫妇居住的沼津行宫进行“朝见之仪”，拜见父母。



新婚的裕仁天皇夫妇

5 月 31 日，为庆祝裕仁婚礼而举办的欢庆宴会在皇宫内的丰明殿进行。这次欢庆宴会盛大而隆重，日本皇族、文武大臣、各国驻日使节以及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的代表，还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舆论媒体的代表等共 3700 人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引人注目的是，为促成裕仁和良子婚事而在暗中出力颇多的浪人、恐怖主义者的头目、右翼组织黑龙会的头面人物头山满等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按照日本皇室的惯例是没有新婚旅行的。但在这一年的 8 月，新婚不久的裕仁和良子夫妇还是离开东京，去日光和福岛进行新婚旅行。两人在日光的行宫住了两晚后，便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岛县翁岛的高松宫别墅。这座别墅原是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于 1908 年建成的，1913 年有栖川宫逝世后，被裕仁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继承下来。翁岛夏季清凉，别墅内建有可俯视附近猪苗代湖美丽风光的天镜阁，是一处绝好的避暑胜地。裕仁夫妇在翁岛住了 20 多天。

白天，他们或泛舟于湖面，或垂钓于小溪，或流连于山间，或乘马车远游。傍晚，夫妇二人常登上天镜阁，一边品尝着美味佳肴，一边欣赏着美丽的风景。附近小学校的小学生们甚至捉来数千只萤火虫，放飞于别墅周围。只见流萤纷飞，如同天上星光点点，甚为壮观。

这次新婚旅行进一步加深了裕仁夫妇之间的感情，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为此，裕仁还特地邀请素有“画伯”之称的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作了一幅体现猪苗代湖美丽风光的风景画，挂在自己居住的吹上御所阶梯跳舞场的上方。40 年后的 1964 年，年逾花甲的裕仁夫妇重游猪苗代湖，裕仁天皇诗兴大发，挥毫写就了一篇充满怀念之情的诗篇：

令人怀念啊，远眺猪苗代湖；思念年轻时之岁月啊，似金秋之正午。

新婚夫妇的新居就在赤坂离宫。裕仁每周去皇宫一到两天，一般的事务就在赤坂离宫处理。出于裕仁研究生物学的需要，在赤坂离宫院内设立了生物研究所，裕仁从此开始了正式的研究工作。研究所附设有 148 平方米的动物饲养场和 1980 平方米的实验苗圃，同时聘请服部广太郎博士负责研究所的工作。

新婚后的良子听从父母的教诲，竭力做好裕仁的贤内助。每天裕仁早出晚归，她都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迎送。当裕仁休息时，良子或陪他在花园内散步，或为其弹琴唱歌。为了裕仁，从未接触过生物学的良子还热心地学习有关知识。良子多才多艺，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能用女高音演唱，而且还爱好文学，擅长诗词，并曾随名画家学习日本绘画，擅画羽毛花卉，并能自己设计和服图案。她还精通烹调技术，每天早晨，裕仁都要吃良子亲自下厨煎的鸡蛋。

面对对自己关爱有加的良子，裕仁也以真挚的爱情来回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两人的婚姻。裕仁反对日本千百年来历代天皇视为天经地义的纳妾习俗，公开宣布天皇一夫一妻制，把自己的爱情专一于良子。他的这一想法自然遭到了宫廷守旧势力的反对，连裕仁的母亲节子皇后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裕仁除反对纳妾的习俗外，还对皇宫内的女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女官即皇室的女侍从。根据早已形成的宫内制度，女官之间有着严格的分工，

等级森严。高级女官有“典侍”、“权典侍”、“掌侍”、“权掌侍”、“命妇”、“权命妇”等，其中，“权掌侍”以上的女官是在天皇身边听候差遣的人，她们全都是未婚处女，实际上是天皇纳妾的一个重要来源，只要天皇认为合适就可以纳其为偏房。“命妇”则主要负责处理事务性工作。下级女官有“女孺”、“权女孺”等，负责分管服装、饮食、用具等差事。其下还有专事杂务的“杂仕”、“针仕”等。在皇宫院内，有一个地区叫“女护之岛”，通常称作“御居”（女官宿舍），3 栋宿舍占地约 4000 平方米，最盛时期，其中住有女官 200 人，人多得无事可干。

这样一种制度严格、等级繁多的女官制度，常使女官们因彼此之间的钩心斗角而闹得皇宫鸡犬不宁。为此，裕仁果断地对女官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下令废除了“典侍”以下直到“命妇”这些高级女官在身份和职务上的差别，一律都称作“女官”，从而打破了两千年来的旧传统。此外，日本皇室历来有专用的宫廷特殊语言，这种特殊的表达方法充满了特权思想。新婚后的裕仁同时宣布，皇室专用的特殊宫廷语言原则上不再使用。另外，裕仁还下令撤去了宫殿里的地面铺席，将殿内改成西洋样式，并改变了自己的衣着，西服成了裕仁平常穿戴的服装，使古香古色的皇宫内充满了近代文明的气息。

第三章　裕仁即位号“昭和”
精心炮制“满洲国”

裕仁即位

病情严重的大正天皇从1926年8月起，就移居靠近太平洋的叶山行宫进行疗养了。12月25日，只有47岁的大正天皇由于中风发作去世。由于从1921年起大正天皇就已因病将皇权让给了裕仁，五年来他早已在国民的心目中销声匿迹了。因此大正天皇的去世，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轰动。

自从大正天皇病情加重后，裕仁天皇就住到了行宫附近，时常守候在父亲身旁。裕仁和大正天皇两个房间的电话一直保持着畅通，当从电话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裕仁深为自己当时未能在身边陪伴而悲痛。

大正天皇去世后不到两小时，皇太子裕仁的汽车已到达了叶山行宫。他让侍从留在车内，自己同两位皇族亲王和两位贵族出身的证人进入行宫庭院。天皇之位不可一日空缺，明治时代的《皇室典范》规定，天皇驾崩时应举行新天皇的践祚仪式，也就是继位仪式，并继承祖先传下来的神器。当日凌晨3时15分，裕仁在叶山行宫举行了简短而庄严的秘密继位仪式。

在日本天皇早期历史上，践祚仪式与即位仪式本来是同时进行的，但在697年文武天皇践祚后，数十日后才发布即位诏书，此后便逐渐形成了践祚仪式与即位仪式分别举行的惯例。按照这一惯例，裕仁的践祚仪式要先行举行。

因为正式的即位大礼决定在一年多以后隆重举行，所以继位仪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举行“剑玺继承仪式”。参加仪式的主要有以高松宫为首的皇族成员、东乡平八郎、西园寺公望、首相若槻礼次郎等人。由原侍从、松浦侍从和松井内大臣分别将象征皇权的神器——草薙剑和八坂琼钩玉，以及御玺和国玺奉献给新天皇。与此同时，在东京皇宫供奉着“神镜”的贤所，由掌典长代表新天皇进行拜祭表示继承，因为神器中最紧要的八咫镜定位安放在贤所，是不能随便挪动的。随后掌典长还在供奉历代天皇的皇灵殿和祭神的神殿举行仪式，告以继承皇位之事。至此，裕仁正式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时年25岁。

12月28日，从叶山行宫返回东京的裕仁在皇宫举行了“朝见仪式”，全体内阁成员、勋一等以上的文武百官等约300人出席。在仪式上，裕仁宣读了登基敕语：“朕赖皇祖皇宗之威灵，继承万世一系之皇位，总揽帝国统治之大权，以行践祚之式，率由旧章，聿修先德，但求祖宗之遗绪不坠。”同时，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天皇还要求他的臣属：“着眼于国家之大局，以图举国一体，共存共荣，培植国本于不拔，繁衍民族于无疆，以显扬维新之宏谟。”①

按照日本年号必须从四书五经出典的惯例，枢密院在“朝见仪式”的当天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在政府提供的“昭和”、“光文”、“神和”中，挑选“昭和”作为新年号。该年号取自《书经·尧典》中的“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一语。此后20年的历史证明，裕仁天皇的“万邦协和”同明治天皇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下实现的。

在大正天皇去世之前，裕仁一直居住在位于皇宫正西的赤坂离宫院内的小凡尔赛宫，现在已身为天皇的裕仁迁入了高墙深院却风景如画的皇宫之中。皇宫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处高地，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一道由棕黄色岩石堆砌而成的蜿蜒城墙以及深深的城壕将其与外界划分为两个天地。皇宫坐北朝南，正门外一座造型优美的双孔拱式铁桥横架于城壕之上。由于壕深的缘故，桥身被分为上下两层，看上去像是双重的桥，故称之为“二重桥”。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二重桥被看作皇宫的象征。

皇宫内的建筑，既吸收了中国、欧洲的建筑风格，同时也充分展现了

---

① ［日］猪木正道：《天皇陛下》，DBS·大不列颠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日本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皇宫内的西侧是著名的吹上御苑，因轻风掠过吹皱古井中的一池清水而得名。整座御苑古树参天，芳草萋萋，灌木丛生，白头翁等数十种野鸟栖息其间。裕仁先是在这里建立了生物研究所，"二战"后又把皇居建在了这里。皇宫的西南部，坐落着所谓的宫中三殿，也就是供奉三件神器的贤所、供奉天照大神皇祖皇宗的皇灵殿以及供奉天神地祇、八百万神明的神殿。宫中三殿的东部是天皇的居所以及皇家花园东御苑。

裕仁天皇的寝宫是一座典型的日式建筑，装着纸制的拉门、铺着草席的地板。裕仁天皇从中选择一所房间作为书房和办公室，整个房间采用了低矮漂亮的方格天花板。在房间的一端，推开屏风，便可直通阳台，在此可以俯视赏心悦目的御花园。房间内的家具什物，依照裕仁的要求均按西式陈设，铺有地毯，除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外，还有一张可供休息的沙发。裕仁在房间内挂上他在欧洲时分别同贝当元帅、威尔斯亲王以及比利时王储利奥玻德的合影。在神龛两旁，放置了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和达尔文的两座半身像。可以说，这两座塑像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裕仁作为一个对外扩张的战争天皇以及作为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的一生。

搬到皇宫后，裕仁命人在皇宫内建造了一个新的高尔夫球场、一个带有顶棚在雨天也可使用的跑马场以及一间混凝土的防空地下工作室和一座御文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裕仁就是在御文库宣布投降的。

搬进新皇宫后，裕仁天皇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6时左右起床，刮脸穿衣，接着祈祷皇祖皇宗。如果早饭前还有些时间，裕仁往往会在室外散散步。他在叶山消夏别墅居住时，邻居常被他强劲有力的劈柴声惊醒。7点，他便会以一种受过严格军纪训练的军人风度，精神抖擞地走进屋来与良子皇后共进早餐。通常，天皇夫妇的早餐并不是日式的，而是麦片、鸡蛋、熏肉、烤面包和咖啡等。

吃过早餐的裕仁一般会到书房，仔细阅读各种报纸，接着通常会接见最亲密的顾问大臣牧野伸显。然后裕仁便开始处理一天的公务。裕仁的日常生活按日历排好了固定必办的事务。从大约10点至下午2点，除12点半进食午餐时稍作休息外，裕仁不断地接见源源而来的大臣和官吏。作为陆海军大元帅，他每周会见一次他亲自主抓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次官。内阁的陆军省和海军省主管招兵、发饷以及和平时期的军事编制，参谋本部直接对裕仁一人负责。此外，裕仁天皇还主持每年秋季举行

一次的陆军特别大演习以及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的海军特别大演习。

每月初一、十一和二十一以及每年的二十四个节日，天皇还不得不打破常规去主持宗教仪式，诸如端午节和天长节等民间节日、祭天照大神、由天皇亲自主持的最隆重的列祖列宗周年祭等。一般每天下午2点至4点，裕仁会去锻炼身体，主要是打高尔夫球。他的球技高于一般业余水平。下午4点后，裕仁会进行沐浴。在天皇寝宫中，从明治时代就安装了几个浅的洗温水澡的欧洲瓷浴盆以及几个深的洗热水澡的日本式木浴盆。裕仁喜欢日本式泡水浴。水温要求准确地保持在华氏110度（约43.3摄氏度）。洗澡后，全身暖和的裕仁披上和服回到书房，在内大臣呈上的二十多份公文上盖印或签名。大约6点，他就要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寝宫吃晚饭，如有多余时间，有时会和良子皇后一起消磨，有时专心阅读一本有用的书，或写日记，或钻研生物学。他不喝酒，也不抽烟。

裕仁在每周的星期三要参加枢密院全体会议，听取枢密院各委员会会议和预备会议的报告。枢密院建于1888年，其成员包括因对帝国有丰功伟绩而被天皇任命的24名显赫的贵族，此外还有内阁成员和皇族亲王。枢密院主要负责有关宪法的草拟、疑义的解释、戒严令的发布，以及对外签订条约和皇室一切重要事务的咨询等。国会通过的决议，也需经过枢密院同意。枢密院同帝国会议、内阁、军部一起构成了支撑天皇制统治的四根支柱。参加枢密院的全体会议，是裕仁倾听讨论情况、观察意见分歧及人物冲突的一个机会。每周的星期五，他主要接见获奖学生、体育健将和外国大使等。

每周星期六一早，裕仁便会埋头钻研自己爱好的生物学。刚搬入皇宫时，他在一座改建成储存仓库的宫殿中从事研究，后来则在专为他兴建的生物学研究所内进行研究。对他个人的这一爱好，曾经有过许多误传和误解，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靠雇佣助手来欺世盗名的科学外行。其实不然，他的廷臣的日志和他自己的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真正有洞察力、有进取心、有真才实学的学者。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专事搜集生僻海洋生物的、为科学而科学的人，其实也不然。裕仁认为科学是一种实用工具，是一种必需的战争工具，他知道这是日本所缺少的。例如，他关于海水潮汐及流向的海洋生物学知识曾对制订海军计划有过帮助。另外，在生物战争这个概念在西方还是海外奇谈时，裕仁早在1927年就鼓励日本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进行

研究。在帝国大学的组织培养下，到1939年就已制造了雅司病、脑炎、肉毒中毒病和淋巴腺鼠疫等多种致命的毒菌。1940年以后，装有芽孢杆菌，或带有芽孢杆菌的跳蚤、带有芽孢杆菌鼠食的鼠疫弹已经被反复投到中国的土地上。

登基盛典

裕仁天皇的登基大典是在1928年秋季举行的，这是向国内外正式宣布新天皇登基并已履行天皇使命的最高仪式，相当于外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当时执掌日本政权的田中义一内阁从对外提高国际地位、对内强化天皇权威和宣扬国家主义的考虑出发，决定将裕仁天皇的登基大典办成一次富丽堂皇、史无前例的盛典，同时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一场神化裕仁的“造神”运动。

登基仪式虽然定在秋季举行，但实际上庆典活动从当年1月份就已拉开了序幕。1月17日，天皇和皇后先后拜祭了贤所、皇灵殿和神殿，奉告列祖列宗登基之事。从2月份开始，又接连举行了44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仪式。最后，11月10日在京都御所举行的登基大典将庆典活动推向高潮。

为了确保裕仁天皇登基大典的顺利进行，皇室成立了专门负责登基大典的大礼使，由闲院宫载仁亲王任总裁，贵族近卫文麿任长官。大礼使下设典仪、调度、造营、车马、铁道、主计六个部，从政府各部门抽调了大约600名官员负责上述六部的工作。

田中内阁要求各地警察机构在庆典之际要加强对民众的警戒，禁止出版过激思想的刊物，进一步镇压共产主义者，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在日朝鲜人的监控。负责天皇出行的后勤部门更是为庆典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要对天皇出行所经过的车站、下榻处、休息所进行消毒，还要把天皇经过的街道打扫干净。负责天皇膳食的大膳寮专门派人严格化验天皇在外期间的饮用水和食品，对牛奶、熟菜和餐饮用具进行严格的检查和消毒，所有肉食只有在大膳寮检验合格盖章后才能选用。

在严格的治安管制和检查下，裕仁开始了他为期20多天的即位仪式。1928年11月6日，天皇和皇后分乘6驾和4驾马车，在文武百官和武装警

察的簇拥下，浩浩荡荡的队伍长达594米，从皇宫向东京站进发。沿途挤满了前来欢送的东京市民，他们不断向天皇发出欢呼。裕仁天皇等从东京站乘专列西下，当晚宿在名古屋行宫，7日下午到达京都。列车一路上有意缓行，以便让天皇的臣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瞻仰圣驾。铁路沿线挤满了村民和学生，一路为天皇和皇后送行。

当裕仁天皇还未到达京都时，有着悠久历史的京都早已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预定举行即位仪式的主会场紫宸殿被装饰得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名流显要及外国宾客等2000余人参加了庆典活动。




参加登基大典的裕仁天皇夫妇

11月10日，即位大典一切按古老仪式举行。首先，裕仁天皇差遣敕使返回东京，代表天皇在宫中三殿举行“奉告之仪”。天皇夫妇则身着祭服，来到供奉神镜的临时贤所春兴殿向皇祖神灵祭拜，奉告即位之事，举行“贤所大前之仪”。随后便是大典中最主要的仪式——“紫宸殿之仪”，裕仁天皇身着黄丹袍，头戴立缨冠，缓步登上紫宸殿面南而设的高台。随后，身穿平安时代御五衣唐裳的良子皇后登上高台左侧的御帐台。随着天皇夫妇面前垂帐徐徐掀起，站立在殿下的来宾们一齐向天皇致最高敬礼。致礼完毕后，裕仁天皇接过内大臣呈上的即位敕语书，宣读道：

朕惟我皇祖皇宗，惟遵神之大道，经纶天业，肇万世不易之丕基，传一系无穷之永祚，以逮朕躬，朕赖祖宗之威灵，敬承大统，恭奉神器，兹行即位之礼，昭告尔有众。

大殿内肃寂无声，来宾们恭敬地聆听着。裕仁天皇用他那经过特殊训练的古怪声调继续宣读道：

皇祖皇宗建国临民，以国为家，视民如子，列圣相承，洽仁恕之化下，兆民相率，奉敬忠之俗上，上下威孚，君民一体，是我国体之精华，当与天地所共存。

皇祖考鉴古今，开维新之宏图，征中外，敷立宪之远忧，文经武纬，以建旷世之大业，绍继皇考先朝之宏谟，恢弘中兴之丕绩，以宣皇风于宇内，以朕寡薄，忝嗣遗绪，赖祖宗之拥护与亿兆之翼戴，以治天职，庶几无坠无衍。

朕内则以醇厚教化，愈致民心之和合，进益国运之隆昌为念；外则以亲善国交，永保世界之和平，普益人类之福祉为翼，尔有众戮力协其心，忘私奉公，以弼成朕志，朕扬祖宗作述之遗烈，以祈祖宗神灵之降临。①

敕语宣读完毕后，首相田中义一拾阶而上致简短贺词。然后再躬身退至庭内的万岁旛前，率与会来宾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在这一片欢呼声中，良子皇后、裕仁天皇先后离座退场，即位仪式宣告结束。

11 日，举行了贤所御神乐仪式。14 日晚至 15 日晨，裕仁天皇又举行了作为登基大殿重要组成部分的、神秘的“大尝祭”。大尝祭是使新天皇神格化的重要仪式，在古代，天皇每年都要在秋后举行这一仪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从远古开始日本就以稻作为生，每当新天皇即位，便要向皇祖诸神供奉当年的新谷，并与之共食，希望皇祖诸神保佑日本丰衣足食；另一方面，也使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借此机会增添“神力”。

举行大尝祭要临时设立大尝宫，裕仁天皇将大尝宫设在了京都御所旁

① ［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 年，第 74 页。

的仙洞御所的正门内。大尝宫由悠纪殿和主基殿组成，天皇钦定悠纪殿供奉的米和酒须取自滋贺县，主基殿供奉的米和酒取自福冈县。14 日夜幕降临时，身着祭服的裕仁天皇先后在大尝宫的悠纪殿和主基殿进行祭祀，与神“共食”用当年新谷制作的“神馔”。当晚，裕仁盖着“神被”在殿内独宿一夜。这样天照大神的灵魂便附在了他的身上，裕仁天皇便成了真正的“现人神”。

按照规定，在举行大尝祭后的两天中，新天皇要设盛宴款待百官宾客。裕仁天皇在 16 日、17 日两天，在丰乐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第一天将和食“神馔”赏赐臣属，出席者约 1600 人，第二日昼夜各举行一次宴会，出席者达 2500 人，外国使臣也应邀出席，菜肴以西餐为主。席间，古乐齐奏，歌舞翩翩，极尽奢华喧嚣。

20 日，裕仁天皇参拜了伊势神宫。从 23 日开始，又分别参拜了神武、明治、孝明、仁孝、大正各天皇陵。其间，为显示天皇“恩泽”，裕仁对全国高龄者和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功者进行了表彰。同时，他还对各地神社发出升级命令，各神社可按等级从政府领取补助金，其目的在于彰显天皇是敬神的楷模。登基大典结束后，裕仁天皇下令将举行大礼的紫宸殿向国民开放，直到第二年 3 月结束，其间共有 534 万人前往参观。

11 月 30 日，返回东京的裕仁天皇在拜祭宫中三殿后，结束了为时 20 天的登基大典。30 日夜晚，东京市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缤纷的礼花照亮了整个天空，大街小巷挤满了欢庆的市民，载歌载舞，彻夜不散。

按照《明治宪法》，天皇不仅拥有统率陆海军的权力，可以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还有权力决定宣战或媾和以及宣布戒严等。上述权力是天皇对内阁、议会和法院等拥有的广义的统治权之外又多加的一种特权。因此，天皇在即位的同时也就成了统率陆海军的大元帅。登基大典结束后的 12 月 2 日和 4 日，作为陆海军大元帅的裕仁天皇分别在东京代代木和东京湾检阅了陆军的大礼纪念阅兵式和大礼特别阅舰式。

1928 年，除裕仁的登基大典外，日本皇室还有另外一桩喜事在民间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那就是裕仁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与势津子①在该年 9 月喜结良缘。引起轰动的原因在于婚礼打破了皇室的陈规陋习。按照皇室典范，皇族的妃子应是皇族或华族的女儿。势津子的父亲松平恒雄，曾担

① 原名松平节子，因与皇太后重名，更名为势津子。

任驻美大使，是旧会津（今福岛县西部地区）藩主松平容保子爵的庶子，在分家后早已失去了华族的头衔而成了平民。这对新人之所以能够终成眷属，除了雍仁亲王的坚持外，还得到了皇太后节子的大力帮助。尽管如此，为了平息守旧势力的反对呼声，势津子还是不得不改籍做了叔父松平保男子爵的养女，凭此取得了与皇族结婚的华族资格。

世间的事情总是福祸相倚，如果说裕仁登基与弟弟雍仁亲王的婚事算是喜事的话，那么同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却令天皇裕仁悲伤不已。皇后良子继 1925 年 12 月 6 日生下长女照宫成子内亲王后，又于 1927 年 9 月 10 日顺利产下一名女婴，天皇为其命名为久宫祐子。1928 年 3 月 1 日，久宫开始哭闹起来，情况异常。当时侍医诊断称只是轻度咽喉炎，只需调养两三日就会好转。没想到病情急剧恶化，三日后被确诊为败血症，不久红斑疹扩散全身，高烧不退。

久宫病重期间，正逢裕仁天皇也因患感冒而卧病在床。每当侍从和女官来探望他时，裕仁总是关切地询问女儿的病情。对久宫一直恶化的病情，侍从和女官都难以回答。从他们的表情中，裕仁也看出了病情的严重性，他焦急不安地催问道："病得那么厉害吗？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但是久宫的病情并没有因侍医的精心护理和裕仁对女儿的关爱而好转起来。3 月 8 日，久宫停止了呼吸，出生后只存活了半年。

久宫的棺木里放进了短刀和她喜爱的玩具，天皇与皇后都痛哭不已。按照皇室惯例，天皇不能参加送葬。夫妇二人目送女儿的棺木被抬往门口的停车处后，又急忙登上二楼的房间，从窗口凝视着远去的车队，目送成了最后的诀别。

九一八事变

1928 年 6 月，张作霖被炸死于返回东北的途中。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此时的日本认为要尽快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外别无他途。1929 年 7 月，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等对"满洲"北部进行考察后，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系统地提出了侵略东北的计划。1931 年 6 月 11 日，陆军

大臣南次郎秘密组织了一次“五课长会议”[1]，经过反复讨论，于6月19日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始发动事变的种种周密部署。鉴于沈阳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关东军将首战地区选在了沈阳。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又选择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作为爆破地点。时间预定在1931年9月28日，并且预定在爆破铁路的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电战一夜占领沈阳城。

在板垣、石原等人多次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密谋后，驻朝日军也遥相呼应，开始有计划地向中朝边境集结，不断进行越境演习，并准备在事变爆发后兵分两路，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配合关东军作战。

进入8月后，日本军部作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8月1日，曾担任驻华武官的张作霖的前顾问、谙熟中国东北情况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而著名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则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日本军部将此二人派往中国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出的军事部署。据说本庄繁是由裕仁天皇亲自选定的。8月1日上午，本庄繁到叶山夏宫晋谒裕仁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授予了此职。

8月末，关东军阴谋发动事变的计划逐渐传到了日本国内，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内大臣牧野伸显以及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担心关东军的行动一旦导致战争，将危及若槻内阁的“协调外交”，希望天皇能够召见陆相和海相，以整顿军纪。9月10日和11日，从叶山夏宫刚刚回到东京皇宫的裕仁天皇，立刻会见了海相安保清种和陆相南次郎，并问询二人“是否听到社会上关于军纪有各种批评”。

天皇的垂询，加上来自内阁、元老及舆论的压力，陆军在9月14日召开了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官会议，决定了关于抑制关东军实施武力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少将为使者，把陆相的信送交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陆军省选择建川为信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建川恰恰是一名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急于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接到任务的建川在出发前授意自己的部下、陆军情报课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

---

[1] 所谓的“五课长会议”，由陆军省的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组成。

续向关东军发出了三份密电，要求提前行动。

板垣、石原等人在反复研究了桥本的三份电报后，决定将原定的日期提前10天，于9月18日发动“事变”。而身负紧急军机重任的建川故意拖延时间，迟至19日晚才将陆军省的亲笔信送到本庄手中，“事变”已是既成事实。

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按照预定计划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附近进发。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包安放在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下并点燃了导火索，只听轰的一声，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乱飞。随后日军故技重施，又制造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诬为炸毁铁路的凶犯。随即河本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等候在铁路爆炸地点以北约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袭击北大营。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正在旅顺的本庄繁夜里11点接到报告后，立即通过电话命令第2师团向沈阳出动，并决定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向沈阳转移，同时电请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迅速增援。

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日夜晚日军就顺利地进占沈阳城。9月19日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尚未到达沈阳，关东军就已把事先炮制好的署名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石印布告贴满了沈阳城。诬称事变是中国军队制造的，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

日本军部接到事变的通报后，参谋本部、陆军省首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因而决定无保留地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应关东军“增派三个师团”的请求，着手准备派兵增援。但在当天上午10时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若槻首相、币原外相却担心战火扩大，引起国际干涉，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将此事上奏了天皇。在此情况下，陆军省、参谋本部只得含糊地训令关东军：本着内阁会议的精神，“妥善处理”今后的军事行动。深知军部意图的桥本欣五郎又密电板垣：本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本意并非要你们停止行动”。

军部的暗中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9 月 21 日下午，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未经内阁批准和天皇裁可，以“对关东军不能坐视不救”为由，按早已达成的谅解，独断专行地派遣第 6 飞行联队战斗机和侦察机各一个中队飞往中国东北，并调动所辖步兵第 39 混成旅团渡过鸭绿江夜抵沈阳。关东军也立即抽调兵力进攻吉林省城，促成事态进一步扩大。

无论是关东军挑起战争，还是驻朝日军出兵东北，都没有经过天皇和内阁会议的批准。所以事件发生后，陆军高级首脑十分紧张，唯恐政府以“侵犯天皇统帅大权”为由弹劾朝鲜军司令官并拒绝拨款。但出乎陆军意料的是，鉴于驻朝日军出兵已成事实，本来与军部在控制满蒙问题上并无原则分歧的内阁大臣们在 9 月 22 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竟毫无疑义地一致通过了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作出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可见，内阁根本不想为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设置任何障碍。

当晚，若槻首相、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先后将内阁会议的决定上奏天皇，并得到了天皇批准。据当时担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的日记记载：“陛下曾指示首相、陆相，称政府努力不使事件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很好，望继续努力。”同时，裕仁天皇根据内阁的奏请，以“不扩大事态”为条件批准了驻朝日军的越境行动。

就这样，驻朝日军的独断越境问题，以事后追认的方式而告结束。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还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赫赫威名”，并受到天皇的赞赏，后来还受命组织内阁。这样一来，就给陆军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只要作出实际成绩，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天皇的厚待。也正因如此，这种事后承认的做法后来屡次发生，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

发动九一八事变只是日军的第一期计划，尽管内阁和天皇都表明了“不扩大事态”的意见，但日本军部已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下一步的计划是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奉路沿线的主要城市，以图牢固控制南满。9 月 19 日，关东军攻下长春，日军独立守备第 3 和第 4 大队也先后于当天侵占了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至此，南满铁路沿线已完全被日军占领。到 9 月 23 日，日军又相继攻陷了吉林、齐齐哈尔，这样，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沦入日军之手。

同年 11 月 27 日，本庄繁又下令关东军向锦州进犯。但关东军这次独断的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从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出发，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为了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日本参

谋本部决定暂停对锦州的作战。次日，日军参谋本部把进攻锦州的部队撤回到了辽河以东。

12 月中旬，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若槻内阁倒台，犬养毅内阁成立。新任军部首脑支持关东军进占锦州，并增派了大批部队进驻中国东北。12 月 28 日，关东军再度发起锦州战役，并于 1932 年 1 月 3 日攻占锦州。这样，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也迅速为关东军所占领。而此时的裕仁天皇再次提出了“事态不扩大”的要求，并要求警戒关东军、朝鲜军的肆意行为，他对元老西园寺公望说：“现在军部不顾统一命令，肆意行动，干涉国政、外交，为此，我对国家颇感忧虑。”但在此后不久的 1 月 8 日，裕仁天皇却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

> 曩者满洲事变勃发，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此后，凌艰苦，冒祁寒，荡伐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1]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所著的《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对天皇发表嘉奖敕语进行了如下评价：

> 裕仁在发布诏敕时，对内容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这里，裕仁特别具体地提出嫩江、辽西的两次作战加以称赞，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关东军擅自发动的这两次战役，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的为难，也成了国际上猛烈谴责的目标，可是由于这一敕语，在日本国内把对关东军的专断进行谴责的道路一下子就堵死了。这一敕语清楚地表明：裕仁的军队不管是擅自发动侵略战争也罢，擅自扩大战争也罢，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认为是应加赞赏的。[2]

---

①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三铃书房，1965 年，第 337 页。
②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69 页。

天皇的表态，给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打了强心针、兴奋剂，使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更加肆无忌惮。裕仁天皇以敕语的形式把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无诏书的战争”变成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的“圣战”。

寻衅上海滩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一些爱国反日的人士走上了暗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道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江淮大侠”之称的王亚樵。王亚樵早年反蒋，随着日寇入侵中国，又一改反蒋为反日，组织“铁血锄奸团”，专事刺杀日本特务及卖国汉奸。在此期间，王亚樵逐渐与当时流亡上海的朝鲜反日组织韩国独立党和韩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王亚樵与朝鲜反日志士金九进行密商，双方约定分头行动，王亚樵负责刺杀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板垣征四郎，金九领导的爱国团负责刺杀日本天皇裕仁。然后共同发表声明，要求日本侵略军退出中、朝，否则将遭更大的报复。

1931年10月，王亚樵前往沈阳，在得知靠侵华战争起家的日本陆军元老白川义则大将正在沈阳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后，遂决定改为行刺白川。但由于日本宪兵警戒极严，暗杀未能成功。11月底，王亚樵返回上海后，金九立即着手布置刺杀裕仁天皇。

金九派出的刺客是韩国独立党成员、时年32岁的李奉昌。1931年12月16日，李奉昌一切准备就绪，并在自己的内裤里缝了两枚日制军用炸弹，前往东京。

在东京，李奉昌以木下省藏的日本名字住进锦町旅馆。经过多天对皇宫周围的侦察，李奉昌选择了皇宫樱田门外警察署附近作为狙击地点。一是因为裕仁天皇经常从此门出入，二是因为樱田门外道路弯弯曲曲，特别是在警察署处有一个较大的转弯，天皇车队经过时必然减速，便于趁机投弹狙击。

但是要想接近那里并不容易。按规定，只有在每年1月2日和4月29日“天长节”时，人们才可以到那里。而在平时，若想到那里必须有贵族的证明。李奉昌在离开上海前，以参观皇宫为名，托曾与他谈过恋爱的一

位日本贵族小姐为他办好了证明。证明上用的是另外一个日本名字——浅山太郎。

1932 年 1 月 8 日，裕仁天皇在东京郊区代代木练兵场检阅了号称“精锐之师”的陆军第 9 师团。也正是在这次阅兵式上，他宣读了那份赞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敕语。检阅结束后，裕仁天皇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起驾回宫。这时，李奉昌已顺利抵达樱田门附近，准备伺机下手。

裕仁天皇乘坐的是一辆四乘古式马车。日本警方为预防行刺，除安排大批警力前呼后拥以及从“满洲”空运来关东军的秘密警察进行协助外，还特意在天皇马车后安排了一辆装饰与警戒都相同的马车，称之为“副车”，主要起伪装与迷惑作用，当时坐在这辆马车上的是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

自从 1923 年发生谋刺天皇的事件后，在御驾巡幸时沿途两边的警察都背向街道肃立，两眼紧盯着人群。按照历来的传统，人群是跪着的。当天皇的车队来到樱田门外警察署前转弯处马车减速时，混在人群中的李奉昌趁机将日制炸弹磕火，投了出去。不料，李奉昌误将副车当成了天皇的座车，随着轰然一声巨响，副车的车夫当即被炸死，车上的人却幸免于难。坐在前面马车上的裕仁天皇听到爆炸声后，惊慌失措，差一点摔出车外。驾车的驭马见状立即挥鞭催马，拉着天皇直奔樱田门内。

刺杀裕仁未果的李奉昌当场被捕，并被押至警察署。他拒不回答警察的询问，只是一再追问：“裕仁受伤没有？”当得知裕仁安然无恙后，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大事未成啊！”

行刺天皇失败后，金九立即通过南洋报纸发表声明，警告日方不得杀害李奉昌，如若不然定遭更大报复。但日本法院还是于当年 9 月判处李奉昌死刑，并大肆宣扬犯人已经悔过。

裕仁在得知刺客身份后笑嘻嘻地说：“他一定是韩国独立党派来的。”当天下午，宫内侍从官木下称，这次谋杀未遂事件有助于裕仁重新获得对他日益失望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刺杀事件后，主管警务的内务相曾同内阁其他人员一起向裕仁奏请辞职。但裕仁看也不看，就将辞呈退给首相，要求内阁全体留任。

1932 年 1 月 5 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从沈阳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10 日，板垣从东京

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将发电报："'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的事变，将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中心，控制了上海，既能以此为据点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腹地的侵略，又可进一步迫使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大都集中于上海，是列强对华关系最敏感的区域，易于收到转移国际视线的效果。

1月18日下午4时，驻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5名日莲宗①僧人在毛巾厂附近突遭日本特务川岛芳子②雇用的流氓打手的袭击，致使一名日僧死亡。以此为口实，1月28日晚11时50分，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驻上海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地叫嚷"上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但是日军一开始便碰了壁。驻防闸北的蔡廷锴将军率领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进行了英勇而顽强的抵抗，并于29日下午开始反击，一举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日本的狂妄计划破灭了。盐泽被迫接受英、美、法驻沪领事的"调停"，同意停战3天，以待援军。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战事发展的裕仁天皇于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见宫为海军军令部总长。这项任命一反宫廷惯例，事先并未与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只是在事情决定后才通知西园寺公望。由于陆军参谋总长已由伏见宫的祖叔闲院宫担任，至此，陆海两军的作战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员手中。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随后，日本海军中央部慌忙增派新组成的第3舰队支援上海。2月3日，盐泽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进攻，并于次日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将战火延烧至江湾、吴淞一带。结果是激战数日，进攻江湾的第一联队被中国军队围歼。吴淞炮台虽被日军摧毁，但日军仍无法登陆。这次总攻被粉碎后，在裕仁的指责下，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被免职，改由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2月5日，根据裕仁天皇

---

① 日莲宗：以镰仓时代中期僧人日莲为宗师的日本佛教派之一。

② 川岛芳子：又名金碧辉，前清肃亲王善耆之女，后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训练成忠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女间谍，为日本提供了大量侵华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被处决。



参加陆海军特别大演习的裕仁天皇

的敕令，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急令陆军第 9 师团火速增援上海。第 9 师团于 2 月 20 日、23 日发起两次总攻，均被击退。总攻计划破产后，日本统治阶级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

为尽快结束上海的战事，犬养毅内阁根据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于 2 月 23 日决定向上海增派第 11、14 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原田中内阁的陆相、最高军事参议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24 日下午 4 时，内阁的上奏得到了天皇的批准。在 2 月 25 日白川义则的任命仪式上，天皇裕仁指示道：“在将中国第十九路军从上海击退之后，不要长追不舍，希望在 3 月 3 日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之前能够停战。”

3 月 1 日黎明，日本陆军第 11 师团 1 万人在 80 多架日机的掩护下从

长江的七丫口[①]登陆，占领了中国军队背后的浏河镇。同时日军第9师团也于3月1日发动第3次攻击，绕过江湾，于次日攻占大场镇。已苦战一个月之久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又得不到蒋介石的增援，为保存力量只能于3月1日晚全部退守至第二道防线，即黄渡、嘉定、太仓一线。

日本军部仍不肯罢手，他们给白川大将的指令是：向太湖前进。但白川忠实地执行了天皇裕仁的指示，于3月3日下午向日军发出了停战的命令。据说裕仁天皇在战后曾同近臣谈到上海事变时夸耀道："在上海，将战区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扩大，这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②] 很显然，天皇裕仁是在为自己表功。事实上，日本之所以罢手停战，是在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以至四易主帅、连吃败仗，在西方列强的一再警告和干涉声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住面子"的策略。

上海停战后，天皇裕仁对派遣军大加褒奖，命令议会准予追加军事预算，并于3月16日颁赐敕语："派往上海方面的陆、海军将兵，齐心协力，以寡克众，使皇军的威武扬于海内外，朕深嘉其忠烈。"[③]

尽管裕仁侥幸躲过了李奉昌的暗杀，但他的爱将、在沈阳躲过了王亚樵行刺的白川义则就没那么幸运了。4月29日正是日本所谓的"天长节"[④]，占据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庆祝仪式，白川义则也出席了这一庆祝活动。王亚樵与金九再度策划了行刺活动，当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乐曲接近尾声时，朝鲜义士尹奉吉将一颗自制高爆力炸弹投掷到了主席台上，白川义则等7人被炸伤，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后来在日本战败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了一条腿。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被送回国内，在一个月后死去。行刺者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底在日本的石川县金泽市英勇就义。

闻知白川被炸伤后，伤心不已的裕仁于5月23日亲自看望了受重伤住院的白川，对其大加赞扬："作为上海军司令官，在异地奋力作战，终于

---

① 七丫口：又称七浦，在江苏省常熟县。
② 《裕仁天皇独白录》（中译本），《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8期。
③ ［日］《朝日新闻》，1932年3月16日。
④ 庆祝日本天皇诞辰的节日，1932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31岁生日。

完成任务，显扬了国威。”并对周围的人们说，“白川是好样的！”[1]

白川的死被当作战死，其灵位也被祀奉在了靖国神社。第二年春天例行大祭时，裕仁在白川的灵位前叩首。回想起白川的一片忠诚，裕仁暗中流下了眼泪。后来，天皇还把这种感慨写成了诗赐给了白川的遗孀。

少女逢雏祭[2]，
战火纷纷势无羁，
朕心愁不已，
难得爱卿排万难，
停战有功当永记。

天皇亲书诗词赠与臣下，以往并无先例，同时又担心给军部的刺激太大，所以长期没有公布。

“一·二八”事变历时35天，日军四易主帅，死伤3000余人，同时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联合干涉，日本一度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但“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1月3日，关东军步兵第四旅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3月中旬热河全省沦陷，4月17日滦东地区也被日军占领。

关东军出兵热河，曾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首肯和批准。1933年3月2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奉命回国向天皇报告热河的作战情况。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天皇“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3]。4月15日，天皇裕仁还向侵占热河的日军颁赐了敕语：“在热河方面作战的关东军将兵，冒风雪逾艰险，长驱速进以寡敌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应养其锐力，朕深有厚望。”

裕仁天皇虽对关东军侵占热河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但对关东军越过长城占领长城以南的滦东地区，却有些忧虑。关东军在滦东一路深入，英国政府为其权益曾向日本政府提出过严重抗议，裕仁天皇对此惊恐不安。另

① ［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年，第87页。
② “雏祭”日，即3月3日，为日本传统的女儿节。
③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

外，裕仁也担心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深入会付出惨重的代价。4 月 19 日，天皇召见陆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曾当面质问："关东军还没有从滦河一线撤退吗?"被召见后的真崎立即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发出密电，表示"如不立即撤退，将奉敕令下达撤退命令"。4 月 20 日，关东军司令部只得密令关东军陆续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

5 月 2 日，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商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降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并奏请天皇批准。关东军司令部于次日便下达了入侵关内的命令，关东军再次向滦东发起进攻，同时强渡滦河侵袭滦西，华北形势危在旦夕。5 月 31 日，蒋介石政府被迫与日本缔结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被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塘沽协定》签订后，裕仁天皇曾亲临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此后，日本政府更是得寸进尺，在华北频繁制造事端，并先后迫使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主权。1936 年 4 月，经裕仁天皇批准，华北驻屯军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原来的两个步兵大队扩大为由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坦克队、骑兵队、工兵队组成的战略兵团，总兵力扩大到 5000 余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地位也随之升格，由少将级升格为中将级，由军部任命改为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日本陆军第 1 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成为由天皇亲自任命的第一任司令官。日本军队的各项变动，骤然使华北地区乌云密布，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

炮制"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参谋本部针对武装侵占东北后的殖民统治问题提出了三个阶段的方案：一是组织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也就是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并将其划入日本版图。1931 年 9 月 22 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的会议上，土肥原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汉、满、蒙、韩"五旗共和国"的新方案被通过。

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出笼后，在关东军的煽动和蛊惑下，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建立东北三省的省伪政权。在拼凑省、县“傀儡”的同时，关东军还积极着手筹建全东北的傀儡政权。

自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溥仪经郑孝胥、罗振玉等人暗中活动，辗转逃入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被护送至天津日租界，先后居于张园、静园，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豢养。

1931年11月13日，在日本间谍祈继忠的安排下，溥仪与郑孝胥等人由海路到达营口。随后，板垣派来的特务甘粕正彦将溥仪转移到旅顺的大和旅馆，严加隐蔽，以待时机。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东北三省尽被日军侵占。日本帝国主义认为炮制“满蒙”新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在李顿调查团[①]来东北之前造成既成事实，加速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

1932年1月6日，板垣带着关东军的方案赶回东京，受到了裕仁的破格接见。同一天，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规定：满蒙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参与这个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

按照《纲要》，关东军导演的伪满洲国的政治丑剧一幕幕开始上演。先是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了10余次的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具体研究建立傀儡政权的各项事宜。接着，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于2月18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东北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2月25日，板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亮出了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指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国旗为红蓝黑白满地黄的五色旗，体现了“满洲国”的口号“王道乐土，五族共和”[②]；首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张景惠等俯首听命，以“东北建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建国通电”。

---

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多次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美、法、德、意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4月21日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

② 所谓五族，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就是“满洲”人、蒙古人、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五族共和”这一口号是由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的。

3月6日，在关东军的严密护卫下，溥仪携婉容及郑孝胥等人，从旅顺前往“新京”就任“执政”。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及汉奸头目、清室遗老、蒙古王公等参加了就职仪式。

半年多后的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满洲国”。同一天，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同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以条约的形式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加以“合法化”，使日本在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方面都得以排他性地独占中国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动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日本在李顿提出报告书之前公然承认了伪满政权，这意味着向国联挑战。1933年2月21日，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国联召开特别大会，以42:1（日本弃权）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政权，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并确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根据军部的要求，决心退出国际联盟。对此，天皇裕仁予以了批准，并发表诏书，声称：

> 值此满洲国新兴之际，帝国尊重其独立，促使其健全发展，以除东亚之祸根，奠定保卫世界和平之基础。然不幸，联盟所见与此相悖，朕乃令政府慎重审议，遂使之采取退出国际联盟之措施。[①]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得更像个王道国家的样子，将其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总算圆了溥仪的皇帝梦。但不论当执政还是当皇帝，都不过是关东军手下的一个傀儡，只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罢了。

溥仪当上“皇帝”两年后，与“秋鸿皇后”婉容仍无后嗣，因此下一代有可能让其弟弟溥杰继位。日本把嵯峨侯爵家的嵯峨浩许配给溥杰做夫人，这与日本将梨本宫方子王女许配给朝鲜的太子李垠为妃的做法如出一辙，完全是一桩政治婚姻。

为满足溥仪的虚荣心，1934年6月6日，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秩父宫

---

①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82页。

雍仁亲王奉天皇之命到达长春，祝贺溥仪即“皇帝”位，并赠给溥仪一枚大勋位菊花大绶章，赠婉容勋一等宝冠章。

1935年4月，关东军以答谢日本天皇的祝贺和躬亲垂范“日满亲善”为理由，安排溥仪赴日访问。日本政府以枢密院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叡号”迎接溥仪，“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溥仪从大连出发，到达横滨时，日本安排了100架飞机组成的编队欢迎溥仪。受宠若惊的溥仪即兴写下了两首极尽谄媚的诗句：

>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
>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溥仪来访，裕仁天皇亲自到东京车站迎接，两位“陛下”在“和睦”的气氛中“亲切”地握手。溥仪的下榻处被安排在天皇裕仁当太子时居住的赤坂离宫。当晚，在皇宫中的丰明殿为溥仪举行了丰盛的欢迎晚宴。为迎合溥仪的口味，晚宴特意精心烹制了各种菜肴，室内“满洲国”的“国花”兰花散发着清香。这时，天皇和溥仪互相问候后就座。当天皇说请吃菜时，众人都被其后出现的景象惊呆了：有一名溥仪的随从从旁边走过来，用进餐的刀叉将每个盛菜的盘子都翻了一遍，设计精制的菜品瞬间变得面目全非，令裕仁和其他众人为之瞠目，宴会气氛陡变。但溥仪对此并没有感到丝毫意外，甚至以他熟练的手法，试了试菜中是否有毒，然后再悠然自得地缩回手来，并对裕仁报以微笑，裕仁也不得不勉强报以微笑。

尽管如此，溥仪还是受到了日本的热烈欢迎，裕仁陪同溥仪一起检阅了军队，溥仪还参拜了明治神宫，先后参观了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神户等地，各地都是官、民、学生热烈欢迎的场面。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使得溥仪有些飘飘然，他感到日本是真心尊重和帮助他的，过去的一切不愉快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皇太后对初次来访的溥仪也进行了热情招待，同溥仪在皇宫内交谈、散步等，长达6小时。溥仪在自己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这样说道：



欢迎溥仪的阅兵式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1935年4月9日）

> 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扶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①

为了主动与天皇攀亲，溥仪竟突然向皇太后提出希望能将天皇的长女照宫成子公主认作自己的养女。溥仪的真实想法是，如果照宫真的成了自己的养女，而把清朝某个遗少与照宫配婚，那么下一代皇帝就不是溥杰，而是照宫公主生的孩子了。当"满洲国"总务厅长远藤向天皇反映溥仪的这一要求，并认为是"蛮横无理"时，天皇却训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他总是人，难免会有不满，也会有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满洲国皇帝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溥仪离开日本时，裕仁的弟弟雍仁亲王作为天皇的代表到车站欢送溥仪，并对溥仪说道："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

①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342～343页。

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溥仪赶紧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临近登船出发时，溥仪还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男爵转达向裕仁天皇和皇太后的致谢。

回国后的溥仪立即召集“新京”所有的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异想天开地把自己同日本天皇放在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5 月 2 日，他还特地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宣称：“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你们应该认真体会，与友邦一德一心，奠定两国永久的基础，发扬东方道德的真义。”

与受宠若惊的溥仪相反，天皇裕仁满脸的笑容里却暗藏着审慎和怀疑。送走溥仪后，皇太子向裕仁说了几句夸耀溥仪有礼貌、和蔼可亲之类的话。裕仁则淡淡地说：“不见得，那边的人是很会应酬的。他不过是施展了一手罢了。”接着又说道，“在东京车站迎接他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倒有一种亲切感。可是，分别时的握手和那种态度不过是例行公事，使人感到相当的冷漠。”这段话连皇太后都感到意外和奇怪，可这恰好表明了裕仁的心态。正因为他以虚伪和欺骗的态度对待别人，所以必然怀疑别人对自己的冷淡和不满。两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彼此间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溥仪的自我陶醉也没有持续多久，便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了。

1936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一份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件，其中第 3 项明确规定了“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满洲国”皇帝是基于天皇的圣意而即位的，必须为天皇服务，这是即位的条件。另外还规定关东军司令官是天皇的代理人，同时也是“满洲国”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①] 说来道去，溥仪只有唯关东军司令官之命是从，才能保住“皇帝”宝座。

1940 年 6 月，关东军又精心安排了溥仪的第二次访日。目的是改变东北人民的宗教信仰，使中国东北彻底殖民地化。这次访问名义上是为了庆祝日本神武天皇纪元 2600 年，实际上是为了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

---

①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64 页。

洲国”奉祀。这次日方对溥仪的接待虽不及第一次隆重，但也相当礼遇。裕仁天皇仍亲自到车站迎接，皇太后也设午宴招待，溥仪后来回忆说：

> 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1]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一句话：‘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接着，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钩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来的，哪一个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2]

尽管思想上想不通，但溥仪仍不得不按照关东军的要求，在“帝宫”旁用白木搭起一座建国神庙，并专门成立了祭祀府，每逢初一、十五，由溥仪带头前往祭祀。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强迫溥仪和东北人民接受和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其用意无非是表示伪满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的，“满洲国”的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满洲国”也就应该由日本来统治。

---

① 吉冈安直：关东军安排在溥仪身边的监护人。

②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362页。

第四章　法西斯主义形成
“二二六”裕仁发威

法西斯团体纷涌出现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矛盾的加剧，日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危机四起。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美英的压力，日本不得不接受以列强共管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体系，被迫将其所谓“特殊权益”地局限于中国东北，其侵略野心遭到极大的挫败。在日本国内，1918 年的“米骚动”事件、1923 年的震灾危机、1927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 1929 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工农群众的贫困化和中间阶层生活处境的恶化。面对这种危机四伏、到处碰壁的现状，为了镇压国内的革命斗争以及在国际上同英、美争夺亚洲霸权，日本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

民间法西斯运动与军部法西斯运动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迅速崛起的两大组成部分。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

北一辉（1883—1937），原名北辉次郎，从小受到“忠孝一致”、“忠君爱国”的教育，早年自称是社会主义信仰者，曾参加过中国同盟会。1919 年 8 月，几乎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战斗团”（1919 年 3 月 23 日）同时，北一辉在上海的病房中写出了系统阐述其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小册子，初名《日本改造原理大纲》，1923 年出版时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北一辉所谓的“国家改造”，就是要对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对外煽动扩张主义，重新瓜分世界。

1919 年 8 月，日本最早的法西斯组织“犹存社”[1] 成立，其创立者是另一个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川周明。大川曾积极向青年军官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并自称是“彻底的日本主义者”。他的政治主张包括：标榜反财阀，鼓吹实行第二次“维新”；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建立绝对忠于天皇的专制极权统治；鼓吹使日本成为称霸亚洲和世界的超级大国。1920 年，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把北一辉接回国，以便共同推进日本的法西斯运动。

日本军队法西斯团体并不是完全按照民间法西斯主义的思路发展的。1921 年 10 月 27 日，奉命去德国考察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 16 期毕业生，人称“三杰”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 3 名少佐，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秘密聚会，约定回国后要在陆军内部实行改革，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他们回国后，又纠集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士官学校第 15 期至 18 期毕业的校级军官 20 名，于 1923 年建立了“双叶会”[2]。在其影响下，军队中的各种法西斯组织纷纷成立。

与德、意法西斯不同，在日本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法西斯政党，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军部法西斯的主导下实现的，民间法西斯势力与之勾结，起了辅助作用。另外，与德、意法西斯势力“自下而上”、通过推翻原有政权建立法西斯体制有所不同，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充分利用了天皇的权威与权力，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局部地改变原有统治机构而完成的，因而被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1929 年取代田中内阁上台的滨口幸雄内阁，尽管继续奉行上届政府的反动政策，但仍不能满足法西斯军人的胃口。1930 年春，滨口派代表团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舰艇规模的《伦敦条约》，规定美、英与日大型巡洋舰比例为 10∶6，轻巡洋舰和潜水艇比例为 10∶7。这一协议立即激起了以海军军令部为首的军部的反对。1930 年 11 月 14 日，滨口被民间法西斯团体“爱国社”的成员佐乡屋留雄行刺于东京车站，并于次年 8 月死亡。滨口遇刺，拉开了日本法西斯势力对政党政治进行总攻的序幕。

1931 年 3 月，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少壮派军官同大川周明等

---

① 关于“犹存社”名字的由来，大川周明的解释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家陶渊明的“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这一名句，其含义是指即使在强调国家改造的时候，“国粹主义”的倾向还是存在的。

② 双叶会：因经常在东京涉谷区的一家法国式餐厅“双叶亭”聚会而得名。

民间法西斯分子勾结，预定于3月20日调动军队包围议会，迫使继滨口之后的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内阁总辞职，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部独裁政府，推行所谓的“国家改造”计划。但这一政变计划由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因条件不成熟予以反对而最终未能实施，史称“三月事件”。当时策划政变者不仅未受到处分，反而在后来得到升迁，很多人还被派到侵略中国的第一线，这更加助长了军队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若槻礼次郎内阁所主张的“不扩大”方针，激起了主张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强烈不满。在“三月事件”中受挫的以桥本为首的“樱会”急进派再次与大川周明勾结，准备第二次策划武装政变。政变预定于1931年10月21日举行，届时将动员陆海军少壮派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百余名，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槻等人，建立以法西斯头目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相、建川美次陆军少将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权。但这一政变计划也由于知情者告密而流产，桥本等12名主谋被捕，史称“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后，若槻内阁总辞职，组成了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是日本战前著名的政党政治家，一生为实现政党政治奔走呼号，有很高的声誉。由于在如何控制中国东北问题上与军部及外务省存在分歧，同时犬养曾利用政友会在议会中的优势打击军部，促使法西斯分子将政变的矛头对准了犬养毅。1932年2月9日，与皇道派密切合作的民间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分子根据其“一人杀一人”的方针，枪杀了民政党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准之助。3月5日，又杀死了支持犬养内阁的三井财阀最高领导人、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制造了“血盟团”事件。

3月底，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等人勾结以橘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木间宪一郎为首的“柴山塾”、大川周明为首的“神武会”、头山秀三为首的“天行会”等民间右翼团体，制订了推翻犬养内阁的政变计划。计划决定于5月15日采取行动，参与起事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候补军官分为四组，分别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等部门，以“爱乡塾”为中心的别动队袭击东京的6个变电所。在政变得手后，由以荒木贞夫陆相为首的军部出面收拾局面。

在此之前，曾发生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趣闻。5月13日，天皇曾召以犬养首相为首的阁僚于宫中共进晚餐。该日当值的冈本爱祐侍从在安排出

席人数时，发觉正好是 13 名。在西方的习惯中，13 日是星期五，而且又是 13 人的晚宴，是一个不祥之兆。于是冈本在 13 人的名单后又特意增补了一名侍从，成了 14 人。但仿佛命运注定这是一个不祥之夜似的，在出席晚宴时，又恰逢一名阁僚未能到席，又成了 13 名。察觉到此事的冈本，只好无奈地又将特意增补的侍从从席间撤下，于是成了 12 人的晚餐。①

侍从冈本的良苦用心终究未能摆脱不幸。5 月 15 日，政变按预定计划如期展开。以古贺清志为首的青年军官于下午 5 时半闯入首相官邸，将年已 76 岁的犬养首相枪杀。但参与政变的其他各路人马却未能得手。参与政变的主力部队被迫向宪兵队自首，“爱乡塾”头子橘孝三郎和向政变部队提供武器和资金的大川周明先后被捕。日本史称这次未遂政变为“五一五”事件。

受元老西园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裕仁天皇对法西斯军人制造的一系列军事政变和暗杀行为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并非出自政治上的分歧，而是由于他认为法西斯运动“涣散军纪”，危及国家的正常秩序。当犬养毅受命组阁时，裕仁天皇就曾对负责推荐首相的西园寺说过：“为国家着想，不控制军部是令人担忧的，请告诉犬养要充分注意。”话虽这样说，但裕仁天皇显然不可能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打击以天皇名义制造恐怖事件的法西斯分子。不仅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法西斯势力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指出：

> 天皇裕仁不仅不对侵犯他的统帅权的、肆意出兵外国领土的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总长加以责备，反而公开称赞他们。既然如此，司令官和军部在军队内怎么能对那些企图挑起战争的军官或企图建立主战内阁的军官给予处分呢！同样，警察也不可能逮捕那些和军官共谋的社会上的右翼领导人。

首相犬养被刺身亡，使裕仁天皇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召见元老西园寺，就继任首相的人选提出如下要求：（1）首相要有光明磊落的品格；（2）要改革政治弊端，整顿陆海军军纪，首先决定于首相的品格如

① ［日］大久保利谦等监修：《昭和史画报·第 14 卷·昭和史和天皇》，研修出版社，1987 年，第 62 页。

何；（3）搞独裁政治的人绝不可用；（4）必须拥护宪法，否则有愧于明治天皇；（5）外交应以国际和平为基础，力求圆满地处理国际关系。此外，裕仁还提醒陆军大臣："近来年轻人似乎有些越轨，这种时候大臣应不惜牺牲作出处理。"

根据天皇的指示，元老西园寺对首相的人选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希望仍由政友会总裁继任内阁首相；二是如果情况有变，则推荐第一在野党总裁。因此，政友会等都对新任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寄予厚望。对此，反对政党政权、企图夺取内阁大权的军部表示反对。在军部的压力下，西园寺只得放弃了推选政党领袖担任首相的努力，最终向天皇推荐了曾任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

斋藤实上台后，努力在统治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中寻求平衡，组成了所谓的"中间内阁"，是军部和政党共同维持的政权。但总的说来，军部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比以往大大加强了。自政友会的原敬于1918年组织内阁以来，除两年的官僚内阁外，一直由政党内阁轮流执政。犬养被暗杀和斋藤的上台标志着"政党内阁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议会政权的消亡。自此以后一直到战败，政党再也没有能够再登上首相宝座，组阁的都是贵族、官僚或退役军人（后来又发展为现役军人）。与此同时，西园寺等尊重议会的重臣势力明显衰退。从这个意义来说，斋藤内阁的上台，也是日本公开向军人法西斯政权迈出的重要一步。

后嗣危机与皇太子诞生

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的右翼法西斯分子继续策划暗杀阴谋。1933年7月，日本警视厅逮捕了"爱乡党"、"大日本生产会"等秘密组织的44名恐怖分子，当时，他们正准备暗杀内阁所有成员及其他政治要人。经过审理，警视厅发现了隐藏在这一暗杀行动背后的更大的阴谋。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动得到了一个军人小组的支持，他们预谋在暗杀成功后，废黜裕仁天皇，必要时不惜将其置于死地，而将皇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推上皇位。由于这一案件涉及皇室，日本警视厅未敢认真审理，便以阴谋的参与者均是出于爱国动机为由将他们释放。

部分法西斯右翼势力之所以将矛头指向裕仁天皇，据说与"五一五"

事件后裕仁天皇曾明确表示“亲法西斯的人绝对不能当首相”有关。在1936年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中，日本军人再一次明确表示了这种观点：“如果天皇反对革新，就该拥护某宫殿下（指秩父宫），取代当今陛下。”

看来比起裕仁天皇，秩父宫雍仁亲王更受到法西斯少壮军人的欢迎。雍仁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就长期在日本军队任职。在这期间，他熟读了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深受其法西斯理论的影响，并与一批法西斯青年军官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五一五”事件发生时，他曾站在政变军人的一边，言辞偏激地鼓吹天皇应当亲政，如有必要，即使停止实行宪法也在所不惜。雍仁亲王的这种政治态度以及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右翼法西斯分子拥戴的对象。

然而要废黜裕仁天皇，对那些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分子来说，必须找出一个能为广大国民接受的名正言顺的理由。而当时结婚已近10年的天皇夫妇还未生下一位继承皇位的太子，这正是他们得以进行阴谋行动的一个重要借口。

1924年与裕仁天皇结婚以后，良子皇后接连生下了4个孩子，却没有一个是男孩。1925年12月生下了照宫成子，1927年9月生下了久宫祐子，1929年9月生下了孝宫和子，1931年生下了顺宫厚子。

生育后嗣，传宗接代，使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得以世代相传，这是身为天皇的重要任务。可是，良子皇后接二连三地生下公主，这不仅使裕仁天皇因愧对皇祖皇宗而苦恼，而且也令将天皇视若神明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危机感，“皇后陛下肯定是只生女孩的肚子”，“明治天皇拥有十二名妻妾，而现在的陛下却只有皇后一人”……各种议论充斥于街头巷尾。

面对皇室的后嗣危机，元老西园寺和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十分焦急，“这事可能需要认真考虑，已经不能指望皇后陛下了”，纷纷劝说裕仁天皇纳妾。在这些出生于明治时期的老臣看来，天皇为传宗接代而纳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孝明天皇的生母正亲町雅子、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庆子、大正天皇的生母柳原爱子等都是女官。为此，他们命令宫中长相漂亮的女官精心梳妆，尽量多接触天皇，并从贵族后代中挑选美女送到裕仁天皇面前。

对老臣们的精心安排，裕仁天皇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主张一夫一妻制，不愿纳妾，况且他同良子皇后的感情一直都很好，不愿伤良子的心；

另一方面又担心后嗣问题不解决而引发政变和政治危机。因此，当有人将衣着华丽的三位华族姑娘的照片送给天皇，并请他从中挑选时，天皇只能婉拒道："看上去全都是很好的姑娘，还是分别选定合适的去处好了。"

正当后嗣危机难以解决时，1933 年初夏传来了良子皇后再次怀孕[①]的消息。这不仅使裕仁天皇重新燃起了希望，而且也牵动了几乎所有国民的心。许多人前往神社和寺院，祈祷良子皇后这一次生个太子。甚至有人在神前发誓，如果良子皇后再生女孩，他就要先杀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然后再剖腹自杀。

此时此刻，良子皇后所承受的压力很大，本来与裕仁天皇结婚已然招致了一场轩然大波，如今又因未能生育太子而导致皇室后嗣危机。裕仁天皇虽然总是安慰她不必担心，甚至说"不必介意，还有秩父宫和高松宫嘛"，但这种宽慰使皇后在感激之余，更感愧对天皇。如果皇位将来由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或高松宫来继承，对国民来说或许还会出现一些骚动和抵触情绪，更何况秩父宫和高松宫也都还没有子嗣，天皇的另外一位弟弟澄宫（三笠宫）也只有 17 岁。

随着良子皇后预产期（12 月 28 日）临近，人们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为了使日本国民能尽快得到皇后生育的消息，日本各地修建了多座汽笛塔，并作出规定：如果汽笛只连续鸣放一分钟，就表明生的是公主，如果隔十秒钟再连续鸣放一分钟，那就是太子了。

就在离预产期还有五天的 1933 年 12 月 23 日清晨，良子皇后出现了分娩征兆。侍医们赶紧忙碌起来。汤浅仓平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内大臣、铃木贯太郎侍从长，纷纷冒着逼人的寒气从家中赶到了皇宫。此时的良子皇后已被送进了静养室产殿，裕仁天皇则在书房中焦急地等候着。

6 时 39 分，从产殿中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在另一房间恭候的重臣们迫不及待地走进产殿，眯起昏花的老眼，将正在柏木盆中洗浴的新生儿仔细打量了一番，他们欣喜地看到：是一个男婴。侍医们报告，皇太子体重 3260 克，身长 50.7 厘米，母子都很健康。

久悬于人们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侍从永积寅彦飞一般地跑到御学问所，向天皇报告了这一喜讯。裕仁天皇几乎不敢相信地追问道："是吗！

---

① 这是良子皇后第六次怀孕。实际上，在 1932 年良子皇后有过一次流产。在皇室的墓地——丰岛岗造了一个空坟。

确实是个男孩子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皇随后下楼来到侍从和侍从武官们群集的常侍宫候所，这时满面春风的铃木侍从长也走了进来。侍从中有人开玩笑地问道：“侍从长，您看清楚了吗?”铃木显出一副郑重的神情大声说道：“我确确实实拜见了男子的标志!”话音未落，侍从们哄堂大笑起来，天皇也跟着笑了起来。

清晨6时55分，宫内省正式公布：“皇后陛下于本日清晨6时39分分娩，亲王诞生。”随之，遍布在东京市内18处汽笛同时拉响。尖锐的汽笛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牵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弦。当一分钟的汽笛声响过后，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汽笛声再次响起。短短的10秒钟显得那么漫长，人们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在等，有人甚至已拿起了日本刀做好了剖腹自杀的准备。当汽笛声再次传来时，市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人们纷纷走出家门，高举着日本国旗，聚集到皇宫正门的二重桥前，山呼万岁，庆祝皇太子的诞生。

当时担任内大臣秘书官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终于听到了第二次汽笛声，国民的热切希望终于得到了满足，一个重大问题解决了。感慨无量，热泪难禁。”元老西园寺也说：“这一下日本太平了，不至于再发生政治危机和动乱了吧!”可以说，对那些在经济危机下艰难度日、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皇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国民来说，皇太子的诞生犹如一束穿透阴云的灿烂阳光，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而对那些一心要维护裕仁天皇统治的元老重臣们来说，皇太子的诞生巩固了裕仁天皇的地位，解救了天皇面临的危机。

上午8时，裕仁天皇换上陆军礼服，来到与产殿相邻的皇子室，探视正在酣然大睡的皇太子。他长久地注视着姗姗来迟的儿子，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接着，他又前往产殿，探望良子皇后。此时的良子皇后刚刚经历过产痛的折磨，虽显得身体虚弱，却异常高兴。面对自己的妻子，裕仁天皇意味深长地说道：“可以放心了!”当他走出产殿后，又返回来对良子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为了庆祝皇太子诞生，日本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一天。日本全国各家各户纷纷挂起国旗，各地还举行了提灯游行。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所有咖啡馆、酒吧、舞厅纷纷把营业时间从夜里11时延长到深夜1时。日本的著名词曲作者也连忙编出了《庆祝皇太子诞生之歌》，供电台播送和国民传唱。歌中唱道：“日出之国太阳升，太阳一出汽笛鸣……天皇陛下多开心，



良子皇后与明仁亲王

大家拍手同欢庆……"[①] 这首轻快中而又不失庄重的杰作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可以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好歌。

12 月 29 日，东京市政府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庆祝大会，斋藤首相以及

①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 年，第 106 ~ 107 页。

内阁成员、国会议员等共64人参加了集会。这一天，东京市内彩旗招展，奔驰的电车插满鲜花，人们纷纷拥上街头，唱着欢庆的歌曲，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

就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裕仁天皇没有忘记给皇太子命名这件大事。他招来了文学博士三上参次、市村祐次朗、宫内省御用官员吉田增藏，以及负责天皇书房的编辑课长芝葛盛硕士等人，共同商议为皇太子命名之事。经过充分研究，裕仁天皇决定给皇太子命名为“继宫明仁”，继宫为号，明仁为名。继宫明仁典出明治天皇颁布的《大教宣布之诏》中“宣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一句。同时，这一命名还依据了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典故：“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1935年11月28日，良子皇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即义宫正仁亲王，1939年又生下了清宫贵子内亲王。这样，就进一步确保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后继有人，试图以秩父宫取代裕仁天皇的阴谋者再也不能借天皇无后而发难了。

由于明仁皇太子生逢乱世，并且一出生就解决了皇室的危机，因此，不仅为庆祝皇太子诞生而举行的庆祝仪式是史无前例的，就连对他的抚养也与以前的历代皇太子不同。

按照惯例，皇太子出生后，便要送到远离父母的人家去抚养。裕仁天皇本人就是在出生3个月后，被寄养于川村纯义伯爵家的。但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有了这种亲身经历，裕仁天皇不愿再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体验远离双亲的寂寞，希望将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于是，便在天皇居住的内宫设置了皇子御殿。

随着明仁逐渐长大，培养教育皇太子的问题也逐渐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看到裕仁天皇无意将明仁送出去抚养，宫内大臣汤浅、内大臣牧野等人不得不求助于连天皇夫妇也要言听计从的贞明皇太后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由于皇太后和西园寺都一致同意将明仁送出去抚养，铃木侍从长也不得不收回了反对意见。于是，宫内省正式向天皇夫妇禀告：“皇太子到3周岁时要离开两陛下，此事业已决定。”对宫内省的决定，裕仁天皇拿不出有力的反对理由，况且这也是祖先留下来的惯例，只得同意将明仁送出去抚养。

1937年3月29日，3岁零3个月的明仁离开了双亲，移居东宫御所居住。按照规定，明仁只能在每周的星期日返回皇宫一次看望自己的父母。

这短短的一天时间，对十分疼爱孩子的天皇夫妇来说，显得非常短暂。他们尽量利用这点时间，陪着明仁玩捉迷藏等各种游戏，裕仁天皇还经常给明仁讲述各种花草和动物的知识。

虽说皇太子明仁一出生就解救了皇室危机，却无法阻止日本法西斯一步步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他不仅生逢乱世，而且还将在更为惨烈的战乱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

“天皇机关说”事件

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不仅制造一系列暴力事件和恐怖活动，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加强了控制和镇压，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遭到了严厉取缔。1933 年，在“特高”[①] 警察极其残酷的拷问下丧命的小林多喜二[②]，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而 1935 年发生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则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天皇机关说”是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宪法学说。美浓部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权威、日本国会贵族院议员，早年曾在皇家学问所为裕仁及其家人讲授教育方面的课程。早在 1912 年，美浓部达吉就在其著作《宪法讲话》一书中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作出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解释。他反对天皇有神权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日本的统制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而不属于天皇。日本的立宪君主政体是天皇和代表国民的帝国议会（众议院）共同进行统治的君民共治的政体，天皇和帝国议会都是国家的直接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应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不是绝对无限的，这就是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的“天皇机关说”。

这一学说提出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元老西园寺、内大臣牧野以及学术界都给予了广泛的支持，但同时遭到了主张“天皇主权说”的东大教授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学者的攻击，而且也招致了军部和右翼

---

① 从1925 年起，日本实行了《治安维持法》，并在全国的警察署设置了“特别高等警察课”（简称“特高”），严密监视国民的思想动向。

② 小林多喜二，1903 生于日本秋田县，别名乡利基、堀英之助、伊东继，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有《蟹工船》、《在外地主》、《工厂支部》、《组织者》、《安子》等书。1933 年 2 月 20 日，被军警特务逮捕，当晚被迫害致死。

的强烈反对。

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抬头，日本的军部和法西斯团体要扼杀政党政治，建立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统治体制，就不能容忍“天皇机关说”的宪法解释。他们认为这一学说有损于天皇尊严，违反日本国体（天皇制），于是发动了反对“天皇机关说”的运动。

1935年2月18日，法西斯议员菊池武夫首先发难，大肆指责“天皇机关说”是“紊乱国宪”的“妄说”，攻击美浓部达吉是“慢性谋反”。随后，众议院议员江藤原九郎、陆相林铣十郎等人也指控美浓部达吉犯有“不敬罪”。军部、在乡军人会、右翼团体等也以维护天皇的绝对主权为旗号，群起而攻之。政友会出于倒阁的目的，也从中推波助澜，主张对美浓部博士的学说和著作采取制裁，甚至骂美浓部是“学匪”。

面对这种形势，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一开始表示相信美浓部的国体观念没有错，但其“天皇机关说”所说的“机关”用语不恰当，学说究竟正确与否可以让学者们自由讨论。并决定让美浓部在贵族院会议上发表一次演讲，为自己的“天皇机关说”辩解。

在1935年2月25日的贵族院全体会议上，美浓部达吉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驳斥了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之词。第二天，《朝日新闻》作了这样的报道：“阐述得有条有理，全场肃然倾听，大约经过了一小时的雄辩。当他离开讲坛时，贵族院响起了罕见的掌声。”

冈田的态度和美浓部的辩解，更加激起了法西斯势力的仇视。3月20日，右翼议员们串通一气，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要求政府必须明征国体本义”的《关于政教刷新的建议案》，并在日本各地掀起了所谓的“国体明征运动”。

在众议院，政友会元老、原农相山本梯二郎发起成立了有志议员会，决定追究“天皇机关说”的责任。在社会上，民间法西斯团体如黑龙会、在乡军人会也大肆活动，头山满纠集一些法西斯分子成立“天皇机关说扑灭同盟”，叫嚣要彻底消灭“天皇机关说”及其主张者。日本军部和警察机构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同年4月4日，真崎甚三郎陆军教育总监向全军发出了“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的训词。4月9日，东京地方刑事检察局传唤美浓部，对其进行了长达14小时的“调查”。紧接着，日本内务省也作出决定，禁止出售美浓部的著作。随着运动的发展，法西斯势力进一步

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冈田内阁及其背后的宫廷集团。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必须明确表示反对“天皇机关说”，确认天皇是统制权的主体。

迫于法西斯势力的重压，冈田内阁不得不于 8 月 3 日发表声明称：“大日本帝国的统制权，严格地说属于天皇，这是肯定的。如果持有认为国家统制权不在天皇、天皇是行使权力的机关的想法，则是对我国万邦无比的国体本义的亵渎。”时隔不久，冈田内阁又就统帅权问题再次发表声明：“我国统帅权的主体是天皇，这作为我国国体的本义是帝国臣民绝不动摇的信念。认为统帅权的主体不是天皇，天皇是国家机关的所谓‘天皇机关说’，乃是有悖于我国神圣国体的过分的东西，必须坚决刈除。”

这样一来，以日本政府明确否定“天皇机关说”作为结局，法西斯势力发起的“国体明征运动”大获全胜。天皇、天皇的军部和政府的专制统治——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理论被树立起来了，军部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在这场围绕“天皇机关说”展开的斗争中，裕仁天皇按照惯例始终躲在幕后，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他在私下的议论，却颇为耐人寻味。当时，担任裕仁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在其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天皇的观点：

> 为了要抨击“天皇机关说”，把我置于绝对的地位，这使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感到有负担。总之，如将天皇看成是掌握国家命运的首脑，将其他人看成服从首脑的命令而行动的手足的话，这就同美浓部等人的根本观点没有多大区别，不能认为违背我国国体。只是美浓部等人所说的评论诏敕之类的话，以及议会竟然对天皇命令也可以不遵从之类的说法和“机关”二字的字面本身，似都不妥。

从裕仁天皇的谈话来看，他似乎对消灭“天皇机关说”不以为然，尽管他也认为一些观点不妥。但他在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交谈中又说道：

> 主权在君主还是在国家？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光从感情出发，争论机关说是好还是不好，那就没有意思了。我个人认为主权比之于在君主，不如主权在国家。因为主权在君主，很容易陷

入专制。像日本这种君主和政权一体的国家，提出“机关说”是有道理的。尽管对美浓部的学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决非不忠。今天像美浓部这样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日本又有几个？断送这样的学者，那是十分可惜的。[①]

对天皇的这种态度，本庄繁作了如下解释：“军部不涉及学说，只是作为一种信念，绝对不要在军队内引进有伤崇高的我国国体和有害天皇尊严之类的言行，那种所谓议会中心、评论诏敕、议会无须遵从天皇之命一类的说法，是与军部的意见水火不相容的。”裕仁天皇对本庄繁的观点予以了肯定：“所谓信念，它是超越社会上的宪法学说而存在的，因此上述观点当然是恰当的。”

裕仁天皇的这段话表明，他虽然认为“机关说”并不坏，但同时又肯定了作为军部“信念”的专制天皇主义可以超越宪法而存在。因此，他的观点实际上与右翼势力的观点是一致的。

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

1931年的“十月事件”后，日本陆军内部的法西斯分子重新组合为互相排斥的两个派系：一派主张继续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由天皇依靠军队直接进行统治。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代表人物是曾担任陆相的荒木贞夫大将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其成员多为现政权中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中下级军官。“皇道派”受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较大，主张通过政变方式控制政权，实行军部法西斯独裁。

另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在清洗了长州藩势力之后，逐渐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其代表人物是在陆军中享有“三杰”盛誉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少将，以及东条英机少将，此外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该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主张运用军部的现

①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年，第147页。

有地位，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逐步扩大势力，以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改造国家，建立军部控制的法西斯政权，被称作“统制派”。这一派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支持。其实两派法西斯军阀在“改造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由于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统制派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1935 年 1 月，得到皇道派支持的荒木贞夫辞职，林铣十郎接任陆相。7 月，代表统制派的新任陆相林铣十郎，又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任战地指挥官。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调动，就是免去了在皇道派军官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将其调任军事参议官的荣誉职务。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由于日本军部向来以陆军为主，控制了陆军也就意味着统制派掌握了对军部的主导权。

罢免真崎，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暗中支持。长期以来，裕仁天皇一直不满意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他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指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常识都没有”。罢免真崎后，裕仁天皇在接见陆相林铣十郎时再一次表示了对他的支持：“就主要的问题而论，要控制陆军。我关心的是调任真崎可能造成的影响。你是否愿意负责设法不让它扩大。”林铣十郎当即表示能做到。

林铣十郎的一系列人事调动，尤其是真崎的下台，导致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皇道派认为，这是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7 月 19 日，驻扎在福山的皇道派成员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拜访永田，要求永田辞职，当即遭到永田的拒绝。相泽返回福山后，一纸将他调往台湾步兵第一联队的调令也随之而至。被激怒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8 月 12 日，相泽三郎身佩军刀，只身闯入了永田设在陆军省的办公室，将永田砍死。

视永田为心腹爱将的裕仁天皇，在听闻这一消息后备感震惊。他当即向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为永田举行的隆重葬礼上，裕仁天皇还令皇室送去了鲜花。

9 月，当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拜见天皇时，裕仁天皇对他说道：“请转达陆军大臣，对时局问题，军部尤其是陆军的主张太张扬了。作为大臣，致力于实现部下的希望是好事，但如果被部下牵着鼻子走，那会成为以下

克上的诱因。最近各方面，似有以下克上的风潮……”天皇对陆军进行了警告。

永田事件之后，统制派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935年12月借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机，将第1师团长、“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决定在第二年的4月份以前将驻屯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满洲。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于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武装政变的步伐。

真崎在暗中出钱资助，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也加入进来，为他们的政变宣言进行修改润色。特别令政变军人受到鼓舞的是，他们在访问新任陆相川岛义之大将后，从其态度中得到的印象是“在有什么事情突然发生的情况下，将不会进行镇压”。据此，皇道派少壮军官决定在没有上层人士公开支持的情况下，自主行动，发动政变。

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城内一片寂静。在皇宫外侧西端第1师团兵营的一间屋子里，灯火通明，气氛紧张。以香田清真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人为核心的青年军官们，正在为政变作最后的准备。

香田大尉首先为军官们进行了一番思想鼓动，强调“只有这一条路了！与其让我们的生命无谓地牺牲，不如用我们的血去祭祖国”。随后，他开始布置行动计划。政变预定于2月26日凌晨5时开始，由9名军官指挥1500余名官兵参加。按照计划，每位军官将率领一个小分队，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包括首相冈田启介、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以及牧野伸显伯爵和西园寺公望元老；同时，分别占领警视厅和陆相官邸，停止其工作机能。任务布置完毕后，与会的军官们便立即分头行动。于是，由皇道派中下级军官组织的1500余人的叛乱即将在东京爆发。

当时，假借的名义是“夜间演习”和“参拜靖国神社”。部队从营房出发后，在行进中才将真正的目的告知士兵们。由于大部分士兵是新入伍一个半月的新兵，他们都亲自尝到过寒冷、疲劳和被剥削的痛苦，所以对这些青年军官们的“昭和维新必行论”从内心产生了共鸣，因此并没有一个士兵表示犹豫。2月26日清晨，东京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参加政变的军人们沿着空旷的街道，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别扑向

各自的目标。

政变军人先是占领了准备用作前沿大本营的山王旅馆，控制了电话交换台，接着顺利控制了陆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以及朝日新闻社，占领几处重要设施的计划在5时之前便顺利完成了。在陆相官邸，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出来谈判，但川岛以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谈判。

5时以后，其他刺杀小分队也分别开始了行动。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的一路人马包围了藏相高桥是清的官邸。时年81岁的高桥是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过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因坚持削减巨额军费而成为政变军人的仇敌。政变军人在中桥的率领下，直接冲入了高桥的卧室。中桥首先上前掀开被子，口喊“天诛”，对着高桥连开三枪，其他政变军人也同时开枪，并用刺刀、军刀在高桥身上乱砍乱捅，高桥当场气绝身亡。据事后查明，高桥共计中弹达47发，并有十多处刀伤。

由坂井直中尉指挥的小分队负责刺杀内大臣斋藤实。这位77岁的海军大将是在辞去首相后接替牧野伸显担任内大臣职务的。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他还在酣睡之中。首先被杂乱的脚步声和吵嚷声惊醒的斋藤夫人意识到事情不妙，立即起身关上卧室的门，并对欲闯进来的军人们喊道：“请稍等一会儿。”当斋藤醒来穿好睡衣时，政变军人已破门而入。3名军官对准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们无法将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其身下，继续对斋藤进行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洞累累，共中47处。凶手们杀害斋藤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在起居室内，被政变军人开枪打死，一名少尉还用刀割断了他的咽喉。负责刺杀铃木贯太郎侍从长的安藤辉三指挥的队伍在铃木住宅的门口遇到了卫兵的顽强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入室内。当叛军冲进来时，铃木镇静地举手要大家安静，并问道：“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永田上士说道：“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作出牺牲吧!”说完连开三枪，一枪打空，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铃木倒地后，仍有人高喊“再补一枪!”铃木夫人苦苦哀求：“别再打了!”这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他平素钦佩铃木的为人，看见铃木已倒在血泊之中，认为必死无疑，便说：“那太残忍了。”随即命令士兵向铃木致敬，然后带着部下匆匆离开了。安藤万万没有料到，铃木并



集结于赤坂山王旅馆前的叛乱部队

未死亡。几天后，身负重伤的铃木竟奇迹般地被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而且后来还担任了“二战”时期日本的最后一任首相。

由栗原中尉带队的士兵刺杀的目标是首相冈田启介。冈田所住的首相官邸，正是四年前遇刺身亡的犬养首相所住过的。当叛军们大喊大叫地冲入院子时，这位早就听到有关政变传言的73岁的首相顿时瘫坐在床上，带

着宿命的口气说道："他们终于来了。"他的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起来，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洗澡间藏了起来。然后，松尾来到院子里，为吸引叛军的注意，他高呼"天皇万岁"。负责带队的栗原中尉当即下令手下的士兵将松尾打死。由于松尾与冈田长相相似，一些曾经见过冈田的士兵在经过一番辨认后，确认死者就是冈田。栗原中尉仍不放心，又让士兵找来冈田的女佣，在女佣也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栗原确信死者就是冈田无疑了。

次日，混入叛军中的东京秘密警察从冈田的女佣那里得知冈田还活着，立即向上作了报告。冈田的女婿迫水随即制定了一个营救计划，他以为死者举行葬礼为名，找了20名上年纪的秘密警察化装成抬棺人，前往首相府。找到冈田后，迫水给他戴上黑边墨镜和口罩，将他化装成吊唁首相的人。这样，冈田混在送葬队伍中，偷偷溜出了被叛军控制的首相官邸，戏剧性地脱险。

刺杀元老西园寺和天皇顾问牧野伯爵的计划未能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以来唯一健在的元老，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士兵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也不愿意执行这一任务，见部下拒绝执行命令，便取消了这一行动。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这位明治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后代，政变发生时正由20岁的外孙女和子陪同，在神奈川县的一座温泉旅馆里休养。和子的父亲便是战后初期5次组阁、执政长达7年之久的吉田茂首相。当叛军袭来时，牧野在和子的帮助下，利用卫兵抵抗争取的一点时间溜出旅馆的后门，逃到附近的一座山上躲藏了起来，才得以死里逃生。

当天空渐渐发白之际，叛军的刺杀活动已全部结束。叛军要求已被占领的5家大报的报社，刊载他们的《崛起宣言书》，并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到处张贴"昭和维新"、"尊皇讨奸"、"七生救国"等标语，同时勒令影剧院关闭，广播电台停止播放文娱节目，定时播放他们发布的新闻，整个东京笼罩在恐怖之中。这便是日本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

裕仁与"二二六"事件

政变爆发30分钟后，侍从甘露寺连忙叫醒尚在睡梦中的天皇，将政变情况简要地作了报告。"终于还是干起来了。"裕仁天皇一面自言自语，一

面立即穿上军装前往办公室。

6 时左右，侍从武官本庄繁也赶到了皇宫。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坏消息，许多重臣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裕仁天皇闻讯后十分震惊，立即下令召见陆相川岛，并对本庄指示道："这是未曾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使事情平息，希望转危为安，有情况要立即禀奏。"同时对临时代理首相后藤指示道："应竭尽全力，迅速镇压，恢复秩序。"然而本庄并没有按天皇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镇压叛军。这不仅因为本庄在思想上同情叛乱军人，而且还因为最早向他报告叛乱消息的步兵第 1 团的值星官山口一太郎大尉正是他的女婿。

上午 9 时半，川岛陆相在同占领其官邸的政变领导人香田清真大尉谈判后，赶到皇宫觐见天皇。他首先向天皇宣读了叛军的宣言并转达了叛军提出的要求，要求包括政府必须宣布恢复天皇的全部权力；要求陆军摆脱派阀，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建川和宇垣等"元凶逆臣"；为"威慑俄国"，任命真崎甚三郎大将为首相、建立维新内阁、以荒木贞夫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等。随后，川岛战战兢兢地进言道："请陛下姑念起事将校之行为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统帅之意旨去行动，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希望陛下能予以谅解。"

听完这番话后，裕仁天皇当即怒道："杀戮朕的股肱老臣，此等凶暴的将校，先不管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镇压暴徒，尽快！"

在旁边的本庄繁听到天皇使用了"暴徒"一词，担心会招致军部更大的反击，连忙插言道："暴徒一词，请陛下斟酌。""不听从朕的命令，肆意调动军队，这不是朕的军人，就是暴徒！"裕仁大怒地说道。本庄武官见状不敢多言，赶忙与川岛一起退出，余怒未消的裕仁天皇仍在那里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我的脖子。"

在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未能得到立即执行，原因是军事参议会议被皇道派的荒木和真崎所操纵。军队的老前辈荒木大将支持叛乱军人，将其称作"维新部队"，以义军相待。而叛乱军官准备推举为军政府首脑的真崎大将，早在事发前就将一笔日元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了叛乱的军官。川岛根据会议的决定，发布了《陆军大臣告示》，敦促崛起部队"先各自返营"，并称："关于崛起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这种表述好似在赞扬

这次袭击行动，给人造成了叛军行为得到天皇允许的印象。但叛乱者坚持在新内阁产生之前绝不撤兵。

下午，枢密院经过激烈的辩论，决定由陆军宣布实行戒严，进行镇压。陆军虽不情愿，但还是于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不料香椎也是同情叛乱军人的，他向军官们下达了天皇的命令：“奉旨宣布，参与事件的军官以下的人应迅速返回原部队。”其实，他用尽了心机，表面上声称如不服从就以武力讨伐，但暗中却在庇护作乱的军官们。

27日整整一天，裕仁天皇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下午4时，日本海军方面闻知三位海军大将（斋藤、冈田、铃木）遇刺，已将以“长门号”为首的军舰开进了东京湾，但陆军方面仍然迟迟按兵不动。恼急交加的裕仁天皇三番五次地催问本庄繁：“讨伐部队出发了吗?”“双方交火了吗?”本庄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本庄把话说完，裕仁天皇厉声喝道：“如果陆军无能为力，朕就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马上备马!”周围的人为之愕然。

裕仁天皇此时的焦急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刚刚获悉，他的弟弟、在弘前第8师团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来东京。秩父宫向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并因此与裕仁天皇存在着观点上的对立，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调任弘前第8师团之前，他一直在麻布的第3团任职，他和此次事件核心人物之一的安藤辉三大尉关系不错，并且两人都熟读过北一辉的右翼理论支柱——《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等书。秩父宫受过这本书的洗礼，再加上他生来具有的刚毅性格，因此集青年将校的众望于一身。

在叛乱前，秩父宫曾对坂井中尉开玩笑地说道：“起事的时候，可率领一个中队前来接我。”早在“五一五”事件时，他就不断主张天皇有必要亲政，甚至激烈地说：“如果必要，停止实行宪法也在所不惜。”言辞相当偏激。听闻此话的天皇对侍从长说：“有伤祖宗德望的事，那是根本不能同意的。即使亲政，我也要根据宪法管理朝政，至于停止实行宪法等，这是破坏明治大帝创立的大法，断不可行。”

秩父宫此次进京，名义上是安慰天皇，实际上是担心青年将校的起事能否成功。并且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当时的外务次官重光葵后来这样回忆：“我经常从军人口中听到对天皇的

批评，‘二二六’叛乱的时候，我听说军人中有这样的言论：‘如果天皇反对革新，我们就拥立某宫殿下[①]，取代陛下。’”

裕仁天皇担心如果秩父宫站到叛军一边，形势将更加难以控制。为此，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省决定派东京大学的平泉澄教授作为特使在中途迎接秩父宫，利用到达东京前的时间对他进行说服。

平泉教授是历史学家，向来从天皇拥有绝对权威的观点出发倡导皇国史观，在右翼团体中声望极高。平泉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半的《日本政治史》，是担此重任的合适人选。平泉领命后，在上越线的水上车站登上火车迎到了秩父宫，详细地向他说明了情况，并再三恳求他不可轻举妄动。当时，秩父宫脸色凝重，一言不发。

27 日晚，火车到达东京上野火车站。秩父宫一下车，便被大批军警保护起来，在严密的警卫下，乘车直接前往皇宫。这是裕仁天皇为防止秩父宫被叛军劫走而采取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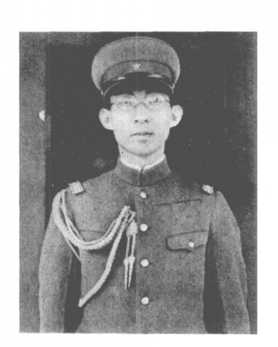
进入皇宫的秩父宫，首先受到了裕仁天皇的心腹木户幸一的劝导，木户向他说明了最新形势，并劝道：“陛下的担心非同小可，一定请殿下辅佐皇兄陛下。”已弄清了哥哥意图的秩父宫表示：“完全明白，我将辅佐陛下。”接着，为了进一步证实秩父宫确实已无反对天皇的意向，又安排秩父宫与高松宫见面后才去拜谒了天皇，天皇与秩父宫一起共进了晚餐，其间，秩父宫作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

秩父宫在关键时刻站到天皇一边，令整个皇室松了一口气。但秩父宫与叛乱事件的关系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许多重臣仍对他心存疑虑。“二二六”事件过去两年后，元老西园寺还对身边的人说：“若目前这种政治气氛一直继续下去，其结果很难预料。日本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令人厌恶的事。比如，神武天皇的后继者绥靖天皇就是弑兄君而后称帝的。这类事情在日本历史上不胜枚举。当然，这不是说现在的皇族中有这样的人，不过，今后对这种事应多加注意。”

28 日，天皇一再催促，“地区居民撤退还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兵力不足，可以调动近县的部队”“如果增援部队不到，不能发动进攻吗?”“反正要尽快镇压!”在天皇的催逼下，犹豫不决的军部终于下了决心。当晚 11 时，出台了内含讨伐计划的“戒严令第 14 号”，戒严令称“反乱部

---

① 在日本皇室中，天皇称陛下，其余皇族成员称殿下，这里指裕仁的二弟秩父宫。



秩父宫雍仁

队，若不服大命，当断然以武力恢复治安”。戒严令还命令各有关部队在次日上午5时之前做好攻击准备。戒严令发布后，近卫、第1、第14师团和近县的部队约2.5万人被调进东京将叛军包围起来，机枪已架好，坦克昂起了炮口，装甲车在来回示威，停泊在东京湾的海军军舰也将大炮对准了叛军的阵地。

眼看大势已去，唯恐自己受到牵连的真崎来到叛军之中劝说道：“各位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势必成为皇军的罪人，我劝你们还是归顺吧！”说罢匆匆离去。

失去了皇道派上层人物的支持，叛乱军人没了主心骨。面对重兵的包围，他们意识到败局已定，如果继续抵抗下去，为天皇而举兵的名义就将失去，而且还要永远背负逆贼的骂名。想到此处，将校们相抱痛哭。根据栗原中尉的提案，山下少将含泪和川岛陆相奔赴宫城，向本庄武官提出了最后一项要求，为了证明发动叛乱是为天皇而战，请天皇派出钦差，在钦差监视下，以痛快的自裁光荣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本庄向天皇说明叛军的要求后，遭到了天皇的断然拒绝：“如欲自杀，任其自便，给这种人派钦差，真是荒谬之至。”过不多久，侍卫长再

次就派遣钦差一事奏请天皇，但裕仁根本不予理会："朕只能认为他们是为了私利私欲，才如此胆大妄为的。"

29日上午7时10分，戒严司令部命令三宅坂、赤坂见附、溜池、虎之门、樱田门一带的居民撤离。荒木、真崎两位大将为避免叛军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但遭到拒绝。戒严司令部的答复是：如果叛军继续违抗命令，部队将于下午1时发起攻击。8时，有战斗机开始向叛军撒投降传单，但传单随风飘荡，并没有落到叛军所在地。于是，戒严司令部改用播音的方式向叛军传达戒严司令部的"告士兵书"："书告下士官与士兵：从现在起应各归原队，仍为时不晚；凡抵抗者均属逆贼，将予以枪决；汝等的父母兄弟亦将成为国贼，为此都在哭泣。"

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的叛乱军人此时已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听到广播后，他们纷纷脱离叛军返回了原来的部队。策动叛乱的军官们见大势已去，也未加阻止。除野中四郎自杀外，其余军官全部在下午1时后投降，河野大尉后来在医院自杀。2时过后，陆军的杉山参谋次长和香椎戒严司令官进宫将平息叛军之事上奏天皇。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兵变，在裕仁天皇坚决镇压的方针下终于得以平息。

由于这场政变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人的惩处也异乎寻常地严厉。3月4日，裕仁天皇发布敕令："朕兹鉴于紧急需要，依宪法第8条第1项，批准成立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特决定"将其作为特设军法会议"。在成立军法会议之时，天皇极其严厉地讲道："如果再采取像对待相泽中佐（青年军官，在陆军省用刀劈死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那种优柔的态度，相反会后患无穷。因此这次军法会议的审判长及审判官一定要正确、严厉地处理这些将校！"在天皇的指示下，特设军法会议在非公开、一审制、无须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对叛乱者进行了秘密审判。

1937年7月5日，军法会议一审判决在暴动中起领导作用的17名"首犯"以及支持暴动的北一辉及其门徒西田税死刑。其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此前历次政变军人的处理，明显地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对陆军影响的意图。另有70名"少壮军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与政变有牵连或瓜葛的一批将领被编入预备役或被派往边远地区。7月12日，对首犯执行了死刑，据说行刑时，他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随着"二二六"事件的平息，皇道派迅速瓦解，统制派完全控制了

整个陆军和军部的要职。日本的法西斯运动此后进入自上而下地建立法西斯统治体制的阶段。

“二二六”事件后不久，天皇曾对侍从说过这样的话：“军人干涉政治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人痛心之至，不过，政治家对此应负的责任也不轻。如果政治稍微务实一些，也就不会有让军人专横跋扈的余地了。”这次事件对天皇的打击是很大的，事件平息后好长时间，天皇都闷闷不乐。天皇曾在战后回忆道：“在张作霖事件中对田中义一所讲的话，以及在“二二六”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多少有些违背宪法。”确实，在镇压“二二六”叛乱中，裕仁天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影响力。这一事件从另一侧面也表明：天皇之所以不经常运用他的个人政治影响力，而依靠政府和军部的建议去行动，完全是因为他本人并不反对那些建议。而一旦发生特殊情况必须由天皇出面表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运用他个人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来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二二六”事件后，继任首相是军部同意的右翼组织“玄洋社”的主要成员、老牌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军队对继任内阁的人选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凡被视为自由主义和协调主义的人物，均被排除在阁僚名单之外。广田欲任命统制派的重要成员寺内寿一大将为陆相，但寺内以“在对时局的看法上，军部对广田抱有疑虑”为由，予以了拒绝，但天皇例外地给寺田一份敕谕，钦命寺内为陆相，并要求力戒军部的专横。寺田虽答应入阁，但对天皇的训诫却并未重视，也没有告诉军部首脑。

广田开始组阁时，天皇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依据宪法执政；二是以国际亲善为基本方针，在外交上要谨慎；三是财政政策和内政方针不宜突变。这是继犬养内阁后天皇第二次对组阁主动表态。

由于寺内的入阁，广田内阁一开始就全盘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强化国防”、“国体明征”、“稳定国民生活”和“刷新外交”四点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第一，按照军部的要求和意愿，于 1936 年 5 月恢复了大正时期被取消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的恢复，为军部操纵内阁的存亡大权提供了合法手段。第二，改组政府机构，强化法西斯体制。广田内阁设置了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五相会议”，处理一切大政方针。第三，实行准战时财政。按军部意愿出任藏相的马场瑛一，实行所谓财政首先服从国防需要的方针，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第四，确立了扩大对外侵略的方针。1936 年 8 月 7 日，五相会

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规定："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这一"国策"既迎合了陆军的"北进论"，也满足了海军的"南进论"。不久，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贯彻实施这一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第五，1936年11月25日与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该协定名义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同盟，而实际上是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其侵略矛头除针对苏联外，也针对美、英等国家。从此日本正式加入了国际法西斯阵营。第六，加强对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广田内阁不仅以镇压叛乱、稳定政局为名，长期维持"二二六"事件期间在东京地区实施的戒严令，而且还颁布实施了《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思想犯保守观察法》等法西斯法案。禁止工会组织，严格限制国民的集会、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

广田内阁的成立及其内外政策表明，"二二六"事件后，统制派清算了军队内部的派系，实现了军队统制一元化的目的。以军部为主导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初步建立起来了。这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释放出了日本法西斯这个恶魔，从此，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也正因如此，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广田弘毅成为唯一一位被定为甲级战犯并被处以绞刑的文职官僚。

第五章　惊变卢沟桥　鲜血染金陵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迅速膨胀，遭到了政党势力的强烈反对。1937 年 1 月 21 日，政友会的骁将、众议院议员滨田国松在众议院会议上对军部的专横予以了猛烈抨击："在明治大帝的军人敕语中，写着军人不涉足政治……而现在军人的行动令人无法容忍，如果要参加政治活动，就应该脱去军服，放下军刀。内阁也应全力整顿军队。"这在当时，如果没有豁出命来的决心，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的。

对滨田的发言，寺内愤然反击，认为其发言有辱军人并会妨碍国民的团结。充满激昂斗志的滨田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个人虽不足道，但作为国民的代表，我在这里并不想找碴打架，但我也不会退缩。我并没有侮辱军人，我所说的都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你剖腹向我道歉，否则我剖腹！"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滨田国松议员同寺内寿一陆相进行的这番激烈论战，引发了政党与军部的正面冲突，傲慢的寺内威胁要么开除滨田，要么解散国会，否则将辞去陆相。在国会和政友会都不屈服的情况下，有失体面的寺内只得辞去了陆相职务。军部为了泄愤，拒绝向内阁派出后任陆相，害怕引火烧身的广田遂于 1 月 23 日提出了辞职。

在"一战"前，文官没有资格担任陆海军大臣，陆海军大臣只能由军人中的大将、中将中产生。这样一来，军部大臣的任命、选考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军人的手中，军人如果不推荐人选，就无法组阁。而广田辞职的原

因也正在于此。

广田辞职后，陆军上层统制派代表、九一八事变时的朝鲜军司令官，以“越境将军”著称的林铣十郎受命于1937年，勉强完成了组阁任务，政友和民政两党没有一人入阁，完全是军部占主导地位的内阁。林内阁在通过政府1937年度预算案后，突然以“整顿政党”为由，“过河拆桥式”地解散了议会，遭到了舆论的强烈抨击，被称为“第二次越境”。在4月30日举行的大选中，民政党、政友会等在野党获得了80%的议席，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5月31日，林内阁只得灰溜溜地宣布总辞职。

林铣十郎下台后，元老西园寺把收拾残局的希望寄托在了近卫文麿身上。6月4日，近卫在西园寺的推荐下出任首相。

从1937年6月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就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城（在卢沟桥的东端）附近连续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以便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制造借口。这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就已开始流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①] 的消息了。

7月7日10时左右，即近卫上台后仅1个月又3天，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诡称听到宛平城内发出枪响，致使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并开枪示威。为平息事端，国民党华北当局答应派人调查。不久，“失踪”日兵归队，但日方决意挑起战端，赶派援军包围了宛平城。8日清晨5时，正当双方代表交涉之时，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

卢沟桥距北平仅15公里，位于向南通往汉口的京汉铁路沿线，靠近宛平车站，是通往北平的重要门户，占领了这里就可控制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地区。

卢沟桥事变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侵略中国既定国策的必然结果。在挑起这一事件后，由于策略上的原因，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在扩大还是不扩大事态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

在日本军部内，慎重论者认为苏联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真正威胁，必须全力准备与苏联进行决战；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条件尚不具备，以日本现有的国力，难以支撑一场全面的日华战争。目前日本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备战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担心

---

①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日本陷入持久战。因此，主张“不扩大，就地解决”，采取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方针。而强硬论者则认为目前苏联不会干涉日本的行动，英美也无暇东顾，而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因而主张借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举占领南京。陆相杉山元更是狂妄地宣称：“最多3个月就解决了。”军部内部出现的分歧，显示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窘境，而这也是随着日本侵略政策的逐步推进，日苏、日中矛盾进一步扩大而带来的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7月9日上午8时50分至10时，近卫首相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杉山陆相发言：“从第29路军的兵力及其抗日态度看来，正在考虑由国内派出三个师团左右的兵力。”但是一般意见则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会议最终决定了“暂不扩大事态和就地解决”的方针。但以杉山陆相为首的“扩大派”并不甘心，仍暗中积极制定出兵华北的方案，并四处活动力促政府批准出兵。10日，杉山陆相再次向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提出了出兵华北案，并提议召开内阁会议。

11日上午11时30分，近卫在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会上强硬派占据上风，最终通过了向华北增兵的方案。决定向华北派遣5个师团，首先从朝鲜、“满洲”抽调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会议还根据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称为“华北事变”，把“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这标志着日本的下一步侵略计划将在卢沟桥事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从9日到11日，仅3天时间，近卫内阁竟先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两个决定。这充分表明了近卫内阁所谓“不扩大方针”的虚伪性和统治阶级在对华侵略问题上的一致性。驻日美国大使格鲁曾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现阶段，在内阁、军部、外务省、新闻和工商业者之间，对无论如何也必须制止日本在华北地位的继续衰落，似乎已经有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①

7月11日下午4时至5时15分，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陆相杉山元、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先后赶到叶山行宫觐见天皇，奏请出兵一事。

据一些研究裕仁天皇的西方学者分析，尽管卢沟桥事变不是裕仁天皇亲自策划的，但以其特殊的地位，他在事变之前肯定知道军部将有所举

① J. C. 格鲁：《在日本的十年》（上），每日新闻社，1948年，第279页。

动。联系到事变爆发之前，他突然以异乎寻常的友好态度会见了国民党政府驻东京大使，更使人怀疑这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姿态。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裕仁天皇对朝鲜驻军擅自越境出兵还多少表示过不满的话，那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向华北派兵则完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赞同和支持。当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他奏请出兵华北时，一直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裕仁天皇所关心的并不是反对扩大侵华战争，而是担心大批军队被牵制在中国，苏联会乘机在背后采取行动。他直截了当地向总长问道："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总长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显然天皇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追问道："这是陆军的武断，万一苏联介入，将如何是好?"再一次提醒载仁亲王一定要注意这一问题。同样的问题，裕仁天皇也曾问过杉山陆相。狂妄至极的杉山向天皇吹嘘说："一次派出大批军队，短期内就能把中国的抗日压下去，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①

在吃了定心丸后，裕仁天皇批准了近卫内阁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随即近卫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由日本国内向华北增兵 3 个师团，另由关东军调派 2 个师团，由驻朝鲜军调派 1 个师团。随着大批增援部队运至京津，7 月 28 日，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兵分 3 路向北平、天津发起总攻。驻守平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仓促应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北平、天津先后被日军占领。

不断督促增兵上海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上海，并欲将其开辟为华中战场的突破口。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既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还是通往内地和海外的交通枢纽、首都南京的门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能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促使国民党政府丧失战斗意志，给蒋介石集团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甚至可能一举攻占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实现其"3 个

①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83 页。

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1937年7月20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宣称有两名士兵失踪，意欲寻衅。但两天后这两名士兵被中国当局查获并送还日本领事馆，日本挑衅未成。8月9日18时30分左右，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名水兵驾驶一辆军用汽车，风驰电掣般冲向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当中国哨兵上前阻拦并要求查验证件时，大山勇夫竟开枪打死了哨兵。正在附近巡逻的中国保安队闻警赶到，在相互射击中将两名日军击毙。这就是日军精心挑起的“虹桥机场事件”。

“虹桥机场事件”后，以前对华北支持不扩大方针的海军，对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华中却变得非常积极。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向军司令部上报称：“要想以武力打开日中关系的现状”，仅惩罚华北的第二十九军是没有效果的，必须设法使“当今中国的中央势力屈服”，因此，“最好派遣陆军5个师团控制上海和南京”。[①]

8月10日，近卫首相临时召集内阁紧急会议，通过了海相米内光政向上海派遣陆军的提议。接着，陆相杉山元进宫拜见天皇，派兵方针得到了天皇批准。11日，日舰27艘驶抵上海，在杨树浦码头登陆。

12日夜至13日上午，日本政府连续召开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四相会议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两个师团，向青岛派出1个师团，进行增援。

13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第3舰队突然以重炮向上海闸北猛轰，日海军陆战队也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规模宏大的淞沪之战由此开始。15日，日本内阁发表声明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之措施。”第一次在政府声明中抛掉了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假面具。同时以裕仁天皇的名义下达了编组上海派遣军的敕令，命令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以第3、第11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迅速开赴上海作战。同时命令在九州、台湾待命的“渡洋轰炸队”出动，轰炸中国的机场。

17日上午10时，裕仁天皇亲自召见即将率军出征的松井司令官，并面赐敕语：“朕委派你统率上海派遣军。应仔细观察各种形势，迅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不要辜负朕的厚望。”受宠若惊的松井石根立

---

① ［日］《现代史资料》（9），三铃书房，1964年，第186页。

即答道：“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并当面接受敕语，诚惶诚恐，不胜感激之至。”当裕仁又问及今后具体采取何种方针时，松井答道：“派遣军将与我国海军密切配合，同时密切联系当地我国的官员、宪兵，尤其是各国的外交使团和军队，齐心协力，迅速恢复上海附近的治安。”[①] 8月18日16时许，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和陆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先后晋见天皇，裕仁问询道：“有没有办法在集中兵力重点给予大的打击下……迅速收拾时局。”再次表示了对淞沪之战的关切。

松井石根在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曾提出：投入不足两个师团的兵力，不仅难以作战，反而会招致众多牺牲，至少应派遣5个师团。但由于日军统帅部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抵抗力量，特别是由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担心苏联会乘机从背后进攻“满洲国”，不愿把兵力分散到上海，驳回了松井的意见。

8月23日，在日本海军的配合下，上海派遣军在吴淞、川沙一带强行登陆。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把上海作为防御的战略重点，投入了巨大兵力，登陆的日本陆军遭到了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进展缓慢。无奈之下，松井不得不在8月31日向陆军参谋本部发出紧急呼吁：根据上海的敌情及地形，要给南京军以强大的打击，最小限度需要5个师团。同一天，日本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也向海军军令部发出了要求火速增援上海的申请。

日本陆海军统帅部接到求援电报后，紧急磋商增兵事宜。海军军令部及陆军大臣杉山元力主增兵，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则不同意增兵，认为即使增兵也是杯水车薪，难以奏效，表示“除非陛下训示，否则不再扩大”。

在裕仁天皇的积极支持下，日本内阁会议于9月2日正式决定将卢沟桥事变以来使用的“华北事变”改为“支那事变”，表明了日本政府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态度。为通过军事预算和战时经济统制法令，在9月4日召开的第72届临时议会上，裕仁天皇出席并在开幕式上发表敕语：

中华民国不明帝国之真意，贸然挑起事端，导致今日之事

① ［日］松井石根：《中国事变日志摘录》，转见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伪》，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变，朕深感遗憾。今日朕的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其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反省，尽快确立东亚的和平，别无他意。朕希望帝国臣民配合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同心协力，相互协助实现我们的目的。朕命国务大臣向帝国议会提出关乎时局的紧急追加预算案和法律案。你们应体察朕意，努力发挥协助的责任。①

在裕仁天皇的呼吁下，这次临时议会一致通过了追加20.22亿日元临时军费的预算案。这一巨额军费，相当于日本政府当年全部预算总额27亿日元的75%。会议同时还通过了战时经济统制等法令。

9月6日上午，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晋谒裕仁天皇："上海之战迟迟没有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此时的裕仁天皇也"担心仅以两个师团的兵力会在上海陷入悲惨的境地"，因而立即召见陆军参谋总长，督促陆军尽快增兵。当日15时，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奉命进宫禀奏天皇："内定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再派后备步兵4个大队到上海。"② 裕仁天皇当即予以批准。

向上海增兵的决定一出，一直主张"不扩大"方针而受到多方指责的石原莞尔遂于9月27日离职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由下村定少将继任作战部长。

9月7日，以台湾守备队扩编而成的重藤支队首先驰援上海。9月11日，从日本国内调派的第9、第13、第101师团等增援部队也陆续在上海登陆。由于日军不断增兵，中国守军被迫转入守势。经过数次激战，日军于10月底占领了苏州河北岸，但仍未能突破苏州河。

10月20日，参谋本部再次决定，从华北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组成第10军，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另从华北战场抽调第16师团，从水路进入长江，在江苏常熟县的白茆口登陆。这两支部队登陆后，迅速向太湖的南岸、北岸接近，切断中国守军的后方，以策应上海派遣军的进攻。

为统一指挥日益增多的上海日军，11月7日，参谋本部又决定将上海

①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474页。

②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8页。

派遣军与第 10 军编组成华中方面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

11 月 5 日，日本第 10 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附近登陆，第 16 师团在上海西北的白茆登陆，对中国守军形成了包抄之势。11 月 8 日，上海派遣军突破了苏州河南岸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奉命撤退。11 月 12 日，日军占领上海。

淞沪之战胜利后，欣喜不已的裕仁天皇又一次发布了敕语："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合作，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宣扬于世界。"[①] 再次表明了裕仁天皇对这场战争所持的积极态度。

当炸死张作霖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天皇曾以坚决的态度制止了战争和叛乱。没有"朕的命令"就不能发动和扩大战争，这就是统帅权。倘若此时天皇下令停战，必能求得和平解决。可是因胜利捷报而兴奋异常的裕仁采取了同九一八事变时一样的态度，又一次予以事后承认，致使战争不断扩大。

对当时的局势，裕仁天皇在他后来写的《独白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 在此期间，战火又飞到了上海。尽管近卫仍主张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我感到战火既然已经蔓延到上海，再防止扩大就不容易了。当时我国在上海的陆军兵力很单薄，这是因为惧怕苏联，而不愿把兵力分散到上海。后来汤浅（仓平）内大臣告诉我，起初石原（莞尔）曾说陆军仅向上海派出两个师团是因为政府加以阻止，而事实上却是石原本人阻止了的。我担心仅以两个师团的兵力会在上海陷入悲惨的境地，于是我曾不断地督促增加兵员，但石原仍然畏惧苏联而没有派出足够的兵力。

战后在日本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天皇是被持积极态度的军队和政府拖向扩大战争的道路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在《东条英机与太平洋战争》中所说的那样，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有关出兵、作战的各项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

---

①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129 页。

血雨腥风陷金陵

为适应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作为加强内阁的措施，经枢密院批准，日本政府于1937年10月15日公布了临时内阁参议官制，设临时内阁参议官若干人，参与筹划有关全面侵华的重要事务。10月25日，日本政府又将原来的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设置了企划院。企划院属内阁首相管辖，负责起草有关平时、战时综合国力的扩充运用方案，此外还负责制订、推行有关国家总动员计划、谋求统一调整各厅事务。11月17日，裕仁天皇根据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的建议，决定在皇城内设置大本营。18日公布《大本营令》，规定："大本营在战时或事变之际，根据需要设置"，是日军的"最高统帅部"，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其主要成员为陆海军省、部领导人；任务是"运筹军机，策划作战"，规定作战目标，制定作战方案，协调历来成见很深的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的关系，"谋求陆海两军之间同心协力互相策应"，统一行动。20日，大本营正式设置。

设置大本营的目的，显然在于强调统帅权的独立，将平时由陆海军省与统帅部（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分管的权力实行一元化领导，借以消除陆海军省、部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为使统帅府（大本营）与国务府（内阁）保持经常联络，随后又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的协议机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其成员除大本营成员外，还包括了政府方面的首相、外相、陆海等。联席会议负责政治与军事战略的协调与制定。有关军、政之重大议案，必要时举行联席会议，对特别重要的议案更应奏请召开御前会议"聆听圣断"。

处于这一系列战争领导机构之上的，便是拥有统帅权的裕仁天皇了。按照惯例，有关军、政之重大议案，必要时举行联席会议，对特别重要议案更应奏请天皇批准，于是又增设了御前会议。所谓御前会议，是指在天皇面前召开的会议，而并非是由天皇主持的会议。它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在天皇面前讨论的形式，使重要的战略决策得以上达天皇。一般来说，御前会议的议案都要事先在联席会议上确定下来，在御前会议上是没有变更余地的。而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也通常不作任何发言或表态，只是在闭会后对

表决过的议案予以批准。

但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事实上，裕仁天皇对战争的进程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写道："天皇经常对进宫上奏的国务大臣和统帅部长提出种种质疑，上奏者能够从天皇质疑的内容和在听取回答时表示的态度中察觉出天皇的意图。这时，天皇经常给予启发和暗示，或对上奏的事项表示出相当强烈的感情上的爱憎。实际情况是：上奏者对天皇的这种态度极为关切，都为如何能符合天皇的意图、满足天皇的希望而煞费苦心。"

自在宫中设立了大本营后，裕仁天皇的政务更加繁忙了。他日夜关注着战事的进展，面容也日显憔悴，以至宫内大臣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担忧，特地托请陆、海两相出面"奉劝"。但比较起来，他显然没有其祖父明治天皇那种在战争期间与前方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裕仁天皇正在叶山休养地悠然地度假，并忙着在海上打捞海洋生物标本。得知事变的消息后，他仍在叶山逗留了 3 天才返回东京。此举立即引起了军部一些少壮军官的不满，他们在私下议论："在此非常时期，陛下却去搞那种无用的生物研究。""有那么多时间，请多研究一点军事吧!"联系到裕仁天皇一周总要打上几次高尔夫球，也有人指责说："受欧美影响对高尔夫球着了迷……"

外界的风言风语也逐渐传到了皇宫，裕仁天皇感到了压力。他不得不放弃了个人爱好，生物学的研究几乎停止了，高尔夫球也一度不打了。为此他还特地吩咐下人："现在已经不玩了，球场用不着再修理了。"

尽管如此，对海洋生物学的爱好还是促使他经常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有一次，他听说有人在拍摄一部海底鱼类和海藻类的电影，便总想着去看一看。一次在同广幡宫内大臣谈话时，他突然问道："不知那部电影出来了没有?"脾气暴躁的广幡立即回答道："眼下这个时局，没有必要看那种电影。就是有人前来进献这部电影，我也会把他赶走。"放弃了这些个人爱好，裕仁天皇便拿出更多的时间在宫中作战室关注日军在华的战事。

11 月 24 日，日军大本营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裕仁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等人。会上，陆海军分别向裕仁上奏了作战计

划。作战部长下村定在向裕仁启奏陆军作战计划时表示：统帅部正在考虑，根据今后的情况，命华中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或其他地区。

在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虽然尚未正式作出进攻南京的决定，但实际上已默认了陆军参谋本部的上述作战计划。同日，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便发出了撤销过去以苏州、嘉兴一线为作战限制线的指令。28 日，参谋次长多田骏又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了攻克南京的秘密指令。同一天，裕仁天皇的特使侍从武官也莅临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带去了天皇的圣旨和由皇后亲制下赐给松井的围巾。

12 月 1 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了由裕仁天皇签发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取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同日，又下达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

12 月 2 日，松井石根因患结核卧病苏州而被免去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特任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中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接到天皇进攻南京的命令后，将第 101 师团大部分兵力留驻上海，率 20 万大军兵分 3 路直扑南京。到 12 月 13 日，日军终于攻占了南京。日军攻占南京的消息于当天 23 时 15 分传到宫中，兴奋不已的裕仁天皇第二天便发出敕语：

> 我陆海军各部队继上海附近作战之后，施行勇猛果敢的追击，迅速攻陷首都南京，朕对此深感满足，期将此旨传谕将士。①

意犹未尽的裕仁还下令给占领南京的士兵每人一杯御酒、10 支香烟作为奖赏。

天皇的褒奖很快便传到部队，将侵华战争视为天皇“圣战”的日本侵略者犹如打了一针兴奋剂，变得更加疯狂。一场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便在南京展开了，六朝古都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12 月 15 日，已放下武器的 3000 余名国民党军警人员，被集体解往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然后被全部焚化；16 日，中国难民 5000 多人，

---

① 蒋立峰：《日本天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1 年，第 160 页。

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鲜血染红了长江……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不留俘虏，方针是带到僻静处处理……但处理俘虏需要相当大的沟壕，而这种沟壕根本找不到。一个办法是将其分散成一二百人的团体，诱至适当地点分别处理。”① 贪婪疯狂的抢掠遍及全城的每个角落，抢掠的物品，从车辆、机器、原料、商品、粮食、牲畜，到古书、文物、珍宝玉器、金银首饰，无所不有。日军还三五成群，闯入民宅、店铺，在抢掠一空之后，再残暴地杀死中国居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持续了3个月，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野蛮、最可耻的一页。

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军事法庭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攻陷南京后，中国军民被日军集体枪杀和活埋的共有19万余人，零星被杀其尸体经慈善机构收埋者达15万多具，合计遇难者有30多万之众。如今，在坐落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白骨累累，血案历历，铁证如山，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构成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罪犯松井石根及其帮凶武藤章（副参谋长）进行了审判，并处以绞刑；另一主犯谷寿夫，还有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以及曾用军刀杀死300余人的田中军吉，也被中国军事法庭处以死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日军最高统帅的裕仁天皇及亲自指挥日军攻陷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却逃脱了历史的惩罚。

皇族成员、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中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于12月5日在前线司令部，“发出了一连串由他本人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标有‘机密，阅后销毁’的字样。命令十分简单：‘全部杀掉俘虏。’”② 接着，他又驱动围城部队向南京城发起最后的进攻。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为确保将在17日举行“入城式”时松井石根、朝香宫等日军头目的安全，而“决不允许敌人的一兵一卒残存于南京”，于是日军更

---

① ［日］江口圭一著，杨栋梁译：《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② 参见《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加剧了对南京军民的大屠杀。12 月 22 日，松井从南京返回上海后，朝香宫成为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并于 12 月 25 日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移驻南京城内中央饭店，直到次年 2 月起程回国，对此间在南京城内发生的烧、杀、淫、掠等暴行，他更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至于说到裕仁天皇，战后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裕仁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只是在战后才知晓的。这种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要说日军的大屠杀在国际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舆论纷纷谴责，就连被日军严密控制的报纸也在不断炫耀“皇军”的“战绩”与“武功”。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和美国人在东京出版的英文日报《日本报知者》，都曾对第 16 师团的两名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进行“杀人竞赛”一事作过报道。据报载：“两人在随军侵入江苏句容县时就约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 100 人，谁就是胜者。12 月 10 日，两个魔鬼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都拿着缺了口的军刀。野田说‘我杀了 105 人，你的成绩呢?’向井答：‘我杀了 106 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可是，确定不了是谁先杀到 100 人，于是两人重新再赌谁先杀满 150 人。次日，比赛继续进行……”并刊登了两人手持凶刀的合影。

据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日本史学工作者色川大吉在《昭和五十年史话》一书中回忆道：“当时，作为军国少年之一的我，对这种杀人竞赛，也惊得目瞪口呆。”“也认为过于残酷。”① 对这些连中学生都能看到的报纸，时刻关注战局发展的裕仁天皇怎能看不到呢？当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传到日本后，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将松井石根及其 80 余名将校召回日本，其中也包括朝香宫在内。对这种大规模的人事调动，特别是对皇族成员的调动，很难想象裕仁会不知道。实际上，正是他，亲自签发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进攻敌国首都南京”的绝密命令；正是他，对攻占南京的日军大加褒奖，起到了对南京大屠杀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他，当那些指挥日军大屠杀的刽子手奉召回国后，还在其举行登基仪式的叶山行宫亲自接见了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接见之后裕仁还设盛宴款待，并赏赐给每人一对雕有皇室神圣徽记菊花纹章的银质花瓶。

---

① ［日］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6～47 页。

裕仁与“和”、“战”之争

当上海、南京地区的战火依然燃烧之际，华北的日军在攻占平津后，又以天津为基地，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指挥下兵分3路，沿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进犯。由于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仍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致使日军长驱直入。1937年底，日军已占领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5省的主要城市。兴奋不已的裕仁天皇于1937年11月，再次向“华北内蒙作战的将士”发布敕语，予以褒扬：“华北及内蒙作战部队的将士，攻克敌阵，所向披靡，宣扬皇威于国内外，朕甚赞其忠烈。望继续磨砺斗志，克服艰难，以不负朕之信赖。”[①]

在扩大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也对蒋介石政府进行了政治诱降活动。早在1937年9月间，由于日本在华北和上海的进攻并不十分顺利，而日军统帅部又于9月20日上奏天皇说：“11月间苏联将有所动作，希望在此之前积极地解决事变。”[②] 故此在日本统治阶级中出现了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呼声。

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德国发出了希望从中进行“调停”的信号。当时的德国政府为了保持其在华和在日利益，也希望借此使日本从对华战争中摆脱出来，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于是立即接受了日方要求，并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1月5日，陶德曼奉命在南京面晤蒋介石和孔祥熙，转达了日本提出的7项和谈条件。[③]

原指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会议能作出具体的对日制裁措施，但在期望落空后，无奈之下的蒋介石遂决定有条件地接受德国的调停。表示愿意在维持华北主权和行政权的前提下，以日军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此时的德国认为中日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中方的立场做成备忘录于12

---

① ［日］袮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②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478页。

③ 这7项和谈条件是：（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的在华权利。

月7日送交广田弘毅。当广田外相将中国态度的这一变化奏报天皇时，裕仁面浮喜色地点头道："那好哇。"

12月14日，也就是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近卫内阁召开会议，根据"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配合为辅"的方针，讨论与中国和谈条件问题。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并上奏天皇得到了批准。复文追加了向中国逼降的4项基本条件①。面对复加的条件，蒋介石以日方的和平谈判条件不清楚，希望提出更具体的提案为由进行了回复。

为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日本于1938年1月11日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裕仁天皇亲自出席。会议根据政府的方案，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方针规定：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日本的条件，请求媾和，日本将不再把现行中国政府视作谈判对手，并设法"使之毁灭"，而"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② 会上，裕仁天皇根据近卫首相会前的建议，一言未发。12日，日本通过德国限令中国在3日内对日本的新条件作出答复。15日，最后期限已到仍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日本再次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以最终决定对华方针。会上，以近卫内阁为主的一方主张停止交涉，以参谋本部为主的一方主张先进行交涉。会议从早9点一直开到晚8点。双方围绕是"战"还是"和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代表参谋本部出席会议的参谋次长多田骏，是一个有战略头脑的军人，他认识到了继续硬打下去的危险性，担心苏联乘日本把兵力用于侵华战争之际，增强其远东兵力，对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形成威胁。因此主张继续进行谈判，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避免陷入战争长期化的泥潭。但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为代表的内阁一方，却被占领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南京陷落后，蒋介石政权的处境十分困难，"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此时，"应排除姑息妥协"，继续发动攻势，摧毁蒋介石政权，使中国屈服。在陆、海相的压力

① 这4项基本条件是：（1）中国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2）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3）在日、"满"、中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4）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并要求中国全部承认，向日本表示乞和之态度，在本年内作出答复。

②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70年，第385页。

下，参谋本部经过研究，认为“不能忍受因中国方面的态度致使日本内阁崩溃”，遂决定作出让步，放弃了反对继续扩大战争的立场。

1月15日，在裕仁天皇亲自主持下，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作出决定，立即同中国停止交涉。16日，经裕仁天皇批准，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称：

>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①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它表明日本已堵死了停战媾和的道路，决定孤注一掷，继续扩大侵华战争。

对此，南京政府也迅速作出反应，在18日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同日，日本撤回驻华大使川越茂，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20日离开东京回国，中日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两国在形式上进入了战争状态。

对日本军方是否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争论，天皇裕仁的态度又如何呢？战后裕仁在他的《独白录》中曾作过如下表白：

> 尽管我经常说要在威吓的同时提出和平主张，对此，参谋本部虽表赞成，而陆军省则反对。反对的大概是陆军省的军务局。至此妥协的机会再次丧失了。攻下南京之后，德国大使出面调停，后据币原（喜重郎）说，当时日本的提案被宋美龄扣压下来，好像没有送到蒋介石那里，再加上畑俊六司令官恃强逞能，妥协的机会再一次失去了。②

应该说，在当时统帅部（参谋本部）与政府（内阁）之间意见相左、互不相让的局势下，最终的裁定人只能是天皇。近卫内阁就曾表示：如果

---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9页。

② 张振鹍译：《日本侵华与裕仁天皇的独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第30页。

参谋本部坚持要“和平”，那么政府就要按照与军部不同的单独主张前进。所谓“单独主张”就是政府总辞职或诉诸天皇更换参谋本部人员继续进行战争，二者必居其一。上述语气暗示，政府要走的道路不是总辞职，而是要依赖天皇这一途径。当时参谋本部中也有人主张“如万不得已，即通过直接上奏（天皇），发挥统帅权独立的作用”。那么，当时的裕仁究竟倾向于哪一方呢？

真实的情况是，裕仁天皇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内阁一边，支持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扩大对华战争的方针。当参谋总长闲院宫为争取天皇的支持而谒见裕仁时，他不无生气地质问道：“为什么参谋本部那样迫不及待地停止对华战争，并作出对付苏联的准备，当真有苏联出兵的危险吗？”闲院宫当时回答道：“归根到底就像陛下外出时需要警卫一样，尽管认为没有什么，但一旦出事，作为负责人就无言以对了，因此要尽量加以警卫，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样要做好对付苏联的准备。”

后来，裕仁天皇把他同闲院宫的上述谈话告诉了近卫，并说道：“既然如此，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就更好了吗？”显然，裕仁天皇这段话背后的意思是，若要防备苏联，一开始就不应同中国打，但既然已同中国打了起来，就必然坚持干到底。

接着，裕仁又对近卫说道：“参谋本部提出总长闲院宫要在近卫总理之前来皇宫拜见，但我认为这大概是要推翻已作出的决定，便以‘已约定先同总理会见，因而那是办不到的’予以拒绝了。”①

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天皇明确选择了政府的战争路线，而拒绝了参谋本部的速和路线。也正因如此，一向专横的参谋本部不得不对政府作出让步。当联席会议通过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首相声明后，裕仁立即对其予以了批准。

由于日本采取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迫使自抗战以来一直动摇观望，随时准备妥协投降的蒋介石政府不得不继续坚持抗战方针。

进入1938年后，为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包围并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势。四五月间，徐州会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军后迅速撤离。5月19日，日军占领了空城徐州。尽管日军打通了津浦线，但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却落空了。面对

---

①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9～90页。

这一失败，近卫首相撤掉了广田，任命宇垣一成继任外相，同时任命池田成彬为藏相。希望借助这两个人的力量，恢复内阁的领导能力。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许多领导机构都迁至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国共两党要员会聚武汉，使武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徐州战役结束后，日军统帅部又把进攻目标指向了武汉和广州。日军统帅部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和广州，切断蒋政权的重要补给线，便可在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赢得侵华战争的胜利。

1938 年 6 月 15 日，裕仁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攻武汉。为确保这次会战的胜利，6 月底，日军大本营决定变更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将原属华北方面军、由裕仁的姑父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任司令官的第 2 军（辖 4 个团）编入华中派遣军，从江北侧攻武汉；并组编新的第 11 军（下辖 5 个师团和 1 个支队），任命以“侵华恶魔”而著称的冈村宁次中将为司令官，从江南正面进攻武汉。7 月 5 日，裕仁天皇亲自召见了即将出征的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及主要头目，并御赐神酒和赏金，皇后也向冈村下赐了亲手缝制的围巾[①]，以示特别恩宠。

武汉会战历时 4 个半月，日军在投入约 40 万人、死伤 3 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下，于 10 月 26 日占领武汉。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东京后，裕仁天皇于 10 月 28 日上午 11 时在皇宫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对攻陷武汉的日军发布敕语，以示褒奖：“我陆海军诸部队紧密协力，克服长途诸多困难，终于击败众敌，攻占武汉，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在攻克武汉后，日军战略攻势已呈强弩之末，陆相杉山元向天皇作出的“事变一个月左右结束”的狂言早已破产，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也宣告失败。从此，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天皇的细菌部队

在战略相持阶段，在对国民党集团实行政治诱降、在中国炮制傀儡政

①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34 ~ 335 页。

权的过程中，裕仁天皇十分重视对汪伪政权的支持和扶植。1941 年 6 月 17 日，汪精卫率伪府官员抵达日本后，作为“国宾”住进了天皇招待外国元首、皇族居住的离宫。次日，裕仁还在皇宫亲自接见了汪精卫一行。与此同时，日本除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军事迫降行动之外，还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进攻和战略轰炸，迫使其屈服。

1938 年 12 月 2 日，裕仁天皇下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在同一天也向侵华日军下达了命令，指示日军在空袭中可使用特种弹（毒气弹），“但使用时须尽量避开第三国人居住区域，混合使用，对毒气的使用须严守秘密，不留痕迹”[①]。此一命令致使市民被炸死 1.18 万多人，伤 1.41 万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在这一过程中，裕仁天皇曾一再督促进攻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裕仁天皇在 1940 年 11 月 30 日曾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到重庆吗?” 1941 年 3 月 2 日，又对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发问道：“可以对重庆采取积极行动吗?”

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逐渐转为对中共开辟的广大敌后根据地加紧进攻，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甚至置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于不顾，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而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天皇敕令而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细菌部队——“731 部队”则充当了杀人恶魔的角色。“731 部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根据天皇敕令建立的部队，该部队的队员也因此而十分自豪，在每年举行的建队周年庆祝宴会上，都要首先朝皇宫方向遥拜天皇。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其实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着手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1931 年秋，日本军事细菌学家石井四郎从欧洲考察细菌武器回国后，立即向军部提议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部队。石井认为日本没有充足的五金矿藏资源以及制造其他武器的原料，“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

1933 年 8 月，根据天皇的秘密敕令，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先在哈尔滨市东南背阴河地成立了“关东军防疫班”。为了保密对外称“加茂部队”，又因由石井主持，故又称“石井部队”。至此日本出现了专门研制细

---

① 见拂洋编写：《伯力审判——12 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90、96 页。

菌武器的秘密部队。

1936年，为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又根据裕仁天皇的敕令，将“关东军防疫班”扩大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石井出任部长。其任务表面上是为野战部队研制净化水设备，但实际上是从事细菌战研究。两年后，该部迁至哈尔滨市东南约20公里的平房镇，并将代号改为“东乡部队”。经过大规模的扩建，该“部队”将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特别军事区域”，拥有许多先进设备，人员也由原来的1000人扩展到3000人，年经费高达1000万日元以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战基地。

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在1939年至1940年期间，根据裕仁天皇的新敕令，“东乡部队”又在靠近苏联的战略要地海拉尔、孙吴、海林、林口分别设立了4个分队，并派出研究骨干，分赴驻华各日军部队，先后建立了一批细菌部队。1941年6月，“东乡部队”更名为“关东军731部队”。1945年5月，又再次更名为“关东军第25202部队”。

尽管名称多次变更，但这一根据裕仁天皇敕令建立并逐渐扩展的部队，实质上就是一支研制细菌武器的“特种部队”。他们制造了大批霍乱、天花、芥子气、沙门氏菌、伤寒、鼠疫、炭疽热、结核、破伤风等菌苗，并用抓来的中国军民以及盟军战俘进行活体实验。日军将那些用做实验的活人称作“马木大”，也就是日语“原木”的意思。他们之中有的被种上各种菌苗；有的被施以氰化物毒气；有的被关进零下50摄氏度的“冷室”，直到冻死为止，以观察人体的耐寒极限。这些被迫接受细菌实验的“马木大”无一幸存。正如日共《赤旗报》一名记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唯一的出口“就是焚尸炉的烟囱，他们只能化为灰烬从烟囱中出来”。据估计，死于上述实验的人数多达万人。而日本侵略军以细菌、毒气为武器所屠杀的中国军民，则难以计数。日本侵略军曾多次在中国的宁波、金华、常德、北京、南京、太原、晋中、晋绥、晋南、济南、农安等地使用细菌武器。

731部队的建立、发展及其重大活动，都是依照裕仁颁布的敕令进行的。原731部队总务部长兼第4部（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称：

> 第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该部队

驻地最初决定设在哈尔滨，由日本陆相任命的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当我任第731部队总务部长一职时，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但现在我不能记起这道敕令的外表和详细内容，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加紧、该部队作用的增大及其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于是就必须增加部队员额，扩大其实验室和驻地范围。由于这个缘故，日本天皇于1940年颁布了一道新敕令，责成把部队内主要部分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处的平房镇地区，部队内的基本活动，如研究、试验和生产事宜，都在那里进行……此外，1940年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该部队人员扩充至3000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重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并把部队机构分成为几部。上述一切关于第731部队产生经过的情形，我是因为在1941年看过本部队总务部内的文件才知道的，并且亲自由前任总务部长太田大佐（1941年我从他手上接任此职）和第二部长军医中佐村上隆口中听到过……

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尾家隆二也交代说：

第731部队奉日本天皇裕仁1939年的密令，于1939年至1940年期间曾经改编过。1940年2月，我在关东军司令部读过这个密令，并在上面签署过……此外，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密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孙吴城、海林及林口站，成立了第731部队的4个支队，从密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签署的各该支队人员表中可以看出，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①

法国作家爱德华·贝尔在他的《天皇裕仁传》一书中也曾讲过：“有一点是无可辩驳的：是天皇亲自在决定建立731部队的敕令上签字盖章的。裕仁此举并非走走形式而已，一位皇室成员说过：‘凡需要加盖御玺的文件，裕仁都仔细审阅，他从不像盖章机器那样随便使用御玺。’”

---

① 见拂洋编写：《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0、96页。

此外，裕仁天皇曾亲自接见过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为其加爵晋级，并授予其“旭日勋章”。天皇的四弟三笠宫曾亲临平房镇视察试验基地，并参观了实验室。天皇的二弟秩父宫在1934年2月也曾参加了石井在陆军省举行的秘密报告会，并对石井的成绩“赞叹不已”。

战后苏联政府在伯力审判中揭露了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人使用细菌战的罪行，并于1950年2月3日向中、英、美三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委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进行调查和审判。但日本投降后石井为了保全自己，除销毁了一切人证和物证外，还将带回日本的所有资料、菌种和文件偷偷交给了美国。美国出面掩盖了731部队的真相，并对其进行百般庇护，致使裕仁、石井等人逍遥法外。

第六章　“南进”、“北进”之争
批准三国同盟

日本的北进政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陷入了长期战争的困境，几十万侵略军的伤亡，财政经济的日益拮据，不仅在人民和士兵中引起了广泛不满和厌战情绪，连统治阶级内部也在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两派主张。近代以来，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向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南进”与“北进”之争。所谓“南进”主要是指南洋或东南亚，有时兼指华南，亦称“海洋政策”。“北进”则主要是指中国大陆，首先是中国东北，有时兼指苏联西伯利亚，亦称“大陆政策”。

“南进”与“北进”之争，是与日本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的。20世纪初期，执掌日本陆军大权的长州藩阀是“北进”侵犯中国东北、进攻俄国的积极鼓吹者，而与之不同的是，控制日本海军大权的萨摩藩阀，则主张“南进”，以英、美为主要对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南进”与“北进”之争又演变为统制派与皇道派之间的斗争。“二二六”事件后皇道派虽被彻底镇压，但在日本军部中主张“北进”攻打苏联的仍不少。

日本为摆脱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持久战的困境，企图以发动对苏军事进攻的办法改变其在国际上所面临的被动局面。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主张继续扩大对华战争的杉山元被赶出内阁，而由主张缓和中日矛盾、实施“北进”战略的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7月，朝鲜驻屯军和关东军终于在苏联边境挑起了“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位于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是一座海拔149米的秃山。按照1886年的《中俄条约》，此处为中俄两国国界，但无标桩，界限不太明确。自九一八事变后，日、苏两国在这里部署了边防守备队，驻扎在当地的日军是“朝鲜军”第19师团。

1938年7月11日，有情报称有约40名苏联士兵在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一贯好战的关东军和“朝鲜军”立即行动起来，声称“在日中战争久拖不决的形势下，为了试试苏军的意图和作战力，应该在张鼓峰地区打一仗”①。

此时，正值侵华日军准备全力进攻武汉前夕。为避免与苏联发生大规模战争，“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将此事电告日本军部，主张应通过外交谈判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地区。

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部分首脑最初同意小矶的主张。但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参谋们认为在张鼓峰这样狭窄的地带，无法出动大批军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在对苏强硬派的鼓动下，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最终还是决定对苏一击，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对此，陆相板垣和参谋总长闲院宫都表示赞同。闲院宫对天皇说：“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同时还提醒道，“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但宫内大臣汤浅却对天皇说：“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随后天皇问道：“即使我不同意，他们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汤浅答道：“这样就无法控制陆军。若引起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但天皇只说了一句：“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天皇是陆军大元帅，却听任部下胡作非为。对此，元老西园寺公望也曾对秘书原田谈道：“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最好辞职。”②

7月16日，参谋本部最终向“朝鲜军”下达了“向国境附近集中，但行使武力须听候命令”的指示。7月17日，中村孝太郎取代小矶就任“朝鲜军”司令官后，就立即下令“朝鲜军”第19师团做好对苏发动战争的准备。

---

①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年，第154页。
② ［日］《西园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0页。

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天皇的批准，于是在7月20日，新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要求晋见天皇。

对陆军的强硬方针，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持反对态度，外务大臣宇垣一成虽赞成在张鼓峰集中兵力以备万一，但也反对积极动用武力。裕仁天皇从一开始也不太同意，虽说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频发诏书嘉奖官兵，表现得十分积极，但那是在日军处于优势的形势下作出的。如今，在侵华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又要进攻强大的苏联，裕仁深感没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当板垣二人求见时，裕仁令宇佐美侍从武官长传旨说："如为奏请使用武力而来，朕则毫无赞同之意，所以不必进宫。"尽管如此，二人还是再三请求，坚持求见，天皇只好答应。参谋总长闲院宫先行进宫，听侍从长作了详细说明后，当即退了出来。迟到一步的板垣不知此情，在拜见天皇时竭力陈述了非使用武力不可的理由。"与有关大臣商量的结果如何?"天皇问道。"外相和海相都表示赞成。"板垣回答道。

其实裕仁早已知道宇垣外相和米内海相不赞成使用武力，而板垣竟当面撒谎，裕仁大为震怒。正言厉色地说："陆军的做法太不像话。满洲事变时在柳条沟（湖）也好，后来在卢沟桥也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作为朕的军队，竟然屡次采取不应有的卑劣手段。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不能动一兵一卒!"

见天皇震怒，板垣和闲院宫只得战战兢兢地退了出来。板垣丧气地说："我再也不想看到陛下的龙颜了，请求免职。"参谋总长闲院宫也提出申请说："作为陆军的元老，这样下去，的确无法辅佐天皇。"近卫首相认为这是天皇干涉过度，赶忙出面调解。此时天皇也传下话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都可以照样干下去。"两人这才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由于天皇明确反对，参谋本部只得电令当地驻军"务期慎重，严防引起纠纷"。然而已奉命结集在张鼓峰一带的"朝鲜军"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本来就属于强硬派，常为未能参加对华战争而抱怨不已，于是对大本营的这一决定深表不满。7月30日，他以所谓苏军在张鼓峰以北2公里的沙草峰上构筑工事为借口，擅自下令向苏军发起了进攻，但当即被苏军击退。7月31日，日军又增加了两个步兵联队，实施新一轮的进攻，由于这次日军数量超过苏联，不仅占领了张鼓峰及哈桑湖西面的高地，而且入侵苏联领土4公里。

当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将发生冲突的战况上奏天皇。出人意料的

是，天皇并没有追究尾高师团长擅自违令的责任，却一反常态地说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也就是说，天皇完全相信了参谋次长根据当地部队的假情报所作的报告，承认了事态的发展，但同时又认为没有必定获胜的把握，因此仍然继续坚持不扩大的方针。

于是，参谋本部根据天皇"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的指示，于同一天向当地日军发出了"只要苏军不进行挑战，军事行动不得超过目前范围""除准备迎击敌军反击外，应维持现状"的指令。

从 8 月 2 日起，处于绝对优势的苏军出动飞机、坦克和重炮发起了反击。8 月 7 日，苏军攻占了张鼓峰，把日军赶出了苏境。8 月 9 日，日军反攻，又遭惨败。参谋本部根据天皇的指示采取了不增派援军，不许出动飞机，不得向苏联境内推进等措施。到 8 月 10 日，损失惨重的日军被迫后撤。由于苏联也无意扩大战争，8 月 10 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五天后的 8 月 15 日，天皇向参谋总长闲院宫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这次张鼓峰事件中，我军将士在困难的情况下，以寡敌众，善能克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感到满意。尤其对死伤者不胜哀怜，务将此意传达给将士。"与以往嘉奖日军武功的"敕语"截然不同，天皇的这次"圣旨"，对当地日军按照圣意没有扩大战火表示了满意的态度。

张鼓峰的炮火熄灭后，日本并未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一贯积极好战的关东军，仍坚持利用边境纠纷，伺机挑起对苏战争。第二年，关东军再次挑起了"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位于外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处，是漫无边际、起伏不平的大草原，虽说有国境线，但并无标桩。"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主张以哈拉哈河为界，外蒙古则坚持以哈拉哈河以东 13 公里的诺门坎为界。双方曾多次发生边界争端。外蒙古为确保其国境线的安全，于 1936 年 3 月同苏联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从而使这一地区的边界纠纷扩大为关东军同苏、蒙两国军队的对峙状态。到 1939 年初，关东军已在中苏边境集结了 25 个师团的兵力。

1939 年 5 月初，天皇获悉大批日军集结于中苏边境，曾问过侍从武官长宇佐美："陆军在满洲集结部队，用意何在？"然而宇佐美并未将天皇的询问告知陆军。5 月 11 日，以蒙军有越境行为为借口，数百名日军进犯蒙

古国境，与苏、蒙军队发生冲突。后双方互有增兵，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

5月28日，关东军向苏、蒙军队了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因日军骑兵部队被苏军的坦克和炮兵包围，关东军几乎全军覆没。5月31日，日军被迫撤离战场。6月20日关东军司令部再次下令向诺门坎增兵。除增派坦克联队和步兵联队外，还增派了一个飞行集团。为确保制空权，6月27日，关东军擅自出动飞机130余架，飞抵离国界线达100公里的外蒙境内的苏、蒙空军基地塔穆斯克机场进行空袭。这次空袭已明显地超越了“防卫边界”的范围而成为对苏、蒙的侵略战争。

一直为战争前景担心的裕仁，对这次空袭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关东军没有得到天皇的命令而向外国进攻，是对天皇军事统帅权的严重侵犯。因此，当参谋次长中岛铁藏进宫向他禀告这次空袭的“赫赫战功”时，遭到了裕仁的严厉训斥。由于战争正在进行中，裕仁并未对关东军司令官及有关责任人采取处罚措施，只是严厉地命令说：“关东军司令官应考虑到将来，谨慎行事。”

但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等人认为，轰炸塔穆斯克机场后苏联已处于劣势，因而不顾中央的指令，又于7月1日和15日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但均被苏、蒙军队击溃。战争一直持续到8月31日，日军伤亡惨重，死伤达1.1万余人，死伤率超过了70%。

裕仁天皇和参谋本部获知战局失利的消息后，慌忙于8月30日派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到长春，试图说服关东军迅速了结这场冲突。但关东军司令部仍以要打扫战场、收回阵亡将士尸体为由，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参谋本部只得第二次派中岛赶赴长春，严令关东军停止一切进攻，将军队撤出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同时，参谋本部也急忙于9月6日和8日接连下达两道命令，免去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等人的职务，改由梅津美治郎中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9月16日，日本被迫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由于陆军中央的姑息迁就和制止不力，天皇的统帅权威未能像“张鼓峰事件”时那样及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同“张鼓峰事件”时一样，当天皇认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取胜希望的战争时，会立即表示出明确的反对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两次对苏军事挑衅均以失败告终

的日本，被迫改变其不断扩张的战略，即在占领中国大片土地的基础上，由原来以攻击苏联为主要目标的“北进政策”，改变为集中向南洋扩张的“南进政策”，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裕仁与日德同盟案

“北进”对苏军事挑衅失败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也严重受挫。这突出地表现在欧战爆发前日本力图通过强化法西斯轴心来打开侵华战争的僵局而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上。

日、德、意三国尽管在 1937 年 11 月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三国轴心正式形成，但这一协定不包含在军事上相互援助的条款。为了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三国都需要把政治同盟发展为军事同盟。

德国为了排除英、法的抵抗和干涉，迫切希望与日本和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1938 年 2 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同日本驻柏林武官大岛浩秘密接触，就两国结成军事同盟一事进行试探，大岛立即向东京参谋本部作了汇报。

日本对德国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陆军，希望通过加强反共轴心，以便让德国钳制苏联，免除北方的后顾之忧，因此积极主张加强合作。为此，参谋本部背着外务省和天皇，密令大岛同德国进行谈判。

1938 年 8 月 15 日，大岛武官将德国政府提出的日德同盟方案带回东京。德国方案的基本点有三条：（1）日德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外交冲突”时，双方进行协商；（2）一方“受到第三国威胁时”，另一方有义务在政治、外交各方面给予支援；（3）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给予军事援助。可见德国当时的目的不仅只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还包括美、英、法等国在内，显然，德国的企图是想扩大《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范围。

对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无论是日本政府、陆海军，还是裕仁天皇原则上都是赞成的。但在条约的内容上，尤其是在日本承担的义务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陆军同意接受德国方案，希望同德国结成一个不仅针对苏联，而且广泛针对英、法、美的坚强的军事同盟。而海军和宫廷集团则主张将这一同盟局限在只针对苏联的“加强防共协定”上，

力求避免刺激英、美。

8月2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以德国方案为基础，同德国进行“加强反共协定”的谈判，同时议定了日本的修正方案。日本的方案在德国方案前增加了“以防卫苏联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为着眼点，而不把英、美等国当作正面敌人为其宗旨”的前言；又对第2条中的“受到威胁时”和第3条中的“受到攻击时”分别增加了“非因挑衅”的限定条件；还把第3条中“一方有义务主动对另一方提供军事援助”改为受到攻击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显然，日本的方案是要把盟约变成纯粹反苏反共的防御性协定。

日本的方案在遭到德国拒绝后，日本陆军通过驻德武官大岛继续同德国继续进行秘密交涉，试图缔结全盘接受德国要求的盟约。近卫首相虽不赞成陆军主张，却又没有勇气压制陆军，遂于1938年12月宣布内阁总辞职。

对继任首相人选，元老西园寺没有表态，最后内大臣汤浅和宫内大臣松平向天皇推荐了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平沼首先邀请近卫出任枢密院议长兼不管部大臣[①]，又邀请前内阁的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田八郎等人留任，于1939年1月5日组成了新内阁。

日德同盟问题，仍是平沼内阁对外政策的重大论点。1月6日，德国向日本和意大利重新提出了三国同盟方案，其内容和实质几乎没有变动。这一次，平沼内阁打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德国的愿望。1月19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如下协议方案：（1）三国同盟是针对苏联的，但根据情况也可扩大到“第三国”；（2）如果德国直接攻击苏联以外的第三国而苏联未参战时，日本仍要视情况决定是否援助德国。

对五相会议的这一妥协案，裕仁天皇表示赞同，并训令平沼首相确认两点：驻外机构不服从训令时应召回或作适当的处理；协定内容如需再作更改，即停止谈判。随后，平沼向天皇呈上了五相会议全体人员署名的保证书。

既然天皇如此亲自叮嘱，就必须作出周密的安排，以防驻外机关独断

---

① 不管部部长：政府中不专管某一部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亦有称为不管部大臣、国务大臣、无任所相等。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不管部部长通常是内阁成员，出席内阁会议、参与政府决策，承办内阁会议或政府首脑交办的特殊重要事务。

专行。为此，平沼首相这次改变了以往用电报发训令的一贯做法，派出了一个由外务、陆、海军组成的特使团直接去国外传达训令。特使团于2月下旬前往德国和意大利，向日本新任驻德大使大岛浩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传达了政府训令。然而，两位大使已分别答应德、意两国外长，在德、意与英法开战时，日本也负有参战的义务。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训令、超越权限的独断专行。

但是由于陆军想在柏林造成既成事实，再强加给天皇和政府。因此在陆相板垣的强烈干涉下，政府既未能停止交涉，也未能召回两位大使。

天皇获悉大岛和白鸟同德、意两国外长连签订条约的日期都已商定，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了陆相板垣。天皇在与木户内大臣商量时问道："朕打算单独把陆相找来，训斥他一顿，你看如何?"木户劝阻道："训斥他，反而会激怒他，我认为不妥。"

尽管如此，当4月11日板垣陆相晋谒时，裕仁仍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板垣说道："驻德大使随意表示参战，这是超越天皇大权的行为，陆军居然予以支持，实在令人生气。还有，每次内阁会议，陆军大臣都要推卸责任，这很不好。"①

5月10日，当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要求进宫谒见天皇时，裕仁命令侍从武官长道："闲院宫如果还谈'参战'问题，就事先告诉他，我对这个问题明确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闲院宫还是坚持进宫谒见了天皇并提出了"参战"问题，结果遭到了天皇的严厉斥责。此外，天皇还曾对汤浅内大臣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愤懑情绪，"凡是宣战媾和的大权由我执掌，我作为大元帅也应掌管元帅府。未经我的同意或没有跟我商量，强行主张这样那样的问题，简直太不像话!"

由于天皇强硬的反对态度，五相会议围绕是否再拟订妥协方案、参战范围和参战条件等问题相持不下，致使日德同盟的谈判陷入了搁浅状态。

裕仁天皇之所以反对德国提出的方案，主要是担心与美、英为敌。虽然在"二二六"事件中他坚决镇压了"北进"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南进"派。他深知日本国力有限，英、美实力强大，不能不考虑到一旦开战可能带来的后果。

日本对谈判迟迟没有反应，德国便于5月22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

① ［日］河原敏明：《日本天皇——裕仁》，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盟条约，实现了“柏林—罗马轴心”，并着手准备进攻波兰。为了孤立波兰，德国也开始接近苏联。对此种形势焦虑不堪的日本陆军，一面封锁天津租界，恶化对英关系，一面唆使右翼势力掀起反英运动。日本陆军甚至散布说计划利用右翼暗杀亲英派重要人物和通过陆相单独辞职来搞垮内阁等，从侧面施加压力，催促缔结同盟。然而对同日本结盟已不再抱有太大希望的德国，在8月23日，也就是日苏两国在诺门坎作战之际，突然与自己的宿敌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这一条约与原先德日签订的防共协定根本就是矛盾的。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原先为牵制苏联而签订防共协定的目的已彻底告吹，而且意味着日本已被它所一直依靠的德国盟友出卖了。

天皇对内阁的干预

张鼓峰、诺门坎两次军事挑衅的惨败，使日本尝到了苏联远东军的厉害。以裕仁为首的日本最高统治阶层认识到，只要侵华战争不结束，就不可能抽出足够的兵力北上进攻苏联，日本的“北进”政策发生了动摇；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又使其试图通过同德国合作对抗苏联的外交政策破产，在国际上陷入困境的日本此时又不敢贸然南下。日本的外交政策暂时进入了一个举棋不定、动摇观望的时期。

为此，平沼内阁于1939年8月28日率内阁总辞职。为抑制陆军独断好战的情绪，同时谋求外交的一元化，裕仁天皇打破惯例对新内阁的人选进行了直接干预。

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内大臣汤浅仓平最初曾考虑由前首相广田弘毅或前藏相池田成杉出任首相。但陆军方面表示反对，并推荐了预备役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和前首相林铣十郎。对此，裕仁天皇明确表示：如果是阿部的话，可能取得人们的合作，而且他对陆军的情况也了解，可以让他试一试。内大臣汤浅根据天皇“圣意所向”，最终推荐了阿部为继任首相。

1939年8月27日，阿部奉命进宫接受天皇的组阁大命。裕仁首先流露出了对陆军的不满，他表示即使推荐媒体揣测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少将出任陆军大臣，他也不会同意。接着，裕仁又以严厉的口吻命令阿部道：“陆军大臣由我指定，必须由梅津美治郎或畑俊六来担任，即使陆军三长

官（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提出其他人选，我也无意批准。”[1]

因此，当三长官将矶谷、多田、柳川三中将作为候选陆相提呈时，天皇语气强硬地说：“总之，我不同意，应该任命我所信赖的人。”深表不满的陆军三长官也不敢公然违背天皇的意志，只得从天皇指定的两人中推荐天皇的侍从武官长畑俊六大将出任陆军大臣。天皇亲自指定陆军大臣的人选，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已发展到必须由天皇直接干预的程度。

当阿部拿着预定的内阁成员名单再次进宫时，裕仁天皇又对其他阁僚人选一一提出了质询。对内定为农林大臣的民政党人永井柳太郎，天皇问道：“此人是最早煽动反英运动的，靠得住吗?”对法务大臣宫城长五郎（审判共产党案件时的审判长，由此声名大振）的任命，天皇也表示了疑虑：“他任法务大臣合适吗?”

由于裕仁特别强调在外交上“要与英美协调”，因而对外务省的人事安排尤为重视。阿部组阁时，最初曾想让积极推进同德意结盟的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出任外务大臣。但因天皇十分讨厌主张同英美开战的人，外务大臣一职只得由阿部首相兼任。甚至对外务省东亚局长的任命，天皇也进行了干涉。由于此前的东亚局长也主张同德国缔结针对英美的军事同盟，给前任外务大臣有田设置了种种障碍，引起了天皇的极大反感。天皇明确指示阿部：“无论如何，东亚局长是要更换的。”于是，东亚局长最终由堀内干城接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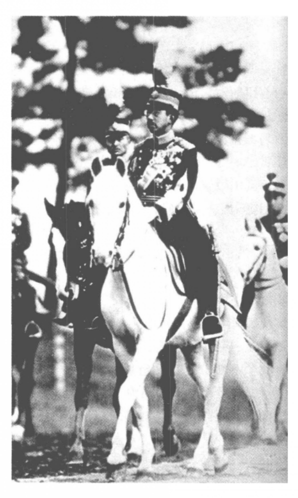
阿部内阁于1939年8月30日走马上任。两天后的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袭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9月4日，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宣称“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将不介入，专力解决日华事变”，暂时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这一声明体现了阿部内阁试图软化、稳住英、美，对德国实行观望的机会主义态度。

为缓和因中日战争不断扩大而日趋紧张的日、美关系，推行对英、美的“协调外交”，9月25日，阿部起用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外相。野村属于海军内部的稳健派，同曾任美海军部副部长、时任总统罗斯福及美国政界的领导集团交往甚密，是著名的“对美协调论者”。野村就任外相后，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同英、美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同已通告废除《日美通商

[1] ［日］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45～46页。

航海条约》的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上任伊始的野村立即就续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问题同美国进行交涉。

早在阿部内阁成立前的7月26日，为了牵制无休止地对华战争的日本，美国曾通知日本：《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1940年1月26日期满后将自行失效。当时日本20%以上的出口和30%以上的进口都依赖美国，废除此项条约无疑会给日本以巨大打击。因此，能否续订这一条约，对阿部内阁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此，野村外相首先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商谈，希望在现行条约失效之前签订一个临时条约。实际上，日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企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威胁到了美国的在



参加陆军阅兵式的裕仁天皇

华权益，只要日本不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美国就很难再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因此，日美会谈毫无结果。1940 年 1 月 26 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期满失效后，两国的条约关系断绝。此后，日美进入了无条约时代。不过，美国并未对日本商品课以特别关税，仍向日本出口包括石油、废铁和机械在内的战争物资。

为“解决”中国问题，阿部内阁除发动一系列新的军事进攻外，着重推行所谓的“和平工作”，利用汪精卫建立亲日傀儡政权，企图达到以华治华、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

外交上一事无成，内政方面又接连失策。1940 年 1 月 14 日，仅维持了 5 个月的阿部内阁被迫辞职。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围绕继任首相人选再次展开了频繁的活动。陆军方面极力主张由现任陆相畑俊六出任首相；而以内大臣汤浅仓平为首的“现状维持派”则推荐主张与英、美协调的前海相米内光政。由于裕仁天皇对米内颇为信任，并曾征求过前首相阿部的意见：“下届首相由米内出任如何?”在天皇的授意下，米内受命组阁。

在组阁前，裕仁对米内说道：“要严格按宪法行事，慎重确定大臣的人选。”而没有像上届内阁那样对人事安排进行过多的干预，表明天皇对米内是非常信任的。

为防止陆军在陆相人选的推荐上刁难，阻碍米内顺利组阁，裕仁天皇决定再次运用个人影响，直接命令畑俊六留任陆相，支持米内。为此，他亲自召见了畑俊六。

“已命米内组阁，陆军能否与之合作?”天皇试探性地询问道。

“能够合作。”畑俊六回答道。

“那就很好。”天皇高兴地说道。

尽管这是“询问”式的对话，但畑俊六完全明白，这是天皇在要求他与新内阁合作。这种“询问”无异于命令，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于是，畑俊六只得留任，继续担任陆军大臣。

米内内阁于 1940 年 1 月 16 日宣誓就职。在对华政策上，米内仍继续执行前任内阁的路线。1940 年 3 月，日本政府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粉墨登场，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米内派前首相阿部信行为特使，前往南京祝贺。

在所谓“自主外交”的方针下，米内内阁在搁置日德意军事同盟问题

的同时，继续采取避免刺激英、美的立场，并通过外交谈判，先后与法印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使其各自关闭了印度支那和缅甸这两条援蒋通道。

确立“南进”方针

三次担任过外相的有田八郎被选任为米内内阁的外相。有田外交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确保荷属东印度资源问题。在同重要物资出口国的美国就续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失败后，确保荷属东印度的资源，无论对进行中的侵华战争来说，还是就确立经济自立体制而言，都是紧急而必须解决的课题。因此，有田八郎一上任，就立即通过驻荷兰大使石射猪太郎向荷兰政府提出保护荷属东印度的要求，但遭到了荷兰的拒绝。而此时欧洲形势的突变再次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1940 年初，英、法军队与德军在欧洲处于相持状态。但是到了 4 月，德军侵占了中立国丹麦和挪威，接着又于 5 月侵占了中立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包围了比利时边境上的 35 万英法联军。5 月末，德军攻破法国的马奇诺防线，重挫英法联军。6 月，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投降。英军被迫撤出欧洲大陆，英伦三岛也已处在德军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

在上述形势下，有田外相向荷兰政府提出了购买锡、橡胶和石油等 13 种重要物资及其数量，要求保证对日出口。当时与荷兰进行交涉的石射大使，在给外务省的电报中称，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大有在临终者床边讨债的感觉”①。

希特勒的胜利，使法西斯日本的决策者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逐步占据上风。正为战略物资大量消耗在中国战场这个无底洞而忧心忡忡的日本，窥伺着败给德国的荷兰和法国在亚洲南部的殖民地。军部上层几乎一致认为，为了在对殖民地的重新分配中不致落后，有必要同德国携手合作，推进“南进”方针，既可获得维持战争所需的原料，又可夺取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同时还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不失

① ［日］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太平出版社，1972 年，第 303 页。

时机地断然南进。

1940 年 7 月 3 日，日本陆军首脑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纲要》，提出：在世界形势动荡的情况下，帝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特别应注意改善国内外形势，继而寻求良机，解决南北问题。这一方针实际上是要把“南进”确立为日本即将实施的基本国策。“南进方针”确定后，陆军又同海军进行了协商，并很快达成了一致。

但是在对南方行使武力的问题上，外务省主张应通过外交谈判加以解决。于是，不满外务省的陆军开始谋划倒阁。7 月 4 日，陆军参谋本部的骨干军官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陆相畑俊六提出要求书，一方面批判现任内阁的政策消极颓废，对国军士气的团结将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要求实现“举国强有力的内阁”。为进一步施加压力，陆相畑俊六于 7 月 16 日提出辞职，而且陆军三长官会议也表示拒绝推荐后继陆相人选。无奈之下，米内内阁不得不宣布总辞职。

由于内大臣木户幸一刚刚上任不久，因此对继任首相的选拔是通过重臣会议进行的。组成重臣会议的有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和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这六位前任首相。在内大臣木户的召集下，重臣会议推荐近卫再次组阁，并将此事报告给元老西园寺公望。西园寺以“情况不明，不便答复”为由拒绝推荐，实际上就是反对近卫组阁。但天皇尊重重臣会议的推荐，依然命近卫组阁。7 月 22 日，把日本带入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在军部的全力支持下，奉天皇之命，第二次上台组阁。

对近卫组阁，天皇问木户道：“提醒近卫注意些什么好呢？”

木户答道：“鉴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要特别注意外务大臣和大藏大臣的人选。”

近卫组阁时，陆军推荐了两位锋芒毕露、力主“南进”的法西斯干将入阁。一位是傲慢无理、能言善辩、有“说话机器”和“五万言先生”之称的法西斯外交家、前满铁总裁、亲德派人物松冈洋右，出任外相；另一位是从小被人称为“打架大王”、在侵略战争中号称“剃刀将军”、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出任陆相。这两人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及其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此外，内务大臣是法西斯主义官僚安井英二，文部大臣是皇道派的桥田邦彦，星野直树任总管战时经济的企划院总裁，海相为吉田善吾中将（9 月 5 日后，改由与陆军相协调的

及川古志郎大将接替）。

7月26日，也就是近卫内阁成立后的第四天，内阁会议通过了施政纲领——《基本国策纲要》，基本方针是："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① 为此，在国内应确立"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次日，在皇宫中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由陆海军联合提出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处理时局纲要》，更具体地制定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方针政策。随后，由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总长将联席会议的决定上奏天皇，裕仁天皇当即予以承认。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至此作为经天皇批准的基本国策而确立下来。对近卫内阁决意南进的原因，裕仁天皇曾流露过这样一种感想："近卫首相似乎打算把因中国事变失败造成的国民不满情绪转移到南方去……"

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发表讲话，宣称："我们当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据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设以日满华集团为链条之一的大东亚共荣圈。"自此，"大东亚共荣圈"口号出笼，表明日本已开始了向"南进"体制的战略转变。

裕仁批准三国同盟

"南进"战略确立后，日本加快了同德意法西斯结成军事政治同盟的步伐。目的是与德、意划分势力范围，凭借德国在欧洲的胜利牵制美、英的力量，为南进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借助德国，改善日、苏关系以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同时，在1940年4月以后，德国的闪电战已发展到准备向英国本土进行登陆作战的阶段，而美国也加强了对英援助，美国直接对德参战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因此，德国也有必要借助与日本结盟来牵制美国，阻止其参战。以上述形势为背景，德、日两国加快了缔约结盟的

① "大东亚新秩序"后来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外相松冈洋右于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

步伐。

1940年9月7日，德国特使斯塔玛赴日，与松冈洋右外相连续举行了两天会谈。德国的提议是对英战争时，德国不要求日本军事援助，所要求的是日本运用一切办法牵制住美国。而德国则承认日本是东亚的政治领导者，并且在缔结三国同盟后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的中间人”①，这也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因此，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

尽管法西斯德国在欧洲连战连捷，但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裕仁的心情还是十分忧虑。9月16日，当近卫首相进宫报告政府已下决心缔结三国同盟时，裕仁向近卫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思：“现在缔结日德军事同盟，实出无奈。可是万一同美国交手，海军怎么样？听说海军大学的海上作战经常败给美国，不要紧吧？万一日本成为战败国，那该怎么办呢？”②

对天皇推心置腹的表白，激动万分的近卫首相重复了当年日俄开战时伊藤博文对明治天皇曾表过的决心：“如万一战败，将辞退爵位勋等，为国捐躯。”“我万分同情陛下的忧虑心情；虽感到自己的微力不足以报效，也决心竭力奉公尽职。”③

9月19日，依然忐忑不安的裕仁天皇在皇宫的朝觐厅召开了由内阁主要成员、陆海军首脑及枢密院议长等人参加的御前会议，最后研究与德国结盟的问题。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6时，就缔约后对中国战场的影响、与美英的关系、战略资源特别是石油的获得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分析。与会者虽一致认识到由于与德缔约必将进一步恶化同英、美的贸易关系，使战略物资的获得更加困难，日、美战争也很可能成为持久战，但最后还是作出了与德意结盟的决定。亲临会议的裕仁天皇在会上一言不发，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与会者的发言。但在会议结束时却起身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的态度。

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草案，裕仁通过自己的心腹亲信、已升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明确指示首相和外相：要经枢密院审议。并向木户说道：“若枢密院予以否决，政府不就可以向天皇奏陈反对意见了吗？”9月26日，在裕仁亲临的枢密院会议上，经过反复磋商，最后通过了三国同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70年，第452～453页。

② ［日］袮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

③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95页。

盟条约草案。

1940年9月27日，松冈外相参加了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举行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条约规定："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权"；"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设欧洲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① 该条约不影响三国各自与苏联的现存政治关系。这是一个法西斯轴心国重新瓜分世界的条约，其目标明显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当时的大国中，只有美、苏尚未参战，而苏联又被排除在外，因而条约中的所谓"第三国"只能是美国。这标志着日本朝着与美、英开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条约缔结当天，裕仁天皇又发布诏书，向国内外宣布承认三国军事同盟。诏书写道："宣扬大义于四海，合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为此夙夜眷眷而无所措"，"朕切望早日戡定祸乱，恢复和平。……使万邦各得其所，使兆民悉皆安堵，乃旷古之大业。"同时呼吁道："尔臣民愈益明征国体之观念，深谋远虑，戮力同心，克服非常之时局，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并表示，"兹观三国间条约之缔结，朕甚感欣慰。"②

尽管天皇在诏书中表示了"欣慰"之情，但担心战败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在私下里曾对内大臣木户说："缔结日英同盟（1901年）时，宫内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可是这次不能像缔结日英同盟时那样只是高兴，万一形势变化有可能面临重大危急局面。所以我想亲自到贤所（祭祀天皇祖先的神殿）礼拜告禀，同时祈求神灵保佑，你看怎么样？"③

随后，木户立即与宫内大臣商量，为天皇安排了贤所告禀仪式。此时的裕仁天皇，只有靠皇祖皇宗的"神灵"来保佑日本的前途了。

由于天皇已预感到与英、美对抗将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开始担心由皇族继续担任陆海军统帅机关的首脑，将来会承担战争责任，并有可能由皇族波及皇室进而波及自己。因此，裕仁主动提议免去了闲院宫的陆军参谋总长和伏见宫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职务。1940年10月3日，75岁的闲院宫辞职，并推荐自己的心腹杉山元继任参谋总长。1941年4月，伏见宫

①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279页。
② ［日］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③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6页。

辞去海军军令部总长一职，改由永野修身大将接替。不难看出，此时的天皇已考虑将来如何逃脱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加速了日、美战争的到来。裕仁天皇在已完全意识到该条约会把日本引向同英美作战的道路，甚至考虑到战争的结局可能会战败的情况下，仍把赌注压在了德国身上，积极促成并批准了三国同盟。一直以来就对三国同盟心存忧虑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此前曾主张与蒋介石建立友好关系，反对以美、英为敌，也曾抵制日本同德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但都没能成功。他对天皇感到失望，并开始拒绝履行元老的职责——向天皇推荐首相。就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两个月后，这位元老去世了，他没看到日本遭受的那场被他不幸言中的灾难。

日本在同德国交涉缔约的同时就已开始实施“南进”政策了。为了建立日本南进的军事基地，日本将目标瞄向了法属印度支那（包括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北部。

印度支那是日本南进的必经之路。陆军认为将印度支那北部作为基地，既可向北对中国作战，又是侵入泰国、缅甸、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桥头堡，而且那里还有日本需要的橡胶、锡、钨、无烟煤和大米等丰富的资源。

从 1940 年 8 月 1 日起，松冈外相在东京便同法国驻日大使亨利开始了交涉，在日方的高压下，已向德国投降的法国维希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松冈—亨利协定》，以日本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宗主权为条件，接受了允许日本通过法属印支北部及在该地区驻扎，并为此提供日军所需一切方便的要求。

松冈与亨利的谈判，事先并未奏请天皇，只是在协定签署后才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面要求枢密院予以事后承认。但枢密院以这是对天皇外交大权的蔑视和侵犯为由，对内阁严加指责。首相近卫只好出面赔罪，向天皇道歉说：“实在对不起。”

当时的天皇双眉紧锁地说：“我国不能重蹈腓特烈大王（18 世纪德国君主专制的倡导者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那种霸道行径。不能搞权术，祖先留传下来的八纮一宇精神断不可忘。”尽管如此，裕仁仍以“事出紧急”为由，批准了协定。

虽然《松冈—亨利协定》已经签订，但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为代表的军部好战分子，并不满足于“和平”进驻方式。1940 年

9 月 5 日，富永擅自下令日本的中国华南方面军第 5 师团的一个营侵入了法属印支国境。日本的挑衅行动激怒了法属印支当局，当即宣布停止现地谈判，等待法国政府训令。

在法属印支当局的抗议下，擅自越境的日军虽被迫撤出，但已决意南进的近卫内阁在 9 月 13 日的四相（首、外、陆、海相）会议上，仍以法属印支当局有意拖延为借口，作出了“以 9 月 23 日零时为限，即使谈判不成功，日军也要以‘和平’方式进驻；如遇抵抗，将行使武力以达到目的”的决定，并做好了武装占领的各项军事部署。

向外国派兵是要得到天皇批准的。于是在 9 月 14 日，松冈外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先后将政府的决定上奏天皇。当时，天皇对自己的心腹亲信内大臣木户幸一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除了实行政府的方针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不知木户的意见如何?”

“时至今日，如果推迟实行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政策，英、美的阴谋活动将会越来越厉害，法属印度支那也可能同蒋介石携手，所以请按政府的方案予以批准。”木户回答道。

于是，天皇批准了内阁武力进驻的方案，并由军部向待机出动的日军下达了敕令。

从 9 月 22 日开始，经过三天激战，法属印支军队宣布投降，日军完成了对法属印支北部的武装占领。日军在印支北部的举动，使得日本同美、英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七章　“熟柿”、“涩柿”争论不休　裕仁决意对美开战

“皇纪2600年”庆典

近卫内阁为了配合对外推行的“南进”政策，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日本国内开展了“举国一致”的新体制运动，来进一步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签订三国同盟的第二天即1940年9月28日晚，近卫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大讲在“世界历史的大转变时期”缔结三国同盟的意义，同时呼吁确立适应这种重大时局的“万民翼赞的举国新体制”。声称新体制的目标和文化团体都归依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协同，不分文武、海陆、朝野、上下，亿兆一心，完成翼赞大政（辅佐天皇施政）之臣道。

第一，取缔各种政党，不仅不许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团体存在，而且连各种资产阶级政党也一律解散，改由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右翼领导人联合组成“促进新体制同志大会”。

第二，建立新体制筹备委员会。鼓吹一国一党的法西斯新党运动，提出“一君万民”的国体精神，建立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天皇制体制。

第三，建立大政翼赞会。1940年10月12日，成立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直接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翼赞会设本部、支部。本部总裁由近卫首相亲自兼任，同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很显然，这是一个严密监视人民活动的法西斯组织。

第四，1940年11月，近卫内阁通过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产业报国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通过这一措施，不仅取缔了各种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而且实现了对劳务的统制，保证了战时的劳动力资源。后来，还分别成立了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爱国妇人会等，把法西斯的控制网络延伸到了全国各界。

第五，确立经济新体制。12月8日，近卫内阁制定了《经济新体制纲要》，其基本方针是：“确立以日满华为一环，包括整个大东亚的自给自足的共荣圈。根据圈内的资源，确保国防经济的自主性，在官民合作之下，以重要产业为中心，推行综合计划经济，借以应付紧张的时局，促进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以此谋求充实军备，安定国民生活和持久繁荣国民经济。”

这样，近卫所提倡的新体制运动，便以大政翼赞运动和大政翼赞会的形式建立起来了，新体制的口号风靡全国，其声势甚至被看作贯穿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领域的一种革新运动。近卫新体制的确立，标志着日本已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法西斯化，标志着日本式的天皇制法西斯独裁体制的最终确立。

近卫内阁在推行“新体制”运动的喧嚣声中，还充分利用了当时日本正在举行的“皇纪2600年”庆典活动，向日本国民和法西斯军人灌输“尊崇天皇、尽忠报国”的思想。

按日本神话虚构的神武天皇开国“皇纪”元年（公元前660年）算起，1940年恰好是“皇纪2600年”。正处在内外交困、试图从扩大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的日本统治集团借此机会，要求庆祝日本“悠久的历史”和“世界举世无双的国体”，掀起了一轮宣传国体意识、鼓噪效忠天皇的高潮。

这一次庆典活动时间几乎长达一年，横跨米内、近卫两届内阁。日本政府为此绞尽脑汁，花样翻新，大造声势。

从1940年的第一天开始，当时的米内内阁就拉开了庆典活动的序幕。1月1日，从前一天夜晚就来到橿原神宫[①]等候新年参拜的人们，

---

① 橿原神宫，位于日本奈良县橿原市久米町，建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祭祀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和皇后。

挤满了通向正门的道路。零时整，菟田宫司敲响了神宫内的大鼓，宣告新年的开始，并通过无线电向全国转播。上午9时，全国1亿国民一齐遥拜皇宫，以示庆贺。帝国联合舰队也驶入大阪湾，并发射礼炮，向天皇致敬。

日本政府在橿原神宫内大兴土木，修建了国会馆、八纮寮、橿原文库、野外讲堂、弓道场、大和历史馆、相模道馆，以及面向青少年的“生驹生道场”。当局为祭祀神武天皇的全国199个神社进行了升格。日本广播协会在全国征集了《庆祝皇纪2600年歌》。

2月11日，是一年一度纪念神武天皇即位之日的“纪元节”。这一天，庆祝活动达到高潮。裕仁天皇亲自在宫中举行纪念仪式，包括皇族成员和内阁大臣在内的2000余名文武官员参加了仪式。在纪念仪式上，裕仁天皇向国民发布诏书：

> 朕遵惟神武天皇、惟神之大道，继一系无穷之宝祚，定万世不易之丕基，以经纶天业，历朝相承，上以仁爱之化及下，下以忠厚之俗奉上，君民一体，以逮朕世，兹迎纪元二千六百年。
>
> 今际非常之世局，当斯纪元佳节，尔臣民宜骋思神武天皇之创业，念皇图之宏远、皇谟之雄深，和衷戮力，益发挥国体之精华，以致克服时艰，以昂扬国威，慰祖宗之神灵。

据此，内阁发出告谕，要求全体国民遵从天皇“昭示臣民翼赞之道”的诏令，发扬“臣民辅翼之大义”。日本的贵族院与众议院也不甘落后，分别向天皇上呈了祝贺奏文。

6月10日，裕仁天皇“行幸”宇治山田市，分别参拜丰受大神宫和皇大神宫，日本政府又趁此机会要求全体国民在天皇参拜两宫的上午11时12分和下午1时54分向神宫遥拜。

10月11日，在横滨海面，日本海军举行了迎接陆海军大元帅——裕仁天皇的特别阅舰式。10月21日，陆军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了阅兵式。

11月10日，近卫内阁又在皇宫外苑（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皇纪2600年”庆典。为显示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裕仁特意身着军装出现在5万多名参加者的面前。近卫首相宣读了献给天皇的祝寿词：



在代代木练兵场骑名马“白雪”参加阅兵式的裕仁天皇

天皇陛下聪明圣哲，允文允武，夙绍祖宗之丕绩。宵旰图治，弘文教，整武备，威光所被，昭明之化，遍及天下，亿兆臣民皆浴雨露之惠。方今面临世局之骤变，（我皇）或出六师于异域，或结盟约于友邦，以确立东亚之安定，促进世界之和平。此洵为绝大之盛德，旷古之大业，莫不契合皇祖肇国之宸意与神武天皇创业之宏谟。臣等生享盛世，仰此隆运，不胜感激忭跃之至。①

喜不自禁的裕仁天皇也当场宣读了如下敕语：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8页。

望尔臣民善自体察以往所降宣谕之旨趣，显扬我惟神之道于中外，以期对人类之福利与万邦之协和有所贡献。[1]

11月11日，裕仁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宫外苑举行的有55000人参加的盛大庆祝宴会。近卫内阁动用了60辆卡车，运来了为纪念前方将士的野战食物，有肉干、“战力饼”、“兴亚面包”，还有纪念空军的航空葡萄酒、航空健康酒等。出席者们海吃畅饮，祈祷“皇运”昌盛。全国学生代表3000人合唱了国民庆祝歌曲《皇纪2600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庆祝宴会本来是由裕仁的二弟秩父宫担任总裁的，但由于秩父宫患轻度肺结核而住院疗养，于是改由三弟高松宫宣仁亲王代理朗读祝词。天皇曾向及川海相提过，如果皇太子明仁未成年即位，秩父宫顺理成章应是担任摄政的第一人选。但当秩父宫患病后，天皇随即改变了主意：“秩父宫因患有轻度肺结核，需要静养，我如果有什么万一，我想摄政必须拜托高松宫。因此，最好不要让高松宫（海军中佐）去第一线勤务。”[2] 裕仁的这番话是在发布秩父宫患病消息（1940年6月）的前一年讲的，这表明裕仁还是对秩父宫不放心。实际上，在幼年时，两人的关系就不是很好，豪放刚毅的秩父宫经常让与之性格相反的天皇大为伤心。“二二六”事件中，秩父宫成为叛乱军人拥戴的对象，后来在众人再三说服之下，最后才表示服从天皇。后来天皇也曾说道：“高松宫最好了，现在秩父宫也比以往好多了。”宫内省顺势添油加醋：“皇族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我们也备受感动。”战后的1953年1月，秩父宫去世。在秩父宫患病后将近15年的疗养期间内，天皇没去探望过一次。而且在秩父宫去世后，天皇还对其大加批判。

在庆祝皇纪2600年正热闹的10月30日，教育界的11000人在明治神宫外苑的宪法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教育敕语发布50周年的仪式，天皇下赐了敕语。

1941年1月8日，东条首相为使日军官兵在未来的“大东亚战争”中死心塌地地为天皇卖命，又向全军发布了由他制定的法西斯军人《战阵

---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82页。

②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年，第183页。

训》。《战阵训》在序言中指出了“战阵”之根本：“夫战阵乃根据敕命发挥皇军之精神，功必胜，战必胜，广泛传布皇道，使敌人感受天皇棱威尊严之场所。临战阵者，必期深刻体察皇国之使命，坚守皇军之道义，以宣扬皇国之威德于四海。”同时，还在“本训”中强调“我国体之本义”，指出“皇军军纪之核心，在于对大元帅陛下绝对服从之崇高精神”。①

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下，效忠天皇的思想可以说已深入日本军人和全体国民的心中。“实现陛下宏愿”、“为天皇捐躯”、“安慰圣上的忧虑”等，成了支撑日本法西斯军人四处征伐的精神动力。有人说他们在征战中，“假如有天皇命令，即使只有一支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斗”；在身陷重围面临险境时，会以吟唱天皇的“神圣语录”来鼓舞士气；而当他们战败时，则会以剖腹自杀来向天皇“谢罪”。可见，天皇这个被其亿兆臣民顶礼膜拜的“现人神”，的确以其无上的权威，造就了一支极端好战、嗜血成性、冥顽不化的法西斯军队。

“熟柿”、“涩柿”之争

由于日本在中国越陷越深，天皇也因此大为焦急。1941年1月，天皇问杉山参谋总长：“关于解决日中战争，除了你过去的对华作战计划外，是否还有别的好办法?”见参谋总长毫无对策，天皇大为不满，面无悦色。当参谋总长向他敬礼时，天皇也置之不理。

随着法西斯德国突然于1941年6月22日大规模发动对苏进攻，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南进”、“北进”的争论再度出现。6月22日下午4时，闻知德、苏开战的松冈洋右异常兴奋。他的想法是：乘苏联远东地区兵力空虚之际，配合德国夹击苏联，如果美国参战，则立即同美、英开战，一举制胜美、英、苏三国。他迅速给宫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打了一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一小时后，松冈入宫拜谒了天皇，请求裕仁立即批准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

听了松冈的上奏，裕仁甚感惶恐吃惊，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将朝两个方向作战，因而指示松冈找近卫首相商量。

---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82~383页。

松冈外相的主张立即遭到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他们把松冈在苏德战争胜负未分之际出兵远东的“先北后南”的主张，称作“涩柿主义”。他们虽然反对松冈的主张，却并不反对北进，而是主张先南后北。即利用苏联忙于对德作战，北方已无威胁之机，趁势南进夺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待德军完全摧毁苏军后，再进攻苏联，轻取西伯利亚。他们把这种“先南后北”的理论称作“熟柿主义”，东条陆相自鸣得意地说：“当苏联像熟柿子似的要落到地上的时候，再加以进攻，那会大大地发挥日本的威力。”

围绕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从4月25日到7月1日，大本营和内阁先后举行了6次联席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先南后北”的“熟柿主义”论占据了上风。

7月2日，裕仁天皇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略方针。会上最终通过了《适合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指针，加快向南扩张的步伐，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达此目的，不辞对英、美一战。对北方，决定暂不撕毁1941年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暂不介入德、苏战争，但要“秘密进行对苏武装的准备”，“如德苏战争向有利于帝国方面发展，就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以确保北面之安定”。这就是说，御前会议最终决定了先南后北、向南北两面扩张的方针。

据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的《杉山备忘录》记载，亲临会议的裕仁天皇对会议通过的方针，表现出“非常满意的样子”，对《纲要》进行了批准。

御前会议后，日军统帅部在积极策划武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实施南进战略的同时，迅速向中国东北增调了大批兵力，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苏备战活动。为隐蔽其战略企图，日军统帅部把这次陆军空前的调动和集中称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关特演”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批准。7月7日和7月16日，日军统帅部两次下达动员令，从国内先后动员了40多万兵力和大批军用物资，紧急运送到“满洲”和朝鲜。到7月底，关东军在当地已拥有16个师团，总兵力约达70万人，马匹约40万，飞机约600架。一时间，中苏边境上空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但到7月中旬后，德军的锐利攻势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被迫停顿，德、苏战场已呈胶着状态。而且苏联并没有像日本所预料的那样将大量兵力西调（实际上只有4个师团西调）。由于苏联已经注意到了日本兵力的调动，

在日本举行“关特演”期间，苏联也明显加强了对关东军的戒备，调遣了大量兵力，其结果是实力仍远在关东军之上，日本对苏作战已属无望。

日本为夺取南进桥头堡，将侵略目标又对准了法属印支南部。美国得此消息后，意识到将对自己的太平洋属地菲律宾构成直接威胁。罗斯福于7月24日暗示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美国将禁止对日输出石油，同时劝告日本停止进驻，并提出使法属印支南部中立化的提案。

即便如此，日本仍执意要强行进驻法属印支南部。罗斯福遂于7月26日宣布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产，英国和荷印当局也如法炮制。英国并于同日通告废除《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印通商条约》和《日本缅甸通商条约》。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7月28日，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南部后，荷兰又公布停止《日荷石油协定》，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于8月1日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

这一切经济制裁，对资源匮乏、严重依赖美、英资源的日本来说可以说是当头一棒，使其正在进行的战争活动面临瘫痪的危险。从此以后，日本在日元集团以外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断绝，在国防上已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形势。

面对上述形势，裕仁天皇深感不安。7月31日，当参谋总长杉山元进宫拜谒时，天皇表示，“关特演给各国带来了不良影响。”并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苏联远东军的西调不是越来越少吗？这样一来日本就难办了。关东军的动员是否也停止为好呢？”①

7月16日，近卫内阁以总辞职的方式，将主张先北后南、对苏强硬的松冈洋右逐出内阁，并于18日成立了第三届近卫内阁，同时让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由商工相调任外相，与海军大将、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一起，准备好了对美谈判的阵容。

早在1941年1月30日，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近卫内阁就通过了向法属印度支那索取南部军事基地的方案。2月1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两总长将该方案上奏天皇，得到了天皇的批准。在批准后，裕仁自我标榜地对内大臣木户说：“就我个人来说，并不喜欢乘人之危提出要求，不做这种趁火打劫的事，可是，为了适应当今世界局势的变化，图得‘宋

① ［日］岛田俊彦：《日本关东军覆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5～116页。

襄之仁'[①] 也没有多大意思。惟望慎重行事。" 可见，裕仁天皇在支持"南进"战略的同时，担心进驻印度支那南部会导致美国对日战争的爆发，因此强调要"慎重行事"。

6月25日，当首相及陆海军两总长再次上奏并提出武力进驻印支南部的方案时，裕仁表示："虽然担心因此而违背国际信义，但事已如此，只好不去管它！" 说话时语尾提得很高。

尽管如此，天皇仍然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裕仁在准许日军进驻印支南部后，曾对自己的叔父东久迩宫说道："国际关系已对日本极为不利。" 当时，东久迩答道："陛下是大元帅，统帅陆海军。所以我想，陛下认为不能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就可以不批准。"[②]

7月初，裕仁天皇又特意召见了参谋总长杉山元和陆相东条。杉山向天皇保证："由于现在德国的战势有利，美国不会开战。" 东条也随后强调"军队是按照天皇的命令而行动" 的，青年军官的盲动必定能够控制。在得到了两人关于日、美战争可以避免的保证后，天皇这才放下心来。因此，天皇并没有听从东久迩的忠告，也没有撤回准许进驻的命令。

德国控制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已无力顾及其殖民地的利益，29日，法国维希政府又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共同防卫" 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法协定书》。至此，整个法属印度支那已完全被日军控制。

对裕仁批准进驻印支南部的这一举动，法国维希政府首脑表示出了鄙视的态度。当日军开始在印支南部登陆时，维希政府的副总理达鲁兰曾对日本驻法泽田大使说道："日本想乘法国之危采取行动，令人遗憾！" 总统贝当元帅也说："前些年，天皇陛下来欧洲访问时，我有幸陪他在法国参观，后来听说他还常常谈到我。可是，就是这位陛下的政府，竟在法国危难之时提出无理要求，真是难以想象！"

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促使美国最后下定了同日本作战的决心。美、英、荷三国同时采取了等于与日本经济断交的措施。日本军方惊呼："与其坐待石油枯竭，不如先发制人。" 发出了对美开战的叫嚣。7月31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在晋谒天皇时，陈述了军方的意见，他

---

① 宋襄之仁：中国春秋时代，宋楚争霸战于泓水，宋襄公出于"仁义"，不愿趁楚兵渡河时出击，而待到楚兵过河布好阵势再战。结果宋军大败，自己也因身负重伤而亡。

② ［日］东久迩：《一位皇族的战争日记》，转见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61页。

说道："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现在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将消耗罄尽。与其这样，莫如马上动手，除此别无他途。"[①] 天皇随即问道："能绝对取胜吗？""很难说绝对取胜，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永野重复道。天皇当即表示："这不是一场绝望的战争吗？实在危险！"同时命令木户和近卫针对海军的想法制定对策。

9月3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皇宫隔壁的宫内省召开，时间长达7小时之久。会上，永野再次强调道："再过些时候，日本会越来越软弱，以至于难以支撑下去……我确信，现在有战胜的机会。我们惟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随后提出建议："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出击，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一场大规模的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和谈烟幕下的战争准备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美对立日益尖锐。1940年11月，美国天主教神甫沃尔希和德劳特来到日本，会见近卫的朋友、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就调整日、美邦交问题交换了意见，由此揭开了日、美谈判的序幕。

1941年3月，由两位神甫和井川忠雄以及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岩畔豪雄等人制定了所谓的《日美谅解方案》，并进入官方的正式谈判。该方案以美国承认伪满洲国、蒋汪政权合并、美国协助日本获得资源等条件，换取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活动将不诉诸武力而是用和平手段"的保证，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远东慕尼黑协定。

由于双方都不想全盘接受《日美谅解方案》，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后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到1941年7月底，谈判因日本侵入印支南部而一度中断。

从9月开始，日、美会谈重新启动。鉴于日、美之战无可避免的形势，日本在谈判的同时加紧了备战活动。8月9日，大本营陆军部通过了无论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70页。

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专心致力于南方的方针。为此，制定了《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其要点如下：（1）以驻满、朝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2）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3）对南方以11月末为限，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①

8月16日，日本陆海军召开两军务局长和作战部长会议，研究了海军提出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简称《纲要》），讨论并确定了准备开战的日期。9月2日，陆海军取得了一致意见，在9月3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纲要》，主要内容有：（1）帝国为了存在和自卫，决心不惜对美（英、荷）进行战争，大体上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2）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英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贯彻帝国要求；（3）通过前项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还不能达到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定对美（英、荷）宣战。

9月5日，正好是预定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纲要》的前一天。近卫首相入宫，将《纲要》呈递天皇裁决。天皇看后质问道："看后，我的感觉是：第一是战争准备，第二是主张进行外交交涉，是以战争为主，以外交为辅，是吗？"同时又强调道，"不是外交与战争准备并举，而是外交先行！"裕仁对《纲要》中以战争准备为主、外交谈判为辅的方针之所以大为不安，是因为他对与美开战能否取胜心中没底，仍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缓解日美矛盾。他对近卫表示，在明天的御前会议上准备亲自提出问题。近卫连忙讲道，对统帅部来说，在有其他国务大臣在场的情况下，对天皇的提问恐怕不便回答，不如现在就把陆海军两总长单独找来问一问为好。随即，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被召进宫中，接受天皇的垂询。

见面以后，天皇首先听取了杉山总长关于对南方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作战计划，并询问了陆海军训练、登陆演习、登陆作战的难易、船只的损失、天气情况以及胜败的归宿等问题。然后话锋一转，对两总长说道："要尽量通过外交途径加以和平解决，不要外交和战争准备平行，要使外交先行。"

两总长回答说："原来的主导思想就是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来打开局面，战争准备是为了应付外交途径无法打开局面时采取的。"

---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2页。

近卫首相也附和道：“一定要用尽一切和平外交手段，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够诉诸武力。在这方面，我和两位总长的意见是一致的。”

天皇接着问道：“若是日美开战，陆军方面有没有确实的把握？多长时间可以解决？”

“仅就南洋方面而言，3个月左右可以解决。”杉山回禀道。

“你是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时的陆相，我记得你那时就说过，事变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但四年后的今天，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天皇对杉山的信口开河显然十分不满。

惶恐不安的杉山嗫嚅地解释说：“因为中国疆土辽阔，无法按预定的计划作战。”

“如果说中国疆土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有什么把握说3个月可以解决？”天皇显然提高了嗓门。

杉山硬着头皮继续解释：“日本的国力正在日益下降，所以现在必须排除困难以‘扭转国运’。”

天皇再次追问：“能够绝对打胜吗？”

“还不能说绝对，不过可以说有取胜的可能性，很难说必胜。作为日本来说，即使得到半年或一年的和平，接着困难再来也是受不了的，应当谋求20年、50年的和平。”杉山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好了！知道啦！”裕仁打断了杉山的解释，声音大得令人吃惊。

这时，站在一旁的永野见杉山被天皇追问得狼狈不堪，赶紧站出来解围。他巧妙地给天皇讲述了日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阪冬阵”的故事，试图说服天皇不应为了眼前的和平而与美国妥协。

1614年冬，德川家康率20万大军进攻丰臣秀赖，并包围了大阪城。但由于丰臣秀赖防守严密，加之城高壕深，一时难以攻下，于是德川家康以秀赖填平大阪城内壕为条件搞了一个假议和。这就是所谓的“大阪冬阵”。丰臣秀赖中计与之媾和，赢得了暂时的和平。但第二年夏天，作了充分准备的德川家康撕毁和议，发起突然进攻，一举攻下大阪城，丰臣氏一族悉数被消灭。显然，永野对历史的回顾，比起杉山的极力辩解更具说服力。天皇不置一词、全神贯注地听着。杉山在后来追记这次垂询时写到：天皇听得仿佛很感兴趣。

9月6日上午10时，天皇召集御前会议，最后审议《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在会议前，天皇将木户内大臣召来，对他说：“今天朕想亲自发言，

你看如何?”

按照惯例，在御前会议上天皇是不发言的，只是旁听出席会议的人相互质疑和回答。可是，现在天皇担心在陆海两大臣和两总长的主导下，轻易作出事关国家兴亡的开战决定。

木户回禀道：“已经安排好由枢密院议长就陛下所担心的问题提出质询。陛下已经指出这次的决定将招来一场置国家命运于一掷的战争，后果十分严重。为此，统帅部应全力协助，使外交工作获得成功。这番话将对会议起约束作用，请放心。”

御前会议由近卫首相支持，他首先概括说明了目前日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美、英、荷等国正以一切手段对付帝国。随着德苏战争的长期化，还存在着美、苏结成对日联合战线的趋势”。为此，一方面要“做好各种准备，以应付任何事态的发生”，“同时仍必须尽一切外交手段，努力预防战祸于未然”。“如在一定期间内不能奏效”，则采取“最后手段”。随后，近卫希望与会者就《纲要》充分发表意见。

永野、杉山、丰田分别发言，明确表示对外交谈判已不抱希望，日本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接着，企划院总裁铃木就《纲要》作了说明，并请与会者予以通过。

这时，枢密院议长原嘉道站起来，秉承天皇旨意，手持《纲要》质询道：“通览整个议案，觉得似乎是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不过，战争准备应该是应付外交失败时采用的，现在要始终凭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外交上办不到时再进行战争。这样理解这个议案怎样?”

对原议长的质询，已知天皇心思的海相及川代表政府回答说：“第一项的战争准备与第二项的外交工作并无轻重之分，而第三项的开战决心还需要在最高会议上奏请天皇批准。”

按理说不应由担任军事行政的海相来回答，而应由担任作战指挥的总长说明才对。但是代表统帅部的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由于昨日进宫挨过天皇的训斥，害怕承担责任而“默不做声”，根本没有回答质询的意思。

天皇对此十分不满，脸色通红，已是忍无可忍。他用戴着手套的大拇指不断擦拭蒙雾的眼镜，两眼狠盯着两总长，大声说道：“原议长的质问，问得好。可是，两总长居然一声不答，是何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天皇意外发言，以往从未有过，语气又如此严峻，气氛陡然变得紧张

起来。这时，天皇把右手从容地伸进上衣的内兜，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字条，开始高声朗诵明治天皇在日、俄开战前夕所写的一首短诗：

四海皆兄弟，何事起风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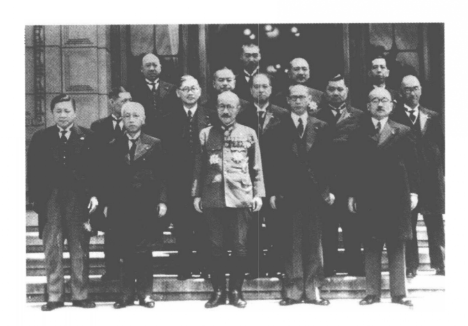
“这是我经常爱读的明治天皇的诗，朕定下规矩，要不时朗诵这首诗，以提醒朕牢记明治天皇对和平的热爱。你们对此有何体会？”天皇就此结束了发言。

与会者像遭到电击一般，许久没有出声。永野和杉山终于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回禀说：“当以外交谈判为主，迫不得已时才采取战争手段。”话虽这样说，但对《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并没有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动，便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

裕仁决定对美开战

自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后，近卫按照天皇的意图，主张力争通过谈判解决日美争端，并提出由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日美首脑会议的建议。但是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的激烈反对。10月15日，东条告诉内大臣木户，如果近卫不下决心对美开战，那么“政变是不可避免的，继任首相的最适合人选是东久迩宫”，明确表示了陆军方面希望推翻近卫内阁的意见。次日，对美谈判毫无进展的第三届近卫内阁，在以陆相东条英机为首的强硬开战派的重压下，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内称：“现在已经到了准备对美开战的时期。可是，我本人认为尽可能地要使对美谈判成功，以解决支那事变为当前的紧要大事。我认为，目前正是欲伸先屈之际，所以我诚心诚意要说服东条陆相。然而陆相一直主张不要错过时机，要我同意立即开战。同他商谈4次，终不能使意见一致。因此，我请求辞职。”

近卫内阁的总辞职，客观上把是战是和这一战略抉择推到了裕仁天皇的面前。近卫是对美谈判最合适的人选，因此，若同意近卫辞职，也就意味着否定了谈判。主张开战的陆海军首脑与主张和谈的元老重臣们都希望天皇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但出乎重臣们的意料的是，裕仁天皇不但



东条内阁

批准了近卫内阁的总辞职，而且在内大臣木户的建议下，把组阁的敕令下达给了强硬主张对美开战的东条英机。天皇选择了东条，实际上也就表明他选择了战争。

从表面上看，令东条组阁是在内大臣木户的建议下进行的，但实际上是因为自9月6日御前会议后，裕仁本身也已站到了主战派一边。正如近卫首相后来所追述的那样："反对开战的陛下，因为受到陆海军人们夜以继日地灌输说战争不要紧、没错，便一点一点地转向那方面去了。"下列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9月9日，参谋总长杉山向天皇上奏南方作战设想时，天皇问道："进攻南方时，如有来自北方的重大压力怎么办?"杉山答道："既然开始了在南方的作战，就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勇往直前，望天皇垂鉴。一旦北方有事，就从中国战场调用兵力，不能中途停止对南方作战。"天皇听了以后说："如果这样，那我就放心了。"

9月10日，杉山总长请求批准对南方作战的动员方案时，天皇痛快地答应说："进行动员吧!"9月29日，天皇为了了解美国作战的持久力，让企划院总裁铃木中将（东条派）报告了"美国橡胶和锡"的有关情况，因为这两种产品美国完全依赖进口。

由于日本进行的对美谈判毫无进展，美国方面拒绝接受日本的要求，坚持以“赫尔四原则”（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机会均等，维持太平洋现状）为基础先举行预备会谈。

为此，10月13日，天皇同内大臣木户进行了长达1小时10分钟的谈话。天皇对木户谈道：“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日美谈判成功的希望似乎是越来越小了，一旦战争打起来，这次需要发表宣战诏书。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一下过去的诏书，在退出国际联盟时，也特别讲到了要文武恪守其职和世界和平，我总觉得国民对这一点好像并没有重视。又如，在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时发布的诏书中，没有强调和平这一目的，使国民认为完全是为了对抗英美的，我觉得这就很不妥当。所以这次草拟宣战诏书时，我希望近卫文麿（首相）和木户幸一务必参加，好好地说明我的心情，把它充实进去。”另外，天皇还谈到了外交策略的问题：“在决定对美、英开战之际，还要进一步看准欧洲的形势，特别是英德、德苏和平论调的前景，还必须进行外交谈判，阻止德国单独媾和，使之协助日本对美战争。而且必须一开始就充分考虑好战争结束时的手段，为此，要和罗马教皇交换使节，奉行建立友好关系的方针政策。”

从裕仁的上述谈话可以看出，正是在意识到对美谈判已属无望的情况下，裕仁才决定起用东条，为进行对美作战作准备，也就是说，此时裕仁已下定了同美、英开战的决心。

另据长期在近卫身边工作，并深得近卫信任的富田健治披露，近卫首相在决定辞职前曾想更换东条，起用反对主战论的真崎甚三郎大将或小田敏中将为陆相，以压制陆军的主战论。但是由于内大臣木户信任东条，讨厌小田和真崎，再加之天皇也不信任皇道派，故近卫此举未能成功。

近卫辞职后，曾对富田健治说过这样一番话：“自己作为总理大臣，向陛下讲述目前开战如何不利时，他表示赞成我的意见；可是第二天一见到他时，他又说：‘昨天你说开战是那么不利，我看不必那样担心吧！’他已向主战的方面靠近了一些；再下一次，则更向主战方面靠近一些。总之，我感到天皇似乎是听信了陆、海军统帅们的意见，认为军队的事总理大臣不懂，我们这些人清楚。这样，对军队没有任何统帅权的总理大臣，惟一靠山就是天皇了。既然天皇都这样想，那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坚持

了。”[1] 近卫的上述表白，道出了他决定辞职的主要原因。

近卫内阁辞职后，东条曾积极鼓动成立东久迩内阁，希望借皇族威望争取海军的合作。但东久迩宫拒绝组阁，木户也坚决反对。木户的理由是，日美战争万一得不到预期的结果，皇室就有可能成为国民的怨府。对此，天皇也有同感，明确表示：“让皇族来支撑政局，必须慎重考虑。和平时期尚可，而当有发生战争之时，为皇室着想，就更不应该让皇族出头露面。”[2]

10月17日下午，木户根据天皇的旨意，召集重臣讨论继任首相人选问题。木户极力推荐东条继任首相，理由是“东条虽然是主战派，但他掌握陆军，也希望同海军合作，也许他能避免开战”。也就是说，为了防止战争而把主战派的东条推荐为首相，这完全是自相矛盾。因此，木户的主张一出，立即遭到了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阿部信行、清浦奎吾等人的强烈反对。冈田愤怒地驳斥道：“应把这次内阁更迭看作军人倒阁，而现在却授命倒阁的陆军大臣组阁，这是怎么回事?”但木户仍固执己见，并蒙骗说：“如有天皇的敕语，东条就会服从。”一听木户这样说，重臣们最终服从了木户的意见。据说，开战后重臣们曾表示“被木户骗了”。

另据说，木户之所以力挺东条出任下任首相，是由于受到东条的门徒、宪兵队将领加藤泊治郎少将的压力。10月12日，也就是近卫内阁总辞职的前四天，加藤曾威胁木户：“不让东条当首相就无法控制陆军。”后来，木户曾对企划院总裁铃木说“将爆发内乱”，反对铃木关于日、美妥协的主张。此外，木户还在向田中隆吉少将说明推荐东条的理由时也谈到“陆军将发动内乱”。这大概是因为他感到如果发生内乱，作为内大臣是有生命危险的。[3]

裕仁天皇对木户在这次内阁更迭中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感慨地说：“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东久迩宫也对这一结果感到吃惊。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东条是日美开战论者，陛下和木户都清楚这一点。可木户却推荐主战派继任内阁首相，天皇又采取了木户的意见，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4]

---

①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2页。
② ［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2页。
③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
④ ［日］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1941年10月17日下午4时35分，东条英机奉召进宫，接受了组阁大命。天皇当面叮嘱东条："当恪守宪法规定……陆海军尤应紧密合作。"

接着，天皇又召见及川海相，面谕及川"要同陆军配合"。

随后，东条、及川又在休息室接受了内大臣传达的天皇旨意："现在，我推测陛下指示陆、海军要合作。我奉命传达上意：在决定国家根本政策时，不要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还要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国内外形势，加以慎重考虑。"① 这就是所谓的"白纸还原的谕旨"。也就是说授权新内阁另起炉灶，不受前内阁既定政策的约束。

10月18日，东条内阁的新班底组建，海相岛田繁太郎大将、外相兼拓务大臣东乡茂德、藏相贺屋兴宣、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内阁书记长官星野直树等。为加强极权统治，东条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陆相、内相两个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同时，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东条英机还被破例由陆军中将晋升为大将，并奉天皇特旨留于现役。现役军人担任首相在以往是没有先例的。

东条上台后，立即重新确定对美开战的"新国策"。从10月23日起，连续召开了9天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重点就对美开战的时机与步骤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直到11月2日1时半，最终形成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其主要内容是：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为做好开战的充分准备，将开战时间推迟到12月初；将继续对美谈判的时间截止到12月1日午夜零时。

11月2日下午5时，东条首相和陆、海军两总长一同进宫，向天皇上奏了联席会议的讨论经过以及作出的决定。裕仁天皇向东条问道："怎样才能不至于师出无名呢?"显然，此时的天皇已对同美、英、荷开战不再心存顾虑，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为发动这场战争编造一个像样的借口罢了。东条当即答道："目前正在研究，很快就上奏陛下。"

11月3日，陆海军两总长再次进宫，向裕仁天皇详细上奏了陆海军制订的将于12月8日袭击珍珠港、马来半岛等地的作战计划。裕仁在认真听取并详细询问了有关作战的准备情况后，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此外，还

---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页。

提示两总长："对泰国的外交谈判[1]，如从大义名分来说，还是早进行为好，但从军事奇袭来看，则以推迟为好，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杉山回答道："正如陛下所说将予妥善处理。"[2]

11月4日，根据东条首相的安排，在天皇亲临之下，又召开了陆海军联合军事参议官会议，审议了陆海军制定的《国防用兵方案》。11月5日，裕仁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天皇也立即予以批准。至此，日本终于迈上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

一般认为，开战是由这次会议决定的。然而，早在11月1日天皇的作战命令就已经发出，联合舰队陆续向千岛的单冠湾集结。因此，这次会议只是一种形式以便让政府同意罢了。从9月15日至11月1日，天皇和军部首脑下达了对珍珠港、马来亚、爪哇、菲律宾和香港等地的作战命令，并决定在11月10日开始行动。

御前会议后，日本陆海军统帅部经天皇批准，并以天皇的名义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作战命令。11月5日，向各舰队发出了第2号作战命令。11月6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南方军和南海支队下达了战斗序列令，天皇亲自任命了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及所属各军司令官。同一天，又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发布了准备攻占香港的命令。11月7日，大本营海军部向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发布了及时进入待机作战海域的命令："机动部队向单冠湾集结，并停泊到11月22日。"到11月22日，由南云忠一率领的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已奉命在千岛群岛的单冠湾集结完毕，负责袭击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军基地。

---

① 《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规定，要通过谈判强制泰国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以作为向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实施进攻的基地。

②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5页。

第八章　裕仁由喜转忧　战争败局已定

偷袭珍珠港

1941年11月26日，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的裕仁天皇与木户商量说："已经是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告诉东条，我想再听取一次重臣们的意见。你看如何?"29日上午9时30分到下午4时，木户根据天皇的旨意，在宫中召集若槻、冈田、广田、林、近卫、平沼、阿部、米内8位前首相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了"恳谈会"。在充分研究了目前外交、军事方面的所有情况后，开始征求重臣们对开战的意见。在约1小时的时间内，重臣们各抒己见，但没有一人明确表示赞成开战。其中，有5位重臣担心日本的国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主张"维持现状"；有2位重臣表示尊重政府意见，比较同意开战，1人保持中立。对主张维持现状的重臣们的意见，东条首相一一加以反驳，最后重臣们只好对政府的开战决心表示谅解。天皇和木户都默不做声。会议就此收场。

11月30日上午，在海军任职的天皇的三弟高松宫入宫时说："海军至今仍想避免战争。"天皇听后颇为不安。当天下午，天皇将岛田海相和永野总长召至宫中，询问海军的真实想法。当两人表示对战争有胜利的信心后，裕仁又立即命令木户内大臣："我问过他们两人，都说有相当把握，那就按原定计划通知首相吧!"随后，裕仁随后召见了杉山，详细询问了日本在南方的作战计划，甚至提到了何时攻占"在中国的租界"，南方的天气是否有利于作战等细枝末节。裕仁随后召见海相岛田、军令总长永田，了解"海军哪一天作战"，海军与美作战是否有胜利信心等。

12月1日下午，召开了开战前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对美、英、荷开战的决议。据“杉山备忘录”记载，在当天的会议上，“陛下对于说明……表示同意，没有任何不安的表情，神采奕奕。”内大臣木户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两点，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天皇决定对美开战。”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却记录了日本现代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历史时刻。

御前会议后，陆、海军两总长又向天皇上奏了向南方军下达命令的草案。天皇勉励两总长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不得已的事。希望陆海军和衷共济好好干。”后据杉山回忆说，当时“陛下神色极为爽朗”。

12月2日，天皇密令陆海军：“12月8日开战。”4日，进攻马来亚的日军开始从海南岛出发。为了掩护偷袭，日本决定不中断谈判，也不对美国发出最后通牒和宣战书，而是等到发动进攻前半小时再向美国递交一份宣布谈判破裂的通牒。

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是由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精心策划的。山本认为，日本一旦实行“南进”，以珍珠港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定会出击牵制，从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也将会给日本本土造成极大的空中威胁。因此，他主张在开战之初就必须先发制人，突袭珍珠港，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夺取西南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其实，早在1941年1月7日，山本就向海军大臣及川正式提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建议。6月，大本营着手拟订具体进攻计划，9月份进行了海上演习。11月1日，天皇下达作战命令第1号：“大日本帝国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宣战，宣战将于X日正式公布，本命令将自Y日起生效。”[①] 11月26日，裕仁天皇向山本发出了大本营第2号令：“26日舰队从单冠湾出发，向待命地点前进。”

按照命令，由“赤城”、“加贺”等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3艘潜水艇及423架舰载飞机组成的特遣舰队，从单冠湾出海，开始了偷袭珍珠港的航程。另有30艘潜水舰早已先行到达夏威夷近海，其中5艘为特殊潜航艇，每艘都搭载有甲板，这5艘特殊潜航艇长约24米，排水量只有44吨，只能乘坐两人，是专门为潜入设有防潜网的珍珠港而特殊制造的。12月2日，坐镇在日本广岛海军基地的山本向

① X日为12月8日，Y日为11月23日。



坐镇战舰“长门号”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

特遣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发出了“攀登新高峰 1208”的密码电报，将开战的时间定为“12 月 8 日”，夏威夷时间为 12 月 7 日。

12 月 4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对美通牒，对美、日谈判无果表示遗憾。

日本预定的开战日——12 月 8 日，夏威夷时间正好是星期天。日军可利用美国太平洋舰队周末返回珍珠港度假比较集中以及有下弦月便于空军飞行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歼灭敌方主力。

东京时间 12 月 7 日夜晚，在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中心的瓦胡岛南岸，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内到处是灯红酒绿，美国官兵正在欢度周末。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料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在南云忠一指挥下，正从北方海面全速向港湾靠近，舰载的 423 架飞机正待命出击，全然不知一场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罗斯福虽然也意识到美、日战争已不可避免，但认为必须让日本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12 月 6 日晚 10 时，罗斯福以个人名义直接给日本裕仁天皇发去一封电报，表示："我之所以在此时此刻亲自致电陛下，是因为热切希望陛下能和我一样，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考虑驱散乌云的办法，我坚信，我们不仅为了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而且也为邻国的人民，都具有神圣职责去恢复传统的友谊和防止世界上再发生死人和遭受破坏。"但这份电报被参谋本部扣压，直至 8 日凌晨才转至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手中。当格鲁收到该电报后，于一个半小时内，立即驱车前往东乡外相的官邸，要求亲自去见裕仁。东乡回答说，要天皇在深夜接见一名外国使节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格鲁想把电报留下的话，他愿意去打扰天皇并送呈电报。于是，格鲁只得把电报交给东乡，返回了大使馆。

12 月 7 日 1 时 30 分，经与内大臣木户联系，东乡外相驱车赶往皇宫谒见天皇。此时，裕仁正坐在御文库中用高功率短波收音机收听着节奏呆板的流行歌曲，静候着前方的佳音。当东乡念完罗斯福的电文后，天皇批准了东乡为拒绝这一电函而事先精心起草的复函。

就在东乡驱车赶往皇宫时，南云率领的 6 艘航空母舰排成两路纵队，在它们的四角有 2 艘高速战列舰和 2 艘重型巡洋舰，最外一圈是 9 艘驱逐舰，在最前面引导整个舰队的是一艘轻型巡洋舰，这支舰队沿着偏离商船航路很远的北纬 45 度以北向东航行。经过 12 天的秘密航行，于 12 月 7 日（日本时间为 8 日）上午 6 时，到达了预定的停泊地点，即瓦胡岛以北约 230 海里处。

预定进攻的时间即将到来，飞行员和水兵们早早起了床，他们把写好的遗书连同指甲屑和剪下的头发一起放进自己的橱柜留给家人，然后围上洁净的腰布，系上"千针带"[1]。早餐是红米饭和鲷鱼，都是节日时才吃的东西。

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战斗机、轰炸机已蓄势待发，轰鸣的飞机引擎划破了黎明的寂静。这时，在南云中将坐镇的旗舰"赤城号"船桅上，一面 Z 字旗缓缓升起，迎着强劲的海风猎猎飘扬。所有在场的人都清楚，当年在日本海大海战中，这样的旗帜同样升起在东乡平八郎大将的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在东乡平八郎"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我军将士务

---

[1] 一种腰带，作为吉祥消灾的护身符。

需奋战”的号令下，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全歼沙俄舰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海战胜利。如今，他们又一次面临“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关键时刻，需要赢得一场同日本海大海战同样辉煌的海战胜利。

东方渐呈鱼肚白色，特遣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命令航空母舰掉转船头逆风行驶，随即命令第一攻击波 183 架飞机对珍珠港进行袭击。

东京时间凌晨 3 时零 5 分左右，夏威夷时间上午 7 时 35 分，也正是东乡外相离开皇宫的时候，由渊田美津雄中佐率领的第一批攻击机群已飞临瓦胡岛上空。他们惊异地发现，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珍珠港内出奇平静，没有丝毫戒备。檀香山电台和往常一样，播放着爵士音乐。大大小小的 96 艘舰艇，静悄悄地停在泊位上，机场上整齐地排列着 300 多架飞机。大部分美国官兵都上岸休息去了，飞行员离开了机场，天上没有飞机警戒，炮手离开了炮位，地面高射炮旁没有人值勤，连雷达站也关机休息了。只有主力舰“内达华”号的水兵乐队正在列队，准备举行升旗仪式。

见此良机，渊田迅即命令机队向各自的目标发起进攻，并迫不及待地发出了三次重复的密码电报：“托拉！托拉！托拉！”（虎！虎！虎！）这便是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有名的信号，意思是“我们奇袭成功！”坐镇在万里之外的广岛“长门号”旗舰上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此刻正坐在作战室内一动不动地闭目养神。当信号传来时，他表现得异常兴奋。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也得到了奇袭成功的消息，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7 分钟后，他打发走了木户，回到寝宫准备安睡几小时，因为白天还有一系列预定的庆祝仪式在等着他。

而此刻的珍珠港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日军的鱼雷轰炸机从四面八方几乎紧贴着海面飞向排列在港中心的 8 艘战列舰，轰炸机呼啸着向下猛扑，炸弹雨点般地倾泻在美舰的甲板上。被炸得晕头转向的美国人这时才如梦方醒，发出了第一份警报：“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随即，基地的美军开始利用一切地面火力拼命抵抗。

半小时后，消耗完弹药的第一批攻击机群陆续撤离了战场，向特遣舰队所在的海域飞去。8 时 55 分，由岛崎重和少佐率领的第二批 167 架飞机接踵而至，对港口、机场实施第二轮轰炸，直到 9 时 45 分才全部撤离战场，狂轰滥炸前后持续了 1 小时 55 分钟。珍珠港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日本偷袭珍珠港，首战告捷，战果辉煌。美军的 8 艘战列舰中有 5 艘被击沉，3 艘受重创；另有巡洋舰、驱逐舰等各类辅助舰艇 10 余艘被炸沉

或炸伤；230余架飞机变成了一堆废铁；死伤官兵4500余名。由于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当时并未停在珍珠港，而是停泊在外海，因此免遭轰炸。加之当时浓烟大火弥漫珍珠港上空，美军基地的油库、修理厂和造船厂等一些重要设施也未遭轰炸，而且因港内水浅，被炸的战舰没有沉入海底，经修理加固，几个月后又重新归队。这些对美军恢复元气还算有利，为日后的战略反攻保存了基本力量。而日军仅损失了29架飞机和5艘小型潜航艇，死亡人数不过百名，唯有潜航艇乘务组的酒卷少将因潜航艇搁浅昏迷不醒，从而成为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的第一名俘虏。

日军飞机对珍珠港的袭击开始后1小时零10分钟，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叩响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办公室的大门，向赫尔递交了断绝日美关系的照会，比日本政府预定递交的时间迟了80分钟，成了“事后通牒”。赫尔看完后气愤地说：“在我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充满无耻的虚伪和歪曲的文件。我至今做梦也想不出，在这个星球上竟有撒出这等弥天大谎和牵强附会的国家！”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帝国主义用谈判烟幕掩盖战争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出奇制胜的一个典型事例。经过这次偷袭，能够在太平洋上对日本海军构成重大威胁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重创，日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南洋进军了。

美国尽管早已料到美、日战争不可避免，并估计到日本可能进攻泰国、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菲律宾，但唯独把珍珠港排除在外。他们盲目自信，甚至把驻日使馆提供的关于日军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也轻率地斥为“虚构”。这个战略上的错误判断和珍珠港驻军的麻痹大意，疏于防务，使美国吃了大亏。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罗斯福有意安排的，因为美军的主力舰只当时没有停泊在珍珠港。这也是一种说法，只能留给史学家和军事学家们去研究了。

发表宣战诏书

12月8日，东京的天气分外晴朗。清晨7时整，著名播音员宫野男守在东京广播电台正式播出了日本南进的“紧急新闻”：“现在广播紧急消息，消息如下，大本营陆海军部于12月8日上午6时宣布：帝国陆海军于

今日拂晓在西太平洋同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听到这一惊雷般的消息，所有行人都不由得驻足不前，脸上表现出复杂的表情。广播里继续传来宫野的声音：“重大消息将不断传来，请不要关上开关，就地等待。”随后，广播里不断播送《军舰进行曲》，阵阵军乐声、报童的叫卖声，一下把人们与战争拉近了许多，人们纷纷朝着皇宫前的二重桥走去，他们要到那里为日本的胜利进行祈祷。

首战告捷，令天皇顿感轻松。上午起床后，他亲自在宣战诏书上盖上了御玺。11 时 40 分，东京广播电台正式播出了天皇的宣战诏书：

仰承天佑、承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尔等忠勇之众庶曰：

朕兹对美英两国宣战，朕之陆海将士宜奋起全力从事交战，朕之百官有司宜克勤职守，朕之众庶宜各尽本分，务期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达到征战之目的，使无遗算。

夫确保东亚安定以利世界之和平，实为丕显列祖列宗作述之宏猷，朕所拳拳无时或忘者也。而与各国敦笃邦交，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亦帝国一贯之外交方针也。

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开启衅端、洵非得已者，岂朕之志哉？曩者，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之和平，卒使帝国操执而起，于兹已四年有余矣。幸有国民政府有所更新，帝国与之结善邻之谊，互相提携。然重庆残存政权，恃美英之庇荫，兄弟阋墙，罔知悔改。美英两国支援残存之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逞称霸东洋之野心，并进而勾结与国，于帝国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战，更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挠，终于断绝经济关系，对帝国生存予以重大威胁。朕饬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恢复事态，隐忍弥久，而彼方毫无退让之精神，徒迁延时局之解决，近则反愈益增大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以图使我屈从。长此以往，帝国多年来争取东亚安定之努力，悉将化为泡影，帝国之存立亦将濒于危殆。事既如此，帝国今为生存与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

皇祖皇宗神灵在上，朕深信尔等众庶之忠勇，必将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

光荣。[①]

在这篇诏书中，裕仁天皇对其中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慎重考虑和反复斟酌，诏书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裕仁天皇对待这场侵略战争的真实态度。另外，这一诏书同以往明治和大正天皇所发布的一切对外宣战诏书有所不同，只字未用“国际法”之类的用词。因为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都决心要践踏国际公法，并在宣战前就偷袭对方，故而不愿把这样的约束条文写进诏书。

宣战诏书所起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宣战本身。因为这一诏书以天皇的神化权威，使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合法化”了，而且还为这场战争披上了一层“圣战”的迷人外衣，进一步驱使国民无条件地投入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去。

正因为天皇的宣战诏书具有这种难以估量的政治影响力，所以诏书播完后，东条首相接着便以《恭奉大诏》为题，向全体国民发表广播演说，陈述了“仰赖皇威胜利常存”的信念，要求一亿国民奋起战斗。东条内阁还当即决定将每月的8日定为“大诏恭奉日”。每到这一天，日本国民都要肃穆站立，聆听诏书，加深印象，以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诏书的要求，为战争作出牺牲。这一活动持续了4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

下午2时，裕仁天皇又在宫中召见陆海军大臣，向陆海军人颁赐敕语，以示嘉许。偷袭珍珠港后的第3天（10日），意犹未尽的裕仁天皇又特向山本五十六颁发敕语，表彰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丰功伟绩”：

联合舰队，开战伊始，善谋能战，大破夏威夷方面敌人之舰队与航空兵力，建树丰功，朕甚为嘉许，望将士再接再厉，以期今后之大胜。[②]

这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天皇颁发的第一个敕语。此后，随着日军战果的不断扩大，每当捷报传来时，裕仁都会发布类似的敕语，激励前方士兵为侵略战争卖命，煽动国民和军队的战争狂热，这成了裕仁的一项

① 诏书全文详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原书房，1971年，第377～378页。
②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3页。

经常性工作。

颁发敕语后，裕仁天皇下令在皇宫接见偷袭珍珠港的有功人员。特遣部队司令官南云中将带着第一、第二攻击机群和指挥官渊田美津雄和岛崎重和来到东京觐见天皇。对这些行伍出身的军人来说，能觐见天皇这个活在人世的“神”，所需要的勇气不亚于参加一次袭击战斗。好在宫内省事先已把天皇要问的事项列成了单子，他们在事先已把应答的话一句一句地背了下来。

见面之后，一开始还比较顺利，天皇按照预定的问题提问，军官们凭着记忆回答。可是到天皇随口提问时，军官们便慌了神。渊田和岛崎紧张得浑身冒汗，南云在不知不觉中冒出了家乡会津的方言，在谈到美军将领时，张口闭口“这家伙、那家伙”地说着土话。对军官们有失恭敬的谈吐，正在兴头的裕仁天皇倒也并不介意，仍然问这问那，使原定15分钟的觐见时间延长了半小时。

12月26日，裕仁天皇特意在宫中设下盛宴，款待从前线凯旋的山本大将。席间，作陪的大臣们觥筹交错，庆祝胜利。山本则与天皇饮酒谈天，但他只谈风月，不提袭击珍珠港之事。当若槻礼次郎向天皇介绍，说“山本极擅长赌博”时，天皇开怀地笑了。显然，他更赞赏的是山本刚刚进行的这场军事大赌博。首战告捷，使裕仁天皇一反开战之前的谨慎态度，而显得欣喜若狂。

就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陆海空军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分兵进犯东南亚各国和西南太平洋岛屿。8日，日本侵入泰国、香港，轰炸菲律宾。9日，入侵马来亚。10日，日军占领关岛，并在马来亚东部海面一举击沉了英国远东舰队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斗巡洋舰“却敌号”，夺取了东南亚海域的制海权，武力胁迫泰国签订了“同盟条约”。12月25日，驻香港的英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宣布投降。

进入1942年，日军在东南亚继续扩大战果。在《军舰进行曲》的伴奏声中传来的捷报使国民振奋，也使天皇陶醉。1月，举行了御歌会。天皇吟咏了一首歌，大意是：愿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散笼罩在山峰上的乌云。

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数万美军驻守在这里。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了首府马尼拉，麦克阿瑟率美军退守至巴丹半岛继续抵抗。3月12日，战

功卓著、声明赫赫的麦克阿瑟奉命撤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麦克阿瑟对记者发表了“我来了，但是我还要回去”的著名声明。

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率领日本第25军于1942年1月11日攻占了马来亚首府吉隆坡，英军被迫放弃马来半岛，退守新加坡。

2月15日，山下奉文又率军攻陷了新加坡，以英国新任远东军总司令官珀西瓦尔中将为首的13万英军全部无条件投降。新加坡的陷落使印度洋的门户向西敞开了，这是一场堪与偷袭珍珠港比肩的陆战胜利。木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陛下听到攻陷新加坡，天颜大悦。”

随着新加坡的陷落，日本列岛又一次掀起了庆祝狂潮。裕仁天皇骑着爱马“白雪”站在二重桥上，接见前来祝贺的人们。2月16日，心花怒放的裕仁天皇颁发敕语，予以嘉奖：

> 马来方面作战的陆海军部队，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下，断然实现困难的海上护航、输送及果敢的登陆作战，耐炎热，冒瘴疠，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神速攻克新加坡，从而摧毁英国在东亚之根据地。朕深嘉奖之。[①]

继攻陷新加坡后，日军又于3月8日占领了缅甸的首都仰光。3月9日，攻占了爪哇岛的万隆，初步完成了对荷属印尼全境的控制。木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再次对天皇的反应作了如下记载：从上午10点45分到11点40分拜谒天皇，应召来到御前伺候，天皇分外愉悦，微笑着说：“这样快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天皇真是满心喜悦的样子，由于过分激动，当时连祝贺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4月9日，日军攻陷巴丹半岛，上万名美军被俘，日军占领了整个菲律宾。4月底，日军攻占滇缅公路中部重镇腊戌，切断了盟国援华的交通线。

就这样，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到194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日本便占领了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澳大利亚，东到吉尔伯特群岛，西迄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连同已占领的中国领土和朝鲜、印度支那，日本已控制了大约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约4亿人口，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原书房，1971年，第468页。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其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似乎已经实现了。

日军初期的作战攻势，其速度和战果都超出了日本统治者的预料之外，整个日本列岛一直沉浸在庆祝胜利的欢乐之中。也就在此时，一向工于心计的内大臣木户感到有必要给有些忘乎所以的天皇降温了。1942 年 2 月 5 日，他提醒天皇说：“大东亚战争难于轻易结束，最终只有把包括建设在内的战争打到底才是通向和平的捷径。”

木户的提醒，使裕仁天皇也意识到，应该见好就收，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2 月 10 日，当东条首相前来向他汇报今后的施政方针时，他就结束战争问题向东条下达了如下指示：

> 不失时机地结束战争问题想来也当认真考虑，为了人类和平也不应徒事拖延战事，扩大战祸。而且，如果拖长战争，军队的素质自然也要下降，当然对方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要看今后美、英的态度，还要看清德、苏关系今后的变化。而且，取得和处理南方资源问题如果就这样地不上不下，达不到预期效果那也不好，对这些情况要充分考虑，采取圆满的对策。①

可见，裕仁天皇试图结束战争的真实意图，是要利用日本在军事上取得的优势，迫使美、英就此结束战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取得和处理南方资源”的问题。

中途岛战败下的裕仁

珍珠港的一阵炸弹，一夜之间激起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热情。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总统的战争咨文：“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开始，日本无端和怯懦地发动进攻，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随后，罗斯福一再催促军事当局尽速轰炸日本本土，以报复日本的不宣而战，并借以振奋美国军民的士气。

---

①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44 页。

然而这并非易事，如果使用陆基远程轰炸机，即使从距日本最近的中途岛基地起飞，按照飞机的续航能力也难以返回；若用航母舰载机，因该机最大作战半径为300海里，而日本在距本土东海岸600—700海里处设置了警戒线，舰队一旦被发现，不仅轰炸不成，舰队自身也将难以保全。

1942年1月中旬，接替金梅尔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尼米兹精心设计了一种空袭方案：动用陆军B—25轰炸机，用航空母舰将其运至离日本足够近的海面放飞，飞机在轰炸完东京后直接飞往中国境内，在国民党控制的机场降落。

这一任务交给了曾数次打破世界飞行纪录的著名飞行员杜立特空军中校。杜立特率领精心挑选的16组飞行人员，于4月2日搭乘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从旧金山起航。4月18日晨7时20分，在距东京668海里的海面上，杜立特率领的16架B—25飞机先后飞离航空母舰。

中午12时30分，当杜立特驾驶的飞机率先飞抵东京上空时，他惊奇地发现，日本人竟毫无戒备，大多数人正在平静地用午餐，街上的行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后还不断地向飞机挥着手，以为是日本空军在做逼真的表演。直到一枚枚重达500磅的炸弹从飞机上暴雨般倾泻下来时，日本人才明白过来：“是美国人的飞机，不是演习，是空袭!”街上的行人惊呼着四散奔逃。负责防空的高炮部队也仓促应战，朝着天空漫无边际地胡乱发射。

杜立特率领的16架飞机中，有10架在东京分别袭击了闹市区、新桥车站、炼钢厂、炼油厂等，并在无意中击毁了一个伪装的大型储油场。另有3架袭击了横滨的工厂和油库，2架在飞往京都的途中袭击了工业城市名古屋，1架袭击了内海的神户，给川崎飞机工厂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当天下午1点，美机在扔掉所有的炸弹后先后向西南方向的中国大陆飞去。其中，大多数飞机都降落到了国民党控制区，只有1架飞机的8名机组人员正好降落在日本占领的南昌上空，成了日军的俘虏。

就物质破坏而言，美军的这次空袭战果并不大，仅摧毁了日本的90座厂房建筑、1个储油场和6个大型油库，炸死50人，炸伤252人。尽管杜立特的飞机曾飞临皇宫建筑群的上空，甚至看到了苍绿色的皇宫屋顶，但他在出发前被告知不要袭击皇宫、医院以及学校，因此皇宫安然无恙。这场空袭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却是巨大的。大日本帝国的首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遭到敌机空袭，这使一向认为有天皇保佑的日本国民突然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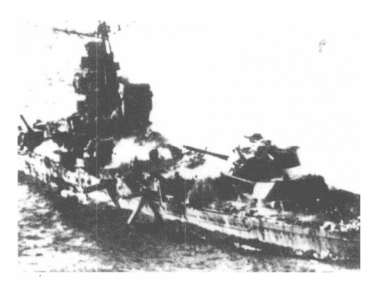
现，他们正面临着直接的战争威胁。

杜立特空袭后的第二天，裕仁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杜立特的驾驶员藏身避难的中国浙江省进行报复性“讨伐”。两周后，10 万日军对浙江省及毗邻的江西省开始了历时 3 个月之久的“惩罚性扫荡”。曾招待过美国人的村庄被夷为平地，25 万中国农民惨遭屠杀，其野蛮和凶残仅次于南京大屠杀。

在南昌被活捉的 8 名美国战俘，被移往东京后受到了严刑拷打。裕仁让其心腹杉山参谋总长出面，建议将 8 人处以死刑。后经东条首相劝说，裕仁最后才同意只处死 3 人，其余 5 人改判有期徒刑，其中有 4 人活到了战争结束。

东京遭袭使耀武扬威的山本司令官大为丢脸，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负本土警戒任务的山本五十六一直担心美军机动部队会袭击日本，因此在空袭发生前的两个月内，山本就已下令海上巡逻部队和航空部队加强了对本土的警戒。但此次美军却如入无人之境般地侵入了被其视为“神圣”的皇宫领空，使山本自觉愧对天皇的重托而极度痛苦。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坐了一天，而把追击美国舰队的任务交给了宇垣缠参谋长。

美国成功地空袭东京一事表明，来自东方广阔海洋发起的空中攻击，构成了对日本本土直接的威胁。为此，山本决定，必须发动攻势夺取位于



与美军舰只相撞的日本大型巡洋舰“三隈号”

太平洋中部、处于夏威夷和日本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美军航空基地——中途岛。一方面可以将日本的海上防御圈向东推进，另一方面可以诱使美太平洋舰队出来应战，并伺机摧毁其发动海上攻击的航空母舰。此外，从石油储备、生产能力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来看，日本绝对不能打长期战争。

5月5日，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奉裕仁天皇的敕令，发布了大本营海军部第18号命令，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官“与陆军协同，攻占中途岛及阿留申群岛西部要地”。

5月27日，由偷袭珍珠港的指挥官南云忠一率领的由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及260多架舰载飞机组成的“机动舰队”，首先扬帆出海。29日，由34艘军舰组成的主力舰队随后出发，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也乘旗舰“大和号”亲自指挥督战。

按照山本的计划，首先将由南云的“机动舰队”空袭中途岛，摧毁岛上美军兵力及防御设施。待美国太平洋舰队赶来增援时，潜伏在数百里之外的主力舰队伺机出击，一举歼灭美国舰队。

但日本万万没有料到，美国事先已截获并破译了日军的密码电报，获悉了日军的全部作战计划。美国尼米兹大将调集了全部太平洋舰队，隐蔽在中途岛东北海面，严阵以待。

6月4日凌晨，南云命令航空母舰上的108架飞机扑向中途岛。但机场上的美军飞机早已升空迎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空战。因此第一次空袭仅炸毁了岛上的固定设施，原计划摧毁岛上美军航空兵力的目标并未达到。由于此时日军仍未发现美国舰队，南云决定把原来准备对美舰进行鱼雷攻击的飞机改装炸弹，对中途岛进行第二轮轰炸。正当此时，美军连续派出两批鱼雷机和37架俯冲轰炸机对日舰实施攻击，使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重巡洋舰几乎在一天之内先后沉没，损失飞机332架，还损失了数百名最富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歼灭日军的“机动舰队”后，美军舰队又迅速撤离，使相距300海里的山本主力舰队企图赶来同美军舰队决战的打算落空。6月5日下午，山本无可奈何地下达了撤退命令。

中途岛海战，被称作“海军史上成败瞬息万变的战役”。太平洋战争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折。日本海军遭到了其建军350年来第一次有决定性意义的惨败，丧失了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被迫转为守势。而美军则逐渐由防御转入进攻。

中途岛惨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东京。由于担心天皇受惊，东条首相第二天觐见天皇时，没有提及此事。但天皇还是很快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实情。

但是此时的裕仁天皇尚未意识到此次失利所造成的惨重后果。6 月 8 日上午，内大臣木户觐见天皇之后，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10 点 40 分应召拜谒，11 点 40 分退出。谈了中途岛附近的海战。航空舰队蒙受的损失诚属重大，想必使陛下心情烦恼。然而仰望天皇却神色自若，举止动作一如平素，并说道：'这次损失实在遗憾，但已命令军令部总长注意不要因此而使士气沮丧，对今后作战不应消极退缩。'今日景仰天皇豪迈之秉性，痛感帝国日本之幸运。"①

中途岛战役后不久，为了激励日军士气，裕仁天皇又向内大臣木户提出要亲临联合舰队检阅。木户以"安全"为由进行劝阻，检阅未能实现，但天皇还是于 7 月 13 日前往霞浦海军航空队进行了鼓励。7 月 21 日，又到宇都宫飞行学校观看了陆军的空、地协同特别演习。

瓜岛惨败后的忧虑

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了反攻，其第一个反攻目标选在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

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逃到澳大利亚，与澳军会合，组成西南太平洋反轴心国联军，积蓄海军力量，以便由南北上，实行反攻。武器、弹药、食品和燃料等物资也从美国经太平洋源源不断地运入澳大利亚。

瓜岛位于所罗门群岛最南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2 年 7 月日军占领该岛后，就将其作为太平洋战场南线的最前沿阵地，严重地威胁着美国对澳洲的运输补给线。美国为了确保与澳洲的联系，并建立对日反攻的基地，决意夺取瓜岛。

在裕仁天皇的鼓舞下，就像输光了的赌徒急于翻本一样，山本也将赌注压在了瓜岛上。对日本来说，控制瓜岛，进可直接威胁美国对澳洲的运

---

①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49～150 页。

输补给线，退可成为日本环形海上防御线的重要支撑点。

1942 年 8 月 7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 1 万余人在瓜岛登陆，并于次日击溃岛上日军，占领了即将建成的飞机场。而后日、美海军进行了 6 次大海战，双方展开了持续半年之久的拉锯战。日军共损失各种舰艇 30 余艘，因此瓜岛附近的一条海峡后来被人称为“铁底海峡”。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不断调集海空部队增援瓜岛，而美军也把瓜岛变成了一架绞肉机，共消灭日军 25000 余人。到 1942 年年底，美军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日本无法向瓜岛输送物资，再加之日军大批死于饥饿和疾病，日本已无力再战。

12 月 31 日，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裕仁天皇亲自出席，会议最终作出从瓜岛撤退的决定。2 个月前还发布敕语令日军攻占瓜岛的裕仁天皇不禁发问道：“美国人几天内就能建成一个飞机场，而日本何以要一个月左右？难道没有改进的余地吗？”军令部总长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美国人用的是机器，而我军靠的是人力。”此时的日本，欢乐气氛已荡然无存，战败的阴影开始爬上人们心头。

裕仁天皇也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1942 年 12 月 12 日，他亲自前往供奉天照大神的国家神道总院伊势神宫参拜，祈祷天神保佑，降服敌国。裕仁天皇此举表明了他对战争进程的失望，这令日军统帅部顿感压力。山本在年底发给各地的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惊闻圣上亲往伊势神宫祈祷，身为臣下，不胜惶恐。满头乌发，一夜皆白。有负于君，乃臣之耻。愿竭尽心力，扭转战局，以慰圣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捷报频传，裕仁天皇因此才让深得他信任的东条、山本等人放手大干。而他自己除密切关注战争进程外，更多的是起着从精神上鼓舞日军士气的作用。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日本统帅部内部矛盾丛生。陆军、海军以及内阁之间围绕战略资源和船舶运输的分配打得不可开交，东条内阁也日益遭到批评和指责。在此情况下，为了给东条内阁撑腰，调解统帅部内部的矛盾，扭转不利战局，裕仁天皇已不得不直接出面，在有关战争决策和国务问题上进一步发挥其影响了。

1942 年 12 月 10 日，裕仁天皇出席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今后作战方针与陆海军战略物资的分配问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御前会议”这一名称被改为“御前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进入 1943 年后，山本竭尽全力试图扭转战局。为此，他策划了新的作

战方案，派飞机轰炸美国军舰，同时前往日军驻守的各个海岛视察，鼓舞官兵的士气。1943 年 4 月 3 日，山本在一首诗中再次抒发心志："立下忠君报国志，疆场粉身心也甘。"岂料山本这一"心愿"竟由美军帮他完成了。

4 月 18 日，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为了鼓舞前线官兵的士气，和参谋长宇垣缠一起分乘 2 架飞机，在 6 架零式战斗机的保护下，从腊包尔飞往巴拉尔岛日军基地视察。美军情报部门破译了有关他出行的密码电报，掌握了他飞行的准确时间和路线。在得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批准后，美国空军精心制订了伏击计划。同日上午 9 时 45 分，在巴拉尔岛上空，山本的座机遭到 30 架美军 P—38 型远程战斗机的伏击，被击落在莽莽丛林中当场毙命。宇垣缠的座机中弹坠入海中，宇垣拼命游至岸边总算免于一死。山本死后，古贺峰一继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山本五十六这位曾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立下头功的"名将之花"的凋谢，在日本引起了难以估量的震动，举国上下都笼罩在对未来的悲观失望之中，裕仁天皇更因失去了一员忠心耿耿的悍将而痛心疾首。他亲自批准追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和元帅称号，并批准以国葬规格为他安葬。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天皇批准的第 12 次国葬。为庶民出身的人举行国葬，除了日俄战争中的海军"英雄"、裕仁的恩师东乡平八郎以外，就只有山本五十六了。

在 6 月 5 日举行国葬仪式时，天皇碍于皇室不得参加非皇室人员葬礼的规定没有出席，但派去了德大寺侍从。德大寺侍从、小出事务官、两邑事务官分别代表天皇、皇后、皇太后出席了山本的葬礼。

山本死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三叉戟会议"，制定了在太平洋战场全面展开进攻的"双叉冲击"战略。即从西南太平洋和中部太平洋，分两路展开反攻。在西南太平洋方向，由麦克阿瑟上将任总司令，沿澳洲、新几内亚、菲律宾一线作战。在中部太平洋方向，由尼米兹海军上将为总司令，负责攻夺吉尔伯特、马绍尔、加罗林、马里亚纳四大群岛，直接威逼日本本土。

5 月 12 日，2 万余名美军士兵在 1 艘航空母舰和 3 艘战列舰的护送下，在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驻守在该岛上的2600多名日军，在既无后援又无退路的困境中全部战死。对战争初期即被日军占领的阿留申群岛的收复，为包围和攻击日本本土建立了前进基地。

6月6日，当参谋总长将此事报告给天皇时，当即遭到了裕仁的训斥。裕仁责问总长：“陆军和海军是否团结一致?”当裕仁得知在这场战役中陆、海军没有很好地配合作战时，又于6月8日让侍从武官转达了对陆海军的严厉批评：

> 早该料到这种结果。但5月12日敌军登陆后你们才仅用一周时间去研究对策，还说什么有“浓雾”。早该知道会有“浓雾”。作战前必须做好预测工作。陆海军之间是否真正推心置腹地协商了？难道不是一方再三要求，而另一方却不负责地应付的结果吗？商量好了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如果陆海军之间总是互相倾轧，这场战争就不可能打赢。如果长此下去，势必会像瓜岛争夺战那样，助长敌人的志气，中立国与第三国也会因此动摇，而中国也将乘势而起，对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影响甚大。能否想个办法，从什么地方给美国以正面的打击。[①]

越来越焦躁不安的裕仁天皇，一再催促陆海军统帅部“设法击败美国”，“选择适当地点发动攻势”。8月5日，杉山参谋总长进宫汇报了新几内亚方面的不利战况。忧心忡忡的裕仁再次逼问：“各方面都不妙，难道不能狠狠地打击美军吗?”面对现实，杉山只得坦承道：“我想从两方面来看，(日军的败退）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在第一线所有办法都用尽了，真是惶恐之至。”

裕仁天皇有些不耐烦地再次发问：“即便是这样，如被压缩得溃不成军，不仅是敌人，就是对第三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很好地打一仗呢？在什么地方决战呢？难道当前这种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状况不能反过来吗?”对天皇这种不现实的要求，杉山只得答道：“事与愿违，实在抱歉!”但天皇仍然强调道：“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像现在这样，要想办法，不能使美方总是叫嚷‘必胜，必胜!’”[②]

尽管裕仁天皇要对美军实行反攻，但客观形势的发展还是迫使他不得不冷静下来面对现实。1943年8月17日，美、英联军在欧洲战场攻陷西

---

① ［日］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79页。
②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4～155页。

西里岛。9月3日，意大利巴多利奥政府同美、英协议停战，并准备对德宣战，德国法西斯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裕仁天皇不得不指示日军统帅部重新考虑日本的战略方针。

9月30日，日本召开了御前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天皇的旨意，制定了《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这个大纲虽然仍声称要“迅速确保必胜的战略形势”，但作战重点已转移到退却和防御上。大纲决定，放弃一切占领区，退守“最低限度”的占领区，即建立“绝对国防圈”。它包括从缅甸起，沿马来半岛延伸到新几内亚西部，再到加罗林群岛直至千岛群岛一线。尽管东条首相和陆海军两总长都向裕仁天皇保证，有信心守住“绝对国防圈”。但事实上，当时日本薄弱的国力和军事实力根本不具备“确保”这一区域的能力。

因此，东条和陆海军首脑们的想法遭到了原嘉道议长的质疑。尽管如此，御前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还是最终通过了这一新的战争指导大纲。在会上，出席会议的裕仁天皇依然一言未发。

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了首次会晤，讨论联合对日作战问题，并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宣布：三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剥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地区所侵占的一切岛屿，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使朝鲜自由独立等。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又在德黑兰召开会议，苏联初步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

进入1944年后，随着盟军的全面反攻，日本的“绝对国防圈”陷入土崩瓦解之势。1944年3月，由缅甸孤军深入英帕尔的日军几乎全军覆没，伤亡总人数达75000人。英、美、中、印联军开始从各方面向缅甸境内反攻，节节获胜。

在太平洋上，美军调集陆海空优势兵力，向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基地马里亚纳群岛发起猛攻。6月19日，日、美海军会战于马里亚纳海面，经过两天激战，日本的9艘航空母舰中有3艘被击沉、4艘受伤，360架舰载飞机只有25架幸存，日本的海空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7月7日，经过22天的激战，美军又攻占了日本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以防守坚固著称的塞班岛。守岛日军4万余人全部被歼，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悍将、担负守岛指挥任务的南云忠一中将和斋藤义次中将自杀身亡。8月3日和

13日，马里亚纳群岛的另外两个主要岛屿特尼安岛和关岛也相继被美军攻占。

马里亚纳群岛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的屏障，被称为“太平洋上的防波堤”。美军对该群岛的占领，意味着日本的“绝对国防圈”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仍在日本控制下的加罗林群岛、中国台湾、菲律宾以及日本本土都处于盟军的进攻威胁之下，美军轰炸机可以由此直达日本本土进行轰炸了。此后，美军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出动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连续空袭，日本的军事设施和工厂设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也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日本败局已定。

第九章　内阁走马换将　空袭皇宫起火

裕仁与东条内阁

长期以来，由于裕仁天皇对东条英机信任有加，才使得东条一直稳居首相宝座。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塞班岛的丢失，使得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东条首相已日益不得人心，进而危及了天皇及皇室。无奈之下的裕仁不得不抛弃东条，决定对内阁走马换将。

在裕仁的信赖和庇护下，东条曾顺利地渡过了一次次政府危机。

早在1942年9月，东条就提出在中国占领区成立一个大东亚省，由陆军来控制。但东乡外相认为这将缩小外务省的权限而坚决予以反对。中途岛惨败后，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东乡（茂德）外相与东条首相再次出现意见分歧，两人的矛盾公开化。

东条要求东乡辞去外相职务，而东乡则想借机更迭内阁。一向支持东条的天皇当即表示：在美国反攻形势极为明显的今天，要绝对避免内阁总辞职。并根据木户的建议，让海相岛田繁太郎出面劝说东乡辞职。当东乡得知天皇的意图后，知趣地立即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就这样，天皇直接介入政府内部的对立，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东条。

1944年2月，权力欲极强的东条向天皇提出要由他本人兼任参谋总长，以实现政治与军事统帅的紧密统一。尽管这一要求打破了日本国家体制中军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但天皇仍然表示了赞同。对此事极为不满的参谋总长杉山元曾无比气愤地指出，让已担任了首相和陆相两个职务的东条再兼任陆军参谋总长，“这简直是向幕府时代倒退，是不能容许的”。但

当他得知天皇已经同意后，也只得无可奈何地表示："时至今日，既然按御旨已经定下来了，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可是必须说清，这只是大东亚战争下的特例，仅限于这次的非常措施。"作为条件，他提出要由海军大臣岛田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

参谋本部领导层对东条此举也极不服气，并要求杉山将参谋本部的意见向天皇作了"内奏"（非正常方式的秘密上奏）。对此，裕仁天皇向杉山解释道："朕对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合并在一起也感到不妥。但是朕同东条谈过这个问题，他保证把此事记在心上，朕对此感到满意。正如你所说的，把政治和军事领导合并在一起是完全违背传统的，为此朕要求你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行事和给予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①

由于天皇明确表态，杉山只得把参谋总长的位置让给了东条。同时永野的海军军令部总长一职也由海相岛田兼任了。裕仁对东条的信任与支持不仅如此，据有关证据表明，东条修建豪宅所用的木材都是天皇赐予的，天皇还曾赠给东条1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亿日元），其他首相从未受过天皇如此的恩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皇对东条的信赖。

东条凭借天皇对他的信赖，独揽军政大权。但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东条英机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他为人心胸狭窄，专横跋扈，加之大权独揽，树敌颇多，秩父宫曾将他称作"东条天皇"。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用"击落英机"这一双关语（英机既指英国的飞机，又是东条的名字）来发泄不满情绪。在海军省的一些办公室内，有人公开挂出了"杀死东条"的牌子。在国会内，也有人甚至开始着手制订暗杀东条的计划。

给东条内阁以致命一击的，是东条的政敌、以近卫文麿为首的曾担任过首相的重臣们。自瓜岛惨败、塞班岛失陷后，以近卫文麿为首的部分重臣们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如果继续打下去，只有战败一途，萌发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他们为了保存"国体"和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战争"。而要结束战争，首先就必须推翻强硬主战的东条内阁，将其作为战败的替罪羊，以转移国内人民对天皇制政府的愤怒情绪。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东条运动"浪潮，裕仁天皇及其皇族最初仍不愿抛弃东条。1944年6月美军占领塞班岛后，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还为东条打气："战争现在绝不能停止，要坚持到底！"6月22日，东久迩宫又对为

① 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69页。

倒阁而前来拜访的近卫表示说，东条内阁“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干下去为好，我认为责任始终由东条来负为好，如后果不好，那就是东条造成的，把全部责任推给东条才对。如果内阁变动责任归属不清，恐怕最后要落到皇室的身上。所以，让东条干到最后才对。”

与东久迩不同，近卫等重臣们的想法是，为了避免让天皇受到东条的牵连，并使广大国民对天皇感恩戴德，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必须说服天皇抛弃东条，让接替东条的下届内阁向盟军投降。为此，他们频繁走访、劝说皇室成员高松宫（天皇的三弟）、东久迩宫及内大臣木户等人。

7月2日，近卫将自己的想法汇总成文件，让木户审阅。近卫指出：“战败已不可避免，这是陆海军当局得出的相同结论。”他强调必须“在现任内阁辞职时，立即敕令皇族（以高松宫最合适）组阁。由新内阁辅佐，及时下达停战诏敕”。7月8日，推荐东条出任首相并一贯支持东条的内大臣木户在看过近卫的意见书后，也担心如果天皇仍信任东条，国民的怨恨很可能转向天皇。他也认为不得不让东条下台了。但木户对近卫希望委托高松宫组织停战内阁却有怀疑。木户认为“如建立皇族内阁，当以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殿下为宜”。

同一天，高松宫对东久迩宫说：“我原以为，为把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东条，使陛下不至于受到牵连，可以让东条将大权掌握到最后。但前不久近卫告诉我，‘恐怕英美仍会认为陛下也对战争负有责任’，这才促使我改变了对东条内阁的看法。”

皇族、重臣们的意见统一后，立即开始实施倒阁的计划。他们首先要求东条撤换对塞班岛失陷负有责任的海军大臣兼军令部总长岛田的职务，其目的是借此造成内阁危机，达到敲山震虎的效果。

因此，当东条于7月3日拜访木户请教应对之策时，木户一反常态，首先对陆海军两大臣兼任两总长一事，特别是对东条不愿撤换岛田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暗示东条：“当前已不单是一届内阁存亡的问题，一步走错可能会使批评天皇的倾向激化。”木户的暗示，其用意已十分明确：为保住天皇，你东条应当放弃权力。

并不愿轻易就范的东条，仍希望能获得天皇的支持。于是，东条决定亲自入宫拜见天皇。裕仁天皇早已知悉皇族和重臣们的倒阁活动，并完全赞同内大臣木户的主张。天皇对东条说：“首先，当此关头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重新确立统帅权，否则将危及更高一层。首相应考虑到这一点。其

次，东条称岛田为部下，而不愿撤换，但何止部下，伏见宫元帅不是也曾辞掉军令部总长职位吗?”

天皇的话已至此，东条明白大势已去。稍停片刻后，他恭恭敬敬地向天皇行了一个礼，便退出了皇宫。中午时分，他正式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就这样，维持了2年8个月的东条内阁终于倒台了。

过渡内阁与“特攻队”

东条下台后，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承担战争责任。1944年7月18日下午4时至晚8时，根据裕仁天皇的旨意，在宫中召开了重臣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内大臣木户、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前首相若槻、冈田、广田、近卫、平沼、阿部、米内等人。会议就东条内阁辞职后的继任首相人选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者众说纷纭，争执不休。

平沼、广田等人认为，为“维持国体和皇室的安泰”，应当组成一个以皇室为中心的内阁，由新内阁辅佐天皇，及时下达停战诏书。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后采纳了内大臣木户根据惯例提出的“此际非陆军莫属”的原则，从陆军大将中推选了3名候选人，即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朝鲜总督小矶国昭、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

木户立即将会议结果上奏天皇。天皇经过斟酌，并征求了东条的意见，最终任命小矶国昭组阁。重臣会议推出候选人，而把最后决定权推给天皇，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担心小矶大将难以独自支撑危难时局，近卫又推荐前首相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与小矶联合组阁。近卫的理由是：“米内大将最了解大局，由他参加内阁，将有助于解决陆海军统帅部一元化问题，当能造出举国一致的态势。”7月20日上午，木户将联合组阁的方案再次上奏天皇，并得到了天皇“恩准”。7月20日下午5时许，奉召从朝鲜匆匆赶回东京的小矶，与米内一起参见天皇。天皇面谕道：“望卿等协力组织内阁，尤其要达成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并需努力避免刺激苏联。”7月22日，小矶—米内联合内阁完成组阁。下午1时半，小矶、米内一同进宫，向天皇呈上了阁员名单，并得到天皇的嘉许。下午2时半，在雷雨滂沱之中，宫中举行了内阁就任仪式。

小矶内阁是被重臣们作为由战争走向投降的“中继内阁”、“过渡内阁”推上台的，是在战局急转直下，求战不能、求和无门的情况下出任首相的。因此有人戏称继东条内阁之后的小矶内阁为“取代汽油，而改以木炭作燃料的汽车”。就连小矶自己也认为是“轻率”之举。尽管如此，在本钱尚未输光，主战论仍占绝对优势，以陆军为核心的主战派仍掌握着政府和大本营的情况下，小矶仍抱着日本“必胜的信念”，竭尽全力继续组织和指导了日本以后的侵略战争。

8月5日，小矶首相经天皇同意后，新设立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6人组成，负责制定战争指挥方针，调整政策和战略，协调军政关系，取代了原有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职能，但在指挥战争的统帅权方面却仍无法问津，实质上仍不过是联席会议的延长。

8月19日，在天皇亲自出席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通过了小矶内阁制定的《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规定的战争方针是：（1）帝国应彻底集中现有的战斗力和在本年年底前可以成为战斗力的国力，击败敌人，以摧毁其继续作战的企图；（2）帝国不管上项是否成功，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在一亿国民坚如磐石的团结之下，确信必定能取得胜利，保卫本土，坚决彻底地完成战争的目的；（3）帝国贯彻对外政策，力求争取世界战局、政局的好转。

这个无视国际舆论要求和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指导大纲》，真实地反映了小矶内阁顽固坚持战争政策的立场。表明继东条内阁之后的小矶—米内联合，并不是近卫所期待的能立即实现和平的内阁。

尽管小矶在大纲中继续坚持“击败敌人”的战争目标，但他心里清楚，在战争资源濒于枯竭的情况下，这一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在8月19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小矶谈到了国民的实际情况，指出：“眼下国内民心之趋向，斗志不够高昂，并未认识到国家和国民同处兴亡关头，如不战胜，则无引导国家国民摆脱现状走向幸运之途径，也没有把一切奉献给天皇的所谓捍卫国体精神的觉醒。”会议同时还承认大东亚共荣圈正在走向崩溃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小矶内阁也已经有了停战的念头。小矶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葛山鸿爪》中透露了自己当时的考虑：“我只想哪怕再打一次胜

仗，以便抓住时机进行和平停战谈判。"①

1944年10月20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莱特岛登陆后，日本为了保住菲律宾群岛，决定把菲律宾列为第一决战地带，同时把莱特岛决战定名为"天王山"②，把赌注压在了这次战役上。10月23日至26日，日美海军在莱特湾展开空前激烈的海空大战。美军以轻微的代价，击沉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包括6万多吨的超级战舰"武藏号"），以及10余艘其他战舰和150余架飞机。至此，日本太平洋联合舰队已名存实亡。在争夺莱特岛的登陆战中，日本陆军也损失惨重，伤亡约7万人。日本陆军被迫于12月25日撤离莱特岛，小矶以战求和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在莱特湾的战斗中，日本航空母舰首次派出"神风特攻队"，实施"特攻战术"。即由飞行员驾驶载有炸弹的飞机直接撞击敌舰，与敌舰同归于尽。"神风特攻队"是一种非人道的"战术"，陆军最初组织的特攻队为"万朵队"（由陆军大尉岩本益臣为队长的岩本队），此外还有陆军的富岳队、海军的敷岛队等。万朵队队长岩本曾谈道：

> 岩本队虽然实际上作为部队进行行动，但每个队员就个人而言却都是分配到第4航空军的……这样，即使全体人员都是以自己的身体去撞击敌人，也不是岩本队的行动，而是个人的行动。

这种"个人"的自发行动，可以具有这样的功效，即"可以把特攻队员当成国难而勇敢舍身的义烈之士"，"还能把这当成壮烈的爱国美谈，用以刺激和提高现已崩溃的国民的战斗意志"。

那么裕仁天皇对特攻队的评价如何呢？有一次，当天皇听到神风特攻队的情况后，就说："迫不得已而到了这种程度，实在遗憾。"过了一会儿，裕仁又补充道，"神风特别攻击队员干得好，对于各队员实有不胜爱惜之情。"对万朵队的报告，裕仁说道："万朵队遭受这样多的子弹，仍进行低空攻击，取得不同寻常的战果，实在不错。"可见，裕仁对特攻队这种惨无人道的"自杀性"行为，是采取肯定态度的。

---

① 赵晓春：《百代盛衰——日本皇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 天王山：日本历史上丰臣秀吉战胜明智光秀的决战场，这里借喻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关键战役。



陆军特攻队的队员

更为残酷的是，有些特攻队员进行了特别攻击而又生还，但如果没有及时返回基地，司令部仍作为战死报告上奏大本营，大本营又会将这一情况上奏天皇。“如果是一旦向天皇上奏了，那么，即使是生还的士兵也不能再活下去了。”司令部仍会要求这些本已死里逃生的士兵再次出击，去以自己的身体撞击敌人。“特攻战术本身是非人道的，而天皇的存在则更使这种非人道性质更为严重。”①

特攻战术的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命中率还不到10%。根据收听到的美国方面通信的判断，则只有3%。因此，这种自杀性的进攻仍未能挽回败局。

对莱特岛决战的惨败，裕仁天皇深表不满。12月20日前后，天皇以既挖苦又不信任的态度问小矶：“你说莱特岛决战是胜负的关键，这下子你可怎么办呢？”面对天皇的训斥，小矶无言以对、无计可施。

---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422页。

1945年2月，美军开始攻打硫磺岛，准备将其作为空袭和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3月，驻守硫磺岛的2万余名日军除212人被俘外，其余皆战死。随后，美军于5月占领了整个菲律宾群岛。

4月，18万美军在距日本本土仅600公里的冲绳岛登陆。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位于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是通往日本的内部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日本除以驻军10万人死守外，还组织了所谓海空特攻队，采取绝望野蛮的自杀战术。经过3个月的激战，到6月底，美军终于占领了冲绳岛。日军9万余人战死，包括"大和号"在内的6艘日本军舰葬身海底，岛上的居民死亡也达10万人。至此，盟军已攻占了太平洋上的全部岛屿，通向日本的门户被完全打开了。

美军的本土轰炸

比起"绝对国防圈"的失守，更令日本国民感到绝望，也令裕仁天皇对战争失去信心的，要算是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进行的持续大规模的轰炸了。

从1944年6月15日起，美军飞机便从中国成都和马里亚纳群岛陆续起飞，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11月24日，美军出动94架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猛烈的轰炸。1945年3月占领硫磺岛后，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更加频繁，平均每月出动飞机多达3000架次。轰炸的目标也从最初仅限于摧毁军事重工设施扩大到日本的各大中小城市。

1945年3月9日晚至10日，美军出动300余架B—29轰炸机，携带着数千吨炸弹和燃烧弹，对东京进行了最严重的一次空袭。以江东地区为中心，23万户房屋被烧毁，死伤12万市民。

身着陆军军装的裕仁天皇，于3月18日在木户内大臣、藤田侍从长、陆海侍从武官等陪同下，巡幸了汐见桥、东阳公园、锦系町、驹形桥、上野、汤岛切通坂等地。虽然那里一具具烧焦的尸体已在天皇到来之前进行了掩埋，但目睹了已化为焦土的城区后，裕仁还是充满恐惧地对藤田侍从长说：

大正十二年（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我曾骑马巡幸过市内。这次远比上次还惨，那时虽然也烧毁了不少房屋，但那时大型建筑物比较少，没有如此强烈的悲痛感。这次许多高楼都被炸毁或烧毁，实在是心痛。这样下去，东京也会变成焦土。[①]

同样的轰炸也出现在日本其余的 98 个城市。据统计，截至日本投降，这 98 座城市房屋的烧毁率京滨地区为 56%、名古屋为 52%、阪神地区达 57%、中小都市也在 40% 以上，个别城市例如福井市甚至高达 96%。

在轰炸东京的过程中，美国最高当局曾严令禁止轰炸日本皇宫。主要的考虑是，皇宫的地下室十分坚固，不但不能炸死天皇，反而会激发日本国民继续作战的意志。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美国已经考虑到“以后天皇也许还会发挥有益的影响”。尽管如此，空袭引起的大火还是几次波及了皇宫。在 1945 年 2 月 27 日美机对东京的空袭中，宫内省主马寮[②]引发了大火灾，皇宫的 17 名消防队员在灭火中丧生。

进入 5 月份后美军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空袭。5 月 24 日，美国出动飞机 526 架；25 日，又出动了 502 架。特别是在 25 日的空袭中，美国飞机向银座、麹町的商业区、官厅街和高岗地区的住宅街一带，投下了多达 3260 吨的燃烧弹。

在 5 月 25 日的空袭中，由于风势太猛，一些燃烧物被吹过宫墙，皇宫内的女官宿舍、半藏门、乾门和吹上御院内的亭榭等处纷纷起火。配备在皇宫内的皇宫警察、警视厅特别消防部、近卫师和宫内省防卫团等，共有近 2000 人参加了灭火。上午一度解除了警报，放下心来的人们刚刚休息下来不到五分钟，皇宫侍从就发现正殿檐下冒烟，连忙通知了警卫人员。正殿的梁柱在回廊的内侧，给灭火带来了不便，熊熊火焰从殿内喷出来，许多人只好将殿里的东西抢搬出来。

这座宫殿是 1884 年花了五年时间修建而成的，占地18150平方米。采用了上好的柏木，装饰极尽豪华。自明治宪法颁布以来，这座有着 60 年历史的建筑一直是举行皇室、国家大典的场所，已经成为日本帝国的象征性

---

① ［日］猪木正道：《天皇陛下》，DBS · 大不列颠出版社，1986 年，第 273 页。

② 宫内省主马寮：管理马车及各种用具并负责饲养、训练马匹，以及管理牧场和运输等事务的机构。

建筑。当久松侍从将皇宫着火的消息向裕仁禀报时，裕仁脸部的肌肉顿时僵硬了，肝肠欲断似的低声喊道："正殿着火了吗？正殿呀！这座建筑是明治陛下精心修建起来的，全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设法灭火！"但是如同气数已尽的日本帝国一样，虽经消防队员、皇宫卫兵奋力扑救，但在两小时以后，这座华丽的宫殿还是在大火中崩塌了。

大火在吞噬了正殿后，又沿着回廊蔓延过去烧掉了丰明殿等建筑，眼看着大火就要蔓延到后宫。此时的裕仁又担心女官以下数十人所在的女官宿舍："如果女官宿舍尚未着火，希望全力保住，如果没有女官宿舍，从明天起日子就难过了。"工兵连忙用炸药将长廊从中间炸断来控制火势，几处防火用水池的水都放干了，这才总算将女官宿舍保住了，但后宫还是在大火中崩坍了。消防人员为保卫宫殿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殉职者达 33 人，包括消防署 16 人，军队 14 人，皇宫警察 3 人。

在这场皇宫大火中，天皇最为担心的供奉着皇族皇灵的宫中三殿总算保住了。神殿、温明殿、皇灵殿统称为宫中三殿，也称作贤所。位于后宫西边 200 米处，下面用混凝土牢固地构筑了一个很深的洞，洞里有一只铁箱，里面安放着作为神的象征的"神镜"。天皇认为如果神殿被毁，那将是日本崩溃的征兆，对国民的打击将是无法估量的。

这一天，位于东京代代木的明治神宫也被完全烧毁。裕仁向来崇拜明治天皇，因此心里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伊势的皇太神宫也遭到了空袭，部分建筑被烧毁。对此裕仁表示"伊势（镜）和热田（剑）的神器，我看还是移到我身边来看管为好。当然，什么时候移动，要郑重考虑好以后再作决定，因为这会给人心带来极大的影响。到了关键时刻，我只好自己看管，与神器共存亡。"

1945 年 1 月 1 日，在这天气严寒、气氛凄凉的冬日，伴随着阵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日本迎来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第四个元旦。

这一天凌晨，裕仁天皇早早起了床。他身着陆军军服，佩戴满金三星和一朵菊花的大元帅领章。在胸前，佩戴着绿黄底红白色旭日的大勋位菊花章的略式勋章，在侍从长的引导下登上了汽车。

按照惯例，每年的元旦，天皇都要在天亮前亲往神嘉殿前庭进行新年的第一次祭拜——四方拜，向天神地祇、天地四方祈祷。然而这新的一年从元旦开始，便显露出不祥之兆。当天皇乘坐的褐色奔驰车刚刚驶出几百米，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便响了起来。

“有空袭，返回御文库吧！”在御用汽车的后座与天皇相对而坐的藤田侍从长说。

“嗯！好！”天皇点了点头。

汽车连忙掉转车头，驶回了御文库。

为确保皇室的安危，早在对美开战前8个月，也就是1941年4月，日军便在皇宫中动工为天皇和皇后修建了一处坚固宽大的避难所。到1942年年底，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才正式完工。这是一座地面一层、地下一层，总面积达1350平方米的超级防空洞。屋顶厚3米，可以承受7～8吨级的炸弹，用草坪和树木伪装着。地下室内设有厨房、饭厅，天皇、皇后及子女的卧室、女官室、常侍官室等。为保密起见；该建筑被命名为“御文库”。

从1944年秋天开始，天皇和皇后便躲进了“御文库”。身处险境的天皇还自我安慰地说：“我们终于也赶上了这场战祸。这至少可以使国民知道，我们并没有受到神的特别保护，而是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伙伴。”每次空袭过后，陆军部都会发表一份公告，说“皇室安然无恙”。

在侍从的引导下，天皇来到地下防空室。这是一间有12张榻榻米[①]大小的房间，与之相连的是一个小寝室。房间里的陈设比较简单，两张沙发，一张写字台，墙上挂着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供侍从武官向天皇报告空袭和交战情况时使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是空袭警报一直都没有解除。坐在沙发上的天皇有些着急了，四方拜必须在天亮前完成。虽说是在战争时期，但祭祀皇祖神灵却是耽误不得的大事。

侍从们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就在御文库前的草坪上举行四方拜。他们迅速在草坪上铺好了菰草席，又在上面从东北向西南斜放了一张镶有金边的草垫，随后在四周支起屏风，权当祭拜之处。由于时间紧迫，其他程序全免了。既没有火炬为天皇照路，也没有燃起篝火，天皇祭拜时必须穿的平安时代式样的衣冠束带也来不及准备，只得穿着陆军军服，来到屏风的入口处，先由侍从为他解下单刀，脱下长靴。随后裕仁只身进入屏风

① 榻榻米：用蔺草编织而成。一张榻榻米的传统尺寸是宽90厘米，长180厘米，厚5.5厘米，面积1.62平方米。榻榻米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计量单位。日本人计算和式房间的大小，一般不是按多少平方米计算，而是根据能铺几张榻榻米计算。

内，在一片警报声中开始了四方拜仪式。

裕仁先向皇大神宫的方向立正行礼，然后平伏在地。片刻后，再次站起来立正行礼，再平伏在地。这叫两拜两叩。然后裕仁又转向右方，对西北两拜两叩，再向东北、东南两拜两叩。

当裕仁从屏风中走出来后，在远处平伏的侍从慌忙跑过来，帮助他穿上长靴。

早上8时15分，天皇来到御文库餐室，举行自古延续下来的晴御膳仪式。在餐桌上，红漆的餐具中分别摆着烧鱼串、咸萝卜、虾、煮栗子、汤、菱葩、野鸡酒、水果、茶水等。其中菱葩是宫中独特的食品，在白饼和菱饼上，添加着细牛蒡和白豆酱。天皇只是用银筷夹起来象征性地尝了尝，仪式便告结束了。

晴御膳仪式刚刚结束，军部便送来了用白布裹着的饭盒。里面装着红色的加吉鱼、小豆饭、蔬菜，另有一小瓶清酒。饭菜旁一张字条上写着："这是为连日来出击的特攻队员踏上征途的饯行菜。"望着这些特攻队员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菜，天皇和皇后目光暗淡，一言未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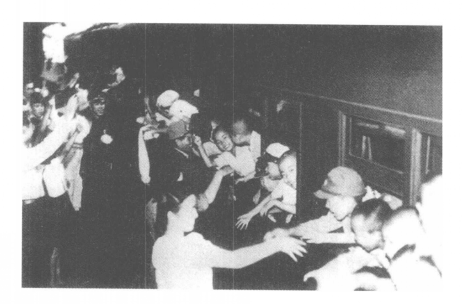
随后，天皇和良子皇后一起共进早餐。自战争爆发以来，良子皇后始终陪伴在天皇身边。对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良子一直持反对态度。在日本面临战败之际，她更是直言不讳地力劝丈夫早日停止战争："事已至此，再忧伤也毫无用处。不过，我倒相信，只要圣上能果断运用你的权力和影响，使战争早日得已停止，让日本少死几十万、几百万人，神灵也许能保佑我们遇难呈祥的！"

一直把做好贤内助作为己任的良子皇后，不仅为战争和丈夫担忧，而且还时时刻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她的大女儿成子，1943年秋与东久迩宫盛厚王结婚，如今已有身孕。她十分担心在这种形势下，女儿分娩会出差错。在1945年3月美国轰炸东京最猛烈的时候，成子在防空洞内生下了孩子，所幸母子平安。这是天皇夫妇的第一个外孙，天皇为他取名信彦王。

最令天皇夫妇担心的要算是皇太子明仁了。1944年5月，明仁和他就学的学习院的同学一起被疏散到静冈县沼津行宫。到达行宫刚刚安置好，马上便发现该地正好处在以富士山为目标而来袭的B—29飞机航线的下方。更重要的是，到了7月，在沼津附近的海面上出现了美国潜艇。惊慌失措的宫内省连忙又把明仁和学习院转移到枥木县日光的田母泽行宫。原以为这里群山环绕，应该比较安全。但不久从坠落在附近的美军飞机的驾

驶室里，发现了日本印制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图上对关东北部的工厂等轰炸目标都加了红圈。令宫内省吃惊的是，就在距离行宫约几公里的古河矿业炼铜厂也被标上了红圈。担任皇太子警卫的仪仗队队长田中义人和抚育官们顿时变得惊慌失措，连忙另行物色疏散地点。最后认为里日光的温泉湖畔最为合适，这才又选中了那里的南间饭店，不过这时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左右了。

尽管是在战时，学习院对明仁的教育还是一如既往，培养未来天皇所必需的课程一门也不能落下。随着明仁年龄的增长，学习院又逐渐给他增加了跑步、体操、击剑、骑马等课程。这是为他即将作为一名军人而做的准备。



战时向地方疏散的学生们

按照《皇族身分令》第 17 条的规定："皇太子或者皇太孙，年满十周岁之后，就要被任命为陆军和海军军官。"根据这一规定，不管皇太子的意愿如何，只要年满 10 岁，就要自动成为陆、海军少尉。裕仁天皇就是在 11 岁时被任命为陆、海军少尉的。

到了 1945 年，明仁已过 11 周岁了。因此各方面都开始为明仁皇太子的军官任命进行准备。按照惯例，作为陆军少尉的明仁还应同时担任近卫步兵第一联队副队长的职务。为此，第一联队特意在营房院内，用白木为

皇太子准备了一个站立的平台。1945 年，先后提任陆相的杉山和阿南也多次催促内大臣木户落实皇太子的军官任命事宜。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天皇也没有发布任命皇太子为少尉军官的命令。对天皇这一违反惯例的做法，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天皇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担心一旦战败，作为陆、海军军官的皇太子会碰上难以预料的麻烦。

裕仁对战争的苦恼

自 1944 年秋季搬进御文库后，天皇终日由皇后及女官们陪伴着，除允许内大臣木户、陆海军负责人及内阁成员晋谒外，皇族及重臣们一概不许接近天皇。原因是军部不愿“杂音”干扰天皇。在这近乎与世隔绝的防空洞中生活，裕仁天皇对战局的了解只是军部首脑们的一面之词。美国要取消日本皇室的消息使他心惊肉跳，接连不断的败绩更是搅得他寝食难安。

进入 1945 年后，困惑不堪的裕仁天皇要求听取重臣们的意见。1 月 6 日，天皇对木户说：“美军企图在吕宋岛登陆，入侵硫磺岛，战况非常严重，结果如何，我想有必要听听重臣们的意见。”为避免刺激军部，木户没有采取让重臣们一同谒见的方式，而是采取了通常冬季叩问圣安、分别秘密拜谒的形式。先后安排 6 位重臣同天皇一一会面：2 月 7 日平沼骐一郎，9 日广田弘毅，14 日近卫文麿，19 日若槻礼次郎，23 日冈田启介，26 日东条英机。

面对天皇充满忧虑的垂询，6 位重臣都各自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除了东条英机仍鼓吹竭尽全力将战争进行到底外，其余重臣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对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近卫更是以继续战争会导致共产主义革命为由，敦促天皇尽快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案。

2 月 14 日，第三个晋谒天皇的近卫，怀着对战争前景的深深忧虑，首先向天皇呈上了精心写就的长篇奏章。其要点是：战败虽属遗憾，但我认为已无法避免。迄今为止，英、美舆论尚未涉及改变国体问题。因此，仅就战败而言，深信无须为国体而忧虑。重要的是，继续进行战争将陷入共产主义者的圈套，最终有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的危险，因此，要尽快清除军部内的主战派，同英、美媾和以维护国体。

阅完近卫的奏章，天皇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听说美国企图取消皇室，是这样吗？"

"现在还不到取消皇室的时候，如继续战争，则有这种危险。"近卫凭着自己对形势的估计说道。

天皇接着问道："依你看，好像美国不想变更我们的国体，可是梅津参谋总长推测，美国正在考虑变革日本的国体，这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对此你有何感想？"

近卫答道："军部为了激发国民的战斗意志，很会表现自己。我坚信格鲁次官（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并不支持左翼。格鲁在辞去驻日大使职务归国时，从他对秩父宫夫妇的态度、从措辞上来看，对我们皇室还是十分尊重和了解的。"

"不过，美国是一个舆论自由的国家，还不能断言将来不会发生变化，这要取决于今后的战况如何。从这一点来看，谋求结束战争的对策，也是至关重要的。"说到此处，天皇话题一转，"海军表示能够在台湾打击敌人，所以我认为也可以在那之后采取手段。"接着又补充道，"如能在冲绳获胜，可趁此机会考虑和平。"

"有把握在冲绳取胜吗？"近卫问道。

"统帅部说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天皇回答道。

"他们的话有一次兑现过吗？"近卫反问道。

天皇回答说："这次像是很有把握。"接着，又补充说，"如不打一次大胜仗，恐怕不好和谈。"

"若能取得那样的战果，实在是再好不过，但在最近的将来会有那种机会吗？如再等上半年或一年以后，那就没有用处了。"近卫回答道。①

这一番对话清楚地表明，当时的裕仁天皇与近卫所思虑的，虽然都是如何维护国体天皇制的问题，但与近卫所提出的立即媾和以维护国体的主张完全不同，裕仁天皇仍和首相小矶一样，依然幻想通过再打一次胜仗后再谈判媾和，以有利的条件或者说是以体面的条件来结束战争。

4 月 5 日，处于内外交困的小矶内阁宣布总辞职。原因是身为首相，却在军部没有发言权，以致丧失了领导战争的自信心。

以近卫、木户为首的重臣集团经过密议，就新首相人选问题达成共

---

① ［日］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档案出版社，1992 年，第 21 ~ 22 页。

识：（1）担任下届首相的，必须是能够接受他们的主张尽快媾和的人；（2）为了避免刺激军方，特别是陆军，绝不从自己阵营中提出人选；（3）为完成即将到来的和平大业，还必须是深得天皇和国民信赖的人。

根据这一设想，在当天下午5时召开的推荐后继内阁首相的重臣会议上，木户、近卫等提出以“近年来与政治无关的军人和深得国民信赖的人物”为选拔标准，引导重臣会议作出了推荐铃木贯太郎为新首相的决定。



身着军装的天皇裕仁（1939年）

铃木之所以被重臣们推举为新首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曾担任过裕仁天皇的侍从长达7年之久。而他的妻子铃木孝，又是天皇幼时的女官，照料天皇生活长达11年之久。因此，铃木是深受天皇信赖的人物。

4月5日晚10时，天皇让侍从长藤田尚德海军大将传达了自己命铃木

组阁的命令。但铃木一度以缺少理政经验，“军人干预政治会导致亡国”，且年老耳聋为由，推辞了组阁使命。

军官铃木推辞不受，但他同意拜谒天皇。晚10时许，铃木在御文库拜见了天皇。在拜见中，铃木仍以此前说过的同样理由推辞。天皇劝导道：“我很理解铃木欲作推辞的心情，耳朵聋点并不要紧。在国家危急的重大时刻，已经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了。”内大臣木户等人也极力相劝。见铃木仍有推辞之意，天皇就对他说：“那就拜托你了，请抛开个人利益得失，接受此任吧！”天皇用这样的口气进行劝说，恐怕以前是没有过的。在这种情况下，铃木终于下定了“最后为国效劳”的信心。

以往天皇对每届新内阁都要求他们遵守宪法等，但这次对铃木内阁却没有提及这些要求。据说原因有二：一是铃木与天皇关系非同一般，深得天皇信任，无须再行嘱托；二是天皇对铃木内阁，有不必遵守宪法之隐意，也就是说暗示铃木内阁在必要的时候，即便超越宪法，也要果断地收拾战争的残局。

重臣们也希望铃木能尽快结束战争，铃木本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自己“早就倾向于媾和”，自己之所以受命组阁也是因为体会到天皇希望“寻找机会讲和，迅速结束这场大局已定的战争”。

4月7日晚，铃木内阁在皇宫举行了就任仪式。在就任仪式结束后，铃木发表谈话说：“拯救帝国存亡之危局，只有依靠一亿同胞别无他途。全体国民应为防卫光荣国体之后盾。我以老迈之身抱为国捐躯之决心，处理国务。希诸君踏越我尸奋勇前进，发扬新的战斗力，以安圣虑。”铃木内阁虽叫嚷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但战局的发展却对日本愈加不利。

4月18日，裕仁的意大利盟友墨索里尼在科莫湖畔被处死，其尸体被愤怒的意大利人倒挂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一根柱子上，任人唾骂。4月30日，他的另一个盟友希特勒在地下室开枪自杀。5月9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只剩下日本与世界对峙了。

盟友的惨死，使裕仁天皇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德国的投降，则使铃木内阁十分担心苏联会立即参加对日战争。在外相东乡茂德的催促下，5月的11、12、14日，铃木内阁秘密召开了3次由首相、外相、陆海军两大臣及陆海军两总长参加的“六巨头”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苏政策，决定了以外交方式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方针。

在5月11日的会议上，铃木内阁宣布废除业已成为一堆废纸的同德、

意签订的所有条约，以取悦于苏联。接着，又委派对苏外交经验丰富的前首相广田弘毅为代表，同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进行交涉。

军部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同苏联接触，但实际上仍然主张坚持进行本土决战，并且制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基本大纲》。6月6日，这一大纲分别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和内阁会议上被通过。6月8日，在裕仁天皇亲自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再次通过了这一大纲。该大纲明确提出要"以七生尽忠[①]之信念为动力，依靠地利、人和，将战争进行到底，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完成征战之目的"。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仍按惯例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内心对这份无视现实的大纲深为不满。因此在会议结束后，天皇破例将会议通过的大纲拿给了内大臣木户阅读。木户看过这一大纲后，认为这是主战派空虚逞强的结果，将会错过尽快谋和的时机。他从天皇忧虑的神态中窥测出了天皇的意图，认为借助天皇的"圣断"结束战争的时机业已成熟，遂草拟了一份题为《收拾时局对策草案》的文件，呈送给了天皇。

木户在这份文件中首先分析了战争形势，得出了战争不可能支持到年底的结论。并强调指出：如果战争继续拖延下去，日本将会遭到与德、意同样的命运。甚至连日本的最低要求：保持皇室安泰，维护我国国体，也可能得不到满足。接着，木户又进一步建议道："我认为日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坚决采取行动恢复和平。"具体的办法是打破惯例，由天皇亲自出面干预，派使节持天皇亲笔信与调停国交涉，在保留天皇制和体面和平这两个条件下，结束战争。

面对山穷水尽的形势，手足无措的裕仁天皇对木户的建议深表赞同，谕令从速着手执行。6月21日，冲绳日本守军全军覆灭，这使天皇越发感到有必要尽快结束战争。22日，裕仁天皇根据内大臣木户的建议，亲自召见了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及陆海军两总长。对"六巨头"明确指示："关于战争指导，虽在御前会议已作出决定，但另一方面，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此时也希望不拘泥于历来的想法，从速进行具体研究，力求促其实现。"

对天皇作出的"终战圣断"，铃木首相表示"自当秉承御旨，努力求

---

① 七生尽忠：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武将楠木正成曾有七生尽忠之语，意即转生七世，也要尽忠报国。

其实现”。其他军政要员也在天皇的逐一询问下表了态。但主战派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却回答说：“我别无异议，但实行时需慎重。”企图用“慎重”一词予以搪塞。

天皇当即反驳道：“当然需要谨慎，但会不会因此失掉时机呢?”

“需要从速进行。”梅津退让了。

就这样，裕仁天皇自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向日军统帅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设法尽早结束战争的命令。木户、近卫等“主和派”人物所主张的依靠天皇“圣断”、谋求和平的方案终于开始实施了。铃木在会后说：“陛下今天把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坦率地说了出来，真是惶恐之至。”

第十章　裕仁“圣断”　“鹤声一鸣”

日本的乞降与美国的诱降

按照日本的想法，结束战争并不是要“无条件投降”，而是要通过中立的苏联，以“维护国体（天皇制）”为条件向英、美投降。1945 年 6 月 24 日，秉承裕仁天皇尽快结束战争的面谕，东乡外相再次指派前首相广田弘毅到箱根疗养地拜访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表示日本愿为改善日苏关系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但马立克态度冷淡，仅答应转告本国政府，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后来，马立克就干脆称病拒见广田了。

苏联政府迟迟不作答复，令裕仁天皇坐立不安。此时他已获悉美、英、苏三国首脑即将在波茨坦举行会谈，磋商对日作战及重建战后秩序的问题。为了抢在会议之前得到苏联的支持，7 月 7 日，天皇再次召见了铃木首相，催促他加快同苏联的交涉。并明确指示：向苏联干脆提出恳请调停，或派遣携带天皇亲笔信的特使赴苏交涉。10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派遣使节赴苏。对特使人选，根据天皇授命，决定由前首相近卫担任。

7 月 12 日深夜，东乡外相训令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同苏联政府交涉，并转达了天皇关于结束战争的意图。电报声称：“天皇陛下对此次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牺牲与日俱增，感到痛心，希望迅速结束战争。但在大东亚战争中，只要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帝国为祖国的荣誉与生存计，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由此，增大彼此交战国国民的牺

牲，实非所愿。兹为人类幸福计，切望迅速恢复和平。"[①] 这样，日本在表示愿意结束战争的同时，坚持了"维护天皇制应是起码的条件"这一原则。

电报发出后，近卫开始着手作赴苏的准备。为了摆脱军部的干扰，争取谈判成功，7 月 19 日，近卫拜见天皇，提出在谈判中将绕过内阁直接给天皇发电报，接受天皇的指示。这一建议得到了天皇的同意。

13 日接到外务省的电报后，佐藤大使立即要求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以赴波茨坦行期仓促为由，拒绝会见。直到 13 日傍晚，佐藤才见到了副外长洛佐夫斯基。直到 18 日夜间，苏联政府才复照日本："鉴于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确"，"不能作出任何确定答复"。

那么，此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反对天皇制这一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呢？当时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作过这样的报道：同盟国中废除天皇制的舆论已占上风。多数专家认为皇室与所有的军国主义的神话紧密相关，必须废除。在中国，国民参议会作出决议：提议宣告天皇为对战争、对日本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残暴行为负主要责任的战争罪犯……皇室乃封建主义及侵略的根源，应予废除。而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1/3 的人主张处死裕仁，37% 的人主张审判他、判处无期徒刑或处决，只有 7% 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

但是这种占了上风的正义呼声，并未被主导对日政策的美国政府所接受。1945 年 4 月罗斯福病逝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以格鲁为首的"日本帮"重新得势。

格鲁认为，日本人投降的主要障碍是天皇制问题。如果美国对保留天皇制作出明确保证，就可以促使日本早日投降，并且在美国占领日本时，能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他将其亲信、前驻日大使馆参赞杜曼提升为副国务卿特别助理兼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从而把持了对日决策的大权。当时，美国出于尽快促成日本向美国投降，以独吞战胜日本的胜利果实之目的，决定放弃《开罗宣言》中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既定方针，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诱使日本尽快向美国投降。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

---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原书房，1971 年，第 1620 页。

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同盟国坚持的要求日本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正确主张。关于天皇制问题，公告删去了可以保留“天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这段话，代之以“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6条）。这一笼统而灵活的提法，为日后保留天皇制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7月27日晨6时，东京海外广播局收听到了旧金山播送的《波茨坦公告》。上午10时半，日本政府紧急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日本军政头目和东乡外相就是否接受公告发生了重大分歧。军政头目主张继续坚持本土作战，顽固拒绝接受公告。而东乡外相则认为“这已是日本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条件了”，而且当时苏联还未在公告上签字。因此东乡认为，这表明苏联与美、中、英之间有分歧，苏联对日仍持维持中立的立场，因而还有可能通过苏联调停，放宽公告的条件。所以，东乡力主不要急于拒绝公告，以便留下交涉的余地，等待苏联的态度明朗后再作决定。会议最终同意了东乡的意见。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内阁会议又作出决定，为了避免挫伤国民的战斗意志，决定在日本国内暂不发表公告；同时指示各报刊登载时应低调处理，只摘要公告的内容，而且要用小号字体印刷，政府不发表任何正式意见。对这种藏头露尾的处理方法，军部首脑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政府表明反对《波茨坦公告》的立场。被逼无奈的铃木首相只得在当天下午4时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

> 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①]

铃木的这番话，完全违背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所作出的政府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决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用词不当，甚至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认为铃木在声明中提出日本将对《波茨坦公告》“予以默杀”。据他自己事后解释，他的原意是想表达英语中的“无可评论”一词。但是在英文中，默杀（mokusatsu）这一组合词包含着“不予置理”、“报以沉默的蔑视”、“默然无视”等意思。当他的声明见报后，同盟国方

---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原书房，1971年，第1633页。

面从他的声明中得出了与他本意相反的结论。7 月 30 日，《纽约时报》在头版赫然登出了大字标题“日本正式拒绝同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对铃木的声明，东乡外相气愤不已，他指责军方从中捣鬼，并提出抗议。但已于事无补，同盟国已决定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打击日本，以迫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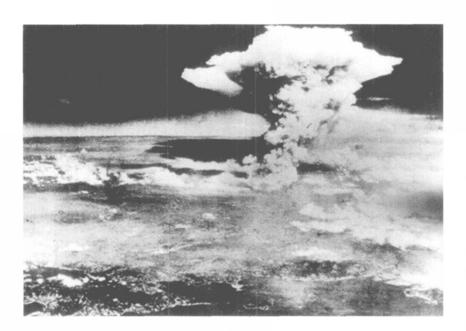
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广岛晴空万里，气候闷热。7 时零 9 分，数架美国飞机飞抵广岛上空，盘旋数圈后离去。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开始了当天的工作。8 时许，又有两架美国 B—29 轰炸机再度飞入广岛市区高空。广岛当局虽然再次发出空袭警报，但市民们认为美机不过是在进行空中侦察，不以为然，行动如常。

8 时 15 分 17 秒，由美国第 509 混合大队大队长保罗·贝蒂茨上校驾驶的 B—29 轰炸机上投下了一个降落伞，携带着一颗绰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其能量相当于 1.25 万吨梯恩梯。旋即发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烈白色闪光，接着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顷刻之间，广岛市上空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火光冲天，可怕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城市。待浓云散去，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景象呈现在人们面前：靠近爆炸中心的人们绝大部分被炸死，侥幸存活的人也呻吟于烧伤之中。据事后统计，经疏散后尚留在广岛的 24.5 万人口中，约 7.8 万余人丧生，5.1 万余人被烧伤或失踪。7.6 万幢建筑物中，约有 4.8 万余幢全毁，2.2 万余幢半毁。

广岛的毁灭，给日本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未收到迫使日本当局立即投降的效果。7 日，日本陆军发布公告称：“一小批 B—29 轰炸机空袭了广岛，造成‘重大损失’，用的是一种‘新型炸弹’。”

日本军部竭力封锁来自广岛的消息，反对东乡外相要求召开会议讨论结束战争问题的建议。从 6 日到 8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直未开会讨论美国投掷原子弹之后的对策。只有东乡外相于 7 日下午向裕仁天皇面奏了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情况。当时天皇面谕：“敌方既然已经使用这种武器，继续进行战争越发不可能了。为争取有利条件，不可错过结束战争



广岛原子弹爆炸

的时机。条件经过协商不会谈不拢的。总之，应该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并令将这一意见也转告给铃木首相。"①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铃木内阁仍然将一丝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争取在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8月8日，一股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再次震撼了日本。当天下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他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自8月9日起，苏联将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两小时后，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近160万苏军，兵分三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面进攻，随即又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向以常胜军自诩的日本关东军很快土崩瓦解。

苏联宣战，使日本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认为，只有放弃抵抗，"接受《波茨坦公告》，才能保持国体"。

9日上午，东乡先后拜会铃木首相和米内海相，商议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以决定停战事宜。天皇也责令木户："你去和首相充分商量一下，苏联既已参战，就要赶紧收拾残局。"

"主和派"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准备，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在

①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年，第212页。

宫中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会的内阁四相和军部两总长面对严峻的现实，都不得不同意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对提出哪些附加条件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会议上，主战派代表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长丰田辅武等，为了试图尽量缩小战败给日本带来的影响，主张提出四项条件：（1）承认日本皇室；（2）自动撤兵；（3）对战争负有责任者由日本自己来惩处；（4）同盟国对日本不实行保护性占领。如盟国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惜进行"本土决战"，"宁为玉碎"，"死中求活"。

与主战派的观点相反，首相铃木、外相东乡、海相米内则主张只提"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一个条件。东乡特别指出：日本已危在旦夕，条件提多了，同盟国可能会干脆拒绝谈判。

直到下午1时，两种意见一直相持不下，会议陷入僵局，只好将问题移交内阁会议审议。就在与会者争吵不休之时，3时传来了消息：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长崎市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使日本人民再一次蒙受了惨重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此时的主战派仍不为所动，坚持己见，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时也未能达成一致。

鉴于两派主张僵持不下的局面，铃木首相与外相东乡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一项无先例可循的措施，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作出"圣断"。

晚10时内阁会议无果而终后，铃木和东乡立即赶往皇宫觐见天皇。东乡首先奏明了两次会议的经过，铃木接着奏请天皇在御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整整一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出的决定。对会上的争论，他了如指掌。在此期间，很早以前就谋求"圣断"的近卫、高松宫、重光葵前外相也分别通过木户上奏天皇，表示反对四项条件，要求天皇作出"圣断"。木户也赞同这些意见，木户还于当日4次晋谒天皇，报告关于促成"圣断"工作一事。此时，天皇对由自己亲自出面作出最后裁决已有准备。因此，裕仁当即批准了首相的奏请。

关于他当时的想法，在《天皇独白录》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 我下此决心是因为，第一，如果继续作战，日本民族就将灭亡，我也无法保护我的臣民；第二，敌人如果在伊势湾登陆，伊

势热田两神宫马上就将处于敌人的压制下，也无法将神器转移，那时神器将难以确保，这样，维护国体就很难了，故而即便牺牲我一个人，也还是讲和为好。①

晚上11时50分，“主和派”精心策划的御前会议在皇宫御文库的地下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位成员外，还有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迫水书记长官、吉积正雄陆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海军省军务局长以及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陆军中将，出席会议的裕仁天皇特意穿上了大元帅的陆军军服，腰间佩戴着系有红穗的元帅刀。当他进入会议室时，提前与会的人员连忙起立向他致最高敬礼。待他在御座上坐定后，会议正式开始。

主持会议的铃木首相让内阁书记长官迫水宣读了《波茨坦公告》，然后由他本人介绍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分歧，接着东乡、米内、阿南、平沼、丰田等分别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从中不难看出，分歧依然十分严重。梅津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支持阿南，海相米内和枢密院议长平沼支持东乡，仍是3:3的僵持局面。显然，如果铃木首相直抒己见支持东乡，东乡派则将以4:3略占上风。但是，铃木首相却故意不说出自己的主张。会议进行了两小时，时间已是第二天（8月10日）2时，铃木首相终于起立发言：“会议已接近两个半小时了，可是尚未达成决议，然而事态又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这虽然纯属例外，我亦诚惶诚恐，既然如此，那就根据圣上的旨意为会议作出决断吧！”言毕，直趋天皇面前请求圣断。铃木的话一出口，令在座的多数大臣震惊不已。此举打破了天皇历来不在御前会议上作出明确指示的惯例，这是自明治以来所没有过的。

面对铃木的请求，天皇会意地点点头，先示意铃木回到座位上坐下，然后站起来说：“那么，我就说说自己的意见吧，我赞成外务大臣的意见。”

接着，天皇又陈述理由道：

所谓本土决战，关键是九十九里滨（位于日本千叶县东部，房总半岛东北部的海湾）的设防，决战师的装备都不充分，飞机

---

① ［日］色川大吉：《昭和史和天皇》，岩波书房，1991年，第255页。

的增产也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计划从来没有按期完成过。这样，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吗？一想到要解除忠诚的军队的武装，要惩办战争的责任者，确实难以忍受。可是，现在却要忍受这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且必须忍耐。想起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的心情，我自己也是饮恨赞成外相的提案的。①

说完这一番话后，天皇慢慢地走出了会议室。在他的身后，响起了一片抽泣之声，有几个人竟号啕大哭起来。铃木首相呜咽着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容分说地宣布："会议到此结束，现在谨以圣上的旨意作为会议的结束。"

御前会议结束后，铃木首相又立刻召集了内阁会议，让全体阁员在一份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上签了字。时间已到了凌晨4时。但尽管如此，围绕对《波茨坦公告》的解释问题仍存在对立意见。

10日上午6时45分，日本外务省正式电告驻瑞士和瑞典的日本公使，分别请两个中立国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达给美、英、中、苏政府，要求尽快得到对方答复。照会表示："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并附一项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仍坚持以保持天皇的最高统治权作为投降的先决条件。10日夜，又通过广播电台向上述四国播发了照会。

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在美国收到照会后，杜鲁门总统立即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并在征得英、中、苏三国同意后，于8月11日复照日本。复照对日本要求的"谅解"条件的答复是："自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

① ［日］河原敏明：《日本天皇——裕仁》，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

本帝国大本营在必要的投降条款上签字……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确定。”

应当说，由美国起草的这一复照，既重申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又巧妙地回避了是否保留天皇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含蓄地答应了日本关于保留天皇制的请求，只是要求天皇必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条件非常宽大。

但是，围绕着如何对待盟国的这一复文，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却再次发生了激烈争吵。以陆相阿南为代表的军部中的“主战派”，坚决反对接受盟国的条件，认为这样将不能维持日本的国体，主张继续战争，顽抗到底。12 日上午 8 时 20 分，梅津和丰田两总长抢先进宫谒见天皇，代表军部要求天皇拒绝接受美国的答复。而原来主和的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亦从国体论的观点出发，表示反对接受盟国的复文，并要求再次发出照会进行交涉。而东乡外相、米内海相和木户内大臣等人则主张接受盟国的复文。上午 11 时，东乡也进宫向天皇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天皇面谕：“我认为可以按照对方答复接受，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指示应将此意转告首相。不料，阿南陆相和平沼议长也去劝说首相，认为如若接受复照，将无法维持国体。铃木首相听后，也赞成阿南和平沼的主张，并于下午 2 时许将此事上奏了天皇。一时举棋不定的天皇，下令再仔细研究一下。

下午 3 时，铃木内阁举行全体会议。东乡外相同阿南陆相发生了激烈争吵，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由于此时的铃木首相也倾向于“主战派”一方，因而使东乡外相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内阁会议结束后，气愤不已的东乡外相前去拜访了内大臣木户，对铃木首相的发言表示了强烈不满，并提出要辞去外相职务以示抗议。木户慌忙劝说东乡打消辞意，并答应由他去说服首相改变态度。

其实，早在内阁会议召开前，木户便继铃木首相之后晋见了天皇，并就接受盟国的复文问题说服了天皇。晚 9 时半，木户会见铃木首相，告诉他说：“陛下的旨意是，可按外务大臣的意见去办。”听说是天皇的旨意，铃木立刻改变了态度，表示同意接受。

与内阁会议召开的同时，裕仁天皇在皇宫御文库的地下室中召集了有 13 名皇族成员参加的皇族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明确表示：“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说说 10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表明的我的决心和理由。在这重大时刻，请各位皇族给予协助。我下了这个这样的决心，以不变更天皇

的统治大权为条件，接受同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接着天皇又用10分钟的时间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讲完之后，皇族成员纷纷表示赞同。最后，皇族中最年长的陆军元帅梨本宫代表皇族表示：“我等全体，誓同心协力贯彻圣旨。”天皇因得到皇族成员的支持而显得格外高兴，下令端上茶点款待皇族成员，并自由讨论了各种问题，至下午6时20分左右方散。

天皇的主意已定，令“主战派”十分沮丧。当晚8时许，阿南陆相拜访了刚从皇宫返回官邸不久的三笠宫，恳请皇弟尽力奏请天皇改变主意。结果遭到了三笠宫严厉的训斥：“陆军自满洲事变以来一次也没有符合天皇意志的行动。到了现在这样的时期还继续抗战，深感意外。”

为了讨论对同盟国复照的态度，13日上午9时和下午4时，日本军政头目又先后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但均无法统一意见。为此，铃木首相只得宣布：“我打算将今天会议的实际情况向陛下报告，再次请求圣断。”

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意见分歧而陷入混乱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美国通过广播公开指责日本故意拖延答复，同时出动大批轰炸机猛袭日本各地。从13日下午3时到14日清晨，美国飞机还在东京等城市散发了上百万份日文传单，传单上印有日本政府8月10日的乞降照会和同盟国的复照，把日本当局一直对内严密封锁的消息公之于众。

为防止传单刺激国内的主战分子和军队，引发混乱或叛乱。14日上午8时30分，木户内大臣携带美国散发的一张传单晋谒天皇，奏请天皇打破以往决策程序的惯例，下令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以及内阁成员一起举行御前会议，借此一举解决问题。天皇当即准奏，并表示如果出现僵局，他将亲自作出裁断。

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战时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皇宫地下室举行。铃木首相首先简明介绍了过去几天各种会议上争论的情况，请天皇在听取意见后作出“圣断”。接着，梅津、丰田两总长和阿南陆相相继起立，声泪俱下地恳请天皇准许再次发出照会，若同盟国不同意，莫如继续作战。这时，与会者发现天皇已在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不时地擦拭着脸颊上的泪水了，随之，会议室遍布啜泣声。

此时，铃木站了起来，他乞求天皇恕罪，再次恭请天皇予以圣断。会议室里的哭声顿时停止，变得鸦雀无声。

天皇打破了暂时的沉寂，开始发表自己的想法。作为国务大臣出席会

议的下村海南在《终战记》一书中对天皇的发言做了记录。天皇说：

如果另外没有别的意见，我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反对意见都分别仔细听过了，我的看法仍和上次谈过的一样，没有改变。

当我充分研究了世界的现状和国内的局势以后，认为再继续战争下去不妥当。关于国体问题，听说有各种疑虑，但据我理解，通过这一复文的文意来看，对方抱有相当的好意。对于对方的态度感到少许不安，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不愿那么怀疑。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全体国民的信念和觉悟。所以，我认为此时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希望大家也这样考虑。

还有，对于陆海军将士来说，像解除武装或保障占领这样的事，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我很理解这种心情。

不过，不管我本人如何，也要营救国民的生命。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最后将使我国完全变成一片焦土，使万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我实在于心不忍，无以对祖宗在天之灵。当然，采取媾和手段，对于对方的做法，难以完全置信，但我想较之日本灭亡的结果还略胜一筹，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

回想明治大帝忍气吞声，断然决定接受三国干涉的苦衷，但愿此时此刻，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团结一致，以求将来之复兴。

想到过去在战场上阵亡的，或殉职死于非命的，以及他们的家属，实不胜悲叹。至于身负重伤、遭受灾难、丧失家业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我深为忧虑的。此时此刻，如果有我应做的事，我在所不辞。如果需要我向国民呼吁，我随时准备站在麦克风前。

由于对一般国民从来什么也没告诉，现在突然听到这一决定，震动一定很大，陆海军将士的震动将会更大。抚慰这种情绪，可能相当困难，希望很好地体会我的心意，陆、海军大臣应共同努力，妥善予以处置。必要时，由我亲自晓谕也行。现在当然要颁发一份诏书，希望政府迅速起草。这些就是我的想法。[1]

---

① ［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 年，第 131～133 页。

天皇讲完话后，转身离开了地下会议室。已彻底绝望的大臣们此时已失去了自制，有的伏案而泣，有的跪地痛哭。对他们来说，比起投降更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天皇将因此而受到的羞辱。

正午时分，御前会议在全体与会者的涕泣声中结束。这是自日本发动“二战”以来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裕仁天皇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天皇制，被迫作出了“终战”的决定。这不仅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帝国第一次承认输掉了一场战争，而且也意味着这个侵略成性的帝国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流血的录音盘”事件

战败已成定局，投降已不可避免。随之，在这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8 月 14 日）中，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日本人都为此紧张地忙碌着。

内阁秘书木原便是那些不知名的人士之一。这位原《报知新闻》驻首相官邸的记者，因战局不利，报社合并，通过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迫水内阁书记长官帮助，当了内阁秘书。没想到，这一工作的调动，却给他那默默无闻的文字生涯留下了辉煌的一笔。8 月 10 日，迫水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为天皇起草“终战诏书”。连日来，他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但进展甚微。为了能使天皇的诏书符合标准的汉语文言文的要求，他还特意搬来了《历代诏敕集》、《内阁告谕集》、《汉日大辞典》、《广辞林》等作为参考。8 月 14 日，迫水在御前会议结束后，拿着天皇的发言记录找到木原，催促他赶快完成诏书草稿。深知事态严峻的木原不敢怠慢，他铺开带红格的内阁用笺，用钢笔写下了改写日本历史的第一句话：“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

就在木原紧张地草拟诏书的同时，另一位不太知名的青年军官也在奔忙着。身为陆军省军务课课员的畑中健二少佐此时正满头大汗地蹬着自行车，穿行于东京的大街小巷。为了阻止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向同盟国投降，畑中及其同伙连日来一直在密谋活动。他们曾闯进陆相阿南的家中，要求阿南运用他的一切权力阻止接受《波茨坦公告》。阿南碍于自己

的身份，没有公开表态，但他也没有禁止自己的部下进行非法的冒险活动。接着，畑中等人又闯进了肩负保卫东京和关东平原重任的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的办公室，试图得到东部军的支持。但田中大将不仅断然拒绝合作，而且痛骂着把他们轰出了办公室。最后，他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师团身上。

下午，在宫内省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大桥八郎、国内局局长八户桂二郎、技术局局长荒川太郎正在紧张地安装着录音设备。因为内阁提出，让天皇直接向国民广播诏书，是对天皇不敬，因而决定事先录好音后再进行广播。迄今为止，日本的国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天皇的声音。一想到这一点，大桥等人便深感责任重大。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安装好的设备，以期确保录音时万无一失。

太阳已经西沉，裕仁天皇一边照例在吹上御苑散步，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内阁送来诏书，好去录音。8 月 14 日下午 1 时，铃木内阁的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将木原草拟的诏书，又补充了上午御前会议上天皇圣谕的内容后，递交阁员们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就这样，经过六七小时的反复推敲修改、定稿、誊清，晚 8 时半，铃木首相才入宫将诏书的定稿送交天皇审阅。天皇在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御玺，全体阁僚也一一签名，此时已是晚 10 时左右了。

晚 11 时 25 分，裕仁天皇在情报局总裁下村宏的陪同下，来到宫内省二楼的政务室。

天皇径直走到麦克风前，问道："说话声音应该多大?"

下村宏回答说："用圣上平常讲话的声音就行了。"说完，他上前一步，举起了戴着白手套的手，示意隔壁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开始录音。

在御文库，天皇已经事先练习了好几遍。但第一次录音还是有些紧张，声音稍微低了些，有些地方也念漏或念错了。

8 分钟后，天皇念完了诏书，问道："行吗?"下村回答说："很好，只是有几处没读清。"

于是，天皇提出再录一遍。下村宏再次向工作人员举起了白手套，天皇独特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又一次灌进了唱片的纹路之中。可能是紧张吧，这一次声音又偏高了些，而且仍有个别地方念漏了。

"再读一次吧。"显然，天皇也担心第二次仍然没有录好。

"这样就可以了。"恭候在旁边的宫内相石渡庄太郎和藤田尚德侍从长

经过短暂商议后回答说。在场的人们看到天皇念诏书时的沉痛表情，觉得不能再让天皇第三次受这样的罪了，遂决定不再录了。

两次的录音盘，很快便被天皇的侍从德川义宽锁进了宫内省的保险柜中，准备第二天送往广播协会于中午 12 时对外播出。

15 日零时五分，天皇返回了御文库。就在他就寝之际，外务省发出的电报正经过瑞士和瑞典转往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重庆等地。电报内容是通知各同盟国：天皇陛下已颁布了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的诏书。

就在天皇录音刚刚结束时，日本陆军中的一批法西斯青年军官为抢走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录音盘，竟在宫城内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叛乱。

这次叛乱的首领有日本陆军省军务课的畑中健二少佐、椎崎二郎中佐以及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的参谋石原贞吉、古贺秀正两少佐。他们计划占领皇宫，夺取天皇录音盘，以阻止广播投降诏书；推翻主和派政府，由军部组成新政府，以便继续进行战争。

深夜 1 时许，以畑中为首的主谋者们赶到了位于皇宫附近的近卫师团长森刚中将的办公室，要求他支持政变行动。森刚虽然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同情，但对自己参与政变却有些犹豫。只得推辞说："让我到明治神宫去洗一洗不纯的脑子，然后再正式作出决定。"

"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畑中怒气冲冲地喊道，随即掏出手枪对准森刚扣动了扳机，森刚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畑中连忙取出森刚的印章，盖在了事先起草好的《第 584 号帝国近卫师团战略命令》上，然后让卫兵火速送交有关指挥官，政变终于爆发了。

担任守备皇宫的近卫步兵第 2 联队长芳贺平次郎大佐，接到伪造的命令后，不疑有诈，立即调动兵力，解除了皇宫警察的武装，封锁了皇宫的各个出口，切断了皇宫与外界的联系。同时派兵占领了东京广播协会大楼，控制了广播。同联队长芳贺一样，被派去包围皇宫的 1000 多名官兵并不知道自己参加了叛乱，还以为是去增强保护天皇的警卫力量呢。

参加录音的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和日本广播协会工作人员正准备乘汽车离开时，在皇宫外面被上了刺刀的士兵拦住。由于下村宏的秘书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致使所有人都被带去盘问。其中有人泄露：录音盘已交给一名宫内侍从保管。于是，一支搜索队在因停电而漆黑一片的宫内省大楼里搜索起来。

睡在宫内省四楼的内大臣木户被窗外纷乱的噪声惊醒，这时侍从户田匆匆来报："近卫师团发动政变，已经占领了皇宫，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许任何人进出。而且叛军已进入宫内省，正在搜捕您和寻找录音盘。"

"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类事，陆军是该死的笨蛋！"木户稳定了一下情绪后，立即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匆忙收集起绝密文件，撕得粉碎，扔进了抽水马桶。随后，巧妙地躲过叛军的搜索，钻进了被称为"保险银库"的地下室。他发现叛军正在搜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宫内大臣石渡也躲在这里。

叛乱者成功地孤立了天皇，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更令人沮丧的是，被畑中派去说服东部军参加政变的井田中佐带回来的是"东部军不介入"的坏消息。叛乱策划者们由此人心浮动，对政变成功的前景产生了怀疑。蒙在鼓里的芳贺联队长也觉得不对头，连声追问为何一直看不到森刚司令官？畑中极力回避，但古贺少佐不愿再保持沉默，向自己的上级坦白说森刚已死，并敦促芳贺指挥近卫师团。正在这时，东部军参谋长高岛辰彦打来电话，命令畑中停止叛乱，服从天皇大命。畑中不肯就此收场，提出在天皇讲话录音播放前给他10分钟的广播时间，用来阐述少壮派军官们"造反"的理由。高岛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畑中的要求。芳贺联队长此时才恍然大悟，冲着畑中等人大吼起来："原来你们一直在骗我，利用我，这是造反——我绝不加入！"稍微冷静后，他命令畑中马上离开皇宫。

凌晨5时许，东部军司令官田中大将驱车匆匆赶到皇宫同芳贺会见。向芳贺说明近卫师团长森刚中将已经遇害，师团长的命令是伪造的，命令芳贺把部队撤回原地。叛乱被制止了，包围皇宫的官兵有秩序地撤出了皇宫。

此时，早已被侍从们叫醒的裕仁天皇，已穿好了大元帅陆军军装，正准备直接去向叛军讲话。当他得悉田中将军已经进宫控制住了叛军后，不由得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道："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处境吗？"

比起那些叛乱军人，陆相阿南似乎更理解天皇的"处境"。这天晚上，他没有参加叛乱，而是由他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陪着通宵豪饮。拂晓时分，阿南在留下"蒙君厚泽，死而无憾"、"弥天大罪，以身谢之"的绝笔后，用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南是第一个因战败投降，为逃脱盟国的审判和惩罚自杀身亡的高级将领，却不是最后一个。继他之后，陆军将官级将领中，另有29人自杀，包括陆军元帅杉山元、前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而海军中也有4名将级军官自杀，包括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中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未能逃脱应有的惩罚。就在阿南自杀的当天上午，因政变失败而彻底绝望的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秀正少佐在森刚师团长的遗体前剖腹自杀，畑中少佐和椎崎中佐也在皇宫前的草坪上双双用手枪自杀。

御音播送

1945年8月15日7时21分，日本广播协会向全国播发了一个特别通知：天皇陛下已发布诏书，将于中午12时播出，届时请全体国民恭听天皇“御音”。

聆听天皇“御音”，这对大多数国民来说是第一次。全国停止了一切活动，人们很早便守候在收音机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候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是结束战争，还是本土决战？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猜测着、期盼着。

12时整，广播里传出了日本最著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的声音：“从现在开始有重要广播，请全体听众起立！”

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全国听众，凡能站立者都肃然起立，唯一能站而未站起来的只有天皇本人。天皇所在的房间约20平方米，因为是地下室，所以没有窗户。除天皇外，有两名侍从在一旁侍立。他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注视着桌子上放着的收音机，神情紧张地等候着诏书的播出。

广播里再次传出和田的声音：“天皇陛下将对全体国民颁布诏书，现在敬请开始御音播送。”

随着国歌《君之代》播放完毕，广播里传出了天皇那特有的令人敬畏的抑扬顿挫的声音：

致忠良臣民：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

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4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国公告者也。

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亡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事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激，枉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宣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随后，又传出缓慢悲凄的《君之代》的乐曲声。广播员接着播送道：

天皇陛下的御音播送已经完毕。天皇陛下为开万世之太平，已于昨天指示政府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对这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国民诚惶诚恐，一亿均为感泣。我等臣民只有遵奉诏书旨意，维护国体，保持民族荣誉，灭私奉公，谨奉读诏书。

接着，播音员又以平淡的声调重读了一遍诏书。从开始播送到结束，正好用了14分钟。天皇听着自己的声音，一直全身纹丝不动。等广播播送完后，天皇站起身回到会议室。

电波载着天皇的声音飞进了千家万户，这是日本国民第一次听到战争的真实情况：日本战败了，这也是日本大多数国民第一次听到天皇那神圣的声音，所谓的“鹤声一鸣”①。

当时的录音和广播设备不佳，播放诏书时杂音干扰很重，诏书又是用非白话体裁写成，再加之裕仁那特有的发音，多数人并没有完全听明白诏书的内容。但从当时的气氛和断断续续的语句中，人们还是体会到在这场持续了多年的战争中，日本败了。

御音播送，令体验到战败的日本国民呈现出复杂的心态。有的因怀念死去的亲人而痛苦不已，有的因战败的耻辱而剖腹自杀；但更多的人因终于熬过了战争而如释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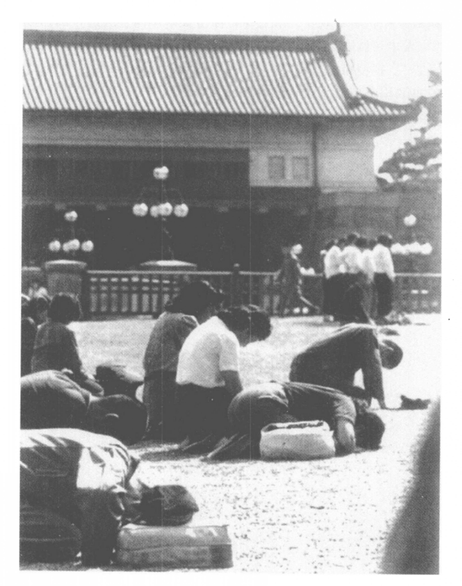
播送完毕不久，皇宫前广场上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市民和下级军官。他们有的站在那里默默祈祷，有的伏在地上把额头触到白石子上，也有的在行最敬礼，还有一些人一边哭一边唱着《君之代》。哭泣之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

“御音广播”结束后，日本第5航空舰队司令宇垣缠中将，仍然驾驶舰载轰炸机“慧星号”飞向冲绳，向美国舰队施行了最后一次的“特攻”攻击。

日本长期的对外侵略战争，终于以天皇的“御音广播”正式宣布结束。由于日本的投降是以“圣断”的形式确定并由天皇公布的，故而日本的某些史学家曾以此来歌颂裕仁天皇的“圣德”，认为“天皇从危地拯救了日本民族”。诚然，如果没有天皇出面，军部主战派还会将日本国民拖入新的战争深渊。在这一点上，天皇确实发挥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但通观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无一不是经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批准实施的，裕仁天皇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头号罪犯。在日本，只有天皇才拥有决定宣战和投降的权力，既然发动战争是按照天皇的命令进行的，结束战争当然也需要有天皇的命令。而且，停战投降，也并不是天皇主动倡导

---

① 鹤声一鸣：在古代，鹤是天皇的象征，天皇的御音被视为“鹤鸣”。



播放终战诏书后跪在皇居前的日本国民

的，而是在重臣力奏停战、战局难以为继、天皇制面临生存危机的严酷现实下作出的无奈抉择，也是天皇为保存皇室的特殊地位而采取的“舍车保帅”之举。

另外，上述所谓的“御音广播”，并无片言只语明确承认日本是战败投降，更没有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表示出悔过之意。明明是日本妄图通

过侵略战争称霸亚太地区，诏书却还标榜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的这场战争“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侵犯他国主权及领土则“固非朕之本志”。把侵略说成自卫，其强词夺理的语调同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宣战诏书如出一辙。尤其是天皇竟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将“维护国体”作为既定的事实，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号召臣民“举国一致，子孙相传”、“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其真实目的昭然若揭。

第十一章　众大臣频频被捕
天皇制岌岌可危

日本投降后天皇的忧虑

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19分，一架美军C—54大型运输机呼啸着降落在位于日本横滨的厚木机场。与其他涂成保护色的美军飞机不同，这架飞机外表花哨，机首绘有菲律宾吕宋岛的地图，机身印有“巴丹”字样。这便是美国五星上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座机。

舱门打开，时年65岁的麦克阿瑟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踏上了舷梯。他身着开领军便服，戴着墨镜，嘴里叼着长管玉米芯烟斗。在走下短短的舷梯时，他两次收住脚步，盛气凌人地环顾着四周。

踏上日本国土的麦克阿瑟带来了一支46万人的美国占领大军，这些陆海军部队将分别陆续从横滨、横须贺登陆，进驻东京和日本全国各地；太平洋舰队停泊在东京湾。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也带来了一把悬挂在裕仁天皇头上的上方宝剑。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在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就他的权力作了如下说明：“天皇和日本政府，是在你、盟国最高统帅的领导下，被授予治理国家的权力的……由于阁下的权力至高无上，在权限上无须接受日方的任何异议。”

尽管麦克阿瑟的正式身份仅为盟国最高司令官，但《麦克阿瑟》一书的作者小克莱·布莱尔还是把他更为形象准确地称为“是独裁者，是殖民地总督，是日本幕府时期的将军，是沙皇”。而日本人则把他称为“蓝眼睛的太君”、日本的“太上皇”。



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

原定于8月底举行的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因受台风影响改在9月2日举行。9月2日上午9时许，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军巨型军列舰上，隆重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他首先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们，各主要交战国的代表们，今天会聚于此，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我宣布，我将遵循我所代表的各国的传统，以正义和宽容的态度履行我的职责，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投降条款完全地、迅速地、忠实地得到遵守。”

接着，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大本营出席仪式并在投降书上签字。重光葵曾在“一・二八”事变时被炸断了一条腿，他那副可怜相充分象征着日本战败的惨境。随后，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他先后用了五支“派克”自来水笔，才

签完了自己的全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继他之后，代表美国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中国的徐永昌将军、代表英国的福莱塞海军上将、代表苏联的杰列米扬科中将以及其他五个同盟国的代表相继签字。

签字完毕后，麦克阿瑟再次发表简短讲话：“让我们祈祷吧！和平已在世界上得到恢复，愿上帝永远保佑它！”

麦克阿瑟的话音刚落，天空中便传来嗡嗡的机群轰鸣声，数千架美军飞机呼啸着掠过“密苏里号”战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随着签字仪式的结束，日本天皇、政府的国家统治权便被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领导之下，麦克阿瑟也由此完成了他作为日本“太上皇”的“加冕”仪式。

9月8日，暂住横滨“新大饭店”的麦克阿瑟元帅入住美国大使馆。17日，将坐落在皇宫护城河畔的第一生命馆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简称GHQ）。

就在举行投降签字仪式的第二天，一向对各种祭拜仪式循规蹈矩的裕仁天皇，决定举行“战争终息亲告仪式”，向皇祖皇宗禀告日本这次史无前例的投降。

这一天，裕仁天皇在高松宫、三笠宫，以及东久迩宫、近卫公爵的陪同下，来到供奉天照大神神镜的贤所，向皇祖皇宗行礼后宣读了《御告文》，向皇祖皇宗禀报了日本战败的事实，表达了自己对虽有天神庇护而仍然战败的歉疚之情。

每当裕仁拿起那份令他的帝国最终屈服的《波茨坦公告》时，他的目光便会久久地停留在公告的第10项条款上：“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对于在青少年时期便熟读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裕仁天皇来说，“战争罪犯”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如今，日、德、意三国元首中，活着的只有他自己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将如何？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是否会将自己送上被告席和断头台？每思及此，裕仁总感到不寒而栗。

裕仁天皇作为陆海军大元帅、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对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裕仁比谁都清楚。当时，国际上要求审判和惩办天皇的呼声也极为高涨。苏联、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将

裕仁列为第一号战犯，要求起诉和审判天皇。澳大利亚政府在致英国政府的电报中称："天皇作为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罪行负责。"并致电华盛顿说："不应豁免天皇对日本从事侵略战争所负的罪责。"美国舆论界也强烈要求审判天皇，全美律师协会散发文件，要求逮捕并审判天皇。受美国政府委托，当时曾进行过"应如何处置战后的天皇"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其中77%的美国人要求惩办天皇，36%的人要求处死天皇。正如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后来对重光葵首相所说的那样："当时世界舆论中占上风的看法是，天皇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高负责人，应该接受国际审判，并被处以绞刑。"

天皇身边的重臣们也有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主张裕仁退位的。在战争结束前，近卫就曾从结束战争的角度提出过天皇退位的设想，他的想法是天皇退位后，在京都安闲度日，这样可以缓和盟军总部的情绪，是一条防止指名天皇为战犯和废除天皇制的途径。近卫曾对内大臣木户说："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对方就会对陛下和天皇制双管齐下，采取措施。关于国体，我想还是通过国民投票确立天皇制为好。陛下退位，由高松宫摄政不是很好吗？至于国民投票，若现在进行，天皇制将会得到维持。以后进行将会怎样？可能越往后拖，支持共和制的人就会越多。"木户、东久迩宫等人也都考虑过这一问题。东久迩宫也是一个积极的让位论者，他主张天皇最好是退位，以表示对战败的反省。也就是从那时起，天皇变得不太喜欢近卫了。天皇虽然不反对退位，可是他怕退位成为导火线，进而发生无法估量的混乱，尤其是为年幼的皇太子明仁担心。

投降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也明确地承认天皇应对战争负责，但他却反对让天皇退位。战后不久，他曾对其亲信左近司政三说过："陛下承担战争责任最为合理……我决不赞成天皇退位，应该继续在位来承担责任。"但是，随着美军进驻日本，除近卫等少数人仍主张让天皇退位外，多数重臣都打消了这一念头。这不仅是因为盟军开始逮捕战犯，他们担心一旦天皇退位，成为平民，会被盟军作为战犯轻易地起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天皇退位会导致天皇制的崩溃。木户在劝阻天皇不要退位时就曾这样说过："圣虑宏大，深为感激。但如果提到退位，就会动摇皇室的基础，其结果会引起同盟国中'建造民主国家（即共和制）之议论'，先看看对方的意见再说。"受维护天皇家血统、维护天皇制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支配下的裕仁天皇，想到退位会危及

到天皇制的存在，便只好打消了退位的念头。

维护天皇制的皇族内阁

在日本投降之际成立的以东久迩宫为首的皇族内阁，也在为维护天皇制的生存而竭尽全力地与麦克阿瑟周旋。

东久迩宫是在 8 月 17 日即铃木内阁总辞职后就任内阁首相的。当时，内大臣木户鉴于日本已进入“非常时期”，遂策动天皇，打破召开重臣会议推荐首相的惯例，由天皇直接钦命东久迩宫组阁。

皇族组阁，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并无先例。自明治以来，考虑到皇族涉足政治有可能牵连天皇，因此皇族不得组阁被作为一条禁令规定下来。在“二二六”事件后以及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后，都曾有人提议由东久迩宫出面组阁，但均遭否决，理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起用皇族。

值此日本战败、天皇制面临生存危机之际，天皇和木户都认为这一“万不得已”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使数百万狂热效忠于天皇的日军放下武器，接受投降，非皇族成员出面不可；其次，成立皇族内阁会使日本国民认为皇室勇敢地承担起战败的责任，或许还会使美国人视皇室成员为和平主义者；最后，在天皇统治面临空前危机的背景下，只有寄希望于能够与天皇同舟共济的皇族内阁才能支撑下去。

在对日本实施占领不久，麦克阿瑟便实行了一系列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非军事化政策，如解除日军武装、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等一系列措施。对此，裕仁天皇和东久迩内阁出于维护天皇制的需要，给予了“积极合作”。但某些触及天皇制的改革措施，则无一不使他们感到恐惧与不安。

8 月 28 日，为了向日本国民显示天皇的恩惠。经裕仁批准，东久迩内阁宣布将皇室林野中的 100 万方木材分配给战争受害者，后又宣布出售天皇的三所离宫用于战灾救济。对此，占领军司令部认为天皇此举意在缓和国内外要求惩办天皇的情绪，同时还打算用皇室财产作为战争的赔偿费用，并将其列入即将实施的征收富人财产税的对象，因而禁止皇室实施这

种救济。[1] 这使天皇和东久迩皇族内阁深感不安。

美国进驻日本之初，曾拟实施军政，直接统治日本。在已占领的冲绳、奄美岛，美军早已实施军政，由美国行使行政、司法大权，并使用美军发行的军票。9月2日，即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当天下午，驻日美军副总参谋长马歇尔少将将经由麦克阿瑟签署的《告日本国民书》等三份布告文件递交日本政府，并要求其迅速公布。三份布告的主要内容有：宣布盟军最高司令官对日本国的全部领土和居民实施军事管制，日本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一律在最高司令官职权下行使；凡违反军令、妨碍治安和抵抗者将在占领军法庭受到惩罚；在日本通行军票等。

东久迩内阁面对三份布告惊恐万状，唯恐布告发出后会使国民震动，损害国体的基础，乃至剥夺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力，造成占领军直接统治的局面。因而连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内阁会议结束后，外相重光葵奉命晋见了麦克阿瑟元帅，向他阐述道：结束战争是天皇直接作出的决断，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未预定要以取代日本政府的方式直接颁发军政令，日本内阁将诚心诚意地履行《波茨坦公告》，因而美国通过日本政府来实行占领政策，将是最为明智的策略。最后还警告说：如果由占领军推行军政，或许也就是混乱的开端，对此后果，日方不能负责。[2]

既然日本政府表示愿意充当美国的驯服工具，麦克阿瑟遂改变初衷，决定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同意停止公布上述布告，东久迩内阁暂时渡过了这场国体危机。

东久迩内阁在尽力与盟总周旋的同时，也在极力为天皇开脱罪责，维护天皇制。

8月28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用抽象的所谓“一亿总忏悔”来模糊和淡化作为个人的天皇的战争责任。9月4日，日本第88届临时议会开幕，东久迩首相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继续鼓吹他的“一亿总忏悔”论。议会通过了“承诏必谨”的决议，同意了这一似是而非的论调，给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种糊涂和淡化侵略战争罪责的谬论，对战后日本政局和社会舆论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妨碍了彻底揭露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埋下了复仇的祸根。

---

① ［日］袮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② ［日］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下卷），中央公论社，1952年，第301～303页。

9 月 12 日，东久迩内阁又匆忙通过了一项决议：由日本自己的司法机构逮捕并审讯战犯嫌疑人。其目的是想使昔日的天皇重臣们免遭被美军强行逮捕的侮辱，并可对其实行宽大处理。但当东久迩首相请天皇批准这一决议时，却遭到了天皇的反对。裕仁表示：敌方所列举的战犯均是对朕竭忠尽义之人，如以朕的名义处罚他们，实在是于心不忍。

不仅天皇反对，而且占领军当局也不同意。因此，对战犯的审判仍将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但东久迩内阁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存在，仍通过交涉从占领军手中接过了逮捕战犯嫌疑人的任务，然后再将其转交给美国宪兵。考虑到外务大臣重光葵曾是侵华的急先锋，难得美国人青睐，遂决定让重光葵辞职，“代之以能与麦帅对话的外相”——吉田茂。

吉田茂是原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女婿，1927—1930 年曾任外务次官，其后出任驻英大使，曾反对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1938 年因陆军反对他出任外相而辞职赋闲。辞职后，一直为阻止日美开战及停战媾和而奔走于牧野伸显与美国驻日格鲁大使之间，曾一度被军部逮捕入狱，因而成为著名的“反军反战的英雄”和亲英美派人士。吉田出任外相后，多次拜见麦克阿瑟，双方建立了“亲密无比”的关系，在占领军总司令部与皇室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

9 月 15 日，为了试探美国对是否保留天皇制的态度，东久迩宫首相和留任的海军大臣米内拜会了麦克阿瑟。见面之后，东久迩宫直截了当地问道：“天皇是不是必须退位?”麦克阿瑟答道：“不是，天皇在盟军进驻和解除日本陆海军武装方面给予了很大帮助，所以完全没必要考虑退位的问题。天皇制要不要存在下去，这完全是日本自己的问题。”

美国政府虽然主张保留天皇，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触动天皇制。他们不能容忍作为滋生法西斯主义温床的封建专制天皇制的继续存在，也不能容忍天皇披着神的外衣继续总揽统治大权。因此，美国政府在庇护、利用天皇的同时，对天皇制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东久迩内阁虽然小心翼翼地同占领军当局进行周旋，但其力图原封不动地维持旧天皇制的统治秩序、抵制民主化改革的立场，仍然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不满。为防止国内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势力冲击天皇统治体制，东久迩内阁上台后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战前日本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并于 8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言论、集会、结社的处理方针》，扬言要严厉取缔反对国体的团体和言论。东久迩内阁这种极端露骨

地维护国体的言论和行动，致使本来对天皇持宽容态度的麦克阿瑟也担心若置之不理，将会招致同军国主义合流的嫌疑。而恰好在此时发生的“天皇照片风波”，进一步加速了东久迩内阁的倒台。

9月27日，裕仁拜访麦克阿瑟后，日本准备在各报第2天的头版头条报道这次会见的消息，同时附以盟军总司令部向报社分发的麦帅和天皇并肩而立的合影照。照片上，身高一米八多的麦帅身着便装，双手叉腰，叉开双腿，悠然自得地站在天皇一旁，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而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的天皇则身穿礼服，神情呆板拘谨，摆出立正姿势。两相对比，形成鲜明的反差，俨然是战胜者和战败者的逼真写照。

在东久迩及其内阁看来，发表如此贬低天皇形象的照片，实在是大逆不道。遂命宫内省于28日深夜向有关各报发出紧急指令，停止出售第2天的报纸。

占领军司令部闻知此事后，立即展开坚决反击。29日中午，以麦帅指令的形式发出通告：“撤销对新闻及通讯自由的一切限制”，并声明该指令适用于报道麦帅与天皇会见一事。同时又召集各报负责人，指令发行被禁止发售的报纸。

占领军的强硬态度使东久迩内阁狼狈不堪，不得不撤销了已发出的禁令。10月4日，总司令部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又称“自由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废除《治安维持法》等13个法令，立即释放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废除“特高”警察，解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一切限制，其中包括对天皇、天皇制及政府自由议论的限制。

这道指令，对以维护天皇制及其统治秩序为己任的东久迩内阁来说，堪称是致命一击。东久迩深感“内阁已失去了元帅的信任”，加之他根本不愿意执行这一指令，遂于10月9日宣布内阁总辞职。该内阁任期仅50多天，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短命内阁。

重臣纷纷被捕

9月21日，4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在鹿儿岛县的一个村庄，向身着戎装的天皇以及皇后的“御像”举枪射击，在刺鼻的硝烟中，“御像”的

碎片纷纷飞散。自从1928年裕仁登基大典后，天皇和皇后的“御像”便在各级学校、府、县政府所在地、军队和军舰以至于村庄供奉着，并由专人负责保管。在大正期间，身为小学校长的作家久米正雄就因天皇的“御像”烧毁于火灾中而谢罪自杀。损害“御像”被视为“不敬罪”，是要杀头的。



1928年登基大典后悬挂于全国各地学校及军队的天皇夫妇的“御像”

这一事件发生后，当时的东久迩内阁曾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抗议：“日本政府在促使总司令部严加注意的同时，望最高司令部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抗议归抗议，但在战败投降的处境下，宫内省也认为继续悬挂戎装天皇的玉照已经不合时宜了。为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宫内省不得不于11月底向全国发出了“送还御照”的通知。同年底，被“送还”到宫内省的约1000幅“御像”，在“贤所”殿旁处理后，在护城河畔被焚烧了。进入1946年后，各府、县政府所在地也先后举行了御像焚烧仪式。曾被安放在全国各中小学的奉安殿中、朝夕受到学生们顶礼膜拜的“现人神”化为灰烬了。[①] 望着各地“焚烧仪式”上冒出的缕缕青烟，裕仁天皇

① ［日］高桥弘：《天皇秘闻》，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8～53页。

又怎能不感到心惊肉跳呢?

更使天皇寝食不安的，莫过于占领军逮捕战犯了。1945 年 9 月 10 日，盟军总司令部战争罪行调查局确定了即将逮捕的第一批 38 名战犯嫌疑人名单，名列榜首的便是东条英机。

第二天下午 4 时，美军军官克劳斯少校率领宪兵包围了东条英机的宅邸。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早已预料到末日来临并做好了自杀准备的东条英机从客厅的窗口探出头来，平静地问道：“有逮捕证吗?”克劳斯向他出示了证件。

“明白了，我就去开门。”曾经在战时制定过“活着不受俘囚之辱”的“战阵训”的东条，随即关好窗户，返身坐到一把扶手椅子上，用手枪对准事先已用炭笔标出的心脏位置开了一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子弹刚好错过了他那颗畸形的细长心脏，打穿了他的肺部，在他的前胸和后背留下了两个弹孔。破门而入的美国宪兵叫来医生，给他缝好前胸后背的伤口后，将他送到了横滨美军野战医院，东条又活过来了。这个战争狂人未能逃脱同盟国的审判。

9 月 13 日，盟军总司令部又公布了第二批战犯嫌疑人名单，前首相广田弘毅等人名列其中。19 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了第三批准备逮捕的 11 名战犯，其中有前首相小矶国昭、曾任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等人。本庄繁得知消息后立即畏罪自杀了。

此时的裕仁，不仅为愧对皇祖皇宗而感到内疚，同时也为盟国占领军开始逮捕他的忠实爱将而痛苦万分，并因此萌动了退位念头。他曾与木户商量道：“昨天还是我所依靠的人们，今天就被作为战争责任者交给了美军，实乃痛心难忍之事，能否由我一人承担，哪怕退位也可。”① 但使他仍抱有一丝幻想的是，他看到前三批战犯嫌疑人均为战时的军政首脑，尚未波及皇族和近臣，因而他认为盟军总司令部确定的战犯大概只局限于这个范围。

但他的这一幻想很快便破灭了。12 月 2 日，盟军总司令部又公布了第四批 59 名战犯嫌疑人名单，天皇的叔父梨木宫守正亲王赫然名列其中。梨木宫虽然是陆军四元帅（另外有杉山元、畑俊六、永野修身）中地位最高的，但年已 72 岁，也是皇族中的长者；而且在七七事变前便退出了第一

---

① ［日］河原敏明：《日本天皇——裕仁》，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163 页。

线，主要担任供奉天照大神神灵的伊势神宫的主持等职务，在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上，远不如皇族中的其他 6 位陆海军将领严重。但出人意料的是，梨木宫却首当其冲。听到这一消息后，梨木宫大惑不解地向美国通讯社记者嘟囔道："我不懂，为什么把我划为战争责任者，从满洲事变开始我就表示反对，而且，从昭和十三年（1938 年）担任伊势神宫的主祭起，从来没有陷进战争里去……"后来才获知，美国占领军之所以逮捕他，就是因为他充当了"神宫祭主"和"大日本武德会（剑道的振兴团体）总裁"。因为在同盟国看来，神道教是鼓吹天皇至上的超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疯狂支持战争的精神支柱。

皇族被指定为战犯，使裕仁天皇切身感到追究战争责任的浪潮已向他逼近了。日本政府、宫内省认为，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一事态的发生，否则会造成拘留天皇的借口。遂以梨木宫年老体弱为由，恳请盟军总司令部缓期拘留，但遭到了盟总的严词拒绝。

12 月 11 日，裕仁在宫中宴请梨木宫，与之话别。裕仁眼泪汪汪地说："拘留所可能很冷，请您保重身体。"临别时，还赐给了梨木宫两条毛毯。次日晨，梨木宫被送往东京巢鸭监狱，他向前来送行的亲属说："我好像是去充当皇族的总代表，审问也审不出什么来。我权当替陛下而去，大家不必担忧。"四个月后，梨木宫被突然无罪释放。但他从此将自己禁闭起来，又加之家中两次被盗，许多所藏珍品被洗劫一空，受此打击，梨木宫于 1951 年元旦突然死亡。

令天皇担忧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梨木宫被逮捕一事刚刚过了 3 天，号称华族"双璧"的前首相近卫和内大臣木户也收到了逮捕令。逮捕令要求他们于 12 月 16 日前往巢鸭监狱报到。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裕仁天皇似乎已在劫难逃。

对于裕仁天皇来说，木户是第一亲信；近卫是五摄家之首，出自与皇家血缘最深的门第，并曾三次出任内阁首相。但是，当他们两人即将被关进监狱时，裕仁天皇却表示出了亲疏分明的态度。

在得知木户即将被关押后，12 月 10 日，裕仁天皇令藤田侍从长召木户进宫，准备为他设宴告别。木户对藤田说："现在已沦为嫌疑战犯，就不必再麻烦陛下了吧！"但天皇立即回复："从美国来看是有罪的人，从我国来看则是有功的人，如果有所顾虑，那就派人把饭菜送去吧。"

听到天皇这番话，木户十分感动。下午 5 时，木户诚惶诚恐地来到皇

宫，与天皇共进了晚餐。用餐后，天皇将一方雕花镶金的中国产端砚赐给了木户，皇后则赠给他一张贵重的大桌子。实际上，早在11月24日撤销内大臣府时，天皇除了赐给木户10万日元和两副四季花图案的挂轴外，已经送给他一方端砚了。在日本，将砚台赐人自古以来便是主人对臣属表示信任的一种方式。而天皇连送两方端砚给木户，无疑是希望这位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了如指掌的重臣不要在受审时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告别时，裕仁天皇又闪烁其词地向木户传达了一个关键口谕："这次，我确实十分难过。请多保重。我们之间从来无话不谈，我相信你非常理解我现在的心情，请向他们（其他被监禁者）多加解释。"显然，这又是在暗示木户要让那些已经被关押的文武大臣们明白，无论如何不应在未来的审判中牵连天皇。对此，心领神会的木户当即表示："誓死遵照圣上旨意去做。"

与木户受到如此厚待和信任相反的是，裕仁天皇对近卫却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甚至未与近卫见最后一面。因为近卫在战败前就主张天皇退位，战败后仍主张让天皇承担战争责任并让出皇位。故而使裕仁耿耿于怀，彻底疏远了这位昔日的重臣密友。

但是，此时的近卫对天皇的态度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已决心前往另一个世界了。12月15日晚，他在自己的豪华别墅"荻外庄"举行宴会，同他的至亲故友饮酒畅谈至次日凌晨方散。客人们走后，他返回卧室，与平时要去睡觉时无异。第二天早晨，当他的夫人走进卧室时，才发现他已裹着一块白布死去了。时年54岁的近卫自杀，既未用枪，也没用刀，而是服用了剧毒氰酸钾。据说，与皇室有血统关系的华族不能流血而死。他的夫人在桌子上发现了他的遗书："自日中战争爆发以来，我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但是，作为所谓战犯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使我难以忍受。"①

近卫在自杀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日本的宪法，以天皇亲政为前提，这与英美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在军队统帅的问题上，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能够控制政府和军队统帅部的，只是陛下一人。而且，在日美谈判中，我深深地感到，陛下平时对某些问题采取消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决定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情况下，陛下光是说要鼓励、要注意，那是没法使军事当局和外交当局取得一致意见

---

① ［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的。”据说裕仁在后来看过这段回忆后，很不高兴地说：“怎么近卫尽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呢?”

近卫的自杀，无疑是为了逃脱审判，维护其家族的所谓荣誉。但他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曾向其高中时代的密友后藤隆之助道出了另一个缘由：“估计主要是审问我有关七七事变的问题，如果追问事变根由，那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队统帅权的问题。这势必涉及最高统帅天皇的责任，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近卫的此番话表明，他之所以选择自杀正是为了不牵连天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卫虽然在战后备受天皇冷落，但仍以死维护天皇。而深得天皇厚待和信任的木户却给天皇招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自从九一八事变前后担任内大臣秘书长官起，一直到战败，木户每天都要认真地写日记。他的日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不仅成了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内幕的罪证线索，而且也为人们认清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随着近卫自杀、木户入狱，裕仁天皇可以说已成了众矢之的，国内外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愈加高涨。12 月 6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率领美国代表团到达东京。在他临行前，美联社播发的一则电讯稿写道：基南披露，裕仁天皇很有可能坐在被告席上。

面对上述不断发展的事态，裕仁天皇与日本政府并不甘心束手就擒，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天皇制，他们绞尽脑汁，上下援手，八方奔走，极力为天皇开脱罪责。

币原内阁与新宪法的制定

东久迩内阁辞职后，日本统治集团从“应由充分了解美英的人组阁”这一考虑出发，决定推举币原喜重郎为继任首相。币原是战前日本著名的职业外交官，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驻美大使、外相等职，坚持所谓的“协调外交”，强调维护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协调，被人们认为是亲英、美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他退出政界，默默无闻地度过了 14 个春秋。因此，当吉田茂就此事征求总司令部的意见时，麦克阿瑟说道：“作为盟军总司令部，没有干涉日本内政之意，但根据我们的了解，币原是个

理想人物。”

10月9日，币原组织了战后第二届内阁，其内阁成员由没有战犯嫌疑的所谓民主主义者组成。币原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便遵照“自由指令”释放了包括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内的3000多名政治犯，摆出了与占领当局密切合作的姿态。在币原任内，还废除了《治安维持法》和天皇在政治上的辅佐机构——内大臣府。内大臣府自明治18年设立以来，由总理级的人物就任内大臣，在宫中府中享有莫大权力，甚至过问内阁人事，在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去世后，内大臣木户就常对继任首相提出意见，实权逐渐加强。

10月11日，币原首相亲自前往占领军总司令部，拜访了麦克阿瑟元帅。为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目标，麦帅向币原口述了实行民主化改革的5项指令：（1）解放妇女，给妇女以选举权；（2）鼓励成立工会；（3）学校教育民主化和自由化；（4）废除秘密的司法制度；（5）经济结构民主化。这5项指令成为美国占领军开始推行战后改革的起点。

看到民主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的币原，放弃了东久迩内阁正面抵制的政策，转而采取了搪塞敷衍，甚至抢先改革的策略，力图将民主化局限在最小范围内，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存旧的统治体制。

币原内阁成立时，便感觉到了占领当局对修改日本帝国宪法的决心。币原与其内阁认为与其坐等占领当局亲手修改宪法，不如抢先一步夺取修改宪法的主导权。为此，1945年10月，币原内阁抢先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烝治为首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松本提出的4项修改宪法的原则①，经过3个月的拖延推诿，至1946年2月8日才将新宪法草案呈报给占领当局。该草案不仅对旧宪法未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而且按照美国人的看法，天皇的权力反而越改越大。

这一草案与美国的占领政策大相径庭，也难以为国内外舆论所接受。对此，天皇本人也深为苦恼，他曾与木户商量说：“装作不知，就这样下去也是一种办法，但终非长久之计。是会见记者讲明发动战争的经过呢，还是去向麦克阿瑟元帅说明白呢？真不知如何是好？”但木户不赞成天皇的意见，他认为随意去乱作解释，反而会使形势复杂化。

---

① 松本四原则：（1）不改变天皇对大权的统揽；（2）扩大议会权限，对天皇的权力作一些限制；（3）国务大臣与议会有连带责任；（4）确立臣民的权利和自由。

麦克阿瑟元帅一开始也曾考虑过共和制的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倾向保存天皇制的方针，以便顺利推行其占领政策。但同时他也主张，必须改革天皇制。因此麦克阿瑟拒绝了日本提交的草案，指令总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直接起草宪法修改纲要，并规定了修改的3项原则：主权在国民、实行象征天皇制和日本永远放弃战争。

对麦克阿瑟的主张，币原内阁感到难以接受。1946年2月21日，币原拜会麦克阿瑟，试图寻求松动，但麦克阿瑟向他透露了远东委员会里出现的不利于保存天皇制的呼声。麦克阿瑟说道："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这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则，只因规定了这两个原则，才能排除苏联的反对意见而维持天皇制。在当今国际局势下，美方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正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皇的地位。"

2月22日，币原进宫将此事上奏天皇，请求天皇决断。这时的天皇裕仁已然意识到，只有接受这一宪法草案，才能保存天皇制。于是他态度冷静地表示，即使从他手中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也将予以全面支持。

币原遂于3月5日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以美国草案为蓝本的新宪法草案，并于3月6日正式公布。对此，麦克阿瑟立即表态：我今天十分满意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向日本国民提出我们全面承认的新宪法。

至此，日本有了新的宪法。但是，这个过程也证明了战后成立的东久迩和币原两届内阁，都是以"维护国体"为己任的内阁。为使风雨飘摇中的天皇制得以延续下去，他们四处设防，以守为攻，向占领当局施加了种种影响。这对于促使麦克阿瑟决定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起了重大作用。

第十二章　三招“妙棋”实施“自救”
麦克阿瑟挽救天皇

拜访麦克阿瑟

1945年9月4日，有两名美军乘坐吉普来到皇宫坂下门，负责警备皇宫的警卫不太精通英语，但从两人的说话中似有“裕仁”二字。警卫当时紧张起来，难道是来逮捕天皇的？当即给总务课打了电话，总务课不敢怠慢，慎重地将二人引入内大臣的接待室，并让精通英语的黑田秘书官询问来意。原来他们是从军的美英记者，想采访天皇，请天皇谈一下对战争的感想以及今后的想法。黑田顿时哑然失色，天皇是“现人神”，如何能够接受普通记者的采访，更何况是美、英记者。但他转念一想，他们是战胜国的记者，如果不允许采访，一怒之下，再煽动英美舆论，其后果将难以预料。于是赶紧同大臣们商量对策，经商量后，慎重而礼貌地答复说：“如果要会见陛下，须通过外务省办理相关手续，而且陛下终战后十分疲劳，眼下身体欠佳。”随后连忙同外务省取得联系，希望今后如再有此类事情出现，能够妥善处理。

但结果是，宫城的各门都出现了美军的卫兵。在这种情况之下，宫内省只好在9月25日同意让美、英的两名记者进行了采访。天皇对事前提出的质询，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做了回答。这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拜会”。尽管如此，但也令人深深地感到这确是战败后凄惨的一幕。

实际上，从占领初期起，美军参谋人员为了显示麦帅的权威就曾建议：把天皇召到司令部来。但对大局有所考虑的麦克阿瑟否决了这一建

议。他解释说："这样会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在国民眼里造成把天皇贬为殉教者的形象。不，我将等一等。过些时候天皇会自发地来见我的。就目前情况而言，东方的坚强忍耐较之西方的急于求成，更符合我们的目的。"① 麦克阿瑟就像是张开一张网，在等待着猎物。

果然，1945 年 9 月 20 日上午，藤田侍从长前来拜访麦克阿瑟，向麦帅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天皇希望能拜访麦帅，二是天皇已决定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麦帅非常周到地在美国大使馆六层的办公室接待了藤田侍从长，藤田首先转达了天皇对麦帅的问候："元帅自开战以来，各处作战，可否健康？在炎热的南方诸国，没有对元帅的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吧？另外，日本的夏天异常炎热，还请元帅多保重贵体。"麦帅听后很有礼貌地答道："陛下对我如此关心，我非常感激，请转达我对陛下的问候。"这短短的几句话，使藤田对天皇与麦帅的会面有了比较好的感觉。

就在同一天，吉田茂外相也拜访了麦帅，并询问道："如果天皇陛下来拜访，可以吗？"得到的回答是："我想，能够顺利地进驻日本，全是天皇的大力协助，如能来访，我非常高兴地欢迎。"

早在 9 月 15 日就已拜见过麦克阿瑟的东久迩首相也认为，让天皇亲自去会晤麦克阿瑟，这不仅有益于促进他们之间的感情联络，而且还有可能使天皇避免被控为战犯嫌疑人。于是，经盟军总司令部批准，裕仁天皇决定"自愿"去拜访麦克阿瑟。这也是裕仁为挽救天皇制危机所采取的第一招妙棋。

1945 年 9 月 27 日 10 时许，一辆陈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的梅红色的戴姆勒牌轿车离开日本皇宫，向麦克阿瑟下榻的美国大使馆驶去。坐在车中的裕仁天皇身着燕尾服、条纹裤，头戴高筒礼帽，"表情异常沉重"。

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同时不给苏联等盟国留下话柄，麦克阿瑟只在使馆二楼会议厅的门口迎接了天皇，脸上毫无笑容，只是呆板地同裕仁握了握手。美军的摄影人员等候在那里，给两个人拍了三张照片。寒暄之后，双方秘密会谈了 38 分钟，只有翻译奥村胜藏在场，宫内大臣、侍从长等五名随员被领到了另外的房间。鉴于当时国际上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很高，宫内省和盟军总司令部均对会谈内容予以高

---

①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年，第 60～61 页。

度保密。会谈的记录作为秘密文件，至今仍深藏在外务省文书科的记录文库里没有公开。因此，天皇到底向麦克阿瑟说了些什么？说法不一。

在《麦克阿瑟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天皇显得很不安，好像在此之前好几个月的紧张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除天皇的翻译官外，让其他的人全部退席之后，我们在长方形的迎宾室的暖炉前坐下。

我递给天皇一支美国香烟，天皇表示感谢并接过香烟。当我为天皇点烟时，注意到天皇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我马上明白，原来天皇感觉屈辱的痛苦是如此之深。

我本不想把天皇作为战争嫌疑人起诉，但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是否先将自己的这一立场告诉天皇。联合国的部分国家，尤其是苏联和英国，对于将天皇包括在战争嫌疑人范围内的呼声很高。现在，这些国家提出的第一批战犯名单中，天皇列在第一位。

但是，我的不安是没有根据的。从天皇口中说出的是如下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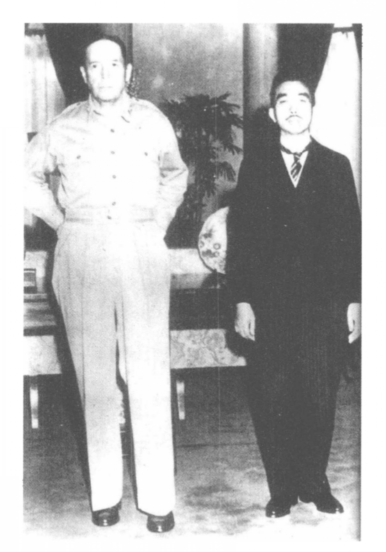
"我是作为对我国人在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做的一切决定和所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您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的。"

我深受感动……天皇这种充满勇气的态度，确实感人肺腑。在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天皇，作为个人来说，也是日本最高尚的绅士。

和天皇第一次见面之后，我经常受到天皇的访问，我们谈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我总是竭力向他解释占领政策背后的各种理由，天皇对我的说明完全接受了。天皇对于日本精神的复活能够起巨大的作用，占领的成功，非常有赖于天皇诚实的协助和影响力。[1]

---

① ［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 年，第 138～139 页。



裕仁访问盟军总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时的合影
（1945 年 9 月 27 日）

此次会面之后，直到麦克阿瑟归国，天皇与麦帅曾 11 次在美国大使馆会面。

另据藤田侍从长写的《侍从长回忆》一书记载：

陛下和麦帅究竟谈了什么内容，不很明确。但后来外务省整理的回忆记录送到了我这里，以供陛下御览，通常的文书，陛下

御览后都会返还到我这里，但只有这份文书陛下留了下来，没有返还到我处。我记得好像是用宫内省的信笺，大约5页左右。当时陛下对麦帅表达了如下意思：

“导致战败，追究战争中所有的责任，责任全在我。文武两官都是我任命的，他们没有责任，都是我一个人所造成的。我任由你处置，同时，请求联合国的援助，无论如何不要让国民的生活陷于贫困。”

藤田日记中的记载，基本上与《麦克阿瑟回忆录》中的内容大体相同。但与上述回忆内容完全相反的，是当时在日本专门进行采访的美国《生活》杂志的著名记者根瑟所写的《麦克阿瑟之谜》。其中披露了天皇与麦帅的另一番对话：

天皇对此次战争表示遗憾，他说：“我本来是想制止的。”麦克阿瑟盯着对方问道：“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未能使你的希望付诸行动呢？”裕仁的回答大致如此：“我的国民非常喜欢我。正因为喜欢我，所以如果我反对战争，或为和平做出努力，国民肯定会把我送进精神医院或者什么地方，一直把我关到战争结束为止。如果国民不喜欢我，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砍掉我的头。”①

按照麦克阿瑟及当时侍从官的记述，裕仁天皇是承认并愿意承担战争责任的；而根瑟的记述则恰恰相反，是说裕仁通过颠倒黑白的诡辩，把战争的责任一概推到了国民的头上，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能等到深藏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库中的会谈记录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虽然天皇是否向麦帅主动谈了“认罪服法”的话尚难断定，但天皇的“屈尊”拜见确实给麦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坚定了麦克阿瑟庇护裕仁的决心。

---

① ［日］袮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69~270页。

发表《人间宣言》

裕仁天皇的第二招妙棋是在国民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以挽救自己及天皇制。裕仁的这一想法，其实早在1945年年底接见皇宫义务清扫团时，就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

由于在战争中美军对东京进行了多次空袭，皇宫的部分宫殿也在1945年5月25日的空袭中被烧毁。虽然日后进行了一些清理，但由于人手不够，仍是瓦砾如山。宫内省正为此犯愁之际，恰好宫城县栗原郡的一伙青年听说宫城前广场一片荒芜的消息后，自愿申请前来义务打扫广场。宫内省总务课筧课长在接待义务劳动团发起人铃木德一和长谷川俊时，突发奇想："与其打扫广场，不如请他们清除一下宫城内的战争残迹。"若在以往，除了一定资格的人外，是禁止一般平民进入宫廷的。因此，铃木等人听说要他们到宫城去做清扫工作，都高兴得欢呼雀跃。

铃木和长谷川马上分头行动，从郡内各个村镇召集了60多人，带着大米、鸡蛋、调味料，忍受着拥挤不堪的交通痛苦，乘火车来到了东京。

12月28日，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兴奋地从宫城的坂下门进入了做梦都不敢想的皇宫。皇宫内到处狼藉，生锈的钢筋散乱遍地，依稀可辨菊花纹章的琉璃瓦散落在干枯的草丛之中。

青年们冒着寒风，不声不响地用铁锹等工具将瓦砾、铁片、混凝土碎块装进垃圾网兜内，清理到庭院的一角时，突然听到义务劳动团团长铃木大喊："立正——为天皇陛下服务，向天皇致以崇高的敬礼。"惊恐万状的青年们纷纷在喊声后抬起头来。不错，以往只有在"御照"中才看到过的天皇，就站在他们面前。不过，与以往看到的"御照"不同的是，眼前的天皇穿的不是军服，而是深茶色的西服，戴着软呢帽子。

原来，天皇听说有一批青年来义务打扫皇宫后非常感动，他本人在办公室也看到了外边人们劳动的身影，心情更加按捺不住，便催促侍从副官木下说："我要去见见他们，给我准备一下。"于是，裕仁便在宫内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劳动现场。

脸色暗淡、面容憔悴的天皇，不断地询问大家："你们远道而来，辛苦啦！""听说火车非常拥挤，怎么样啊？"当周围的人纷纷围拢过来的时

候，裕仁又问道："栗原郡是什么地方？""你们来义务劳动的动机是什么？"天皇还顺便问及了复员、肥料、收成等情况。铃木团长感动得流着眼泪，呜呜咽咽地一一作答。

在与团员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天皇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望着天皇的背影，青年们感到无比的痛心、寂寞和冷清。感动万分的团员新田英志向身旁的长谷川和菅原俊伍喊道："用国歌送行吧！"

在当时，盟军总部是严禁唱日本国歌的。就在长谷川踌躇的一刹那，国歌声就像决堤的河水般响了起来，歌声划破了寂静，回响在皇宫之中。现场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壮气氛所笼罩。

天皇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半个身子，侧耳倾听。不知是什么时候，泪水从大家的双眼中夺眶而出，悲怆的哭声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唱完全部歌词。

天皇回到办公室，马上给皇后挂了电话，劝皇后也到现场去一下。很快，皇后便于下午来到了清扫现场。皇后郑重而亲切地对大家慰问道："你们不辞辛苦前来皇宫打扫，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和清扫团的女团员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在随后的时间内，又有多批成员先后参加了皇宫的义务清扫活动。参加义务清扫活动的成员累计将近100万人，在三四天的时间里，除了除草、清扫落叶之外，还用一天的时间，帮助清理了天皇的东宫住所。在结束劳动时，每个参加义务劳动的人都收到了一份纪念品：十支印有皇家菊形纹徽的香烟和两块印有同样纹徽的点心。

对受到天皇接见的印象，当时义务劳动团的副团长长谷川俊在后来回忆道：由于战败，天皇才瘦成了那个样子，脸色也显得暗淡。而另一位曾参加过义务劳动的团员板桥庆教回忆说："当天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立刻感到天皇真虚弱啊！跟想象中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有点驼背，头也不停地颤抖，说话的样子也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儿，反而感到这样的天皇更为亲切。"

这样，天皇夫妇通过慰问清扫团的成员，在国民中树立了皇室和蔼可亲的形象。为了进一步改善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裕仁在1946年元旦以诏书的形式发表了《人间宣言》。第一次向日本国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脱下了那件令美国人难以接受的外衣。

裕仁之所以发布这一公开放弃自己"神性"的诏书，首先是为了迎合

占领军当局的要求。当时的盟军总司令部社会教育局局长戴克上校等人曾向天皇周围的大臣们发出过暗示：天皇应以自觉自愿的形式发布一道彻底破除天皇至高无上观念的诏书。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国内针对裕仁本人及天皇制的种种责难和批判情绪，盟军总司令部的暗示使裕仁天皇和币原首相认识到此举有利于维护天皇制，裕仁天皇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币原首相很快用流利的英文起草了诏书，该诏书经盟总批准后，又交裕仁审阅，天皇频频点头称赞说："非常好。"

诏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 朕与尔等国民同在，常欲利害与共，休戚相关。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爱而结成，绝非依神话与传统而产生，也非因以天皇为现世神，且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有统治世界之命运的虚构观念而形成的。

诏书尽管措辞谨慎，用语隐晦，但还是明确地申明了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天皇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使自己一下子从虚无缥缈的云端降临到了人间尘世，完成了从神到人的转变。可以说，这对结束1000多年来天皇的神权统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间宣言》的发布，无疑给一向视天皇为"现人神"（现出人形的神）的日本国民以巨大打击，却得到了盟军总司令部及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麦克阿瑟当天便公开发表评论称："天皇的新年文告令我非常高兴；他借此承担了他的人民的民主化过程中的领导职责，他毅然地为了未来站在自由主义路线发展的立场上。"在麦克阿瑟的心目中，裕仁似乎成了顺应民主潮流的"急先锋"。但事实上，裕仁本人的真实意图却并非如此。在几天后举行的新年歌会上，裕仁作了一首题为《松上雪》的和歌，其大意是：

> 大雪压青松，
> 青松不改色，
> 挺拔而傲立，

人亦当如斯。①

意思是说，即便是在“大雪压青松”这种遭受占领的情况下，日本人也不应改变原有的精神，要忍受占领的重压，保持对天皇的信任和忠君爱国的精神。这就是天皇的真实心态。此时的裕仁虽然不得不顺从占领军当局的意愿而否定自己的神性，但心底里仍隐藏着反对民主主义的观念。因此，天皇的上述宣言发表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就发表了评论：“英美两国人民强烈地意识到，虽然天皇已丧失神格，变为平民，但若将其作为国民的爱国主义和忠诚的核心而保存下来，日本将来就难于加入爱好和平国家的行列。”表示出了对《人间宣言》的不信任感。

巡幸全国

1946 年 2 月，也就是裕仁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后不久，为了向国民展示自己与国民“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新形象，同时也为了向国民“谢罪”，以博得国民的信赖。经盟军总司令部批准，裕仁接连不断地对全国各地进行巡视活动，这也是裕仁采取的第三招妙棋。在此之前，裕仁就有巡幸全国的想法。1945 年 10 月，裕仁曾对侍从说：“由于战争，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许多土地都丧失了，同时还牺牲了许多国民的生命。这该如何是好，自己很是苦恼。偶尔也想过退位，然而还是希望能够走遍全国，安慰国民，鼓励他们复兴国家的勇气，这样似乎更好一些。”②

天皇的巡幸活动，最先访问的地方是昭和电工川崎工厂，鼓励他们努力复兴经济。当时，天皇周围追随着一些联合国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偶尔也有被指责的时候，但天皇对此并不介意。

2 月 19 日和 20 日，裕仁天皇开始巡幸神奈川县。在战争受害者的集体住宅区，不断地询问：“冷吗?”“大家都好吗?”“哪里遭受火灾了呢?”对归国者，便慰问他们道：“辛苦了!”2 月末，天皇开始从京桥、日本桥出发，巡幸东京都内，从西经过新宿、府中和日野市，一直到八王子。

---

① ［日］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新华出版社，1991 年，第 121 页。

② ［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 年，第 157 页。

1946年，天皇又巡幸了群马、埼玉、千叶、静冈、爱知、岐阜、茨城等县。

进入1947年后，天皇又巡幸了大阪等地。在大阪和名古屋，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一睹天皇，一窝蜂似的拥来，使天皇进退两难。甚至还发生了踩掉天皇的鞋、挤掉天皇的衣扣等事情，使警卫人员着实捏了一把汗。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一回到住处的天皇便笑嘻嘻地对侍从们说："今天人群可真乱啊！"显得非常高兴。

1948年，根据占领军的意向，巡幸暂时中断。1949年，天皇又接着巡幸了东北、信越、北陆、山阴、山阳、九州地区。1950年，巡幸了四国地区。1951年，巡幸了京都、滋贺、三重等县。由于治安上的问题，迟至1954年，又巡幸了北海道地区。巡幸活动直到1954年8月才结束。

原本打算两到三年的巡幸，结果花费了将近八年的时间。其足迹几乎遍及了除冲绳外的日本列岛各地，总计历时165天，行程33000多公里。这期间，天皇曾在千叶县的列车上休息过，也在宫城县女校铺着席子的地板上休息过，有时则行进于山间小路，或慰问遗族和战争受害者，或慰劳归国人员。无论是遭受原子弹灾祸的广岛和长崎，还是偏远穷困的农舍渔村，无论是幅员广阔的北海道，还是阴暗潮湿的地下矿井，到处都留下了裕仁天皇的身影。

过去的日本国民只能从报刊和"御照"上看到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的形象，而现在天皇竟然在既没有八面威风的仪仗队开路，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护卫的情况下，轻车简从、身着西装来到国民中间，慰问普通工人、农民、渔民，了解他们的生产及生活情况。这使长期生活在天皇制下，对天皇充满敬畏心理的日本国民来说，无疑产生了受宠若惊之感。因此，裕仁所到之处，都出现了国民狂热欢迎天皇的场景。日本史学家河原敏明在他的《日本天皇——裕仁》一书中这样描述：

> 人们多半是出于好奇吧，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现在的天皇，他那温和的容姿，自然无饰的态度，与过去穿着威风凛凛的军装的天皇判若两人，这似乎使人有点不敢相信。

在裕仁天皇历时将近八年的巡幸活动中，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只有冲绳一地。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冲绳还处在美军的军政之下，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冲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日本本土战场。冲绳人在天皇的名义下，为了“圣战”，纷纷扛起枪支，奔赴战场，94000名冲绳县民和近10万名军人丧失了生命。

天皇也深知，自己如去冲绳，定会遭到冲绳人强烈的抗议活动。1965年夏天，天皇在那须行宫例行会见记者时，就有记者问道：“陛下巡幸全国时，惟有冲绳没有去，县民都非常盼望陛下能巡幸冲绳。”天皇说道：“虽说是视察全国，但并不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伊豆诸岛的一部分、对马、五岛列岛、萨南诸岛都没有去过，我也非常想去看看。”接着又讲道，“冲绳人希望我去，这样的话我没有听到过，但是从现在冲绳所处的立场来看，（巡幸）也是一个有困难的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去或不去。”就这样消极地搪塞了过去。然而，裕仁天皇在1972年5月冲绳归还日本后也未去过冲绳。1975年7月，冲绳海洋博览会召开，以往这种国际活动的名誉主席都是由天皇担任的，但那次，裕仁天皇却让皇太子代行。

筑波大学的进藤助教授在美国国立公文书馆，曾发现了一份重要的材料。在这份材料中，宫内省职员寺崎英成[①]在1947年9月18日和19日拜访盟军总部外交局长时，曾转达过天皇关于冲绳的意向：“天皇希望美国在今后25年到50年左右，在日本保有主权的形式下，对冲绳诸岛实行军事占领。既有利于美国，也保护了日本。”[②] 进藤曾将这份材料刊登在《世界》杂志上，读过该杂志的共产党议员在众议院上发表了如下看法：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冲绳，并且这也违反了禁止天皇参与国政的宪法。对此，政府反驳道：“日本方面没有发现证实这一外交文书的资料，希望对发言负责任。”裕仁究竟是否发表过上述言论，虽无从查证，但裕仁天皇直至去世也未踏上冲绳土地一步确是不争的事实。

裕仁天皇的巡幸活动，博得了日本国民的敬仰和好感，巩固了皇室地位。以至苏联为首的部分同盟国成员认为，天皇的巡幸是“维护天皇制的战略性行动”，强烈要求盟军总司令部中止天皇的这种巡幸活动。日本共产党也认为，天皇巡幸是企图“蒙混过关”之举，并在横滨组织了“反对天皇巡幸”的示威活动。但由于美国占领当局试图借此了解一下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以便根据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信仰程度，决定在占领

---

① 寺崎英成：曾担任过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会见时的翻译。

②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年，第275页。

政策下天皇的地位和即将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天皇如何处置，因而支持天皇的巡幸。通过这种变相的民意测验，美国占领当局再一次认识到了保留天皇的价值和作用，更加坚定了麦克阿瑟庇护裕仁、保留天皇制的决心，最终放弃了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念头。

麦克阿瑟拯救天皇

美国政府及麦克阿瑟最初的想法是要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的，但是随着日本各界的积极活动，以及美国政府从战略利益出发，逐渐改变了初衷。

经美国总统批准，由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方组成的“调整委员会”于1945年9月6日制定了《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简称“初期政策”），其中明确规定：为“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将“促使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

11月29日，根据上述文件精神，美国政府向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出了如下指令：不能免除裕仁天皇作为战犯受到逮捕、审判、处罚的责任。同时指令还要求麦克阿瑟秘密搜集天皇是否有战争罪行的证据，并将结论作为建议反馈回美国政府。这意味着是否审判天皇，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麦帅的态度。

应当说，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统帅在到达日本前，和美国政府的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严惩日本并主张审判天皇。1941年7月，时任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菲律宾被山下奉文率领的6万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带着夫人和4岁的儿子乘鱼雷艇仓皇逃命。当时的他就曾发誓：“不收复菲律宾，不收复太平洋诸岛屿，不追究天皇和山下奉文的战争责任，我死不瞑目！”

但是，当他来到日本后，亲眼目睹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各地拼死抵抗、使美军付出重大代价的日军，俯首帖耳地服从天皇的命令，迅速解除了武装，让美军顺利地进驻了日本，便感到“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这使他逐渐放弃了对日本直接实行军管的念头，决定利用包括天

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

当裕仁天皇在1945年9月27日主动登门拜访后，麦克阿瑟已经拿定了主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协助美军实施占领统治。因此，在会见结束后的当天，麦克阿瑟便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美国政府“不能把裕仁作为战犯逮捕”。

麦克阿瑟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同。10月6日，美国政府向麦克阿瑟发出指令：“在事前未同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协商，以及未接到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阁下的通知时，阁下不得采取排除天皇或类似排除的任何措施。”在天皇的去留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已经明朗。

虽然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已决定保留天皇，但国际上要求审判裕仁的呼声却十分高涨。1946年1月22日，麦克阿瑟接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知，澳大利亚代表在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中，提出了包括裕仁在内的62名日本主要战犯名单。

惊慌之下的麦克阿瑟旋即于接到通知后的第3天即1月25日，致电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首先声称说没有发现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因此不应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电报强调说，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在停战前天皇虽然处理国事，但其责任基本上都应自动归属于大臣以及枢密顾问官们。然后又夸大其词地恫吓说，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100万人的军队和几十万名行政官员，还需要建立战时补给体制。①

在麦克阿瑟的极力劝告下，美国政府经过对利弊的权衡，最后决定全力庇护裕仁天皇。为此，美国政府一方面游说各盟国，促使英、法、荷等国首脑同意不起诉天皇；另一方面，则向麦克阿瑟发出了如下秘密指示：日本国民本身显然是支持天皇制的，因此在发展立宪君主制和维护天皇制方面要支持日本国民。对天皇制的直接攻击会削弱民主势力而加强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种极端势力。故此命令总司令官，望暗中协助扩大天皇的声望，并促使其化神为人。②

有了美国政府的旨意，麦克阿瑟便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大权，更加明目张胆地展开了庇护天皇的活动。

---

① ［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33～134页。

②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首先，他任命美国人基南为盟国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从而使美国控制了起诉战犯的主导权。基南在1945年12月初动身前往日本前，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特别授意他要庇护天皇。据曾参与起诉工作的美国律师罗伯特·多尼希回忆说：

> 离开美国之前，天皇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对象，在应受法庭追究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直到坐上飞往东京的飞机之前，我们始终认为将对他进行审判。但是，就在我们将要起飞的时候，一封杜鲁门总统的信交到基南手中，指示我们不得对裕仁和皇室任何成员起诉。

其次，在1946年1月19日经麦克阿瑟批准公布、由国际检察局负责拟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章程》中，有意删去了追究国家元首战争责任的条款。这是按照麦克阿瑟的意图免于追究天皇责任的重要部署。因为如果把纽伦堡审判的章程原封不动地搬到东京审判，天皇必定被作为头号战犯送上审判台。众所周知，在战前的日本，在公务上执行宣战、媾和、缔结条约权限的只有天皇一人，倘无天皇的命令，战争是无法进行的。东京审判的章程还规定：被告的选定最终要得到盟国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批准，这又为天皇免于起诉增加了一道屏障。

再次，基南也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的旨意，在调查取证中有意回避涉及天皇战争责任的证据，最后又从检察局提交给麦克阿瑟的被告名单中去掉了裕仁的名字。对此，基南公开声称："天皇不具备美国所定义的那种犯罪意图。法庭调查结果表明，天皇与被列为调查对象的14届内阁毫无关系。"

也正因如此，在基南结束在日本的审判准备回国之前，天皇夫妇在皇宫接见了基南。他们送给基南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基南夫人一个手提包，其对美国人的感激之情，可见一斑。

就这样，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裕仁天皇最终逃脱了历史的审判，渡过了他一生中最为险恶的一关。其他皇室成员自然也就无罪可言了。不仅已被逮捕的梨本宫于开庭前一个月"做梦也没想到"地被放了出来，曾指挥部队参加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也得以逍遥法外。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当鸠山内阁的外相重光葵访美拜见已退职的麦克阿瑟时，这位裕仁天皇的庇护人不无得意地讲道：

> 是我救了天皇的命。当时世界舆论中占上风的看法是，天皇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高负责人，应该接受国际审判，并处以绞刑。但是，我认为如果这样做，日本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就会得势，要求彻底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这时，占领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压制的。我想，倒不如拯救天皇的生命，让天皇同占领军合作，以利于占领政策的推行。因此，我极力坚持这一主张，挽救了天皇。[①]

缺席的第一被告

为清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麦克阿瑟于 1946 年 1 月发布了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及该法庭的组织章程。章程规定，法庭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美、英、中、苏、法、澳、加、荷和新加坡等 9 国（后来又增加了印度和菲律宾两国）提名、经盟军总司令任命的法官组成，负责审理和判决。澳大利亚人韦伯被任命为审判长，中国法官为梅汝敖博士。另外，由上述诸国各任命一名检察官，组成国际联合检察团负责调查取证和起诉工作。美国人基南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中国代表为向哲浚。

由于该法庭的审判长、首席检察官及所有法官和检察官均需经麦克阿瑟任命，而起诉战犯的主导权又控制在美国人基南手中，这一切就从组织上保证了该法庭只能按照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的意图行事。

1946 年 5 月 3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前陆军省所在地市之谷开庭。首席检察官基南代表国际检察团对经其认定的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控告了 28 名被告在从 192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止的期间内，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

被起诉的 28 名甲级战犯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

①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326 页。

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这份甲级战犯名单，基本上包括了自1928年以来日本历届内阁的主要战犯。但是，正如被基南从起诉书中删去的那句话所说的："在这个被告席上，有一名缺席者。"毫无疑问，这名缺席者便是裕仁天皇。

天皇未被起诉，曾激起澳大利亚、中国、苏联、新西兰等国检察官的不满和抵制。一些国家的检察官曾利用审讯天皇亲信木户幸一的机会，以与《木户日记》有关为由，要求天皇裕仁出庭作证，试图以这种方式迫使天皇出现在法庭上。但这一要求遭到了麦克阿瑟和基南的拒绝，他们强调，不得以任何方式牵扯到天皇。

基南等人虽然阻止了天皇出庭作证，但他们要想在整个庭审辩论中完全不涉及天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庭审中，每当出现涉及天皇的言行时，基南总是以"与本庭审判的被告无关"为由百般阻挠，或转移话题，或干脆停止继续发问。

百密终有一疏。在整个审判已接近尾声的一次庭审辩论中，仍然出现了裕仁天皇险些被追究的局面。而把天皇置于这一危险境地的，竟是因对天皇忠心耿耿的前首相东条英机。

1947年12月31日，东条英机为自己辩护。在发言中，他提到天皇同意对美开战，"但只是违心地"同意。这时，木户幸一的辩护律师问东条："木户有没有违反天皇祈求和平的意志的行动？或是向天皇提出过这种建议？"

东条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没有这样的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连日本臣民都不会有违反天皇意志的行为，何况身居高位的人呢？"东条的这一番话，也许在外人听来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经验丰富的法官们却从中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如果天皇确想阻止战争，他只要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会服从他，甚至包括作为内阁首相的东条本人在内。

一心想把裕仁推上审判台的韦伯审判长闻听此言兴奋不已，立即提醒法官们："诸位当然意识到这个回答的意义了。"第二天，苏联检察官根据这一证词，在法庭之外发表宣言，要求尽早对裕仁天皇起诉。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局，日本皇室十分紧张。第二天，天皇的心腹便在宫中开会，商讨对策。接着他们又同正为此事火冒三丈的基南进行了

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立即派人去巢鸭监狱会见东条，让他收回供词。

首先派去的说客是基南雇用的日本事务顾问田中隆吉。此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日本驻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1940 年晋升为陆军省兵务局长，1942 年因同东条首相不和而退役。在东京审判中，曾作为证人向国际检察团提供了许多日本陆军军人犯罪的内幕和真相，因而曾被人称为“日本的犹大”。

田中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往巢鸭监狱会见东条。关于会面后的情况，田中后来在 1965 年 8 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了详细的披露。田中写道：“我去见了东条，建议他改变前言，但是东条拒不接受我的建议。他说：‘关于皇室，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会收回前言！’”

由于东条不肯让步，田中又赶回皇宫，向木户的前秘书长官、现任天皇顾问的松平康昌说明了情况。松平旋即与他的同僚们进行磋商，经裕仁批准，决定让在押的木户再次做东条的说服工作。

在巢鸭监狱，木户的牢房同东条的牢房毗邻。木户利用一切机会，在两天的时间里，同东条进行了多次接触。由于作为裕仁天皇的第一亲信和代表的木户亲自出面，并告知这也是基南的意思，还许诺将改善其家属的生活处境，东条最终让步了。田中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木户见到东条，告诉他基南的意图。东条一直不同意，但木户竭力说服，晓以大义，东条最后总算被说通，不情愿地同意了。”

由于东条同意翻供，在 1948 年 1 月 6 日再次对东条进行庭审时，基南与东条一唱一和地演出了一幕拙劣的双簧丑剧。在审讯过程中，基南先是向东条提出一些关于伪满洲国溥仪的问题，然后话锋一转，开始了为天皇开脱的诱导式讯问。

基南：“那么再看 1941 年 12 月对美开战问题天皇的态度和你自己的态度。你已经对法庭说过，日本天皇爱和平，这对吗？”

东条：“当然对。”

基南：“那么你还说日本臣民谁都不会不听天皇的命令，这对吗？”

东条：“我说的是我作为一个国民的感情，这和天皇的责任不是一个问题。”

基南：“但你实际上不是对美、英、荷开战了吗？”

东条：“是我的内阁决定了战争。”

基南："那场战争不打不行，裕仁天皇的意思是打吗?"

东条："这可能违背天皇的意志，总之事实是在我的建议和统帅部其他负责人的建议下，天皇不得已同意了开战。而且天皇爱好和平，在最后一刻仍抱着和平的希望。即便开了战，也是这样。只需看一看天皇 1941 年 12 月 8 日的宣战诏书，就很容易明白天皇的心情。诏书中的一些词语的意思是：这场战争实在无法避免，而这是违背我个人的愿望的。"

就这样，基南和东条通过这场沆瀣一气的表演，再次将天皇裕仁的责任遮掩了过去。正如当时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指出的那样："由于盟国首席检察官与被告席上最恶劣的战犯秘密勾结，开庭以来最有爆炸性的危机平息了。"

东京审判历时 2 年零 7 个月，到 1948 年 11 月 12 日才作出了最终判决。在被起诉的 28 名被告中，除永野修身、松冈洋右中途病亡，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发疯被解除审理外，其余 25 名罪犯被作出如下判决：

处绞刑者 7 人：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处无期徒刑者 16 人：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宣、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村、小矶国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冈敬纯。

处有期徒刑者 2 人：东乡茂德（20 年）、重光葵（7 年）。

1948 年 12 月 23 日上午，7 名被判处绞刑的罪犯在日本巢鸭监狱被执刑。盟军总司令部特邀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到场作证，中国代表为商震上将。

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和公理的审判，在相当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战争罪行，伸张了正义和人道，使一批作恶多端的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控制了审判主导权的美国出于战后反苏反共的需要，由惩罚日本转而扶植日本，从而使这次审判并未能完全实现"公正和正义"的目标。例如，对曾积极推动日本对外扩张，并从中大获其利的日本垄断财阀，没有追究其战争责任；对日军在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武器这一违反国际公法的罪行追究得不够彻底，对原"731 部队"的罪魁祸首石井四郎等人，美国以索取其掌握的试验资料为交换条件而加以保护，使其逃避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在量刑上，东京审判较为重视对美国造成直接损害的罪行，而对其他方面包括侵略中

国的罪行则十分宽大，如对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的外相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对九一八事变时任驻华公使、后来历任外相和“大东亚”事务大臣的重光葵却只判了7年徒刑；对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也未判死刑；另外，对战犯的追究也虎头蛇尾。在对东条英机等7人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便释放了在押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又下令对其他在押战犯全部提前释放。

与上述不彻底性相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为有失“公正”的地方，就是未能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毫无疑问，裕仁天皇作为战前日本的专制君主、陆海军大元帅，对其执政期间日本所发动的每一次侵略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证据确凿，昭昭在目。

还要强调的是，东京审判未起诉天皇，既非证据不足，更不能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面意见。当年参与这次审判的一些权威人士对此早已表示了不满和抗议。

1948年11月判决结束后，身为审判长的澳大利亚代表韦伯就曾对记者发表过个人看法：

> 天皇握着日本的军政大权，这一点，在天皇促使战争结束问题上被证明无疑。同样，天皇在开战时也明显发挥了作用，检察官方面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检察官方面却明确表示不对天皇提起公诉……发动战争需经天皇批准，如果不希望战争，理应不予批准。即使天皇是根据臣下的建议采取行动的，也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总而言之，即便是立宪制君主，采纳大臣的建议而触犯国际法，其罪过也是不能宽恕的。[①]

法庭审判官、法国代表安利·贝尔纳尔在判决后也发表了个人意见说：“法庭不允许公平对待所有嫌疑人，只要求对检察官方面提出的被告进行判决，天皇没有被提交法庭，我感到遗憾。”1949年1月13日的《纽约时报》对这次审判所作的评价，也反映了美国一般民众愤愤不平的心情。评论这样写道：

---

① ［日］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有一人缺席，他就是天皇。天皇没有受审，被置于法庭权限之外，这样的决定对不对，只有到将来才能得到回答。根据这个决定如果能使人命得救，并能更好地占领日本和宜于实现日本的民主化，那它可能是个明智的措施，但不管怎样，这是有待将来回答的问题。[①]

东京审判已经过去60多年了。如今，历史已经证明：天皇制被保留，的确有利于美国顺利占领日本并推行其占领政策，但同时也为战后的日本留下了祸患，即军国主义势力长期存留于日本社会。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不能从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相反却不断粉饰侵略行为，并极力推卸战争责任。这显然是与天皇制的保留、日本民主化改造不彻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①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页。

第十三章　“专制”变“象征”皇室吹新风

象征天皇制

美国占领日本后，为利用天皇顺利实施其占领政策，一方面极力庇护裕仁天皇，使其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在天皇的宝座上又稳坐了40余年；另一方面，出于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需要，又对近代的天皇专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造。

改革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作为近代天皇制精神支柱的日本国教——神道教。自明治维新以来，神道教成为凌驾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之上的国家宗教。它在神化天皇绝对权威，对内以效忠天皇的思想毒害人民，对外推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改革天皇制，就不能允许神道教的特权继续存在下去。

1945年12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了《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传布》的指令。该指令明确规定：神道与政府机构及具有公职身份的官吏脱离关系，不许政府和官吏“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和传布神道”，不得出席任何神道仪式、典礼和参拜神社；禁止国家给神道、神社任何财政援助；撤销内务省神祇院等。

此外，该指令还称，“本指令的目的，在于把宗教和国家分离开来，以防止一切把宗教滥用于政治目的的活动”，“防止在欺骗和诱惑日本国民在走向战争的意图下歪曲神道的教义和信仰，防止有利于宣扬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活动重新出现……为永久和平与民主主义理想奠定基础”。

盟军总司令部颁布的这一指令，使专制天皇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遭到毁灭性打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被剥了下来。继废除国家神道后，盟军总司令部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摧毁日本国民忠君思想的基础——对天皇的神化。在盟军总司令部社会教育局局长戴克上校的暗示下，裕仁天皇于1946年元旦发布了《人间宣言》的诏书，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的神权。

为了防止天皇的财产重新膨胀，美国盟总将改革的矛头又对准了庞大的皇室财产。因为它是构成天皇政治权力及其神圣尊严的物质基础，要废除专制天皇制下的天皇特权，必须摧毁这一经济基础。

在美国支持下制定的日本新宪法对皇室财产作有明确规定：“皇室的所有财产属于国家。皇室的一切费用必须列入预算，经国会决议通过。”“授予皇室财产，皇室承受和赐予财产，均须根据国会的决议。”经过评估，盟军总司令部对数额高达37.1562亿日元的庞大的皇室财产进行了分类处理。其中，约9%～12%的财产（森林、工地、建筑物、现金、有价证券、美术品），完全交给国家；约7%的财产，如吹上的皇家书库、那须和叶山的行宫都归政府所有，允许天皇免费使用，皇宫中的三座宫殿（祭神殿）作为私人的宗教建筑物，不计数在内；约1%～2%的财产（有价证券、装饰品、1500万日元的现金）作为皇室私产归皇室所有。这样，旧皇室的经济基础瓦解了。

为将上述改革的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从政治上剥夺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1946年2月，盟军总司令部又迫使日本政府接受了由美国方面起草的新宪法草案。该草案经稍作修改后，于1946年11月3日以《日本国宪法》的名称发表，并于次年5月3日生效。

这部新宪法即《日本国宪法》，与《明治宪法》，也就是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具有如下两方面的显著特点：其一是天皇的法律地位与职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皇已由总揽国家统治大权的专制君主变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国家和国民整体的象征；其二是新宪法规定日本永久放弃战争，天皇也因此被剥夺了军事统帅权。

1947年5月3日，是新宪法正式生效的第一天。这一天，裕仁天皇和吉田茂首相等人出席了在皇宫前广场举行的庆祝新宪法实施典礼，约10万东京市民参加了这一盛典。当庆祝典礼结束后，许多市民围住了天皇的坐车，庆祝实施新宪法，欢呼天皇制得以保存。但是，就在这一片欢呼声

中，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天皇虽在，但意义已完全不同。在新宪法体制下，天皇已从神变成了人，已从总揽国家大权的顶点变成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象征性元首，近代以来的专制天皇制已变成了象征天皇制。

随着《人间宣言》的发表，天皇由神变成人，皇室的一些保守古老的传统也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首先是宫内省被宫内厅所取代。过去负责掌管皇室事务的机构为宫内省，其长官为宫内大臣，在专制天皇制时代，宫内省直接隶属天皇，宫内大臣倚仗天皇权威，权倾一时。在战后，有着悠久历史的宫内省被宫内厅所取代。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了新的宫内厅法，其第一条将宫内厅的任务仅限定为：负责照料天皇和其他皇室成员，保管天皇“御玺”和“国玺”，安排天皇和皇室成员参加国事活动。与战前的宫内省相比，宫内厅从直接隶属皇室变为总理府下的一个直属厅，其预算和人事均由总理府负责，宫内厅长官与职员均为国家公务员。在规模上，战前宫内省是一个拥有25个部、一个地方事务局，以及6200名职员的庞大机构，而战后的宫内厅只设立了6个部和京都事务所一个地方局，拥有职员1150人左右。

其次是天皇身边的侍从发生了变化。在战前，天皇的侍从长历来由退役海军大将担任，侍从均从华族子弟和毕业于皇家学习院的人中遴选，能被选为天皇侍从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战后，天皇侍从长改由文职官员担任，而侍从则来自日本政府各相关省厅，属于国家公务员。他们由宫内厅长官提名，由总理大臣任命，其人数由战前的10人降至6人。由于这一工作要负责天皇公私生活的各个方面，任务非常繁重，而工资又没有特别优惠，因此它已远不如战前那样令人向往了，很少有人会主动担任这一工作，一些负责派出的省厅不得不采取定期轮换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是颁布了新的《皇室典范》。战前的《皇室典范》是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日本最高法律规范，它赋予皇室独立于议会、内阁的特殊地位以及许多特权。1947年1月，日本以法律形式颁布了新的《皇室典范》，对皇位继承、皇族范畴、摄政存废以及皇室会议等作出了新的规定。

新《皇室典范》规定，皇室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审议继位、摄政、遴选皇后的皇室会议由10名议员组成，其中皇族议员仅为两名，其余为内阁总理大臣、众参两院正副议长、宫内厅长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法官，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议长。新《皇室典范》大大削弱了皇室拥有

的特权，并将皇室完全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

关于继位，新《皇室典范》第一章规定，皇位由“属于皇统的男系男子”继承，不承认女系及女皇。根据长系优先原则，继承皇位的顺序依次为：（1）皇长子；（2）皇长孙；（3）皇长子的其他子孙；（4）皇次子及其子孙；（5）其他的皇子孙；（6）皇兄弟及其子孙；（7）皇叔伯父及其子孙；（8）没有以上皇子孙时，皇位传给最亲近的皇族。

最后是皇族成员构成的变化。随着新《皇室典范》的公布，皇族成员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天皇的三个亲弟弟及其子女得以保留皇籍外，其余的11家皇族共51人均脱离了皇籍，降格为平民。

被降为平民的皇族成员

按照新的《皇室典范》，将要被降为平民的11家皇族，除伏见宫博恭亲王和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外，都是明治时期“大量产生”的宫家，与裕仁天皇的血缘关系极远。但在战后初期，他们凭借皇族身份，仍同战前一样维持着比较优裕的生活。他们从天皇那里领取高额的年薪和特别赐金，从宫内省得到战后紧缺的粮食、肉、黄油以及供汽车使用的汽油。此外，各皇族自己还拥有股票、债权、山林等财产，从中还可获得大量收入。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上要求他们一律降格为平民的呼声日益高涨。

对皇室财产的处理，也影响到了其他宫家。他们失去了收入的来源，面对战后初期商品奇缺、物价飞涨的形势，不得不想办法自谋生路：有的靠出卖别墅和土地维持生活，有的皇族制造、贩卖香水，有的经营有歌舞助兴的餐馆。

前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在新宿西口的临时木板房商场中，开了一家食品店，卖些不受管制的海产品和杂粮之类的东西，以此来补贴生活。

皇后的哥哥久迩宫朝融亲王和贺阳宫恒宪亲王，则相继担任了一些想以“亲王”名义招徕群众的组织、团体以及学校的总裁或顾问。贺阳宫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子女多（七个孩子），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得这样。”

最突出的要算是三笠宫了，他常常辗转于箱根、叶山、品川之间。在叶山住的时候，他是乘坐拥挤不堪的电车去东大上学的。有人到他家里去

问安，竟然吃惊地看到连会客室都挂满了孩子的尿布。

各位宫家已经很难维持皇族的体面了，盟军总部也策划削减皇族的人数。

1945年10月，辞去首相职务的东久迩宫通过木户内大臣向天皇提出请求，希望将自己改为平民。不仅如此，他还在会见《朝日新闻》记者时表示，除了天皇的直系亲属三个亲弟弟以外，其他人也都应改为平民，华族也应辞去爵位。

尽管裕仁天皇试图继续保持这些宫家的皇族资格，但驻日盟军总司令从摧毁天皇的权力基础、清除天皇制得以形成的支配网的考虑出发，决定取消这些皇族所享有的特权。1946年5月23日，盟总发布指令，剥夺皇族在经济上“包括免税在内的各种特权”，皇族财产必须照章课税，由宫内省支付的年薪被完全停止，在各宫家当用人的宫内省职员也被撤走了。

1947年11月29日，裕仁天皇召开了皇族会议，除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等直系皇族外，到会的还有闲院宫、伏见宫、东伏见宫、贺阳宫、久迩宫、梨木宫、朝香宫、东久迩宫、北白川宫、竹田宫10家皇族，山阶宫因病未出席会议。裕仁天皇在会上宣布：“根据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除了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外，其他皇族全部改为平民，实在是对不起，请原谅。”说完，裕仁天皇稍坐片刻，便起身离开了会议室。就这样，天皇简短的发言，决定了11家皇族的命运。他们遂以自愿的形式向天皇提出申请：“鉴于最近的国情，深深地感到这是大势所趋。今后愿放弃皇族身份，在皇室之外尽力辅佐。谨请改为平民，以尽微忠。”

于是，正式决定除了3位直系宫家之外，其他11位宫家，共计51人，全都降为平民。

1947年秋天，11家皇族即将离开他们过惯了的天堂生活，去过普通平民的生活了。10月18日，在赤坂离宫举行了告别宴会。天皇、皇后、皇太后（贞明皇后）出席了宴会。虽然宴会厅华丽豪奢，但出席宴会的人们表情却阴沉暗淡。

天皇一改过去从容不迫的姿态，讲道：“现在，诸位就要脱离皇藉了，要到一般社会中去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一点变化也没有，和从前一样，我预祝大家今后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讲话时，天皇的头微微颤动着，其声调中掺杂着悲切与痛苦。

宴会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尽管大家都在吃，都在交谈，却不知是什

么滋味。

宴会行将结束时，天皇举杯说："在此举杯，预祝各位身体健康！"大家都忍不住地泪流满面。梨木宫守正亲王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天皇致以深深的敬礼说："非常冒昧，我作为年纪最大的人，愿意代表皇族说几句话。这次圣上赐予如此丰盛的晚宴，又讲了一些非常热情的话，对天皇的恩情我等将铭记在心，在此让我们举杯，衷心祝愿三位陛下愉快健康！"这位平素刚愎自用、长着螺旋桨似白须的老人，身体不由得发抖了。

如果说上述11家皇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降为平民的话，那么三笠宫却是甘愿自行降为平民的。

三笠宫崇仁亲王是裕仁天皇的四弟，素有"红色亲王"之称。三笠宫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过侵华战争，战争结束时是陆军中佐。战后，他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当研究生并同时研究历史。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三笠宫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严厉的批评。他曾根据自己对于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见闻，写了一本名为《帝王·坟墓·民众》的书。在书中，他坦率地承认："'圣战'这个堂而皇之的美名，跟事实是全然不相符的。而且正因为其真相不是正义的战争，所有表面上就不得不更加强调什么'圣战'了。"

三笠宫不仅直言不讳地抨击日本的侵略战争，甚至还发表了一系列不满皇室的进步言论。

"因为天皇是国家最高的公仆，那就不光是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是陛下高喊'国民万岁'才对。"

"新宪法、新《皇室典范》，不承认天皇让位，就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

"皇族男性的婚姻，要由皇室会议来决定，这不是对基本人权的待遇，有无视人权之嫌。"

"不应当强制人们向天皇敬礼，各人根据各人的判断去做就行。见到天皇，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招手，有的人佯装不知道，最坏时做个'鬼脸'也可以，没有丝毫关系。"①

正是由于具有上述思想基础，三笠宫"经常为身居皇族地位而感到苦恼"。1982年，他终于作出决定，脱离皇籍，专事残疾人福利事业。他说：

---

① ［日］《文艺春秋》，1951年12月号。

我是从过去那种极不自然的皇室制度（假如允许我直率地说的话，那叫没有“铁窗的监狱”）中解放出来的。

我非常愉快，我活了30年才开始知道了一个人在马路上步行的乐趣，虽然感到命运不可思议，但是我可以不被任何人注意，慢慢地在马路上行走。

既然想脱离皇藉，就应当专门从事一项社会事业，这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问题……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终止还是不终止皇族身份……终止对社会有利呢？还是不终止有利呢？经过几个夜晚、几个月的深思，终于得出了一个平凡的结论，像我这样的人，留在皇族中间能有什么作用呢？

三笠宫的这一决定，震动了皇室，闹到了日本国会。宫内厅为此还召开了皇族紧急会议，协商的结果是：希望三笠宫今后仍以皇族身份活动，不要辜负国民的期待。最后，由宫内厅出面，费了好大劲才最终说服三笠宫收回了这个决定。但是，在1982年春天，他最终还是决定脱离皇藉，提出了专事福利事业的申请。

裕仁与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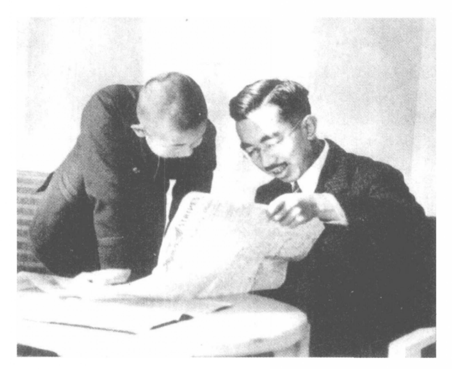
1945年日本战败时，皇太子明仁就和许多小学生一样，都被疏散到日光躲避战乱。与裕仁天皇的联系只能通过共同通讯社来负责传递信件。1945年9月9日，裕仁天皇在给明仁的一封信中写道：

看到你给我写的信了，谢谢你，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感到很高兴。国家现在事情非常多，但是你放心，我也一切都很好。不得不下这样的决心（指宣布投降），应该早告诉你的，但是因为和老师所说的不太一样，请原谅我没有早告诉你。

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战争的）败因：

我国人过分相信皇国而轻视英美；我军人过分以精神为重而忽视科学；明治天皇之时，拥有诸如山县（有朋）、大山（岩）、

山本（权兵卫）等陆海军名将。而如今，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人专横跋扈而不考虑大局，只知进而不知退。战争如继续下去，三件神器也难逃灾难，还将死伤国民无数。因此只能饮恨保全国家。穗积大夫见高识广，你有不懂之处，可去向他请教。①



裕仁与明仁皇太子在一起（1946年2月）

1945年11月7日，明仁从躲避战乱的日光返回东京，陪同他一起回京的有上面天皇在信中所提到的、担任东宫大夫不久的穗积重远。本来，负责皇太子的傅育官在官制上一直是由皇后统管的，但战败之后，日本皇室为了避免战争的责任牵扯到皇太子，遂决定从官制上使皇太子脱离天皇、皇后而独立起来，原来的傅育官全变成了东宫皇太子的侍从，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穗积重远博士，被任命为东宫大夫。穗积重远以对皇室的一片忠心而深得裕仁天皇信任。在接受东宫大夫的任命时，穗积重远向天皇表

---

① ［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年，第205～206页。

示："准备不惜粉身碎骨奉献出我的一切。"

明仁返回东京后，先是同弟弟暂住于未全烧毁的赤坂离宫内，随后又迁移至位于小金井的新竣工的行宫。即便如此，仍同战前一样，他们兄弟俩只能在每个星期日前往皇宫探望父母。

虽然见面的时间很少，但天皇夫妇仍为孩子又回到东京，回到自己的身边而万分高兴。裕仁天皇更是抓住每周一次的见面机会，对刚刚12周岁的明仁进行"思想教育"。

一次，明仁读罢报纸，向裕仁天皇提出了关于共产党的问题，父子之间就此进行了一番对话。

明仁："共产党不必取缔吗？"

天皇："以前根据《治安维持法》取缔过，但这样一来，反倒把他们英雄化了。即使不加取缔，也用不着担心他们会强大起来。"

明仁："警察官里是不是坏家伙太多了？"

天皇："其中也有坏家伙，但不能一概那么讲。"

明仁："共产党在议会中会不会强大起来？"

天皇："即使报纸上有各种各样的报道，他们也不会成为强大的团体。"

通过这次谈话，裕仁天皇意识到了新闻媒体对明仁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天，他召来了木下道雄侍从长命令道："穗积东宫大夫的指导和我所说的必须一致，因此，你要把这次的对话说给穗积听。我所说的是：共产党的消长与天皇的态度有关，在暴君的统治下，他们就可能强大起来。"

穗积等人接到天皇的命令后，心领神会。此后，便经常在这些问题上三言两语地提醒明仁，以防他的思想被"赤化"。他们这样做，固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在战后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大背景下，他们要想完全像过去那样对明仁继续实施"帝王学"教育，已是不可能了。

对明仁长期与父母分居，只是在侍从的陪伴下学习生活，学校的一些老师认为太不近人情，明仁"太可怜了"。尤其是教授英语的培宁夫人，她在与天皇夫妇会见时，也曾当面劝说他们，应该让明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据日本共同社在多年之后披露，当时的裕仁天皇曾沉痛地说："我自己未能阻止这场战争，所以没有资格教育自己的继承人。"

1951年7月29日，日本的两家大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同时报道了一个令日本国民十分关心的热门话题："12月23日，明仁亲王的

成年日即将到来。宫内厅已开始着手选妃的非正式调查。”

按照日本皇室的习惯，皇太子年满 18 岁即算成人，应该考虑成亲了。虽然由于裕仁天皇的母亲节子在这一年 6 月去世，明仁的成年式被推到下一年 11 月才举行，但敏感的新闻界还是抓住了这一话题大做文章。各报社都设立了“皇太子选妃对策本部”，安排了几位专职人员，瞪大了眼睛，猎取头号新闻。

就在新闻界率先拉开选妃序幕的同时，已进入青春期的明仁也坠入了情网，令明仁着迷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学习院教授林友春的长女林富美子。富美子出身于旧华族，本人不仅长得妩媚动人，而且性格开朗，品学兼优。然而，令明仁意想不到的是，1953 年夏天，明仁的好友给他带来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富美子已同三井物产公司食品部部长代理三井之乘订婚，并一同去海外旅行去了。据说，富美子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是因为不愿因此而招致旧皇族和旧华族的嫉恨，同时她也担心不能适应举手投足都有严格规矩的宫廷生活。

初尝失恋的滋味，好长一段时间里，明仁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神情恍惚，委靡不振。看着日益憔悴的皇太子，天皇夫妇非常着急。他们感到，为明仁选妃一事不能再拖了。于是，天皇一声令下，皇室成立了由明仁最尊敬的老师小泉信三和宫内厅长官宇佐美毅牵头，有主要皇族成员参加的“皇太子选妃委员会”。为明仁选妃的活动全面展开了。

每天，皇室都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求爱情书。然而，战后虽然公布了新的《皇室典范》，但在为皇太子选妃的标准上，基本还是沿袭了旧典。因此，选妃委员会一开始还是把范围局限在旧皇族和华族当中。但认真挑选起来，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明仁也并不满意。选妃面临危机，选妃委员会不得不扩大遴选范围。宫内厅向学习院以外的名牌女子大学，如圣心大学、东京女大、日本女大、御茶水女大等发出了请求协助推荐王妃候选人的委托书。在上述学校的推荐名单中，排在圣心女子大学名单第一名的便是后来成为皇太子妃的正田美智子。

美智子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正田英三郎是一家面粉厂的老板，为人正派朴实，教子有方。在圣心女大，美智子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是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57 年春，她以圣心女大英语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说来也巧，1957 年 8 月 19 日，就在日本负有盛名的轻井泽网球场上，

明仁和美智子邂逅了。至此，明仁便被相貌出众、风姿绰约的美智子迷住了。在轻井泽的那段日子里，明仁常约美智子一同去郊游、打网球。两人很快便由相识发展为相恋了。

当明仁与美智子相恋的消息渐渐传开时，招来的却是如山而至的反对之声。

1958 年 4 月，选妃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明仁和美智子婚事的坚定支持者小泉信三在会上正式提出：根据明仁皇太子的意愿，把正田美智子作为唯一的皇太子妃候选人。

决定一出，便遭到了众多旧皇族成员的反对。他们有的认为堂堂皇太子绝不能娶一位平民出身的姑娘，有的则以美智子毕业于天主教系统的圣心女大，在宗教信仰上大做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一心要促成这桩婚事的小泉信三等人，在 1958 年 7 月前往叶山行宫拜见了正在休养的裕仁天皇夫妇，详细介绍了美智子的情况，以及明仁非美智子不娶的决心，特别说明了美智子并不信仰基督教。

对明仁和美智子相恋一事，天皇夫妇早有耳闻。出身于皇族的良子皇后不大赞成，然而，也许是由于自己在同良子结合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一番磨难的缘故吧，裕仁天皇对此事显得比较开通，也能体谅儿子的心情。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他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皇太子喜欢，平民出身也无妨。”

裕仁天皇此言一出，反对派的意见自然被压下去了。但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当宫内厅长官宇佐美毅前往正田家正式提亲时，却遭到了正田一家的婉言谢绝。正田英三郎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到如同樊笼般的皇宫里去受罪，又担心世界各国皇室大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形势下，日本皇室被推翻而牵连到女儿。因此以“出身平民、家境寒微、小女美智子娇生惯养，难以胜任皇太子妃之大任”为由拒绝了皇室的提亲。

父母的拒绝，令美智子伤心不已，大哭了一场。在这种情况下，11 月 7 日，小泉信三决定亲自出面做正田夫妇的说服工作，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亮出了最后的王牌：“两位陛下强烈地希望美智子小姐嫁给明仁。”语气之坚定，使得正田夫妇感到已没有推辞的余地了。于是决定不再干涉美智子的婚事，由她自己作出选择。

至此，经过一年又三个月的热恋、挫折、希望、失望之后，二人终于能走到一起了。1958 年 11 月 27 日，根据《皇室典范》的规定，日本皇室



明仁皇太子与美智子皇太子妃举行大婚之礼

召开了专门讨论明仁皇太子妃候选人的会议。会议正式作出决定，批准正田美智子为皇太子妃。

1959 年 4 月 10 日，日本皇室在皇宫的贤所为明仁和美智子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大典。皇太子身穿橘黄色的黄丹袍，头戴天子冠，手执笏板。美智子身着宫中特有的十二层单衣，头上的乌发做成下垂发型，拖至腰际。在拜见天皇夫妇的朝见仪式上，裕仁天皇亲自向美智子颁发了勋一位宝冠章。

1960 年 2 月 23 日，结婚刚一年的美智子就生下了一名男婴——未来皇位的继承人。裕仁天皇欣喜异常，他在汉学家们提供的备选名字中，亲自为皇长孙选定号“浩宫”，名“德仁”。这一名号典出《中庸》第三十二章：“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从这一命名中，人们不难体会到裕仁天皇期望皇孙能广积天子之德，如同苍穹浩而不偏的一番心愿。

乔迁新皇居

战后初期，裕仁天皇仍居住在战争期间为防空袭而修建的御文库中。这座建筑是在战火中突击修建的，较为简陋，房间的湿度也比较大，有时露珠几乎要顺着墙壁和绳子往下滴。负责天皇生活的宫内厅认为这样住下去，既有碍于天皇的健康，也有损于天皇的形象，因而多次提出建造新皇宫的建议。对此，裕仁天皇考虑到当时日本正处于重建时期，国民住宅难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而没有同意。宫内厅只好在1953年对御文库进行了重新装修，安装了空调、湿度调节器和隔音装置，地面还铺上了厚达3厘米的弹性木条，以缓解房间的潮湿状况。

随着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的住宅问题已逐渐得到了解决，这时对宫内厅提出的建造新皇宫的建议，天皇予以了批准。从1959年起，在原御文库的南面着手动工修建新皇宫。1961年11月，新皇宫正式落成。同年12月8日，天皇夫妇乔迁新居。

这座被称作“吹上御所”的新皇宫，是一幢地下一层、地上两层、总面积达1320平方米的奶油色西式建筑。皇宫一层设有客厅、谈话厅、书斋、书库、食堂，以及专供良子皇后用的日本式套间和浴室。二楼设有天皇的卧室、更衣室、浴室以及专门供奉剑玺的剑玺室等。考虑到天皇夫妇年事已高，还专门安装了电梯。

宽敞的书房，令作为学者的天皇非常高兴。在此之前，大量的学术文献、书籍以及与皇室有关的文件、书籍都是散乱收藏的。

在修建吹上御所后，宫内厅又选择风景秀丽的西之丸地区，在被战火烧毁的明治宫殿的遗址上建造了一所新殿，用于天皇举行各种政治活动以及日本政府举行重大国事活动。新殿由正殿、长和殿、丰明殿、连翠水院等几栋建筑构成，以回廊连成一个建筑群，具有明快朴素的日本式建筑风格。正殿是天皇和日本政府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共分三个厅：“松厅”是天皇举行亲认式、认证官认定式、各国大使信任状奉呈式和亲授勋章的场所，“竹厅”是天皇会见国宾、公宾的场所，“梅厅”是皇后进行公事活动的场所。此外，丰明殿是皇宫的大型宴会厅，长和殿是为天皇举行晚餐会和接受朝拜的宫殿。

对新居吹上御所，裕仁天皇十分满意。比起潮湿阴暗的御文库来，吹上御所终日向阳，内部装修典雅舒适，住所外花草茂盛、树木葱茏，的确是一个休憩养性的好地方。裕仁在吹上御所的周围悬挂了100多个人工鸟巢，召集了多种野鸟在这里栖息。另外在吹上御所周围，还有良子皇后亲手种植的玫瑰。自从搬到这里后，裕仁天皇便再也没有迁居，住了将近30年，直至去世。

在吹上御所，裕仁天皇仍同过去一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一般情况下，周六和周日是休息日，周一到周五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处理公务。

每天早晨7时，皇后按响床边的蜂鸣器后，裕仁天皇准时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卧室设在楼上，是朝南的西式房间，有20张榻榻米大。地面铺着红色的地毯，并排摆着两张双人床，床上按古老的习惯铺着纯白的羽绒被褥。

天皇把大衣披在贴身的睡衣上，来到盥洗室，用电动剃须刀剃去胡须。牙刷是从市面上买来的，但头油则是皇家美容师石井亲手调制的。洗漱完后，天皇便会来到旁边的更衣室，由内舍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给他穿上。除了需要在燕尾服上佩戴勋章时需要添加人手外，一般都由一人伺候，领带和西服多由皇后在前一天挑选备好。穿着好后，天皇便会下楼来到内厅阅读报纸，如《文艺春秋》等各类综合杂志、周刊以及妇女家庭杂志等。天皇有时从报刊、书籍广告栏里发现自己喜欢的新书，便会让侍从买回来。8时多吃早饭。餐厅在宫殿的西南端，厅室向外突出，一眼望去便能看到宽阔的庭院。早餐一般是欧式风味，如麦片粥、烤面包、牛奶、水果等，战后一直如此。

早餐后，天皇常常还会浏览一下当天东京的各种报纸或科技书籍。10时整，准时到达新宫殿的“菊厅”处理公务。菊厅内，设有带菊花纹徽的銮座包厢。天皇在此就座后，就成了国家的办事人员。以往，裕仁天皇往往是徒步去菊厅，顺便观赏路边的花草，但后来一般都是坐车去。徒步需要十多分钟，坐车约用两分钟。

裕仁天皇的工作日程一般是在数周前就确定好的，日程表经常排得满满的。

中午如无应酬，裕仁便回到吹上御所同皇后共进午餐。午饭后小睡一小时，下午2时左右重新回到菊厅处理公务。但公务繁忙时，他就在菊厅进餐。下午4时或5时下班，有时公务处理不完，还要把文件带回吹上御

所“加班”处理。

下午6时左右吃晚餐。午餐和晚餐往往是日式和欧式相互交替，但裕仁晚年时进餐日式风味的时候比较多。为了减轻牙齿和肠胃的负担，肉要剁得很碎，而鱼肉则要除尽毛刺还要煮得烂熟。天皇不偏食，尤其爱吃油性的东西，像鳗鱼、炸虾、中国料理等，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对油性食物也逐渐有所控制。此外，还有炖香鱼、茶泡加吉鱼、甲鱼汤，再就是黑雀蜂幼虫（日本松本市附近的名产）。

1948年在长野县巡幸时，当地端出清炖黑雀蜂幼虫来款待天皇。裕仁十分爱吃，第二天还问有没有剩下的。却不知侍从们在夜里已经都给吃光了，裕仁只能很失望地面露苦笑。

裕仁小时候曾喝过一次酒，当时他感到很不舒服，一连睡了两天。从那以后，裕仁便滴酒不进。

关于喝酒，还有一段趣闻。有一次，侍从们为了让天皇看看喝醉了酒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请当时以酒量大而闻名的侍医村山进宫陪餐。大家一个劲儿地为村山劝酒，村山高兴地一杯接一杯，不禁酩酊大醉，满脸通红，说话也粗声粗气的。过了一会儿，居然把杯子伸向了皇后：“太太，给我斟酒吧！”大家都很吃惊。坐在村山对面的天皇目睹了村山醉酒的全过程，不胜感叹道：“人喝醉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与天皇不太相同的是，皇后喜欢清淡的日本食品，稍微喝点酒，感冒时爱喝鸡蛋酒。如果要找两人的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吃甜食。

天皇爱吃的甜食有年糕小豆汤、巧克力、洋点心、甜酱烙饼等，偶尔也会尝尝甜酱煎饼。甜酱煎饼是京都的名产，侍从们从关西回来时经常买些回来送给天皇。后来宫内厅的御膳房也学着做，但总不如当地的好。这难免惹得裕仁对御膳房的人发牢骚：“御膳房的烹调也要学学别人的长处才好！”还说御膳房“缺乏研究”。

在办完公务回住处时，裕仁经常变换路线，悠闲地欣赏四季不同的花草。晚上的时间通常是与皇后聊天、看电视或读书，偶尔也会到侍从长的房间去玩一局牌或聊聊天。晚上一过9点半，天皇在寝室换上睡衣后，当值的侍医就会照例来测脉搏和体温，偶尔修剪脚指甲也是侍医的工作，而修剪手指甲却是皇后的专项。天皇通常会在10点左右就寝。

按照习惯，晚饭前要入浴。可是天皇并不喜欢洗澡，照他的话说，“我十天不洗澡也不在乎”。所以经常说声“今天算了”而作罢。一般两三

天洗一次，每次最多不过二十分钟，用的都是温水。

天皇和皇后的浴室从来都是分开的，夫妻不能同浴。宫中自古有敬神忌秽的习惯，特别讲究洁净。擦下身的毛巾绝对不能用来擦上身，用于脸部、上身、下身的毛巾分为四五条，出浴之后用得更多。等到天皇出了浴室，肥皂不知滚到哪里去了，海绵也扔在一边，室内乱七八糟。天皇洗完澡后，从不穿着浴衣松快松快，而是随即穿好西装、系好领带去吃晚饭。

在浴室里换衣服时，内舍人员事先按穿着的顺序把内裤、衬衫等摆放在箱子里。箱子是用白木做的，表面绘有很大的金色菊花纹章。晚春季节的一天，稍许有些冷，在箱底下摆着厚薄不同的两双袜子。天皇走后，内舍人员前去收拾，居然发现厚薄袜子各剩一只。好在袜子颜色相同，内舍人员才放了心。



在吹上御苑的天皇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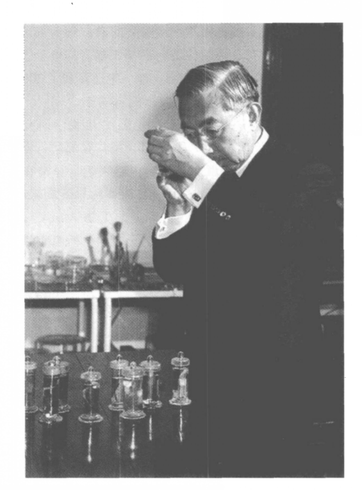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战后天皇　裕仁去世

钟情于生物学的裕仁

研究海洋生物，是晚年裕仁天皇的一大业余爱好。只要没有公务，每周的周一、周四下午和周六，他都是在皇宫内的生物学研究所度过的。这个研究所建于1928年，所内陈列着6万多种他亲自制作的生物标本，其数量之多在日本也是屈指可数的。

裕仁天皇的兴趣主要在海洋微生物，尤其是腔肠动物，此外裕仁对海洋生物分类学也比较感兴趣。裕仁天皇经常去海边采集标本，他差不多每年冬夏都要到神奈川县的相模湾以及叶山、伊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有时还借用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叶山丸”，在近海捕捞海底生物。他经常将刚刚捕捞的标本，在船上进行选择，对不需要的，裕仁尽量将它们放回原处。对自己为什么选择海洋生物分类学作为研究重点，裕仁天皇解释说：“在生物分类学领域，专家很少涉猎，不像遗传工程那样竞争激烈，因此比较容易出成就。”

裕仁对植物研究也非常感兴趣。每年都要在那须停留四五十天，几乎每天都去观察、研究和采集植物标本，他和其他研究学者共同做了1157种观察记录。在叶山的鲛岛，裕仁曾发现过一种长得很低、开着类似樱花花蕾的树。天皇高兴地说：“这种植物非常罕见，应该是新品种吧。”但曾在裕仁的生物研究方面经常对其进行指导的服部广太郎博士却说：“不是，这是○○○，以前就有”。裕仁仍然不认输，经过一番争论后，最终还是天皇认输。虽然类似的争论经常会有，并且往往也多是以天皇的失败而结



生物学研究所观察标本的裕仁天皇（1973年4月19日）

束，但在这一过程中，裕仁在植物分类学方面也逐渐有了名气。

由于研究的缘故，裕仁对各种生物都非常爱护。在那须，和在吹上御苑一样，他决不让人随意乱摘一根杂草。他认为："人将之称为杂草，但草却各有其名，而且总是要尽力活下去。"不仅如此，裕仁对待动物也心存爱心。据原侍从小出英经回忆，有一次在那须走山路时，天皇突然驻步不前，侍从不知何事，只见天皇直盯着脚下的一点，原来一条蚯蚓在慢慢地爬行。天皇担心后来的人不留神会踩到蚯蚓，所以停下来等了5分钟，直到蚯蚓爬过路去。

特殊的身份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再加上数十年坚持不懈地潜心研究，裕仁天皇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除经常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研究论文外，还独自撰写了《相模湾产后鳃类图谱》等5部著作，与植物学者共同研究编写的著作有《那须的植物》等5部。其他学者以他采集的海洋生物资料为主编写的著作有10余部。他一生还发现了200余种动植物新品种，对海洋生物学研究确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裕仁天皇曾自谦地说："生物学研究不是我的专业，只是个人兴趣而已。"1970年9月16日，裕仁在那须行宫会见记者时回忆道："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对动植物很感兴趣，经常在沼津或叶山等地捡贝壳。在伊香保，我还和秩父宫一起抓到两只紫蝴蝶。从那时起，就作为一种兴趣坚持了下来。"同时，国际上的生物学专家对裕仁天皇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1年，英国皇家科学院特地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在他去世后，美国著名生物学博士贝亚曾撰文写道："天皇的去世对日本科学界和世界生物学界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日本的一些报刊曾也将裕仁天皇称为"科学家天皇"、"学者天皇"，可以说他是不虚此名的。

战后天皇的"皇室外交"

战后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不参与国政，但若翻开天皇的年谱，在裕仁天皇繁忙的政务活动中，开展"皇室外交"对促进日本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裕仁天皇不仅每年要接见大批的外国宾客，有时还设晚宴款待国外来宾。据统计，他在战后会见的各国元首和皇族人士约200人，其中有美国总统、英国女王、法国总统、中国总理等。1986年，已是85岁高龄的裕仁天皇仍接见外宾达171次之多。

由于对战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裕仁天皇出国访问的次数并不是太多。仅有的两次出访也是限于欧美国家，而没有一个亚洲国家。1971年9月，裕仁天皇偕皇后对丹麦、比利时、法国、英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士7个国家进行了为期18天的访问。在这次访问的国家中，除瑞士和德国外，都是日本"二战"中的"敌国"。尽管天皇夫妇受到了各国元首的欢迎和破例优待，但由于未在正式场合就侵略战争表示反省之意，仍然遭到了上述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新闻媒体的攻击。在丹麦，有人在天皇路过的大街上洒尿泼粪，散发反天皇的传单；在英国，天皇为纪

念而种植的杉树第二天便被人砍倒，并在根部倒上了浓硫酸；在荷兰，天皇乘坐的汽车风挡玻璃被飞来的瓶子砸裂，太阳旗也被烧毁，“裕仁，滚回去！”“法西斯杀人魔王！”等传单四处飞散；在比利时和德国，天皇甚至也挨了西红柿，遇上了示威游行的队伍。

接受战后第一次出访的教训，裕仁天皇夫妇于 1975 年 9 月访问美国时，在白宫福特总统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裕仁这样致辞道：

> 多年来，我一直渴望来贵国访问，并且我一直想，如果能有这个机会，我将向美国人表达我的下述想法。在我深感悲痛的那场不幸的战争之后，贵国立即为本国的重建伸出了温暖、好意的援助之手。对此，我要直接对贵国人民表示感谢！

美国新闻媒体在报道天皇的讲话时，把天皇所说的“深感悲痛”解释成遗憾之意，认为这是“天皇在美国国民面前对于那场战争进行的谢罪”。10 月 3 日，天皇还特意前往华盛顿阿林顿墓地向无名战士碑献花、默哀。这是间接地向美国赔礼道歉，因而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欢迎。日、美两国舆论界认为裕仁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国人因忘不了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而怀有的憎恨情感”，使美国人“把裕仁天皇访美看成象征着日美间紧密联系的纽带表示欢迎”。

但是，裕仁天皇在返回日本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日本记者就天皇在美国的发言问道：“这是否意味着陛下感到对包括开战在内的战争全过程负有责任？陛下怎样看待所谓的战争责任？”裕仁天皇对这一问题缺乏思想准备，沉吟片刻后，他才含糊地答道：“我想你提到的是措辞上的问题，我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不深，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就这样，天皇拒绝了明确回答有关自己战争责任的提问。

1978 年 10 月，访问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后，来到皇宫正殿竹厅拜访了裕仁天皇。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会见裕仁天皇。日本朝野上下都担心“邓小平当着天皇的面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裕仁本人也为即将会见这位身经抗日战争的老资格领导人而感到十分紧张。

但见面之后，邓小平以其高超的外交艺术，从发展中日关系的战略全局的高度，巧妙而间接地点到了战争责任这一非讲不可的问题。他说道：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邓小平这番充满大国风度的友好谈话，消除了天皇的紧张情绪，并引出了他这样一番答话：“在两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有段时间发生了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这次会见之后，邓小平与裕仁天皇的谈话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共同社发表文章指出：“裕仁天皇在首次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使用‘不幸事件’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达了谢罪之意。”

在战后，裕仁天皇在接见外宾的场合，通常都是按外务省和宫内厅合拟的讲话提纲发言的。但他与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却是第一次脱离了讲稿，临时加上去的。当时担任天皇侍从长的入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竹厅，天皇陛下说：‘曾经有过不幸的事件’，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件。”

日本宫内厅人士还就此在私下分析：“大概在裕仁天皇的脑海里一直思考他的战争责任问题，因此才顺口说出未经商量的话……陛下可能也想作为‘人的天皇’向中国人民说几句话吧。”

上述共同社和宫内厅人士的分析基本上是可信的。裕仁天皇如果不认为自己负有战争责任，是不会说出这种道歉性质的话的。但是，对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奴役之苦的广大亚洲国家的人民来说，仅有天皇的这句“不幸的事件”道歉是不够的，各国人民所要求的是，日本所有政治家都能深刻地反省那场战争，记取历史的教训，保证日本永远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战后的裕仁天皇虽然由“神”变成了人，但他仍十分重视皇宫中的例行祭祀活动。根据战后初期驻日盟总颁布的《神道指令》，国家神道已被彻底废除，政教已经分离。因此，天皇是以天皇家族的“家长”身份主持宫中祭祀的。政府官员可以自主决定参加与否，已不再是国事活动的组成部分。对这些祭祀活动，裕仁天皇仍像过去一样虔诚，基本上是按照明治时代制定的《皇室祭祀令》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从1952年到1975年，裕仁天皇先后七次参拜了坐落在东京千代田区九段的靖国神社，这是与宫中祭祀完全无关的活动。靖国神社内供奉着自明治以来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

等14名甲级战犯。裕仁天皇的参拜，不仅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这些战争罪犯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对少数右翼分子利用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的种种倒行逆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战后的裕仁天皇虽然是象征性天皇，但其确实仍有繁多的公务需要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天皇大约每年处理的各类文件，总数都在1000件以上，每年还要参加50多次诸如国务大臣认定式之类的象征性国事活动，出席200多次礼节性的礼仪、宴会和接见，发出600多封致外国元首的函件与贺电。

通过频繁地参加各种国事活动，以及与国民的广泛接触，裕仁天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前那种神秘莫测的“神”的形象，在国民中仍保持了较高的威望。另外，在战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裕仁天皇通过积极开展皇室外交，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促进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位皇室的崇拜者曾说过：“一百个大使也抵不上一个天皇！”此话虽属夸张，但也说明了天皇在战后日本外交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裕仁的晚年生活

除海洋生物等研究外，裕仁天皇还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在皇宫，裕仁天皇经常和随从或孩子们一起玩象棋、扑克。他还爱打麻将，常和皇后、女官、侍从或者是女儿照宫一起围在桌前打麻将，皇后多少会一些，刚开始时照宫不会，天皇就一边打一边教她。

裕仁天皇还经常收看他最喜欢的日本国技——相扑比赛节目。由于是在家里，不必像在国技馆观战时那样受拘束，所以每当有裕仁天皇喜欢的相扑运动员上场时，他都看得特别投入，眉飞色舞，呐喊助威，身子也不停地摇晃着，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帮着场上的运动员使劲，用脚猛地一踢，甚至有时连拖鞋都踢飞了。在体育活动方面，马术、游泳、相扑、高尔夫球、滑雪、乒乓球、网球等，裕仁都非常喜欢，用他自己的话说：“体育活动，除滑冰外，几乎都参与过，但都不精。”

裕仁也酷爱看电影，一般每周都在天皇书库的中央大厅播放电影。坐在最前面的是天皇和皇后，稍后一点常坐着儿孙们，有时也让侍从陪着一



在皇宫内的“菊之间”办公的裕仁天皇

起观看。自从1966年观看了家喻户晓的《阿花》以后，看电影便成了天皇了解民众生活感情的窗口。杉村在《给天皇把脉》一书中描述道，在观看电影时，看到天皇拉着皇后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脸上露着微笑。另外，当电影里突然出现战争场面的时候，天皇的肩膀会有轻微的颤动。

步入晚年后，裕仁天皇年轻时的许多个人爱好，如游泳、马术、高尔夫球、滑雪、网球等都不得不放弃了。闲暇时，只能是散散步或看看电视。裕仁天皇所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是新闻，遇有重大新闻事件，他还会用录像机录下来。在收看了风靡日本的电视连续剧《阿信》后，他曾对记者说：“我没想到那个时代如此艰苦，特别是对妇女来说。”

裕仁天皇与皇后良子情深意笃，是日本第一个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天皇。两人相濡以沫60多年，始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裕仁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不纳妾；良子在生活上也对裕仁悉心照料，夫唱妇随。

战后的新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但在1973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涉及了新宪法的这条规定。这一年5月，围绕增强防卫力量一事，执政党与在野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防卫厅长官增原拿着地图，就自卫队的现状、防卫能力等向天皇作了详细的说明。天皇听后说道：“与邻近各国相比，自卫队力量并不是很大，为什么会在国会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呢?”他安慰增原道：“国家的防卫是最重要的，不要效仿旧军人坏的一面，要吸取他们好的一面，希望好好努力。”感激不已的增原在记者会见时不小心披露了天皇的话，他说：“陛下非常关心国家的防卫，在下惶恐之至。”言外之意就是说国会也应该体察陛下之意，不要在增强防卫能力一事上总是反对政府。然

而作用恰恰相反，这一发言反而成了引发攻击的最好诱饵。国会强烈表示：防卫长官有在政治上利用天皇来增强自卫能力的意图，要求防卫厅长官辞职。

如果天皇的发言介入政治，这是触及宪法根本的问题。如果将天皇卷入政治争论，内阁也得总辞职。面临如此重大事态，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忙召集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等实力阁僚进行紧急协商。最后得出的统一结论是：作为制度来说，政府人员向天皇进行“内奏”是没有的。因此即便天皇的发言如报道所言，那也不过是属于闲谈，与宪法第 4 条所规定的“关于国政”并无关系。但决定一出，马上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如果承认有“天皇发言”一事，显然责任就会牵扯到天皇。最后只能以“天皇并无发言，责任全由长官引起，长官辞职”这样的形式了结了此事。①

1972 年 6 月 24 日，是裕仁天皇即位后的 16619 天，这意味着裕仁天皇的在位天数超过了明治天皇。1974 年 1 月 26 日，是天皇和皇后的金婚之年，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道：“陛下最快乐的回忆是什么？”“最快乐的是最近的欧洲之行。在促进两国亲善关系的同时，还和各国的学者见了面，参观了动植物标本等，非常有趣。”天皇回答道。“那么这 50 年间，陛下和皇后美满和谐的秘诀是什么？”记者又问道。天皇的回答是：“什么是秘诀，我也不太清楚。总之，遵守传统道德，遵守始终相互协作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秘诀吧。”

1975 年 9 月，裕仁在访美前夕，曾会见外国记者团，当有记者问及为什么没能阻止战争时，裕仁这样回答道：“结束战争的讨论，在御前会议上是三票对三票，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铃木首相感到难办，由于征求了我的意见，大家才转而赞成结束战争的。但是发动战争的时候，是政府、统帅部决定的，我不得不勉强同意。我相信这也是合乎宪法规定的。”接着，他回忆道：“凡是我能想到的都想过了，能够采取的手段都采取了。但是，虽然我尽了我能够尽到的一切力量，却没有什么效果，战争终于还是打起来了，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对这种答记者问的说法，评论家、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袖井林二郎抨击道：“这完全使人感到是推脱了政治责任的理论，对发动战争没有责任，而结束战争却是自己的功绩。这种说法，不就是光往自己脸上贴金吗？”

---

① ［日］河原敏明：《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 年，第 360 页。

1976年11月，日本政府准备在东京武道馆为裕仁天皇举行“在位50年纪念仪式”。然而围绕纪念仪式，却引发了许多争论，反对派认为天皇虽在位已50年，但战后的30年和战前的20年一样，仍处于黑暗时代，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社会党、共产党也都表示反对。接着，美浓部东京都知事作为革新派的头面人物也表示将不会出席仪式。随后，全国的革新派知事、市长也纷纷效仿，左派的国民和部分知识分子也表示反对。总之，对此次纪念仪式，各阶层人士、国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准备主办这次庆祝活动的政府顾及这一形势，只好将庆祝规模缩小。

11月10日，纪念仪式在日本武道馆举行。天皇和皇后端坐在正中央，皇太子夫妇、常陆宫[①]夫妇分坐于两侧，国会议员、各界代表、外交使节等7500余人参加了这次仪式。首相三木武夫首先致辞，随后众参两院议长、外交团代表分别祝词，最后天皇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回顾过去的50年，深深感慨国民在承受了无数的苦难才有了今日的日本，为了建造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愿一直守护到最后。”[②] 当天，武道馆上空有直升机在盘旋，会场周围有500人的警卫警戒，甚至动用了装甲车。害怕引起激烈阻止运动的裕仁在讲话中加进了一些内容：“每当想到在上次战争中牺牲了生命的人和他们的家属，看到至今仍留着战争的伤痕，我就不胜痛惜。”

1984年1月，皇宫内举办了一个大型音乐会，以庆祝天皇和皇后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使儿孙满堂的天皇夫妇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巨大的欢乐之中。不少日本人认为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几十年和睦恩爱，给日本社会特别是老年夫妇带来了安定感，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楷模”。

1986年，裕仁天皇已年满85岁，登上皇位已有60个年头了。这一年的4月29日是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政府为他举行了“在位60年纪念仪式”。在纪念仪式上，裕仁天皇回顾了过去60年的沧桑岁月，他说：“今天在此回顾昭和60年的岁月，想到先时战争所造成的国民牺牲，仍感悲痛，从而更加痛感和平之可贵。”“值此在位60年之际，愿与国民诸君共同祈祷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福祉，期待着创建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国家。”

---

① 常陆宫：裕仁天皇的次子王正仁亲王在1964年9月30日与津轻华子结婚后设立的宫号，是“二战”后日本皇室设立的第一个宫家。

② ［日］大久保利谦等监修：《昭和史画报·第14卷·昭和史和天皇》，研修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番话也是勾画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出席这次纪念仪式时，裕仁天皇身体虽然还算健康，但已老态毕露，步履蹒跚，讲话也显得非常吃力。1987 年 4 月，裕仁天皇在他 86 岁的生日宴会上初感身体不适，只好中途退席。以后，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天皇患病以后，宫内厅医院为他进行了精心的检查。当年 9 月 22 日为他做了历代天皇从未做过的剖腹手术，切除了一段结肠。手术后，宫内厅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健康公报，称天皇的病是由肠胃慢性发炎发展为通过障碍，并宣布国事行为交由明仁皇太子代行。

但实际上，天皇的病情要远比公报上所说的严重。10 月中旬，皇太子明仁亲王访美归来，德川义宽侍从长和高木显侍医长立即与他见面，向他汇报了对裕仁天皇病理检查的结果。

高木侍医长说："坦白地说，陛下所患的是胰腺癌。癌细胞已从胰腺扩散到直肠，而且引起了阻塞。虽然进行了手术，但肿瘤还在胰腺里，如果硬要摘除肿瘤的话，恐怕会引起不测，给陛下造成痛苦，我不想这样去做。从陛下春秋已高、御体衰弱这一点来看，应该避免积极的手术治疗。"明仁默默地倾听了高木的说明，既没有插话，也没有刨根问底。在高木讲完话后，只是说："明白了，全拜托您了。"显然，此时的明仁已经意识到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

就在那次手术后，日本内阁开始着手为天皇的后事进行准备。内阁、宫内厅以及新闻界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将天皇将要去世的那一天定为"X"日，并确定了这一天后各种悼念活动和仪式的一切细节。

进入 1988 年，裕仁天皇的病情曾一度得到控制。在他 87 岁生日那天，裕仁还在宫中分三批接见了前来为他贺寿的国民，日本内阁会议也决定将部分国事行为交还给他。但进入 9 月以后，裕仁天皇开始大量吐血，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日本政府动用了一切力量进行抢救，仅输血就达到了 3 万毫升，人为地使他的生命又延长了 4 个月左右。

自发病以后，裕仁天皇便已从报端逐渐了解了自己的病情。但他对自己的病情进展如何，能否治愈，却从未曾问起过。他把自己的治疗完全托付给了侍医团，同时，他也从亲人的慰藉中寻求着与病魔抗争的力量。

从天皇病危到去世的 100 多天里，明仁每天都要到吹上御所探望父亲，从未间断过。由于要代理父亲处理国事，他常常是上午办公，下午前去探视。每次前往，他总是坐在父亲的身旁，或是汇报自己办理的政务，或是

聊聊往事。更多的时候，是谈论他们共同感兴趣的有关植物的话题。

与裕仁天皇共同度过了66年风雨人生的良子皇后，也每天都要坐着轮椅来探望天皇①。这对夫妇，越是到了晚年越是恩爱。裕仁天皇在病重后每天总要询问："皇后什么时候来?"当良子的轮椅被推到他的床边后，天皇便会伸出两手握住良子的手，久久不放。

进入11月后，裕仁天皇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白天也总是长时间地闭着双眼，连平时最喜欢看的电视直播相扑比赛也不能看了。11月8日，裕仁天皇对宫内厅长官藤森说："听说很多人都来为我签名，代表也前来慰问。请代我表示感谢。"这句话成了宫内厅发表的裕仁天皇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垂危之际，天皇依然关心着他的《皇居的植物》一书的出版情况。12月12日，出版社派人提前送来了《皇居的植物》一书的硬壳书套。抚摸着放在枕边的书套，天皇的脸上流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裕仁天皇去世

裕仁天皇终于没能等到《皇居的植物》一书出版，1989年1月7日晨6时33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裕仁天皇在位64年，享年88岁，无论在位年限还是年龄，均超过以往所有天皇的最高纪录。

在裕仁天皇病危和去世之际，日本政府曾借机在国内掀起了一场为天皇歌功颂德的"天皇热"。在政府的授意下，日本各种媒体都更改了原有的宣传内容和节目，每天以大量的篇幅和时间连续不断地报道天皇的病情发展及与此相关的新闻，同时要求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甚至连日本政府要员出访和外国首脑访日的计划也被推迟或取消。在裕仁病危时，在皇宫前设立"记账所"，开展为天皇祝福、希望天皇早日康复的签名活动。

就在裕仁天皇去世的当天，约有20多万人前往皇居外苑广场签名吊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长者，有的孑然一身，有的携家带口，也

---

① 1977年7月17日早晨，已75岁高龄的良子皇后在上厕所时不慎跌倒，第一腰椎骨骨折，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轮椅。

有各种团体列队前往的。在离开前，一些人合掌闭目鞠躬致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甚至潸然泪下。

在这如潮的人流中，自然也不时会泛起几股沉渣。少数右翼团体成员也趁机前来表演一番。他们穿着深色制服，胸前戴着太阳旗像章，头顶战斗帽，由彪形大汉高举太阳旗和右翼团体旗在前面开路，犹如当年效忠于天皇的法西斯侵略军。

吊唁者有之，指责者也有之。就在天皇去世的当天晚上，东京的600多名工人与学生团体在新丽区日本基督教团早稻田教会举行了反对天皇制、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紧急集会。同一天，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天皇裕仁是侵略战争的最大和最高负责人，并且，尽管新宪法对他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他经常基于反动立场参与国政。天皇制本来就该废除。"社会党山口书记长则警告日本政府，天皇的葬礼"应遵循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条款，在丝毫不带宗教色彩的场所"举行。

对裕仁天皇的逝世，日本人民的反应虽然也显示出悲痛之情，但对官方铺天盖地的美化宣传活动，许多国民则感到反感。有不少年轻人纷纷致电电视台和电台，抗议播放清一色的内容，要求播放正常节目。与当年明治天皇死后乃木大将甘愿剖腹殉死相比，现代的日本人甚至不愿牺牲周末（1月7日为星期六）的电视节目以示哀悼。对这一现象，合众国际社在一条电讯中指出："日本人对裕仁天皇逝世的低调反应表明，现代日本人已经摒弃了那种曾激起一代日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天皇而战的狂热崇拜精神。"

在天皇去世后，东京大学曾就天皇的有关问题，对该校一年级255名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对"裕仁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这一问题，63%的学生回答"有责任"，其理由"是以天皇的名义入侵亚洲国家的"、"没能够避免战争"等。认为天皇"没有责任"的学生仅有14%。可以说，日本国民对天皇去世所作出的"低调反应"，是与这种认识密切相关的。

尽管日本国内对裕仁天皇去世的反应比较低调，却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不仅是因为天皇的死重新勾起了广大亚太国家人民对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因为日本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纸对去世的裕仁天皇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并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位谋求世界和平、反对日本发动"二战"的"和平老人"。日本官方和媒体这种对天皇的美化

宣传，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声讨。

在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35年的韩国，《东亚日报》社论指出："不管日本花多大力气来否认他应负的责任，但都不能否认战争是以他的名义宣布的事实。"韩国最大的日报《朝鲜日报》就卢泰愚总统打算参加天皇葬礼一事抨击说："总统代表韩国和韩国人民参加葬礼去悼念这样一个灵魂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那场侵略战争和战争责任是历史事实，谁也不可改变。"中国历史学家刘大年在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言，严厉驳斥了竹下登首相所谓对侵略"难下定义"，以及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否定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谬论。

英国广播公司则推出了一部反映裕仁天皇犯有战争罪行的电视纪录片。远东国际法庭起诉班子前成员罗伯特律师也第一次公开发表谈话："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本应对裕仁进行审判，如果他当时受审的话，他会被判有罪，并且被处以绞刑的可能性极大。"与此同时，英国舆论纷纷指责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派遣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参加天皇葬礼，认为这一决定"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日本侵占的远东国家死去的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侮辱"。

新西兰国防部长鲍勃·蒂泽德愤怒地表示，裕仁"应当在战争结束后被枪毙，或者公开把他碎尸万段"。在澳大利亚，一名退伍军人组织把裕仁天皇比作希特勒，鲍勃·霍克总理迫于舆论，改变初衷，宣布将不参加天皇葬礼。

面对上述呼声，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及其内阁十分紧张。原来按照竹下内阁的设想，是要趁裕仁天皇去世之际举办一次隆重的大丧典礼。他们认为这"是炫耀日本外交成果和经济实力的绝好机会，是期待经济大国分担国际责任的明证"，同时也有助于日本官方宣扬"战争责任过时论"。如果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知名人士因历史的原因拒绝出席葬礼，无疑会使竹下内阁的设想落空。

随着预定举行葬礼的日期日益临近，竹下内阁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共有16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7个国际组织宣布将派吊唁使节参加天皇的葬礼。这其中包括55位国家元首、15位副总统、12位副总理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等。有记者注意到，这一来宾人数已经超过了1980年5月参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葬礼的人数。

新西兰外长马歇尔在动身前往东京参加葬礼时，发表谈话指出：“这表明整个国际社会尊敬日本这个国家，这表明大家尊重日本人民，尊重日本20世纪后半叶取得的实力，并不一定表明人们尊重天皇裕仁个人的品格。”马歇尔的这一番话，无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真实想法。

“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国家派代表出席裕仁天皇葬礼，与其说是出于对天皇的哀悼，倒不如说是另有目的。一些曾经直接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也派出了最高领导人参加葬礼，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等。这其中，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虑显然压倒了对历史的痛苦记忆。阿基诺夫人明确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日本投资贷款），她不能不“冒险”出席天皇葬礼。一位南亚外交官说：“这是一个机会来显示我们对他们非常慷慨的援助的赞赏。”日本时事社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趁此机会’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国提出了给以经济援助的要求，由此可见吊唁外交之一斑。”

在前往日本参加葬礼的各国政要中，有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那就是美国总统布什。在“二战”期间布什作为轰炸机飞行员，曾直接参加过对日作战。他的飞机曾被日军击落，他本人也险些被日本人俘虏。在参加葬礼之后，一位美国的随团记者问道：“当你向裕仁天皇的灵柩默哀的时候，你作为一位曾经在原日本兵的攻击中死里逃生的美国飞行员，你的感想如何？”布什总统答道：“如果说我没有想到与飞机同归于尽的战友，那是谎言。”记者们注意到，2月25日，布什总统乘专机从东京前往北京访问的途中，在日本时的那种始终严肃的表情“变得温和了许多”。

就这样，怀着对历史的痛苦记忆，出于对现实利益的慎重考虑，世界各国的政要前往东京，出席了这位本应站在历史审判台前的天皇的葬礼。

为了办好这次葬礼，日本政府不惜工本，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大藏省为天皇葬礼拨款7400万美元，其中2100万美元用于建造裕仁天皇的陵墓，2000万美元用于为前来吊唁的外国贵宾采取安全措施。日本政府和东京地方当局为确保安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备体制，共出动了32000名警察，调动了2500名自卫官，以及24架自卫队直升机。日本广播协会等电视台决定出动上百辆电视转播车，在葬礼当天，从上午8时半起到下午3时半进行全程实况转播。

2月24日清晨，初春的东京，阴云低垂，小雨淅沥，格外寒冷。裕仁天皇的葬礼在这一天正式举行。仪式分两部分，先举行皇室的“葬场殿之

仪”，是传统的宗教仪式；其后是国葬仪式，是由政府组织的“大丧之礼”。

上午7时30分，新天皇明仁和新皇后美智子等皇室成员在皇居宫殿的“松厅”，为裕仁天皇举行“当日殓葬殡宫祭”，向遗体告别。9时30分，臂戴黑纱的明仁天皇夫妇及皇族成员登上汽车，护送灵车向主葬会场新宿御苑进发。长达800米的送葬车队由治丧委员长、总理大臣竹下登乘坐的轿车为前导。当车队穿过皇宫前二重桥时，陆海空自卫队仪仗队在哀乐声中举枪向灵柩表示“最高的敬意”，陆上自卫队鸣炮21响，以示哀悼。车队以15公里的时速徐徐前行，沿途20多万市民打着雨伞夹道相送，有人还打出了“奉送裕仁天皇”的横幅。

10时许，车队到达新宿御苑。上万名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以及各国吊唁使节已云集于此。10时10分，灵柩被移至按照古老传统、用柏木精制而成的葱花辇中。51名抬轿的宫廷警卫身着黑褐色“布衫”，天皇、皇后、祭官、乐师等225人徒步跟随其后，葱花辇不久被安放在葬场殿内。

在举行皇室的“葬场殿之仪”时，先由明仁天皇致“诔词”，接着是祭官长用古代大和语言宣读了记述裕仁天皇的事迹、人品和患病经过的祭词，皇后及其他皇族礼拜志哀。“葬场殿之仪”结束后，撤去灵堂前的“鸟居”（神道用的牌坊）和“大真榊”（神道用的“神树”），然后举行政府的“大丧之仪”，即国葬仪式。

11时58分，内阁官房长官小渊宣布“国葬”正式开始。首先，全体吊唁者于正午默哀一分钟，接着由竹下登等国家领导人致悼词。最后，美国总统布什等163个国家和地区的吊唁使节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等2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凭吊。下午1时零5分国葬宣告结束。

就在葬礼隆重举行的同时，反对裕仁天皇的团体也举行了针锋相对的活动。日本的一些左翼激进组织发出了将进行炸弹袭击的威胁。果然，在当天下午天皇灵车前往墓地途经东京中央高速公路的深大寺时，发生了爆炸事件。日本一个叫“支持喧乱、反对天皇同盟”的组织，还在葬礼进行以及全国默哀一分钟时，不顾政府的限制，在早稻田大学校园里举行了一场名为“哭丧日的著名集会”的摇滚音乐会。一些团体还放映了揭露日军暴行的电影，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在葬礼中掺入了一些神道宗教仪式，日本共产党拒绝参

加葬礼，社会党也没有出席“葬场殿之仪”。

当天下午，天皇灵柩被运往东京以西八王子市的武藏野陵墓地安葬。裕仁天皇的陵墓为上圆下方形坟墓，下方边长 27 米，上圆直径 16.5 米，墓高 8.6 米。这个密林之中的、紧傍大正天皇陵和贞明皇后陵的静谧的墓地，就成了 88 岁的裕仁天皇的归宿。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举行葬礼过程中，不得不淡化神道仪式的色彩。下葬时，取消了一些传统的做法，加长的尼桑灵车取代了传统的牛拉轿车搭载灵柩的方式，用于拍摄电视的灯光取代了过去一路点缀着的炭火灯笼。不过，日本政府没有改变将天皇生前心爱的或贵重的物品与天皇一起下葬的旧例，经过精心挑选的 100 件物品成了随葬品。其中有一台天皇用了近 50 年的显微镜，一些植物、花、海洋动物标本、帽子、鞋、领带、餐具，以及一份天皇喜欢的著名相扑运动员的名单等。

随着裕仁的灵柩安葬在东京的武藏野陵，国葬仪式遂告结束。昭和时代也随之降下帷幕，载入了史册。他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漫长的64 年的执政生涯中，亲身经历了日本从发动“二战”到战败投降，从一贫如洗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全过程；他既对战前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最高责任，也为战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过积极的努力；他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历经胜与败、衰与兴的沧桑变化，而且至今仍颇有争议的重要人物，这就是裕仁天皇。

附录　裕仁天皇年谱

公元纪年	日本年号	年龄	月日	大事记
1901	明治 34	0	4. 29	皇太子明宫嘉仁亲王的第一个皇子出生
			5. 5	命名为裕仁，宫号为迪宫亲王
			7. 7	转由东京麻布的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伯爵家教养
1902	35	1	1. 30	签订《日英同盟》
			6. 25	淳宫雍仁亲王（秩父宫）出生
1903	36	2	3. 6	久迩宫良子（后来的昭和天皇皇后）出生
1904	37	3	2. 10	日俄战争开始
			11. 9	裕仁从川村宅邸移居沼津御用邸
1905	38	4	1. 3	弟弟光宫宣仁亲王（高松宫）出生
			4. 14	从沼津御用邸移居青山皇孙御殿
			9. 5	日俄签署《朴茨茅斯条约》
1906	39	5	5. 5	在皇家幼儿园学习
1908	41	7	4. 11	入学皇家学习院初等科
1912	明治 45 大正元年	11	7. 30	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即位，改元大正，裕仁亲王被封为皇太子
			9. 9	升任陆海军少尉

			9.13	明治天皇大丧，乃木希典夫妇殉死
1913	2	12	3.25	移居高轮东宫临时御所
1914	3	13	4.2	皇家学习院初等科毕业
			4.11	昭宪皇太后去世
			5.4	举行皇家学问所（总裁：东乡平八郎）开学仪式
			7.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0.31	晋升陆海军中尉
			11.16	裕仁亲王在千叶县视察近卫师团的机动演习
1915	4	14	11.10	大正天皇在京都御所举行即位大礼
			12.2	澄宫崇仁亲王（三笠宫）出生
1916	5	15	10.31	晋升陆海军大尉
			11.3	在皇居御所举行立太子仪式
1917	6	16	11.7	苏维埃政权成立
			11.12	皇太子视察近卫师团机动演习
1918	7	17	1.14	与久迩宫良子内定婚约
			7.1	皇太子乘“鹿岛号”军舰到东北地区旅行
			10.12	皇太子在横滨视察联合舰队
			1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	8	18	5.7	举行成人仪式
			6.10	皇太子与久迩良子的婚约成立
			10.22	皇太子视察海军特别大演习
			11.9	皇太子视察海军特别大演习
1920	9	19	10.31	晋升陆海军少佐
1921	10	20	2.28	从皇家学问所毕业

			3. 3	乘坐军舰“香取号”出访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9.3 回国）
			11. 4	原敬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刺杀
			11. 16	皇太子统监陆军特别大演习
			11. 25	就任摄政宫
1922	11	21	9. 28	举行久迩良子的“纳彩仪式”
			11. 12	皇太子统监在香川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
1923	12	22	4. 12	乘坐军舰“金刚号”出发，去台湾旅行
			7. 27	皇太子登富士山
			9. 1	关东大地震
			9. 15	视察东京震灾
			9. 19	因震灾，发表延期结婚仪式的通告
			10. 10	视察横滨、横须贺震灾
			10. 31	升任陆海军中佐
			12. 27	虎门事件（被难波大助袭击）
1924	13	23	1. 26	与良子结婚，居住于赤坂离宫
			8. 5	去福岛县猪苗代湖畔的翁岛进行新婚旅行
			11. 1	统监在石川举行的陆军大演习
1925	14	24	5. 10	大正天皇、贞明皇后银婚式
			8. 5	乘坐军舰“长门号”出访桦太
			10. 11	统监在山形、秋田、宫城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
			10. 31	升任陆海军大佐
			12. 6	第一皇女照宫成子内亲王出生
1926	大正 15 年	25	7. 15	那须御用邸完成

	昭和元年		12.25	大正天皇去世，摄政宫裕仁亲王践祚，改元昭和
1927	2	26	2.7	在新宿御苑举行大正天皇大丧仪式
			5.28	第一次出兵山东
			7.28	在小笠原等地视察联合舰队训练
			9.10	第二皇女久宫祐子内亲王出生
			10.20	出任在本州南海面举行的海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1.13	出任在爱媛县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928	3	27	3.8	两岁的久宫祐子内亲王夭折
			4.19	第二次出兵山东
			5.8	第三次出兵山东
			6.4	皇姑屯事件
			9.14	从赤坂离宫移居皇居
			10.4	出任在岩手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1.10	在京都御所举行即位仪式
			11.14	大尝祭
			12.2	亲阅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的大阅兵式
			12.4	亲阅大礼特别阅舰式
1929	4	28	9.30	第三皇女孝宫和子内亲王出生
			11.14	出任在茨城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930	5	29	11.12	出任在冈山、广岛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1.14	滨口首相在东京车站被枪杀
1931	6	30	3.7	第四皇女顺宫厚子内亲王出生
			9.18	九一八事变爆发

			11.8	出任在熊本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总裁
1932	7	31	1.8	“樱田门外”事件
			3.1	“满洲国”“建国通电”发表
			5.15	“五一五”事件
			9.15	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
			11.10	出任在大阪、奈良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933	8	32	3.27	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8.16	出任海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0.22	出任在福井、京都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总裁
			12.23	皇太子继宫明仁亲王出生
1934	9	33	11.10	出任在群马、枥木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总裁
1935	10	34	2.28	“天皇机关说”事件
			4.6	接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1.6	出任鹿儿岛、宫崎的陆军特别大演习总裁
			11.28	第二皇子义宫正仁亲王出生
1936	11	35	2.26	“二二六”事件
1937	12	36	7.7	卢沟桥事变爆发
			11.20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在宫中设立大本营
			12.13	南京大屠杀
1938	13	37	8.11	视察横须贺海军航空厂、木更津海军航空队
			10.10	视察熊谷陆军飞行学校
1939	14	38	3.2	第五皇女清宫贵子内亲王出生
			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1.8	视察在富士山麓举行的近卫师团演习

1940	15	39	6. 26	溥仪访日
			9. 27	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
			10. 11	检阅特别阅舰仪式
			11. 10	在皇居前广场举行皇纪 2600 年庆典
1941	16	40	12. 1	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12. 8	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发表对美、英宣战诏书
1942	17	41	7. 13	视察霞浦海军航空队
			7. 21	视察陆军宇都宫机场
			12. 12	亲拜伊势神宫（向祖先神灵报告战况）
1943	18	42	6. 24	视察横须贺海军工厂的“武藏号”战舰
			10. 13	照宫成子内亲王与东久迩宫盛厚王结婚
			12. 9	视察埼玉县陆军预科士官学校
1944	19	43	12. 14	移住防空设施——御文库
1945	20	44	3. 10	第一皇孙东久迩宫信彦王出生
			3. 18	视察东京下町地区
			5. 26	在空袭中，明治神宫被烧毁
			6. 6	在天皇临席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本土决战方针
			8. 14	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8. 15	战争结束，播放停战诏书
			8. 30	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到达厚木机场
			9. 25	接见外国记者
			9. 27	拜访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
			11. 14	亲拜伊势神宫，奉告战争结束
			11. 20	亲拜靖国神社
			12. 22	会见日本记者

1946	21	45	1. 1	发表《人间宣言》及国运振兴的诏书
			2. 19	视察神奈川县川崎、横滨两市的复兴状况，巡幸地方开始
			2. 28	视察东京都内
			3. 25	巡幸群马县
			3. 28	巡幸埼玉县
			5. 24	通过广播号召国民克服粮食困难
			6. 6	巡幸千叶县
			6. 17	巡幸静冈县（一直到6. 18）
			6. 18	远东军事法庭基南首席检察官声明“不对天皇进行审判”
			10. 21	巡幸爱知、岐阜两县（一直到10. 26）
			11. 18	巡幸茨城县（一直到11. 19）
1947	22	46	5. 3	与皇后一同出席在皇居前广场举行的新宪法施行纪念仪式
			6. 4	巡幸京都、大阪、和歌山、兵库等府县（一直到6. 15）
			6. 23	召开颁布新宪法后的第一次国会
			8. 5	巡幸宫城、岩手、青森、秋田、山形、福岛等府县（一直到8. 19）
			9. 4	巡幸栃木县
			10. 7	巡幸新潟、长野、山梨等县（一直到10. 15）
			10. 14	召开皇室会议，作出除秩父、高松、三笠三宫家外，其他11宫家脱离皇籍的决定
			10. 23	巡幸福井、石川、富山等县（一直到11. 2）
			10. 30	出席在石川召开的国家体育大会开幕式

			11.27	巡幸鸟取、岛根、山口、广岛、冈山等县（一直到12.12）
1948	23	47	3.23	与皇后出席义宫的学习院初等科毕业仪式
			7.1	将宫城更名为皇居
1949	24	48	1.26	举行银婚仪式宴会
			5.17	巡幸九州各县（一直到6.12）
			6.15	出席日本学士院颁奖仪式（以后每年出席）
			9.18	与皇后出席横滨夏季国家体育大会
			9.25	第一部著作《相模湾产后鳃类图谱》出版
1950	25	49	3.12	巡幸四国和淡路岛（一直到4.1）
			4.4	出席在山梨县甲府举行的第一次国土绿化大会
			5.20	孝宫和子内亲王与鹰司平通结婚
			5.29	出席日本艺术院颁奖仪式
1951	26	50	4.15	与卸任归国的麦克阿瑟举行最后的会见（两人第11次会面）
			5.17	贞明皇太后去世
			11.3	出版歌集《九州杜鹃》
			11.11	巡幸京都、滋贺、奈良、三重等府县（一直到11.25）
1952	27	51	3.26	与皇后出席皇太子（高等科）、厚子内亲王（短期大学）的毕业仪式
			5.2	出席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的全国战死者追悼大会
			5.3	出席在皇居前广场举行的独立庆典仪式
			6.3	参拜伊势神宫等地
			7.31	参拜明治神宫

			10. 10	顺宫厚子内亲王与池田隆政结婚
			10. 16	参拜靖国神社
			11. 10	皇太子明仁亲王举行成人仪式、立太子礼
1953	28	52	1. 4	秩父宫雍仁亲王去世
			5. 6	巡幸千叶县
			11. 5	举行战后首次游园会
			11. 10	与皇后在歌舞伎座观看表演
1954	29	53	3. 24	与皇后出席义宫的学习院高等科毕业仪式
			4. 5	巡幸兵库、三重两县
			4. 8	参拜伊势神宫
			6. 9	视察北海道，战后全国巡幸活动结束
			8. 22	出席在北海道召开的国家体育大会
			10. 19	参拜靖国神社
1955	30	54	5. 24	在藏前国技馆观看相扑比赛
			11. 28	义宫正仁亲王举行成人仪式
1956	31	55	4. 23	参拜靖国神社
1957	32	56	1. 25	与皇后出席枥木冬季国家体育大会
1958	33	57	5. 24	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宣布第三次亚运会开幕
			11. 27	在皇室会议上，决定皇太子妃为正田美智子
1959	34	58	1. 14	皇太子、正田美智子的纳彩仪式
			4. 8	参拜靖国神社
			4. 10	皇太子明仁亲王与美智子结婚
			10. 25	与皇后出席东京秋季国家体育大会
1960	35	59	3. 23	皇长孙浩宫德仁亲王降生
			3. 10	清宫贵子内亲王与岛津久永结婚
1961	36	60	4. 24	慰问日赤长崎原子弹爆炸医院的患者

			4. 29	在皇居举行庆祝60岁诞辰的宴会
			7. 23	长女东久迩成子去世
			11. 27	天皇居所吹上御所建成
			12. 8	从御文库移居吹上御所
1962	37	61	4. 29	出版著作《那须的植物》
1963	38	62	3. 6	皇后60岁生日
			8. 15	出席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战死者追悼大会
1964	39	63	9. 30	义宫正仁亲王与津轻华子结婚，创立常陆宫家
			10. 10	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上，作为名誉裁判宣布开幕式
1965	40	64	10. 19	参拜靖国神社（结束战争20年）
			11. 30	皇孙礼宫文仁亲王（秋篠宫）降生
1968	43	67	10. 23	与皇后出席明治1000年纪念仪式
			11. 14	举行皇居新宫殿落成仪式
1969	44	68	4. 18	皇孙纪宫清子内亲王降生
			9. 30	出版《天草诸岛的水螅虫类》
1970	45	69	3. 14	出席在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开幕式
1971	46	70	4. 16	参拜广岛原子弹爆炸慰灵碑
			5. 13	被选为英国学士院会员
			9. 7	参拜伊势神宫
			9. 27	与皇后出访欧洲七国（丹麦、比利时、法国、英国、荷兰、瑞士、联邦德国），于10. 14归国
1972	47	71	2. 3	在札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作为名誉裁判，宣布大会开幕
			3. 1	《那须的植物志》出版

			5. 15	出席冲绳回归纪念仪式
			6. 23	在位日数超过明治天皇的16618天
1973	48	72	4. 3	曾孙东久迩征彦降生
1974	49	73	1. 26	举行结婚50年的金婚仪式
			4. 30	出版歌集《黎明集》
			11. 7	参拜伊势神宫
			11. 19	会见美国总统福特
1975	50	74	9. 30	出访美国，10. 2在华盛顿与福特总统夫妇会见，10. 14归国
			10. 25	参拜伊势神宫
			10. 31	第一次召开与日本记者的公开会见
			11. 21	终战30年，参拜靖国神社
1976	51	75	5. 22	出席在茨城县举行的植树节
			11. 10	在武道馆，举行由政府主办的在位50年纪念庆典仪式
1978	53	77	10. 23	会见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10. 25	《相模湾产甲壳异尾类》出版
1979	54	78	6. 28	与出席东京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首脑会见，并在宫中举行晚宴
1980	55	79	5. 27	会见中国总理华国锋
			11. 13	《伊豆须崎的植物》出版
1983	58	82	6. 20	《伊豆大岛及新岛的水螅虫类》出版
1984	59	83	1. 26	结婚60年（钻石婚）庆祝仪式
			6. 20	《巴拿马湾产的新水螅虫》出版
			9. 6	会见韩国总统全斗焕夫妇
			9. 26	与皇后在猪苗代湖畔旅行

1985	60	84	7.13	突破历代天皇最长寿纪录（30757天）
			11.3	《那须的植物志续编》出版
1986	61	85	4.29	在国技馆举行由政府主办的在位60年庆典仪式
			4.29	《相模湾产海胆类》出版
1987	62	86	2.3	高松宫宣仁亲王去世
			3.31	《相模湾产海蜘蛛类》出版
			9.22	在宫内厅医院住院，确诊为胰腺癌，被切除一段结肠
1988	63	87	8.15	出席在日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
			8.31	《相模湾产水螅虫类》出版
			9.19	在吹上御所出现大出血，卧床不起
			9.22	将国事行为全面委托皇太子
1989	昭和64年	88	1.7	上午6时33分去世
	平成元年		1.31	追赠“昭和天皇”的谥号
			2.17	将裕仁诞生的4月29日定为“绿之日”
			2.24	在新宿御苑举行大丧仪式，葬于武葬野陵
			11.30	《皇居的植物》出版